

2017 / 06
总第 217 期



中國注册會計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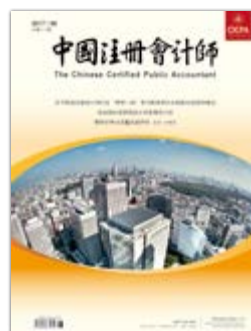
The Chinese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

关于推进注册会计师行业“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指导意见
经合组织成员国会计改革情况介绍
事务所审计质量改进研究 袁敏 徐菁霞



中国注册会计师

The Chinese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



2017年06期 [总第217期]

- | | |
|-----------------|---|
| 主办 |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
| 编委会主任委员 | 陈毓圭 |
| 委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 汤云为 孙 铮 杨雄胜 张连起
张新民 陈 晓 陈景庚 金德华
孟 焰 胡少先 徐 华 郭道扬
彭高俊 韩传模 鲁 玉 谢志华
潘永和 |
| 主编 | 刘晓莲 |
| 副主编 | 周 艳 |
| 主管单位 |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
| 出版单位 | 中国注册会计师编辑部 |
| 发行单位 | 《中国注册会计师》编辑部 |
| 通讯处 |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16号院2号楼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100039 |
| 设计制作 | 北京枫之杨企业策划有限公司 |
| 印刷单位 |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
| 国际刊号 | ISSN 1009-6345 |
| 国内刊号 | CN11-4552/F |
| 国内定价 | 6.00 元 |
| 编辑电话 | 010-88250287 |
| 投稿邮箱 | edit@cicpa.org.cn |
| 征订电话 | 010-88250286 |

目录

CONTENTS

行业建设与发展

- 07 | 关于推进注册会计师行业“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指导意见
- 11 | 中央党校中央国家机关分校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行业党员骨干进修班（第八期）开班
- 12 |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关于开展“2017年全国会计领军（后备）人才注册会计师类（信息化方向）”选拔工作的通知
- 14 | 整合教育培训资源 提升培训工作会员满意度——全国各级注协 2016 年度人才建设情况总结报告
- 17 | 积极发挥“引领、高端、覆盖、补齐、指导”作用——中注协 2016 年度远程培训工作情况总结
- 20 | 2016 年度会计服务示范基地工作回眸
- 25 | 行业代表委员谈履职感想
- 31 | 地方领导关心行业和协会建设

行业创新服务案例

- 33 | 提升不良资产包处置能力 | 龚华娟
- 35 | 从财务咨询切入帮助企业实现管理升级 | 童善进 何柳青 胡长飞

会计师事务所治理与管理

- 37 | 中小事务所服务“双创”企业探讨 | 万燕敏

学术研究

- 46 | 半强制分红政策对上市公司价值的影响研究 | 佟锦霞
- 53 | 管理者特质、负债融资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研究 | 郭桂华 赵倩倩
- 60 | 我国审计费用影响因素研究现状及未来趋势 | 樊瑞炜 傅宏宇
- 67 | 媒体关注、资产误定价与非效率投资 | 刘文琪 杜闪
- 73 |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陷与审计师变更相关性研究 | 葛新旗
- 79 | 分析师盈利预测偏差对审计意见购买的影响 | 尤克清 张昊晨
- 85 | 文化价值观、企业并购与长期账面绩效 | 车伟娜
- 90 | “基底”行为视角下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演进模式 | 梁红俊

审计与鉴证

- 95 | 事务所审计质量改进研究——FRC 审计质量调查报告的启示与借鉴 | 袁敏 徐菁霞
- 99 | 新形势下会计师事务所如何做好科研经费审计工作 | 许诺 徐凯 成伟

会计

- 105 | 合并报表中少数股东权益金额变化及填列的思路 | 郭 磊
- 109 | 完全权益法下逆顺流交易调整抵销的逆向解析 | 张先敏

管理与咨询

- 112 | 企业改革中的管理会计创新分析 | 张小林
- 116 | 程序理性与结果理性在绩效管理中的演进研究 | 高 欣

法律与税务

- 120 | 企业所得税权责发生制的例外情形 | 翟 涛
- 124 | “营改增”后甲供工程计税方法研究 | 赵子悦 李晓 李文美

案例研究

- 127 | 合同能源管理业务会计核算典型案例解析 | 程晓刚

他山之石

- 131 | 经合组织成员国权责发生制会计改革情况介绍

行业信息

- 40 | 中注协工作
- 42 | 地方注协工作
- 13、29、36、39、封三 | 简讯
- 133 | 国内财经
- 136 | 国际财经

53 Research on Management Features, Debt Financing and Overinvestment Behaviors

Based on the Senior Management Echelons Theory, with the listed companies at Shanghai and Shenzhen stock exchanges from 2009 to 2014 as research objects, this article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s of management features on debt financing and overinvestment behaviors in companies. It shows that the gender, education background and financial experience of the management can enhance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debt financing on overinvestment behaviors. Compared with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education background and work experience of the management in non-state-owned companie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positive impacts of debt financing on enterprise value. To some extent, such conclusions could inspire the companies to properly select senior management.

85 Cultural Values, M&A Events and Long-term Book Performance

Cultural values are one of the core elements and represent the collective belief and code of conducts of a compan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values, this article analyzes M&A events and probes into the relations between percentage of equity held by the acquirer after gaining contro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ultural values of both parties in M&A events and the M&A performance. Based on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M&A events on A-share stock markets from 2011 to 2015, it shows that the more consistent the cultural values of both parties are, the better the long-term M&A book performance becomes. This article shows tha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unreasonable economic structure in China, to some extent, the positive and upward cultural values built by companies are beneficial to the long-term performance of the newly formed entities and such entities can then achieve rapid growth.

99 How can Accounting Firms Better Audit S & T Funds under New Circumstances

As independent third-party assurance providers, accounting firms have the unique advantages of professionalism, objectivity and independence an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upervision system of S&T fund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urrent status of such assurance services, the prominent problems and the underlying reasons; in line with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n accelerating administrative decentralization, innovative regulations and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into efficient services in the S&T field, it further puts forwar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accounting firms to improve the audit on S&T funds.

DEVELOPMENT OF THE PROFESSION 行业建设与发展



中共财政部党组印发《关于推进注册会计师行业“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现将《关于推进注册会计师行业“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指导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贯彻落实。

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对于进一步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全党，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生机活力，确保全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激励全党为实现崇高理想和宏伟目标而不懈奋斗，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各级财政部门党组、行业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把推进注册会计师行业“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实。各级财政部门党组要切实履行职责，指导支持各级注册会计师行业党组织根据属地党委及组织部门要求，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认真抓好落实，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中共财政部党组
2017年5月28日

关于推进注册会计师行业“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指导意见

2016年注册会计师行业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加强了行业党的政治建设，促进了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行业基层延伸，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现就推进行业“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提出如下意见。

一、从讲政治的高度充分认识推进行业“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重大意义

党章是管党治党的总章程，党规是党员思想和行为的具体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新发展，是我们党推进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始终坚持的行动指南。做合格党员是对每名党员的基本要求。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是坚持思想建党、组织建党、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的有力抓手，是不断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的有力抓手，是不断落实现代化建设要求积累了成功经验。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对于进一步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全党，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生机活力，确保全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激励全党为实现崇高理想和宏伟目标而不懈奋斗，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注册会计师行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行业党建承担着社会组织党建探索者的重要责任，推进行业“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的内在需要，是在新的起点上进一步深化行业党建工作的有效途径，是促进行业科学发展的重要保障。各级财政部门党组、行业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重要指示、《意见》和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常态化制度化工作座谈会精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这项工作的重大意义，抓紧抓实抓好，使行业党建工作持续走在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前列。

二、紧密联系行业实际把握目标要求

推进行业“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必须紧密联系行业、事务所和党员思想工作实际，坚持用党章党规规范党组织和党员行为，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行业要“紧紧抓住服务国家建设这个主题和诚信建设这条主线”推进行业科学发展重要批示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坚持学思践悟、知行合一，坚持全覆盖、常态化、重创新、求实效，不断增强行业各级党组织和党员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做到政治合格、执行纪律合格、品德合格、发挥作用合格。要不断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确保党组织充分履行职能、发挥核心作用，确保行业党组织和事务所党组织负责人忠诚干净担当、发挥表率作用，确保行业广大党员党性坚强、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团结凝聚职工群众、推动行业科学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证。要始终把思想教育作为首要任务，紧扣目标要求，有的放矢地开展思想工作，持之以恒运用强大的思想教育武器保证目标实现。

要坚持融入日常、抓在经常。事务所党组织要以“三会一课”为基本制度，以党支部为基本单位，把“两学一做”作为党员教育的基本内容，长期坚持、形成常态。突出问题导向，建立完善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的有效机制，推动行业各级党组织和党员自觉修正错误、改进提高，着力补齐工作“短板”；注重以上率下，以行业党组织和事务所党组织负责人带头学习、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的实际行动，为事务所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作出示范；强化分类指导，针对大中小不同规模事务所，区分党委、党总支、党支部、联合党支部等不同党组织形式明确工作要求，体现具体化、精准化、差异化；激发基层活力，充分调动党支部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探索创新党内教育和组织生活的有效方法；选树先进典型，引导行业党员向先进典型学习，见贤思齐；坚持常抓不懈，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综合运用督导检查等手段，探索“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工作方式，防止和克服紧一阵松一阵、表面化形式化、学习教育与思想工作实际“两张皮”等不

良倾向。

三、着眼领会掌握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安排学习

行业各级党组织要切实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方案》和《意见》，以及财政部党组《注册会计师行业“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的指导意见》，在引导党员领会掌握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上下功夫，针对行业从业人员流动性强、外勤作业时间长、长期加班加点的特点和实际情况，科学安排，创新方式方法，注重学习效果。

制定并落实学习安排计划。事务所党组织要按年度作出学习安排，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要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紧密结合起来；要结合党的重大政治活动、重点工作部署联系实际学、带着问题学、不断跟进学，做到学而信、学而思、学而行。行业各级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要根据自身实际制定个人学习计划，坚持缺什么补什么，每年完成规定学习任务。

采取行之有效的学习方式方法。坚持每年“一竿子到底”举办事务所党组织书记远程培训班，在行业继续教育中增加有关学习内容，帮助行业党员领会掌握党章党规和系列讲话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各级行业党组织要建立和维护好网上学习平台，事务所党组织要利用其内部管理信息系统、微信等网络方式，及时推送学习资料，方便行业党员采取小型、业余、分散的方式务实灵活地学习。行业各级党组织要通过举办演讲比赛、知识测试、征文等活动，激励督导党员增强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

注重学习效果。要着眼明确基本标准、树立行为规范学习党章党规，深刻认识党章是管党治党的总规矩总遵循，自觉践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廉洁自律准则和党内监督条例、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要求。着眼加强理论武装、统一思想行动学习系列讲话，准确把握蕴涵其中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领会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筑牢维护习近平同志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思想根基，在推动各项事业发展上体现新担当。

四、按照“四讲四有”标准引导党员做到“四个合格”

行业各级党组织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按照“四讲四有”标准，做到政治合格、执行纪

律合格、品德合格、发挥作用合格。在政治合格方面，重点是坚定理想信念，正确把握政治方向，坚定站稳政治立场，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执行纪律合格方面，重点是增强组织纪律性，执行党的决定，服从组织分配，严守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品德合格方面，重点是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大力弘扬忠诚老实、光明坦荡、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共产党人价值观，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发挥作用合格方面，重点是牢记党的根本宗旨，爱岗敬业、履职尽责，服务群众、奉献社会，敢担当、敢负责、敢作为，在深化行业党的建设、推进行业改革发展和服务国家建设的各项事业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创新载体措施，引导督促党员落实“四个合格”要求。组织开展做合格党员大讨论，明确行业党员日常行为规范。广泛推行党员戴党徽亮身份、承诺践诺等做法，增强党性意识，落实党员先进性要求，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结合党员个人特长，组织党员利用党员活动日、节假日、业余时间，开展志愿服务和结对帮扶，引导党员团结凝聚广大群众，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积极服务社会。

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激发争做“四个合格”党员的内生动力。注重发现、培育行业先进典型，大力宣传行业践行“两学一做”优秀党员先进事迹，用身边人、身边事激励党员学习先进，自我提升。设立党员先锋岗、党员示范岗等，调动党员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激励党员立足岗位创先争优。

完善党建与业务结合机制，为争做“四个合格”党员提供动力和舞台。结合开展行业主题年活动，立足行业党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功能定位，进一步探索建立健全行业党建与业务相结合的机制，为发挥事务所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供机制保障。每年梳理分析行业和事务所发展及党建工作的薄弱环节，研究确立若干重点任务，集中力量攻坚克难，引导党员在急难险重任务中作表率、当先锋。

五、联系思想工作实际经常查找解决问题

要把查找解决问题作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规定要求。党员要对照党章党规，对照系列讲话，对照先进典型，把自己摆进去，自省修身，打扫思想灰尘、进行“党性体检”，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重点解决什么问题；要查找分析理想信念是否坚

定、对党是否忠诚老实、大是大非面前是否旗帜鲜明、是否做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着力解决党的意识不强、组织观念不强、发挥作用不够等问题。事务所党组织要查找分析组织生活是否经常、认真、严肃，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是否严格、规范，团结教育服务群众是否有力、到位，着力解决政治功能不强、组织软弱涣散、从严治党缺位等问题。要把党的组织生活作为查找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注重听取职工群众的意见和反映，建立完善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的有效机制。

落实谈心谈话制度。事务所党组织班子之间、班子成员和党员之间、党员和党员之间要开展经常性的谈心谈话，坦诚相见，交流思想，交换意见，及时发现问题。党组织书记要经常与党员谈心谈话，发现问题及时提醒。谈心谈话不仅要结合组织生活会进行，也要体现到日常工作沟通中，用好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要将事务所党员的违纪违法违规案例作为反面教材，认真开展警示教育。

认真开好组织生活会。地方行业党组织要根据属地党委部署每年对事务所党员组织生活会作出具体安排。事务所党组织要把组织生活会作为经常查找和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反映，深入查摆问题，剖析思想原因，严肃认真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团结-批评-团结”，严于解剖自身缺点，热忱帮助同志认识不足，要制定整改方案，认真加以整改。

坚持民主评议党员。以党支部为单位普遍开展党员评议，继续探索完善和推广利用网络开展党员民主评议的工作方式，要重点抓好对党员合伙人（股东）的评议工作。要依据评议结果帮助引导党员自觉认识问题，激励党员自我改进提高。探索建立行业党内监督执纪制度，严格稳慎处置不合格党员。

六、坚持行业党组织、事务所党组织负责人率先垂范

各级行业党组织要建立健全理论中心组学习制度，按年度作出学习安排，以理论中心组学习为主要抓手，组织行业党组织成员深入系统开展集体学习。理论中心组学习要把学习党章党规、学习系列讲话作为主要内容，确定主题，加强研讨式、互动式、调研式学习，发挥引领示范作用。要带头总结行业党建工作规律，对行业党建工作行之有效的做法、实践证明成熟的经验，及时用制度形式固定下来。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要带头攻坚克难，创新思路，强化举措，不断深化行业党的

建设。

事务所党组织班子成员特别是党组织书记要把“两学一做”作为锤炼党性的基本功、必修课，加强政治能力训练，自觉把讲政治贯穿于日常工作生活和党性锻炼的全过程，时刻牢记自己第一身份是党员。要带头学习，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理想信念、坚定“四个自信”，做到思想认同、政治看齐、行动紧跟。要带头做合格党员、合格书记，时刻检视存在的差距和不足，不断改造自己，提高思想政治觉悟。要践行“三严三实”要求，履职尽责、担当作为，务实功、求实效，积极推进事务所科学发展。要密切联系群众，切实改进作风，推进解决员工反映的问题。

七、把“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落实到党支部

党支部是党最基本的组织，是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要树立党的一切工作到支部的鲜明导向，注重把思想政治工作落到党支部，把从严教育管理党员落到党支部，把群众工作落到党支部。要把“两学一做”落实到党支部，并以“两学一做”为动力，把党支部建设成为教育党员的学校、团结群众的核心、攻坚克难的堡垒。

要把党支部建设作为最重要的基本建设。要结合行业管理服务等工作，健全事务所党的组织和工作动态覆盖机制，优化事务所党组织特别是党支部设置，不断扩大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选好配强党支部班子，落实事务所党员负责人担任党组织书记、管理层和党组织班子双向进入和交叉任职要求。加强对事务所党支部书记的培训，帮助其提高党务工作能力。制定事务所党组织工作手册，指导事务所党支部健全各项工作制度，不断规范党的组织生活、按期换届、党费收缴、发展党员等工作。

运用“三会一课”等制度抓好“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党支部要组织党员按期参加党员大会、党小组会和上党课，定期召开支部委员会会议。“三会一课”要突出政治学习和教育，突出党性锻炼，坚决防止表面化、形式化、娱乐化、庸俗化。要以学习党章党规、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为主要内容，针对党员思想工作实际，确定“三会一课”的主题和具体方式，做到形式多样、氛围庄重。推广党支部主题党日，组织党员在主题党日开展“三会一课”、集中交纳党费、服务群众等活动。利用红色教育基地开展开放式组织生活。行业各级党组织书记每年至少为行业党员讲一次党课，鼓励普通党员联系实际讲党课，组织党务专家、先进模范等到事务所讲党课。党课内容要贴近党员、贴近实际，不搞照本宣科，注重运用身边事例、现身说法，强化

互动交流、答疑解惑，增强党课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建立事务所党支部工作经常性督查指导机制。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党支部，为党支部开展工作和活动提供必要保障。事务所党支部要按照“定频次、定主题、定责任”的要求，制定“三会一课”年度计划并报上级党组织备案，如实、规范记录“三会一课”开展情况，加强检查考核，对没有正当理由长期不参加“三会一课”的党员，要进行批评教育，促其改正。行业党组织要坚持和完善行业党组织联系点制度、分片督导制度等，经常性开展督查，对开展“三会一课”不经常、不认真、不严肃的，要批评纠正；情况严重的，要采取整顿措施，进行组织处理。

八、以压实责任为抓手层层推动工作落实

各级财政部门党组、行业各级党组织要深刻领会“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对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性意义和基础性工程的地位，充分认识推进行业“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政治责任，高度重视，精心组织，抓常抓细抓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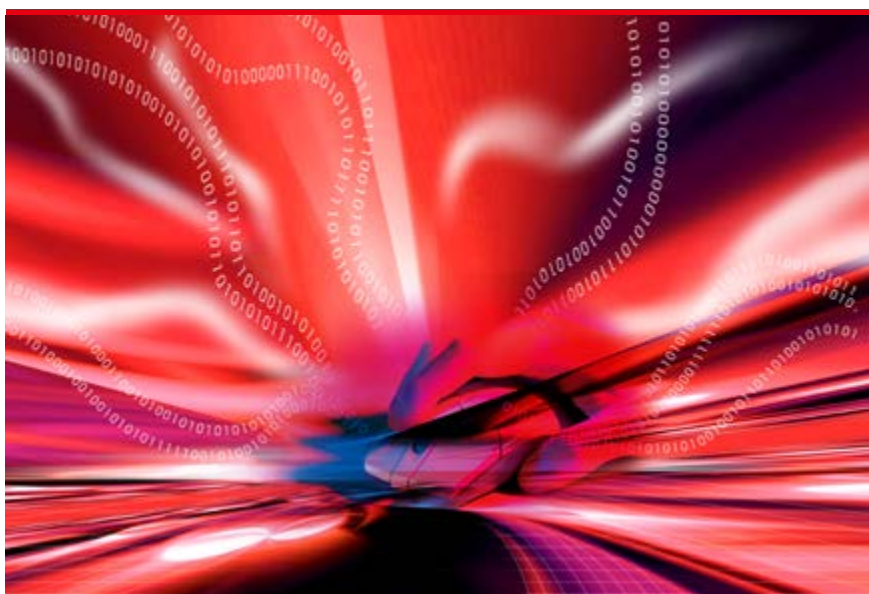
强化责任落实。各级财政部门党组要切实履行指导职责，加大指导支持力度。各级行业党组织要根据属地党委及组织部门要求，每年专门研究部署，结合实际加强督导。事务所党组织要作出具体工作安排。要强化“抓书记、书记抓”的工作机制，有效传递压力，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

强化督导考核。要建立健全督查机制，定期对“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开展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分析评估、指导推动，及时总结交流经验，发现和解决存在问题。将组织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情况纳入行业各级党组织党建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每年结合年度党建工作总结、述职进行检查和评估，作为评判党组织和党组织书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情况的重要依据，注重从党支部工作成效和所属党员作用发挥看效果，让事务所党员群众作评价。要把考核结果与党建资金支持、评先奖优、事务所综合评价等挂起钩来。对工作落实不力、搞形式走过场的，要严肃批评、追责问责。

强化舆论宣传。按照“具体化、接地气、有实效”的要求，在行业党建网、注协网站、会刊、微信公众号，以及事务所内刊、外网、宣传栏等开辟专栏，及时宣传“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新要求新进展和好做法好经验，大力宣传行业先进典型，营造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良好氛围。

中央党校中央国家机关分校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行业党员骨干进修班（第八期）开班

2017年4月24日，中央党校中央国家机关分校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行业党员骨干进修班（第八期）（简称行业党校班）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举行开班典礼。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党委常务副书记、中注协副会长兼秘书长陈毓圭，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纪委书记、院长助理杨卫东出席开班典礼并讲话，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党委副书记梁立群主持开班典礼。

陈毓圭同志在讲话中要求学员：一是高度重视理论学习。参加党校班，主要任务就是全面系统深入的学习党的理论，用党的先进理论武装头脑。要结合推进行业“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扎实推进党的理论学习，特别是原原本本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二是通过理论学习提高全面素质。要理论联系实际，有意识地把学理论、读原著与对具体实践的思考分析结合起来，注重交流互动，通过交流碰撞，开阔视野思路；要自觉把学习政治理论与加强党性锻炼结合起来，将加强党性锻炼贯穿于参加党校班的全过程，通过学习提升党性修养；把理论学习与落实财政部党组专题研究行业党建工作会议精神相结合

来，提高政治站位，深化对行业党建工作的认识，总结行业党建工作规律，提高党务工作能力，自觉深化行业党建的建设。三是加强班级管理。学员同志们要尽快完成从工作到学习、从个人家庭生活到学校集体生活、从单位负责人到普通学员的转变，全力投入学习；教学管理人员、班委会要负起责任，按照宁严勿松、宁紧勿散、宁苦勿纵的要求，严格执行各项纪律要求，认真完成各项教学任务，树立优良的学风。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支部书记、高级合伙人沈发兵代表学员发言表示，一定提高认识，端正态度，珍惜学习机会；遵章守纪，潜心求学，着力提升能力；团结协作，增进友谊，确保所有学员共同进步；坚持学做结合，争做“四个合格”党员，努力成为行业党建工作的行家里手，在促进行业发展、服务国家建设中争创佳绩，争当排头兵。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沈发兵、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天津分所曾欢、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山西分所张战兵、包头通和会计师事务所闫海英、沈阳市财政局注册会计师公会吴红招、哈尔滨市注册会计师行业党委王华淼、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安徽分所周胜、江苏华星会计师事务所吴华奇、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浙江分所郑彦臣、江西金山会计师事务所陈青如、商丘宏财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翟冬青、湖北楚星会计师事务所李农、贵州开元会计师事务所余宗科、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云南亚太分所陈荣举、新疆华龙会计师事务所张建民等参加本期党校班学习。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关于开展“2017年全国会计领军（后备）人才注册会计师类（信息化方向）”选拔工作的通知

■ 会协〔2017〕2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会计师协会：

为贯彻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落实《注册会计师行业信息化建设规划（2016-2020年）》关于“加强信息化人才，特别是信息化领军人才培养”的总体要求，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以下简称“中注协”）将开展“2017年全国会计领军（后备）人才注册会计师类（信息化方向）”的选拔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养目标

适应信息化发展新形势，围绕行业和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事务所”）信息化建设任务，培养事务所信息化建设的“操盘手”、行业信息化建设的“智囊团”和“宣传员”。

二、选拔对象及人数

本次选拔对象为“在事务所分管信息化工作的管理合伙人，或相当职责和相当级别的合伙人”。选拔人数50名左右。

本次选拔范围包括中注协发布的《2016年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前百家信息》所列事务所（含分所），以及省级注协综合排名前10家事务所（不含2016年度综合评价前100家事务所及其分所），其中2016年综合评价前20家事务所每家可推荐不超过2人，其余符合条件的事务所每家可推荐不超过1人。

《2016年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前百家信息》链接地址：http://www.cicpa.org.cn/news/201701/t20170112_49462.html。

三、选拔条件

（一）对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当前我国信息化建设的重大成果和进展有较深入的了解；

（二）对行业信息化发展现状与前景、信息化建设对行业的重要意义有较深入的认识；

（三）在事务所分管信息化工作的管理合伙人，或相当职责和相当级别的合伙人；

（四）具有事务所内部信息化建设，或为客户提供信息化服务的实操经验；

（五）职业诚信道德记录良好，最近3年未受过行业惩戒、行政处罚；

具有信息化专业背景，或具备较高英文能力者优先录取。

四、申报材料

（一）个人简历。包括基本信息、学习经历、工作经历、信息化领域工作经验与特长、主要客户及服务项目、发表文章及著作、主要社会任职及活动、参与行业专业活动情况、参加工作后的获奖情况等。

（二）信息化相关文章。为命题文章，字数不限，题目为“你所信息化建设的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进一步推动你所信息化建设的目标设定、路径设计和机制安排”。要求：文章中不能出现所在事务所名称、客户涉密信息和作者本人信息。标题宋体、三号、加黑、居中；副标题宋体、四号、不加黑（如有）；正文为仿宋、四号、不加黑；段首空二格，行间距为28磅；文章层次按照一、（一）1.的层次进行（如有）。

（三）事务所推荐信。包括但不限于宏观视野与战略思维，职业道德、职业价值观与职业态度，职业经验，团队领导与协调能力，社会责任意识等方面阐述推荐理由。

以上内容请在网上填报“2017年注册会计师行业领军（后备）人才（信息化方向）选拔测试”报名表（见附件1）。填好后，请直接打印并签字盖章。

此外，报名者具有的开展信息化领域相关工作实务和业绩（完成的信息化项目或正在主持或参与的信息化项目），发表过的信息化领域的研究文章、著作或工作报告，以及其他在信息化领域取得的业绩，除在报名表中填写外，请一并提交纸质证明材料。其中，研究文章、著作或工作报告，需提供文章首页及当期刊物封面复印件，著作、工作报告提供首页复印件。

五、选拔方式

采取“初选+结构化面试”两个阶段的选拔方式。

初选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成绩占总成绩的60%，按照选拔人数1:2的比例确定参加面试人员。结构化面试占总成绩的40%，重点考察考生的宏观视野与战略思维，职业道德、职业价值观与职业态度，及专业素质。面试不对考生的英文能力进行考察。

根据初选、面试综合成绩确定入选人员。

六、报名流程及审核

报名采取个人网络报名和提交申报材料同时进行的方式。

(一) 个人网络报名。请考生于6月2日(周五)前，使用电脑点击链接(http://tms.nai.edu.cn/online_wy/2013/zzx/loginKQ.aspx)，输入身份证号后填写个人信息、命题文章并上传个人电子照片。

(二) 提交申报材料。请省级注协收到通知后及时组织动员符合条件的事务所报名，就考生最近3年未受过行业惩戒、行政处罚进行审核并盖章，于6月2日(周五)前将申报材料及“2017年全国会计领军(后备)人才注册会计师类(信息化方向)选拔测试”报名汇总表(见附件2)以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报送我会，并寄送原件。

事务所的报名工作由总所统一负责，考生在分所工作的，应经分所所在地省级注协审核并盖章。

中注协将以短信及邮件方式通知审核通过进入面试的考生以及最终入选人员，并发送考生守则、考试安排、培训安排等重要信息，请务必正确填写有关信息。

七、时间、地点安排及相关提示

面试时间为6月24日(周六)，统一安排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以下简称“北京会院”)举行。请考生在参加面试当天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和执业证书复印件，以备查验。

通过面试的考生名单将在中注协网站(<http://www.cicpa.org.cn>)公示，请注意登录网站查看。入选人员将于7月31日至8月18日在北京会院进行首期集中培训。

八、联系方式

中注协继续教育部联系人：李丽；联系电话：010-88250156；

传真：010-88250056；电子邮箱：cpalingjun@cicpa.org.cn。

北京会院教务部及网络报名技术问题联系人：侯飞；联系电话：010-64505029；电子邮箱：houlf@mail.nai.edu.cn。

附件：

1. “2017年全国会计领军(后备)人才注册会计师类(信息化方向)选拔测试”报名表(略)
2. “2017年全国会计领军(后备)人才注册会计师类(信息化方向)选拔测试”报名汇总表(略)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2017年5月9日

抄送：深圳市注册会计师协会，相关会计师事务所。

简 讯

注册会计师行业再添2家“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

2017年5月4日，共青团中央集中对2016年度全国优秀团员、团干部和五四红旗团委(团支部)进行了表彰。其中，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银川分所团支部、广东省恒生会计(税务)师事务所团支部被共青团中央授予2016年度“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荣誉称号。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银川分所团支部和广东省恒生会计(税务)师事务所团支部组织设置规范，工作制度健全，团组织坚持政治性、先进性和群众性，其团员队伍也具有较强的政治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是全行业事务所团组织中的优秀代表。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团委表示，希望受到表彰的事务所团组织能够珍惜荣誉，在今后工作中继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也希望行业广大事务所团组织以先进为楷模，带领行业青年奋发向上、再创佳绩。

整合教育培训资源 提升培训工作会员满意度

——全国各级注协2016年度人才建设情况总结报告

2016年，全国各级注协紧密围绕行业服务国家“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围绕全面深化改革、“一带一路”等国家重点战略对行业的新要求，紧密围绕行业“创新服务年”主题活动，以提升行业专业服务能力为核心，以广大会员满意为根本出发点，着力在提升行业人才职业化水平上下功夫，深入推进行业人才队伍建设。按照2016年度工作安排，各级注协通力配合，圆满完成了2016年度培训工作任务，有关工作总结如下。

一、注册会计师继续教育完成情况

（一）总体情况

2016年，全国各级注协以服务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对行业服务需求为重点，以全面提升会员的专业知识，职业技能，职业价值观、道德与态度为目标，发挥自身优势，突出“制度、机制、内容、手段”四个创新，培训人次、培训完成率、培训方式、会员满意度等都与往年有较大提升，显露出从“要我学”到“我要学”的可喜变化。

全年注册会计师应培训213697人次，地方注协实际培训196445人次（含接受中注协远程培训），培训完成率91.93%。其中执业会员应培训103164人次，实际培训133766人次，培训完成率129.66%，其中有21省（市）实际培训完成率超过100%，分别是北京、甘肃、青海、新疆、西藏、上海、江西、江苏、天津、山西、宁夏、重庆、云南、广西、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浙江、河南、深圳；非执业会员应培训110533人次，实际培训62679人次，培训完成率56.71%，其中有12省（市）实际培训完成率超过60%，分别是广西、甘肃、福建、贵州、江苏、吉林、北京、上海、辽宁、云南、浙江、河北。

与此同时，中注协委托三家国家会计学院举办面授培训班52期，培训注册会计师5817人次。2016年，全国各级注协共培训执业注册会计师和非执业会员202262人次。

（二）执业会员继续教育情况

1. 总体情况

各地注协通过各种方式，积极组织本地区注册会计师参加各类培训：参加中注协举办的远程培训和委托三院举办的面授培训；发挥地区优势，举办各具特色的地方培训；加强对本地区会计师事务所内部培训的指导；积极开展地区之间在培训方面的合作。

地方注协全年举办各类培训班547期（含接受中注协远程培训班），应培训执业会员103164人次，实际培训133766人次。除举办远程外，中注协委托三院举办面授培训班52期，培训注册会计师5817人次。2016年，全国各级共培训执业会员139583人次，培训完成率135.3%。

从全年总体情况看，中注协委托三院培训总数为5817人次，占培训总人次数的4%；地方注协委托三院培训总数为5904人次，占培训总人次数的4%；参加中注协远程培训的总数为16409人次，占培训总人次数的12%；地方注协自主举办培训班培训35705人次，占培训总人次数的26%；事务所内部培训34220人次，占培训总人次数的24%；网络等其他培训方式41528人次，占培训总人次数的30%，较去年12.25%的比重有大幅提升。

2. 委托三家国家会计学院培训情况

三家国家会计学院是注册会计师行业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在行业人才素质提升中发挥重要作用。全年实际培训139583人次，地方注协委托三院培训5904人次，占全年实际培训人次数的4%。其中有4省（市）委托三院培训人次占全年实际培训人次超过10%，分别是福建、浙江、宁夏、山西。

与此同时，中注协委托三院举办面授培训班52期，培训注册会计师5817人次。2016年，全国各级注协委托三院培训注册会计师11721人次，占全年实际培训人次数的8.4%。

3. 地方注协自主办班培训情况

地方注协是行业人才培养的主体，承担

着本地区注册会计师培训的组织、管理、实施和确认工作。地方注协发挥地区优势，结合当地业务重点、热点、难点，举办各具特色的地方培训班。全年地方注协实际举办各类培训班547期，培训执业会员35706人次，占全年实际培训人次数的26%。其中有8省（市）自主办班培训人次占全年实际培训人次超过40%，分别是上海、辽宁、河北、青海、浙江、湖南、四川、海南。

4. 事务所内部培训情况

满足一定条件的会计师事务所可以自行开展内部培训，这对于减轻行业培训压力、增加培训的针对性和灵活性有重要作用。具有内部培训资格的事务所可以结合本所业务特色和淡旺季特点，在培训内容、课时安排、授课老师、培训时间、考核方式等方面更加灵活；结合行业工作重点和本所业务特点，注重重点内容和前沿内容的培训，更具时效性；培训形式将集中学习与特色课程、网络培训、自学、案例讨论、自由交流相结合，突出灵活性和实效性；能更加有效的针对不同的培训对象开展分层次的培训，培训对象更有针对性；同时能节省大量培训成本。

事务所内部培训34220人次，占全年实际培训人次数的24%。截止年初，除吉林、江西、河南、宁夏、深圳、西藏、甘肃、青海外，全国26省（市）具有内部培训资格事务所190家，其中有17省（市）事务所，内部培训人次占全年实际培训人次超过10%，分别是北京、江苏、深圳、天津、浙江、广东、上海、重庆、四川、福建、湖南、湖北、新疆、云南、辽宁、宁夏、陕西。

5. 网络等其他方式培训情况

我们积极倡导三院开发网络培训平台，支持各地注协利用网络形式开展培训，网络培训较传统培训来说不受时间、空间限制，同时节约成本，资源利用最大化特性使其对于基础性、普及性知识的学习更加适用。近年来，网络培训逐渐成为行业培训的重要方式之一。全年实际培训139583人次，网络等其他方式培训41528人次，占全年实际培训人次数的30%，较去年12.25%有大幅提升。其中有20省（市）网络等其他方式培训方式占全年实际培训人次超过30%，分别是广西、内蒙古、湖北、山东、云南、吉林、河南、重庆、深圳、广东、甘肃、黑龙江、天津、陕西、贵州、安徽、江西、西藏、山西、新疆。广

西、内蒙古、湖北、山东、云南、吉林等6地占比超过60%。

6. 助理人员、新批注册会计师、合伙人培训情况

近年来，我们引导分级分类培训，受到各地注协广泛响应。2016年，各地注协结合自身特点，针对助理人员、新批注册会计师、合伙人举办了专门培训班。有13省（市）专门举办了针对新批注册会计师的培训班，培训新批注册会计师2451人次，占全年实际培训人次数的1.76%，分别是上海、浙江、北京、江苏、福建、广东、河南、陕西、辽宁、重庆、云南、贵州、甘肃；有22省（市）专门举办了针对合伙人的培训班，培训合伙人5654人次，占全年实际培训人次数的4.05%，分别是辽宁、北京、四川、河南、广东、河北、山西、江苏、浙江、江西、福建、陕西、上海、安徽、贵州、甘肃、新疆、天津、重庆、广西、云南、青海。有16省（市）专门举办了针对助理人员的培训班，培训助理人员8299人次，分别是北京、江苏、河南、上海、云南、青海、山西、浙江、甘肃、重庆、宁夏、河北、安徽、福建、辽宁、贵州。

（三）非执业会员继续教育情况

近年来，针对非执业会员培训工作的难点，我们提出了“非执业会员的培训按照属地原则，由所属地方协会组织实施和管理”的思路。各地方注协利用三家国家会计学院等网络教学资源，与专业培训机构合作，举办专业论坛、研讨会、学术报告等方式把提高非执业会员的专业素质作为行业人才培养的一项重要工作，积极采取措施，努力为非执业会员的继续教育搭建平台。

2016年，从各地上报的数据来看，非执业会员有110533人，实际培训62679人次，培训完成率56.71%，较去年43.51%有大幅提升。28省（市）已陆续开展非执业会员的培训，培训方式主要有面授、远程、网络异步点播等。其中，广西注协的非执业会员培训完成率达到100%，福建、甘肃、贵州、江苏、吉林、北京、上海、辽宁、云南、浙江、河北等11地超过60%。

与此同时，中注协持续搭建海外非执业会员培训平台，通过与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合作，并征求海外非执业会员意见，推选了包含370个学时的课程包。2015年8月至2016年8月培训期内，共有51名海外非执业会员实际

接受培训。

（四）注协干部培训情况

为更好地服务会员，在加强行业会员培训的同时，中注协、各地方注协也注重协会干部自身素质提升。2016年，地方注协系统干部705人（不含中注协，数据来自全国注协系统内部通讯录），实际培训959人次，培训率136.03%。

2016年，中注协举办监管队伍和系统干部、行业财务人员等4期全国协会系统干部队伍培训班，包括三家国家会计学院教务部同志，各地注协秘书长，各级协会相关部室同志在内的420余人次参加了培训。12月14日-16日举办的“行业继续教育和人才培养及行业职业化建设研讨班”，各地注协秘书长、继续教育部相关同志，三家国家会计学院面授、网络部有关同志及中注协继续教育部相关同志共80余人参加了培训。

（五）行业信息系统录入情况

行业管理信息系统在注册会计师行业培训工作中发挥重要意义，培训学时信息的录入是培训管理的阶段性总结，也是关乎培训管理质量的重要工作。对此，各省注协积极主动应对，及时把出现的问题报送中注协和软件公司，克服困难，完成全年数据录入工作。

截至2016年12月底，各省已基本完成行业管理信息系统数据的录入工作。由于行业信息系统中会员数据更新滞后，因此在培训系统的数据中，部分地区的培训完成率低于总结中上报的数据。辽宁、河南、山西、甘肃、河北、天津、湖北、西藏、吉林、安徽、江西、广西、江苏、上海、湖南、云南、广东、福建、山东、宁夏、北京、内蒙古等地的培训完成率均超过90%。

二、高端人才选拔培养情况

为发挥高端人才在本地区行业发展和事务所建设中的引领作用，各地注协大力加强高端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北京、天津、河北、山西、辽宁、吉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重庆、云南（2016年新增）、宁夏、新疆等23省份已经启动或继续开展本地区领军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工作。

全国各级注协选拔培养领军人才142批

次，培养2860人次；毕业94班次，毕业1669人次；培养周期2-5年，3年居多；取得国际资格246人；入选全国会计领军（后备）人才注册会计师类52人（见附件5）。其中，有13省（市）为自主举办，分别是北京、河北、山西、辽宁、吉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山东、广西、云南；有8省（市）为依托财政部门，分别是天津、福建、湖南、广东、海南、重庆、宁夏、新疆；有2省（市）两者结合，既有自主举办，又有依托财政部门，分别是河南、四川；有6省（市）领军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工作于2010年之前启动，分别是浙江、广东、广西、河北、吉林、上海；有6省（市）选拔培养领军人才超过10批次，分别是北京、天津、河南、广东、广西、海南；有9省（市）选拔培养领军人才超过100人，分别是北京、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山东、河南、四川；有6省（市）毕业人数超过100人，分别是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河南；取得国际资格246人中，上海118人、江苏125人、河南2人、山东1人；入选全国会计领军（后备）人才注册会计师类52人中，江苏24人、上海18人、天津6人、安徽2人、山西1人、广西1人。

三、几点建议

一是积极拓展培训方式，提高培训的灵活性，为会员提供更加便利的培训途径。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鼓励支持地方注协依托具有网络培训经验的培训机构开设的网络教学平台，同时网络课堂实施中充分考虑面授课程安排，做好横向和纵向的衔接。

二是指导地方领军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工作，积极引导地方领军人才参加全国会计领军（后备）人才的选拔和培养，提高领军人才培养层次，扩大领军人才宣传，提升行业知名度，同时大力推动领军人才反哺行业。

三是聚焦行业重点工作，鼓励会员积极参加中注协远程培训班、委托三院面授班、网络课程和地方注协自主办班等，实现新审计报告准则培训的全覆盖。

四是行业信息系统中的数据有待进一步完善，保持动态更新，确保应培训人数、实际培训人数与系统数据时时吻合。

（中注协继续教育部 白晓红 刘翔）

积极发挥“引领、高端、覆盖、补齐、指导”作用

——中注协2016年度远程培训工作情况总结

2016年，远程培训以提升行业人才综合素质、增强行业专业服务能力的核心，围绕行业服务国家“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结合全面深化改革、“一带一路”等国家重点战略对行业培训工作的新要求，我们积极整合培训主体资源、调整培训主体定位，着力以满足会员需求为宗旨、以提升满意度为目标，设计和实施培训“供给”，根据年度培训计划，深入推进远程培训工作。

一、总体情况

全年共举办5期远程培训班，开通257个分会场，培训注册会计师19809人次，占全年2.65万培训总人次数的74.75%，与去年占比基本持平。

二、组织实施

在培训班筹备过程中，中注协、承办地主场及各地方注协分会场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通力配合，共同做好培训的组织实施工作。

（一）抓好核心环节

远程培训由中注协主办，本着“引领、高端、覆盖、补齐、指导”定位，重点抓好计划编制、主题设定、课程设计、师资选配等培训工作的核心环节，确保高质量的培训。

1. 设计培训主题：围绕国家改革热点、行业工作重点、业务控制难点，精心编制全年培训计划

2016年，围绕国家重点战略对行业服务需求的重要领域开设了5个专题班，包括宏观形势及政策解读、财政预算评审与绩效评价、新审计报告准则、风险导向审计与职业判断，以及行业党组织书记能力建设。其中新审计报告准则专题是为新审计报告准则在上上市公司中先行实施而开设。

2. 设计课程内容：注重专题内在逻辑，侧重应用性和操作性

在年度培训计划基础上，通过征求地方

注协、事务所、相关领域专家、优秀师资的意见，对每期培训课程进行了“再设计”。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侧重实务案例分析、注重应用性和操作性。继续作为“领军人才援教项目”的“风险导向审计与职业判断”培训班，在沿用去年相关专题课程设置基础上进行相应调整。围绕培训主题，课程包括职业怀疑框架与近期资本市场舞弊案例、审计计划及风险识别、审计程序的进一步设计与执行、风险导向审计技术的落地及事务所审计底稿审核、综合风险评估等。专题课程设置侧重实务案例分析，注重方法论和操作性，特别是针对注册会计师执行审计业务过程中的职业判断。

二是突出课程内部逻辑性。为积极配合财政部2014年启动的财政管理体制特别是预算管理体制改革的，帮助会计师事务所更好地适应新的服务领域的需要，有效提升参与财政投资预算评审和绩效评价的专业服务能力，远程连续3年举办财“政预算评审与绩效评价”相关专题培训班。结合政策要求和市场需求，培训班课程设置加大了预算评审的份量，具体包括中央及地方财政预算评审与绩效评价的政策解读、指标体系、操作规程、实务案例、文书撰写等，注重政策和实务相结合，注重具体案例分析和内部逻辑性。

三是服务行业重点工作。2015年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IAASB）发布新修订的国际审计报告相关准则后，中注协研究国际审计报告改革最新成果，按照持续趋同要求，对原有审计报告相关准则做出了修订，并于2017年1月1日起分批分步骤实施。本着服务行业重点工作的理念，为做好新审计报告准则实施范围相关对象培训覆盖，中注协于7月26日-28日举办了远程专题培训班，开设的课程包括总体情况介绍、7个准则解读、问题解答、判断指南和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业务指引等，培训注册会

计师3738人次。

3. 组织选配师资：围绕专题课程，综合发挥行业内外专家优势

优秀师资是培训效果的重要保障。5个专题25讲的20位老师，分别来自中央党校科学哲学部、财政部预算评审中心、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九州证券有限公司、瑞华、瑞华（河北分所）、天健、信永中和、天职国际、致同、中审众环（重庆分所）、武汉宏信会计师事务所，以及中注协专业标准与技术指导部和继续教育部2个部室。

配合课程设计，在师资选择上呈现了以下特点：一是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行业内与行业外相结合的方式，在政府、高校、中注协、事务所等相关领域中有针对性地选配优秀师资授课，其中外部专家、业内专家、协会专家各占60%、20%、20%。二是侧重实务和案例教学，其中来自事务所一线专家占60%。三是培养开发新课程师资，其中新开发的师资占总师资的20%。四是继续发挥行业领军人才优势。连续两年举办的“风险导向审计与职业判断”培训班由行业6位领军人才担任授课师资，课程内容从事务所业务实际出发，所讲案例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广大中小所注册会计师纷纷表示，培训班不仅开阔了眼界，同时业务上也有很大启发。总体上，加大了外部专家和一线实务专家参与授课，以确保培训效果。

（二）充分依托承办地注协资源

作为网络直播的培训形式，远程培训较面授来说更多地依靠主会场的软、硬件设施。根据中东部省份支持的需要和申请，在充分考虑人员、技术、场地基础上，5期远程培训的主会场分别设在山西、安徽、河北、广东、北京。

北京、河北、山西、安徽、广东5个承办地注协各级领导高度重视，把培训班的筹备和举办作为阶段性重点工作来抓，为培训班的举办做了大量工作，包括前期主会场场地选择、设备协调、学员管理，以及师资接送、食宿安排，后期报账事宜等。

（三）筹备衔接及现场组织协调

远程培训的顺利举办需要中注协、主会场和各地分会场的共同配合。中注协除了主题确定、课程设计、师资聘请等核心环节外，在具体筹备过程中还包括讲义收集整理和传送，点数统计及收看连接发放，与主会

场线路、设备的沟通、对接、测试，培训过程全程监控、现场协调、总结收尾及结算等事项，主会场和各地分会场包括组织招生、场地协调、讲义印制及下发、班务管理、收集反馈现场问题、考试评价和学时录入等。

2016年远程培训共设5个主会场、257个分会场，培训注册会计师1.98万人次。注册会计师人数较多和分布较广的省份还依托所在地地市注协和有条件的事务所开设分会场。新疆注协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在十余个地市级协会和事务所内部设立分会场，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受到所在地注册会计师的支持、肯定。

三、培训特点

2016年远程培训在2015年基础上进行了调整和创新，体现出注重高端培训和调短培训天数的显著特点。

（一）注重高端培训

2014年以来，在整个注册会计师培训体系中更加突出分级培训特点。2015年远程培训根据培训对象级别的不同分别设计了不同的专题及课程，培训对象涵盖助理人员、新批注册会计师、一般注册会计师、经理和质量控制人员。

2016年首次开设针对合伙人（负责人）能力提升的培训专题——“宏观形势及政策解读”。本专题将合伙人（负责人）的培训纳入远程培训体系，体现出注重高端培训特点。培训班旨在提升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的业务能力、管理能力和综合素质，内容包括：如何制作标书与现场陈述、会计师事务所业务创新、会计师事务所信息化建设与信息化咨询服务、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规则解读、系统思想与管理思维。

培训班首次将合伙人纳入远程培训体系，不仅整合了各地注协合伙人培训的资源，节约了培训成本，更使培训对象涵盖了从助理、新批注册会计师、一般注册会计师、经理、质量控制人员到事务所合伙人（负责人）的所有级别人员的培训。

（二）调短培训天数

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继续教育制度》规定，注册会计师每年需要完成40个学时的后续教育，一天培训最多可确认8个学时，由此多年来远程培训形成了每期培训5天的模式。近年来有部分学员反映培训天数较长，

容易引起培训疲劳。同时为配合培训供给方式多元化、分级化、模块化，以及开展大规模网络培训，2016年4期远程培训中，除1期为5天外，其余3期均调整为3天。

培训天数的缩短极大地增加了培训的灵活性，不同地区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将规定动作与自选动作结合起来。除统一的3天课程外，各地注协可结合当期培训主题，采取自主安排当地特色业务课程、网络培训、自学、案例讨论、自由交流等多种方式。

（三）提升培训满意度

搞好培训效果评估。坚持对培训情况进行检查、考核和反馈，将随堂检查、考试、撰写心得和调查问卷结合起来，丰富考核形式，不断提高培训工作的科学化、精细化水平；探索加强师资队伍动态评估，建立完善有进有退、合理流动机制。优秀师资是培训效果的重要保证，对授课效果好、多次聘请的师资进行在册登记管理；对新聘请师资进行全面测评，按照政治素质、授课（教学方式、组织表达、讲义制作等）和课程（理论性、实践性、前沿性等）三个方面，力求开展多维度的综合评价，同时对评价较差的师资进行淘汰，不断提高会员培训满意度。

2016年学员对5期远程的课程评价和对20位教师的评价结果分别是4.58分、4.64分、4.6分和4.85分（满分5分），均达到4.5分以上，普遍受到学员好评。

四、体会和建议

（一）以“引领、高端、覆盖、补齐、指导”为定位，统筹规划全年远教工作

远程培训作为中注协直接服务会员的一项举措，以持续提升行业整体素质为目标，服务经济发展热点和行业发展重点，定位于“引领、高端、覆盖、补齐、指导”。以重点内容强化培训引领行业年度培训工作的方向；把握国家和行业前沿、热点领域，做好高端领域培训；以常规内容为依托实现普及性内容的覆盖。新审计报告系列准则于2017年1月1日起分批、分步骤实施。为确保新审计报告准则执行到位，中注协将新审计报告准则的培训作为2016年度培训重点工作，于7月26日-28日在河北举办了新审计报告准则专题培训班。培训班设立66个分会场，培训注册会计师3738人次。同时“宏观形势及政策

解读”、“行业党组织书记能力建设”、“风险导向审计与职业判断”、“财政预算评审与绩效评价”等主题均体现了“引领、高端、覆盖、补齐、指导”的要求。总之，以这一定位的远程培训在整个行业培训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以“能力素质提升”为理念，办好每期远程培训

远程培训是行业培训工作的一种重要形式，旨在提升行业人员的综合素质。把握国家发展和行业热点领域，体现重实务、重操作特点，将培训理念由“知识传授型”向“能力素质提升型”转变，把提高学员的综合素质尤其是业务能力贯穿于课程设计全过程。案例教学以实际案例为载体，将业务中相关要求、重点、难点、关注点更加直观生动地体现出来，对提升学员的操作能力、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及综合素质有重要帮助。除新审计报告准则外，其他3个业务专题培训中有6讲都直接以实务案例为载体：职业怀疑框架与近期资本市场舞弊案例、财政绩效评价政策与实务、财政投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设计、重庆轨道交通财政投资绩效评价案例分析、财政投资绩效评价操作规程及文书写作、会计师事务所信息化建设与信息化咨询服务等。

（三）创新培训形式

通过创新培训管理和教学方法，不断增强远程培训的实效。一是引入“互联网+”培训模式，探索开展“3+2”培训方式，将集中学习与网络点播、特色课程、网络培训、自学、案例讨论、自由交流结合起来，增加培训的灵活性和实效性。二是创新培训方式方法，指导地方注协综合运用课堂讲授、座谈讨论、经验交流等方式，增强培训的针对性。三是丰富学习内容，将课堂讲义与拓展阅读相结合。除上课使用的课件讲义外，收集整理与培训主题相关的参考资料、参考资料目录，增加拓展阅读材料，使学员对培训相关内容有更加深刻和全面地了解。

（中注协继续教育部 刘栩）

2016 年度会计服务示范基地工作回眸

苏州园区会计服务外包示范基地

编者按

自2011年以来,作为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全面实施新业务拓展战略的一项重要措施,全行业已陆续创建了14个会计服务示范基地和3个会计服务试点项目,各示范基地不断创新工作思路,优化服务手段,充分发挥了培育新业务项目、推介高端会计服务、对接服务与需求、展示成功经验和 Service 能力的“四大平台作用”。下面将苏州、上海、北京、新疆、海南、扬州等示范基地2016年的工作总结摘要编发,供行业及各示范基地相互交流、共同发展进步。

2016年,苏州园区会计服务外包示范基地认真贯彻落实园区工委、管委会的决策部署和基地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创新工作思路,强化平台职能,推动园区专业服务业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主要工作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1. 深化培训交流,建设人才队伍。(1) 出台后备人才发展若干意见,安排专项资金用于补贴专业服务机构实习生和实训项目。拨付13.25万元用于资助5家专业服务机构的实习生补贴和1家专业服务机构的实训项目补贴。(2) 加强行业与高校专业服务业相关院系的合作,传达行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信息。(3) 结合会计学会年度活动计划,联合园区国税局等多个职能部门和多家行业协会,以及示范基地成员机构举办了15场培训交流活动,培训人员近1200人次。(4) 举办以管理会计、CPA和CTA三大系列培训为代表的紧缺人才培养,和“新进人员”系列培训,进一步打造覆盖专业服务业业务骨干和新入职人员的全方位培训体系。

2. 强化机构招商,优化增值服务。(1) 示范基地招商部门利用多种渠道,加大行业百强所的招商力度。现有8家专业服务机构入驻园区,其中百强知名机构6家。(2) 实地调研了成员机构十余家,深入了解专业服务机构发展动向,密切沟通联系,优化行业服务,拓展工作思路。并针对走访中了解到的部分入驻星海大厦事务所反映的问题,专程对以上事务所的动向和意见进行调研,积极推动解决方案的出台与落实。

3. 健全宣传平台,推进信息化发展。(1) 开发微信公众平台和行业党委微信公众平台,设置动态要闻、支部来稿和先进典型等多个栏目,及时为广大从业人员和党员提供资讯、宣传、活动、阅读等平台化服务。(2) 在示范基地网站发布示范基地简报、示范基地与会计学会电子期刊,定期向各级注协及示范基地领导小组进行汇报,并遴选重要

信息发布园区政府门户网站和财政简报,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



4. 推进行业党建,注重示范引领。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对在专业服务机构中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工作进行动员部署,传达了上级党委动员会议的精神,指导各支部把工作与学习有机结合,切实增强党支部的凝聚力。进入园区的华星会计师事务所党支部和金鼎会计师事务所党支部荣获“2015-2016年度江苏省注册会计师行业先进党支部”称号,苏州众勤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孟宇欢荣获团中央“全国青年岗位能手”称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苏州分所党支部秦霞、致同会计师事务所苏州分所张劼以及行业党委尚未被评为“2015-2016年度江苏省注册会计师行业优秀共产党员”。

上海浦东新区综合改革会计服务示范基地

示范基地成立5年来，在中注协和地方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上海注协积极发挥示范基地先行先试的示范效应，通过协助组织举办全国会计示范基地联席会议，扩大示范基地对外宣传和影响；通过每年定期举办专业论坛，开拓新业务领域；通过开展示范基地各方的专题研究，探索示范基地体制、机制建设框架，为注册会计师行业服务区域综合改革，深化新业务拓展战略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借鉴。

2016年是中注协确定的“创新服务年”，上海注协以开展主题活动为契机，认真贯彻落实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坚持创新发展、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的要求，紧紧抓住服务国家建设这个主题和诚信建设这条主线，不断加大行业人才培养力度，不断推进行业信息化建设，不断开拓新业务领域，不断增强行业党的建设，进一步深化了对行业发展基本规律的认识，提升了行业服务能力。11月，上海注协以“创新服务、携手共进”为主题举办了“浦东新区综

合改革会计服务示范基地第六届论坛”，邀请普华永道中天、立信、琳方、致同上海分所、天职国际上海分所等5家事务所的相关负责人分别以立足PPP的综合业务拓展、立信IT审计研究项目介绍、运用信息化优化管理提升服务水平、法证服务业务介绍以及案例分享、财务风险预警咨询产品介绍为主旨内容进行了演讲，从专业服务内容创新、专业服务方式创新、事务所内部治理创新等不同方面进行了分享和交流。

上海注协借助示范基地这个平台，通过挖掘和总结广大事务所创新服务、创新管理的实践经验和有益做法，将创新发展理念和创新成果推广落实到行业发展各个方面各个环节，推动全行业紧紧围绕服务国家建设，以行业创新服务国家创新，以服务国家创新驱动行业发展，取得了良好效果。下一步，上海注协将进一步发挥会计服务示范基地先行先试、示范带头、经验推广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切实推动行业开拓创新，不断扩大业务范围和领域。

北京金融街会计服务示范基地

2016年，北京注册会计师协会同基地合作方北京西城区政府金融服务办公室，努力推进北京金融街会计服务示范基地建设。按照基地合作双方共同制订的协议、计划和实施方案，北京注协主要开展以下五项工作。

1. 搭建完善信息平台。搜集整理归纳了“金融街周边事务所及注师信息”，提供给北京西城区政府金融服务办公室，方便其快速联系、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开展工作，同时为事务所开拓业务工作提供良好机遇。

2. 搭建交流平台。通过与西城区政府金融办的协调沟通，邀请其参与“京交会”相关活动，帮助其进一步了解注册会计师行

业，为新业务拓展奠定基础。安排金融街会计服务示范基地相关会计师事务所参加“京交会”，拓展与高端客户的沟通渠道，交流相关工作经验。

3. 搭建宣传推介平台。北京注协有目的、有重点、有步骤地开展以北京金融街会计服务示范基地为龙头的新业务拓展工作的宣传推介。行业内，北京注协领导在各类会议上就新业务拓展多次发表支持、鼓励意见，唤起会员拓展新业务的意识，启发会员拓展新业务的思路，在广大会员中逐渐构建形成自主拓展新业务的良好氛围；行业外，充分利用宣传媒体，在北京注协会刊、示范

基地网站上展开宣传，及时介绍、通报新业务领域拓展工作、金融街会计服务示范基地工作动态，为新业务委托方和事务所之间搭建平台，提供事务所基本信息和新业务需求信息。

4. 搭建服务对接平台。继2014年推荐4家会计师事务所、2015年推荐2家会计师事务所的基础上，2016年继续推动上述事务所对西城金融办所辖的16家大型融资性担保公司以及8家小额贷款公司依照《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办法》开展专项检查，对相关财务数据进行鉴证，促使金融专项检查工作由西城区政府金融办公室亲自组织实施向购买会计师事务所的社会化咨询服务转化，并得到了巩固。

5. 搭建研究推广平台。注册会计师作为智力密集型行业，专业研究、理论攻关、技术指导至关重要。对此，北京注协在各级领导的关心及统筹安排下，借力相关专家委员

会工作，将专业研究成果推介给“金融街会计服务示范基地”相关服务会计师事务所，包括已经完成出版的《上市公司审计案例解析》、《医疗企业内部控制审计实务操作指南》、《经济责任审计案例解析》、《证券公司审计实务应用指南》等4部专业书稿以及“关于P2P信贷服务及第三方支付企业收入确认的一般考虑”等13个专家提示，助力上述事务所拓展新业务领域，为客户提供更全面、更专业服务。

截至2016年12月，入驻北京金融街会计服务示范基地的会计师事务所为金融街153家企业总部和地区总部、1000余家金融机构提供不同程度的会计、审计、评估、纳税统筹、咨询等专业服务，服务的客户资产规模总量达56.4万亿元，占全国金融企业的50%、北京市的80%，服务的客户从业人员近17万人。

乌鲁木齐注册会计师行业服务 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示范基地

乌鲁木齐示范基地自2013年12月19日正式成立以来，为新疆企业提供在中亚市场上市、并购重组、调查审计、会计外包、人员培训等多元化的会计及财务管理服务，不断促进企业的发展建设、提升竞争能力、实现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进一步融合，同时也对加快开发区建设成向西开放、面向中亚的新经济平台，实现“以软带硬，东联西出”的发展战略，形成强大的辐射联动和示范效应。

2016年，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选定了服务基地场所，积极鼓励全疆知名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事务所、咨询公司等加入示范基地，并给予奖励支持。组织召开“注册会计师行业服务中亚区域经济合作会计服务示范基地”座谈会，邀请新疆地区业务收入排名靠前的8家会计师事务所参加座谈，就事务所如何开展针对中亚及开发区（头屯河区）的法定业务和会计咨询业务交换意见，

特别就如何拓展客户资源相互介绍了经验。为支持入驻示范基地事务所的发展壮大，开发区的重点园区项目规划与建设及重大建设项目全过程工程造价审核和财务审计交于入驻基地的事务所，并且通过自治区国资委要求所有区属国有企业积极与入驻示范基地服务机构对接，全方位、多角度的深入合作，加大政府购买服务的力度。截至2016年12月，入驻基地事务所已为开发区（头屯河区）480多家企业提供审计、评估、咨询等各类服务。

海南生态软件园会计服务示范基地

海南生态软件园会计服务示范基地于2015年12月16日正式揭牌成立，构建起地方注协与地方政府、中介机构、海南生态软件园和园区企业等多方合作平台，一年来，吸收了一批执业质量过硬、治理机制科学、发展势头良好的会计师事务所进入示范基地，不断创新会计服务内容，打造“互联网+会计服务”的创新模式，为海南生态软件园园区企业提供全方位专业服务。

海南生态软件园发展迅速。作为示范基地的载体，软件园在2016年取得了很大发展，腾讯、东软、东华软件、久其软件、巴别时代、北京网库等产业巨头纷纷落户园区，2016年园区企业从2011年的198家发展到1303家，年均增长45.8%。2016年入园企业员工10200人，产值达到230.1亿元，税收超过11亿元，年固定资产投资44亿元，创造了海南独一无二的“特区速度”。

吸引事务所入驻企业服务超市。2015年，国家批准海南成为全国唯一“多规合一”试点省份，海南生态软件园作为海南省最大限度简化行政审批的试点园区，政府在企业服务超市内开设了工商局、国地税、公安局、商务局等审批窗口，在这里能够完成新公司注册的一站式审批。目前，已吸引2家会计师

事务所正式入驻企业服务超市，为园区企业提供代理记账、税务代理、代理政策申报咨询、会计审计报告、新三板、新四板上市咨询等服务，获得企业一致好评。

积极筹备建立示范基地“互联网+会计服务”平台。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海南分所正在委托软件公司开发会计服务应用程序，利用手机客户端，完成对小微企业的代理记账服务，同时也让小微企业随时了解公司自身的财务状况。通过互联网保证小微企业与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即时沟通，实现基础会计核算与业务活动同步完成，内部实现会计监督、会计师事务所业务核算流程的有机结合，更好地促进会计核算对经济活动的实时反映和有效监控，同时也将财政税收相关政策及时推送给企业，让企业及时了解国家政策的产业引导方向及对企业的影 响，为企业的经济决策提供基础信息，促进企业的发展。程序开发完成后将与海南城市服务端口实现对接，让园区企业能将企业自身对会计服务的需求发布在平台上或者直接与会计师事务所完成业务对接，改变当前园区企业对会计服务需求盲目寻找的现状，寻求到更专业的会计服务机构。该程序目前正在试验测试中，预计2017年可以正式推出。

扬州中小微企业融资会计服务示范基地

扬州中小微企业融资会计服务示范基地自2015年11月成立以来，扬州市财政局紧紧围绕小微企业创新创业城市示范工作(以下简称两创工作)，积极开展会计服务示范基地的建设。作为新基地，扬州市财政局积极开展调研，主动去苏州和无锡学习会计服务示范基地建设经验和先进做法，结合扬州实际，完成了扬州中小微企业融资会计服务示范基

地(以下简称基地)建设和未来发展初步框架设计，并对财政服务小微企业金融产品中会计师事务所所能发挥的作用进行了调研，形成《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在会计服务示范基地建设中发挥作用的调研汇报》。随后，财政局召开了会计师事务所服务两创工作座谈会，研讨会计师事务所如何更好的参与到两创示范工作，服务小微企业创新创业发展。

局长张彤就会计师事务所如何利用好示范基地的高平台抓好两创工作、服务两创工作做了动员。

为吸引会计师事务所入住基地，调研组开展了会计师事务所服务两创工作专题调研。向全市各会计师事务所宣传《扬州市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城市示范三年（2016—2018年）行动计划》和扬州市小微企业服务券等两创工作精神，要求事务所利用专业服务优势，主动深入园区服务小微企业创业创新，积极地参与两创工作，争取将事务所做大做强。在实地调研了扬州大学大学科技园、扬州智谷和杭集牙刷城等集聚区之后，就扬州中小微企业融资会计服务示范基地示

范点挂牌事宜作出部署，要求扬州市3A资质以上会计师事务所入驻园区服务小微企业。

除此之外，基地还建立了扬州市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平台。该平台作为扬州市两创工作“1+N”总平台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托扬州中小微企业融资会计服务示范基地（两个平台合二为一），为扬州中小微企业提供财务指导、税务代理、金融服务、管理咨询、产权交易等专业服务。该平台的核心是政府提供政策支持、金融机构和服务机构为企业提供融资和各种专业化服务，扶持企业发展。技术方案已通过专家论证，并已与市经信委协调沟通并入“1+N”总平台进行招投标，现已公开招投标。

中注协举办2017年全国注协监管干部培训班

2017年4月26日至28日，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举办2017年全国注协监管干部培训班。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深圳市注协分管监管工作的秘书长、监管部负责人及工作人员等共计112人参加此次培训。中注协党委专职副书记梁立群出席开班式并讲话。

梁立群指出，2016年，行业监管工作取得了新的成绩。继续实施周期性系统风险导向执业质量检查，各级注协对1253家事务所进行了检查，对存在问题的83家事务所和206名注册会计师实施了行业惩戒；适时开展专项调查，加强日常监管，有力地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和公众利益。

梁立群强调，党中央、国务院对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和金融安全作出明确部署和要求，注册会计师行业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财政部的决策部署，以行业“质量提升年”主题活动为契机和动力，强化行业监管，促进事务所提升执业质量。一是进一步增强做好行业监管工作的责任感和定力，创新监管方式方法，加强制度建设，把行业监管的成熟经验制度化、系统化、长效化。二是紧盯重点领域，严密防控风险，强化对高风险业务的监管，加大惩戒

处理力度，树立行业监管权威。三是进一步提高行业监管能力和水平，加强教育培训，提升监管队伍的专业素质和工作能力。

本次培训班重点讲解了会计、审计准则最新变化及国际动向；通报了全国会计师事务所2016年执业质量检查情况，布置了2017年检查工作。培训期间，组织地方注协监管干部就如何加强行业监管、做好2017年事务所执业质量检查工作、促进事务所进一步提高执业质量进行了深入研讨，并交流了检查方法、检查技巧和常见问题的解决方法。

治理体系与职业能力建设

■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李玲

编者按

注册会计师行业是以智力服务为特征的高端服务业,在落实十八大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新布局以及服务全面深化改革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历年来,行业广大从业人员特别是各级两会代表委员积极发挥智力、专业优势,围绕行业发展、民生改善、社会治理等提出了大量提案议案,推动了有关部门出台新的政策法规和对工作进行改进,为推动全面深化改革、服务经济社会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宣传行业在服务国家建设中的作用,展示行业服务全面深化改革的信心和决心。各位行业代表结合自身参政议政经历,就如何履职尽责总结了经验,现予以刊发。

我于1988年进入会计师事务所工作,近三十年执业生涯见证了注册会计师行业的风风雨雨。2013年当选为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实现了参政议政和专业服务的良性发展,专业立足,诚信为本,全方位服务国家经济建设。下面是几点感受和心得。

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决定着长治久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四年的省人大常委任上,了解和熟悉了国家权力机关的运作机制,结合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发展现实,深刻体会和认识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行业和一个单位的长治久安。《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规划(2016-2020)》在阐述行业发展指导思想时,强调了以下三个匹配:行业服务能力与国家经济总量规模相匹配、与公共部门改革与公共资源管理需求相匹配、与中国经济国际化进程相匹配。这三个“匹配”体现了注册会计师行业着眼国家建设大局推进行业建设的高站位,而要实现这三个匹配的发展目标,会计师事务所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就成为关键性的决定因素。会计师事务所作为专业服务机构,承担着财务会计信息真实可靠的鉴证责任,是政府宏观调控、投资人投资决策和各方公平交易的信息基础。财政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财务会计是财政治理的基础,注册会计师行业是财政监督和审计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础的基础。会计师事务所作为民营机构,要自负盈亏却又担负着巨大的社会责任,是这个行业的显著特点。因执业质量出现问题而导致崩盘的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在国内外屡见不鲜,其内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决定着能否有效防范系统风险和项目风险。信永中和在长达三十余年的执业中,关键成功因素就是始终坚持一体化管理体系不动摇,夯实了公司治理体系的基础,坚决不搞任何形式的分包制和承包制,妥善处理好强与大的关系,“不慕虚名而处实祸”,保证了事务所的持续发展。

二、坚持职业化的行业发展方向

《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基于对自身职业规律的认识,提出了职业化目标。职业化是注册会计师行业作为专业服务业的本质特征。作为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在四年的参政议政中,无论是审议政府工作报告、财政预决算审查、审议各项法规条例还是参加各项专项调研视察等活动,身份定位始终是大型专业机构的专业代表,这不仅是专业能力和专业精神,更是一种专业信任。只有坚持专业化的定位,才能有效解决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例如,在今年的山东两会中,我就针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的招投标问题提出建议,“低价者得”仍然是注册会计师专业服务市场的主要机制,劣币驱逐良币,这反映了市场监管、市场竞争和市场化定价还没有充分体现注册会计师行业专业服务的特性。

三、提升专业服务能力是根本

服务国家建设是注册会计师行业的主题,能力不足成为制约行业发展的关键要素。纵观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两条主线,一是服务于国家的开放战略,从上世纪80年代主要为三资企业服务,发展到现在服务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大型事务所在国际化服务上着力;二是服务于国家的改革战略,包括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资本市场发展与改革、“三去一降一补”直到全面深化改革,都有注册会计师行业的深度参与,从法律法规制定、管控与治理、投资决策、过程控制与监督都能看到注册会计师忙碌的身影。特别是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已从单纯的财务报表鉴证机构,发展成为多元化的综合服务集团,提升专业服务能力是当务之急。有别于会计报表鉴证业务,多元业务的专业能力发展和提升面临很大的挑战。对于会计报表鉴证业务来说,市场基于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执业标准和规范是由财政部和行业协会主导完成的,人才培养包括学历教育、资格证书和继续教育也是由国家层面主导完成的,从上述几个层面讲,会计师事务所发展鉴证业务压力相对较小,而发展和提升多元业务能力则面临多方挑战。但是,时不我待,而对国家建设的多元需要,我们只能奋起直追。

尽职尽责参政议政

——做合格全国政协委员的体会

■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朱建弟

今年是本届政协的最后一次会议，连同以前四次会议，我全程出席了全国政协会议。在五年的参政议政过程中，结合我从事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工作，所以对于自身工作相关的参政议政内容体会较多。

本届政协是党的十八大以后组成。因此参政议政工作围绕着中央提出的以供给侧改革为核心内容开展。

作为政协委员尽职尽责的重要内容是向大会提交议案。我在五年内共向本届政协会议提交了27个议案。其中与中国资本市场、注册会计师行业相关的议案为15个。

在提交议案的准备工作阶段，我都会组织所内部分合伙人，邀请被审计单位的财务总监、高校专家等研究如何结合本行业的工作提出提案。形成提案初稿后又组织所内相关人员进行讨论、修改以确定最终内容。

研究提案内容时，我要求所内合伙人从其审计业务视角去分析当前遇到的，需要提供政府部门研究解决的重大问题。如商誉披露问题……等。其中，有关商誉披露的提案还促成了政府监管机构发布了相关规定（征求意见稿）。

在研究提案内容时，我也提请被审计单位的财务总监、高校专家，帮助我如何从体制改革的要求出发，提出中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建议。分析注册会计师行业现状，如何更好地发挥注册会计师的职能等。例如，依据他们的建议，我提出了中国资本市场“大监管体制”的设想。即中国资本市场应实施的大监管体系包括政府监管、社会公众监管（主要通过媒体监管）和注册会计师审计监管三位一体的体系。注册会计师既是受政府监管的对象，也是实施监管的主体之一。这样就改变了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职能。将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对投资者、债权人等业务责任上升为对中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承担社会责任的高度。将促使注册会计师从承担社会责任的视角去判断自身独立性、理解注册会计师所执行识别重大错报、制定有

效的审计应对措施等必要的审计程序不单是审计业务流程、审计技术等细节内容，而是将项目组的工作与中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对接，改变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观念，从而提高审计质量。这一体系是基于政府职能转变、未来资本市场将实施注册制，注册会计师必须要有所准备。

通过参加政协会议的讨论，我还深刻感受到，在确定与本行业相关的提案内容时，应当以改革发展的要求去分析如何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注册会计师只有不断学习、理解十八大的改革要求，包括党中央今后提出的新的各项改革要求，主动跳出目前低价竞争的业务环境，将自身工作融入经济结构改革大潮，才能增强自身竞争力。同时随着G20峰会提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改革，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我国企业必将更深参与全球经济发展，中国注册会计师的业务市场更大，作用也将越大，如此，注册会计师才能成为受人尊敬的职业，吸引众多青年俊才投入，促进行业发展。只有行业大发展，才能从更本上解决低价竞争和由此带来的人才流失、审计质量难以提高的问题。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还提出了今后的主要工作。包括，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通过简政减税、放宽准入、鼓励创新，持续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加快推进国企国资改革。要以提高核心竞争力和资源配置效率为目标，形成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完成铁路建设投资8000亿元、公路水运投资1.8万亿元，再开工15项重大水利工程。落实和完善促进民间投资的政策措施等任务。这些任务都需要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服务。注册会计师行业应当从改革的大局去研究新形势下适用的审计方法与质量控制措施，以高质量的审计服务去更有效发挥注册会计师的作用，服务于上述经济发展要求。

积极建言献策 认真履行职责

■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安徽分所 李友菊

作为安徽省注册会计师行业代表，自2013年当选十一届安徽省政协委员以来，我认真履行政协委员参政议政职责，积极参与会议讨论，圆满完成会议议程，并能够紧扣全省工作大局和人民群众普遍关切的问题，为行业发声，为民众建言，先后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和自身执业实践提交了八项提案。对我而言，作一名政协委员，积极建言献策，既是一个履行职责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深化实践的过程，更是一个学习提高的过程。

一、关于提案准备的几点经验

在近几年准备提案的过程中，我不断学习，不断总结，积累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心得体会：

一是，在选题立意上下功夫。选题的立意和内涵与提案质量紧密相关。作为政协委员，我始终牢记职责使命，坚持提案工作以人为本，以建言献策为契机，了解民情，收集民意，努力为民办实事。自当选以来，我围绕社区建设、大气污染、停车管理等民生和社会治理等主题提交了多项提案，并提出针对性建议。在今年政协会议上，我提交了《提升社区服务能力 打造美好幸福家园》的提案，提出完善服务设施、加快人才培养、加强整体规划、引入民主评议制度等对策，着力提升社区整体服务能力，提高社区治理水平。

二是，在深入调研上下功夫。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才能及时准确获得第一手信息，获得解决问题的真切启示，真正体会到人民群众的诉求，增强履行职责的紧迫感和使命感。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从网络上搜集社情民意已经成为调研不可忽略的方面。作为注册会计师行业代表，我充分利用出差时机，广泛接触和了解行业、企业、社区等方面实际情况，与同行业人员密切交流，通过实地走访调查、听取意见建议、倾听网络声音等方式，尽可能获得真实完备的基础资料，认真思考，分析完善，努力形成具有针对性的

建议和措施。

三是，在办法措施上下功夫。提案问题要抓得准，建议更要提到位。建议是提案的关键部分，要明确具体、实事求是、科学可行，具有可操作性。在撰写提案时，我着重从自己擅长的专业、从最熟悉的领域切入。在往年会议上，结合自己从业实践和思考，我分别提出了关于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大众创业、完善行业建设等方面的建议，在今年政协会议上，结合行业实际，我提交了“关于建立事业单位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的若干建议”的提案，结合上海等地实行事业单位委托注册会计师审计的实践情况，建议在我省建立健全事业单位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进一步发挥注册会计师审计作用，提高事业单位会计信息质量。

二、对政府工作报告的认识和体会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主题鲜明、内容全面、文风朴实，在总结了过去一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成绩的同时，指出了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明确了今后一段时期发展的思路、措施和要求，为我们认清社会发展情况、掌握资本市场发展面临的形势，提供了借鉴和遵循，具有很强的指导性，我第一时间研读学习了政府工作报告，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体会：

一是，总结成绩全面客观。报告在总结工作成效的同时，对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环境污染、民生保障等方面的困难和问题，也有清醒的认识，体现了政府事不避难、直面挑战、敢于担当的执政精神。

二是，分析形势实事求是。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我国发展处在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明确了“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思路，具有很强的主动性、针对性和创造性。

三是，安排工作求真务实。报告体现了

改革创新、克难攻坚、求真务实的精神。特别是报告中提出，今年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进一步减税降费，让市场主体有切身感受；简化增值税税率结构，今年由四档税率简并至三档，营造简洁透明、更加公平的税收环境，进一步减轻企业税收负担。这些财政政策契合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是真招、实招，体现出政府真抓实干的为政情怀。

三、关于充分发挥行业作用的建议

作为市场经济的守护者之一，注册会计师行业要围绕发展大局，立足自身专业优势，提高专业服务能力，为建立公平、合法、诚信、有序的市场经济新秩序发挥应有作用。具体来说：

一是，强化决策服务的意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继续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深化创新驱动，全面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推动“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创新引领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等规划。在资本市场，IPO审核进程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带动并购重组业务发展等，注册会计师行业应当主动把握国家经济转型发展新契机，进一步强化服务政府决策意识，深入领会和准确把握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各项政策措施，实现自身服务优势和各阶段政策导向有效衔接，积极行动，密切配合，为各级政府决策的落实到位贡献力量。

二是，创新客户服务的思维。为顺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新常态，华普天健将在继续发挥证券审计优势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服务思维，积极对接转型发展及企业需求，大力拓展管理、内控、税务咨询等非审计服务市场；加大新技术特别是包括大数据在内的信息技术使用力度，提升审计服务的信息化水平。在帮助企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找到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推动实现做大做强的目标。

三是，提升人才服务的能力。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关键时期，注册会计师行业要发挥对市场经济的保障作用，必须紧紧依靠人才推动服务的转型升级。为此，要进一步提高从业人员职业道德水平和专业胜任能力，加强新业务拓展所需人才的培养，积极吸引优秀的注册会计师、各种专业人员加入到执业队伍。不断完善事务所的人才培养、使用和晋升机制，打造“懂业务、精技术、会管理”的复合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服务能力。

四是，坚持质量控制的根本。注册会计师行业肩负着社会公众的期望。但随着近年来证券行业内违规现象频发，监管部门依法、从严监管逐渐常态化。但是，从行业自身来说，想要实现长远发展，就应当坚持把风险控制摆在首要位置。建立系统的业务质量控制体系，实行项目全过程控制，通过开展各类质量检查，提高风险管控能力，真正构建以质量为导向的企业文化。

关于政府报告中“深化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认识和体会

■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 吕桦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要落实和完善促进民间投资的政策措施，深化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完善相关价格、税费等优惠政策，政府要带头讲诚信，决不能随意改变约定，决不能“新官不理旧账”。

2014年10月2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大力创新融资方式，积极推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近两年来，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PPP热潮。根据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2016年底，全国PPP项目库录入项目数量超1.1万亿，

投资额度约13.5万亿。累计签约落地项目数量为1351个，投资额约2.2万亿。

作为地方政府促投资和稳增长的重要手段，PPP呈现井喷之势，但近年来通过从事PPP业务咨询，我们了解到，PPP模式的发展，还存在诸多问题。如：社会资本的选定不够科学、地方政府与社会资本风险分配不均、PPP模式融通的资金投资方向较为固定、地方政府有关PPP模式的政策机制不健全等。

因此，我们认为：

首先，应将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纳入社会资本的选定对象——资金来源应科学化。在对社会资本的选定方面，一方面确保民间资本对PPP项目的投资热情；另一方面应将已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市场化运营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作为社会资本的选定对象，参与当地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

其次，应科学合理分配地方政府与社会资本方的风险——资金风险应公平化。地方政府应认真对待长期负债，且重视或有负债，避免过度的承担财政风险。对PPP项目从批准、实施到评价过程必须进行严格的审核和监督，在社会资本获得安全稳定机制保证的前提下，使得地方政府真正达到转移风险的目的。

第三，应健全科学的PPP模式的政策及机制——政策机制应特色化。对地方政府在运

行PPP模式时，应该保证运作程序的透明化、运作人员专业化、竞争的充分性、项目审核的严格性、项目执行的规范化和项目监督的持续性的政策。应建立风险共担机制和利益共享机制，避免追求超额利润和不均风险的分配问题。

第四，应引入专业技术服务机构——项目实施应科学化。地方政府在论证PPP项目的可行性研究阶段，应有组织地引入具有胜任能力的管理咨询、财务审计、工程造价和法律等专业技术服务机构，以实现PPP项目实施的科学化。目前国内大型综合性事务所都具有财务会计、工程造价、资产评估、管理咨询、税务鉴证等多种资质，且在专业技术和实践经验方面占有很大优势，因此，大型综合性会计师事务所作为第三方专业咨询和监督机构，将在推动PPP项目公开透明、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维护公众利益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简 讯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在京举办“一带一路”商务服务研讨会

近日，由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利安达国际网络联合北京海外联谊会创新创业委员会、北京市商务服务业联合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一带一路”商务服务研讨会在京召开。利安达国际网络董事局主席、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黄锦辉表示，此次会议是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倡议，配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而召开的，希望在专业服务机构发挥优势、为“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提供更加专业的跨境服务方面发出行业声音。

来自不同领域和行业的专家学者探讨了在“一带一路”政策下商务服务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以及如何通过加强合作、强强联合、优势互补，为推动“一带一路”项目提供专业服务并发挥更大的作用；分享了各自在“一带一路”方面的经验和遇到的困难。大家纷纷表示，要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加强跨界联合、整合专业资源，在服务“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实现自身的发展。

研讨会上，利安达国际网络还发布了《在中国营商》和“一带一路”沿线十个国家地区的《国别分析报告》；利安达国际网络和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分别与白俄罗斯“一带一路”经济研究中心、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和东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谈谈自己对“持续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感受和理解

■ 陕西益友会计师事务所 原如斌

结合自身工作经历，从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把持续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放在深化改革工作的首位”这个方面，谈谈自己的感受和理解。

今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一次提出“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并把不断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放在各项深化改革工作的首位，这说明了政府职能转变对于国家治理，经济发展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做为从事社会审计、税务服务、工程造价咨询和企业管理咨询的专业服务机构，我们与社会的接触面比较广，也比较关注政府简政放权。这既涉及到我们服务的客户，也同样涉及到作为企业的我们自己，我们了解到并切实感受到了政府在简政放权过程中给社会带来的办事的便利，效率的提高，政府职能部门服务意识的增强，政府也在不断探索和明确政府管理的界限。

但是还要看到，政府转变职能，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到位的，既是一场攻坚战，又是一场持久战。政府要把该管的管好，不该管的放开，怎么管，怎么放，都要认真研究、

科学规划，并且还要打破部门利益干扰，抓大放小，放管结合。需要交予社会专业组织来承担的社会监督和社会服务，要制定好规划，当好“裁判员”，体现社会公平。政府可以通过加强采购社会专业服务来实现一些方面的社会治理。比如在经济监督方面涉及到政府财政投资、国企经营的，可以加大采购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资产评估公司等专业机构服务的力度；涉及到民企发展的，可以加强引导，使民企充分利用专业机构的专业化能力，提供管理的专业化服务，规范经营，健康发展。

政府简政放权，但对于政府和国企的招标投标采购工作的监督，应该进一步加强，严格招标投标法的执行，因为招标投标管理事关国家利益，经济秩序，社会的公平正义。

政府职能转变，事关国家深化改革的成败，是一个不断求真务实的过程，所以，持续的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简政放权，放、管、服相结合，是政府提升社会管理能力，克服经济困难，促进经济提速增效的重要举措。

关于注册会计师行业代表人士履职尽责的思考

■ 温州市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周群

一年一度的“两会”又一次胜利闭幕了，而关于两会的思考，关于行业代表人士如何发挥作用的思考却始终未停止，寥述浅见以作分享。

一、关于如何写好提案

提案一般要一事一案，并有案由、案据和建设方案，即写明所要解决的问题及理

由，并提出解决该问题的方案。案由应充分合理，建设方案应具体可行。提案的主要范围可考虑如下：一是贯彻执行党代表和党内决议、决定的重大事项；二是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等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三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大事项。

同时在写提案过程中要坚持四要素和四性原则。所谓四要素：首先是精准；其次是务实，要有深入研究，要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再次是要关注民生，要提确实跟老百姓利益相关的，要讲究“知识为民、专业报国”；最后是要专业，思维和建言要专



业。所谓四性则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要有韧性，要坚持研究，多调研多思考，持之以恒。二是要有理性，不感情用事，用事实说话，用科学讲理。三是要有建设性。四是要有全局性，建言献策可从小的角度切入，但一定要看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大局，不能一叶障目，不顾总体。

二、对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的认识

作为一名“经济卫士”，本人主要关注我国经济相关的以下热点问题：

1. 2017年的经济走势会如何？

政府报告中提出，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

长6.5%左右，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更好结果。对此我们认为政府现阶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位置，这说明要更加追求实实在在的增长，经济增速可能不会很高。

2. 房价是涨是跌？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目前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仍然较多，要支持居民自住和进城人员购房需求。对此，可以认为今年房地产市场面临“防过热”和“去库存”双重任务，基本平稳。

3. 民间投资能否企稳回升？

据过去半年的数据观察，民间投资虽然去年9月份开始连续4个月回升，但回稳向好的基础还不牢靠，要加大相关领域开放程度，比如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参股混合所有制企业，进一步降低成本为企业减负。

三、如何更好地发挥注会行业的作用

作为关心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的一员，个人认为：注册会计师行业要坚持“稳中求进”，要有主动匹配国家战略的政治意识，主动服务社会发展的责任意识和主动提升自我涵养的主题意识。同时要树立新的全球观，坚定不移地走国际化道路，当前迅速崛起的中国成为全球重要的资本输出国，尤其是我国正在大力推进的“一带一路”战略，客观上需要注册会计师为我国的境外投资保驾护航。另一方面，日益崛起的中国经济也急需与之相匹配的专业力量一同崛起。注册会计师要积极发挥在国际会计审计准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同时要打造一批有能力代表国家利益的民族品牌会计师事务所，支持他们进入全球市场，完善全球执业网络，维护我国的全球利益，为国家战略的顺利实施提供专业支持。

地方领导关心行业和协会建设

沈磊：发挥行业优势 服务财税改革

近日，浙江省财政厅副厅长沈磊对浙江省注协开展《营改增对我省地方政府财力的影响》课题研究工作予以充分肯定，作出批

示：“省注协充分发挥行业自身优势和特点，不辱使命，勇于担当，紧紧围绕服务经济建设、服务财税改革这一定位，聚焦工作热点，主动积极为财税改革出谋划策，做法

值得充分肯定。望继续发挥好行业的财政重要基础性工作之作用，为服务国家建设、财税改革贡献应有的智慧和力量。”

胡良安：提升行业服务能力为经济改革保驾护航



2月28日，湖南省财政厅总会计师胡良安在2017年注册会计师行业工作会议上对湖南省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建设和发展提出要求。

一是要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认知行业发展形势。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新的发展理念、新的政策措施中蕴含的市场机遇，为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服务空间，要正确研判经济形势，提振行业发展信心，要正确把握职能定位，提升行业服务能力，以服务提升为经济改革保驾护航，以大视野提升专业人才水平。

二是要齐心协力推动行业跨越式发展。全省行业要坚持

“长、准、高、快、好”的行业发展五字原则，不断拓展行业建设的深度和广度，切实做强、做大、做精、做专注册会计师行业，努力推动行业跨越发展。要围绕于“长”，以党建促行业发展，建立健全长效机制。要致力于“准”，准确把握国家改革发展重大部署，找准需求，不断完善行业发展体制机制。要着眼于“高”，切实加强行业人才队伍建设，特别是高端人才、复合型人才、国际化人才的培养。要立足于“快”，

着力推进行业信息化发展战略，变革审计评估理念、方法与技术，用现代信息化技术全面武装行业，形成行业快速发展新动能。要服务于“好”，提高服务质量，提升行业公信力。2017年行业将开展“质量提升年”主题活动，全省行业要以此为契机，建立健全质量保障机制，提升行业发展质量、专业服务质量 and 会员服务质量，提高服务高端市场的核心竞争力，引导新需求，创造新供给，更好促进行业优质高效发展，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蒋寒迪：加大瑞丽会计服务示范基地建设力度

2月22-23日，云南省财政厅党组成员、厅长助理蒋寒迪赴德宏州芒市、瑞丽市调研会计服务示范基地建设情况。蒋寒迪强调，推动云南省注册会计师行业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是中央和省赋予云南省各级财政部门的政治责任，是2017年必须完成的重要工作任务，德宏州财政局要切实履行职责，牵头尽快组建会计师事务所联合党组织，为全省沿边州市做出行业党建工作示范，云南省注协要积极给予德宏州财政局和瑞丽市财政局指导和支 持。她要求，要加大瑞丽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会计服务示范基地建设力度，适应云南省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定位，积极探索培养不同层次会计、财政、金融等方面人才的新路子，为当地经济社会跨越发展和云南省注册会计师行业“走出去”战略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

行业创新服务案例

提升不良资产包处置能力

■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无锡分所 龚华娟

编者按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按照《注册会计师行业“创新服务年”主题活动实施方案》部署，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制发了《关于征集注册会计师行业创新服务案例的通知》（会协〔2016〕37号），在全行业组织开展了创新服务案例的征集工作，得到了各地注协和会计师事务所的热烈响应，共收到各地报送的创新案例212个。这些案例反映了广大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协会创新服务、创新管理的实践经验和有益做法，我们特在本刊开辟“行业创新服务案例”专栏，选优编发，供大家学习借鉴。

不良资产处置是指通过综合运用法律允许范围内的一切手段和方法，对资产进行的价值变现和价值提升的活动。资产处置的范围按资产形态可划分为：股权类资产、债权类资产和实物类资产；资产处置方式按资产变现分为终极处置和阶段性处置。终极处置主要包括破产清算、拍卖、招标、协议转让、折扣变现等方式，阶段性处置主要包括债转股、债务重组、诉讼及诉讼保全、以资抵债、资产置换、企业重组、实物资产再投资完善、实物资产出租、实物资产投资等方式。本案例介绍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无锡分所在不良资产处置方面的一些探索。

一、背景

某集团A以1折的价格向银行收购了约60亿元的不良资产包。该不良资产主要是前几年银行在钢贸行业大发展中形成。资产包内容主要有房产、土地、债权、少量股权。A集团计划结合集团其他业务，如金融租赁公司，同时发挥集团信誉良好、实力强的优势，利用、分解、重分资产包进行经营。但是在处置方面经验不足。

A集团为国有经营性集团，旗下现有全资、控股、参股企业27家，其中包括2家上市公司和本市最大的政府主导的科技创业园、风投企业。涉及汽车关键零部件、纺织及机械制造、科技地产、创业业风险投资、电子等多个领域。集团总资产130亿元，净资产70亿元。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无锡分所接受委托，在A集团资产处置方面发挥专业优势，提供专业服务。

二、做法

1. 精心准备、统筹安排。接受委托后，立即跨部门统筹调动了注册会计师、评估、法务、税务、融资服务、资产处置、管理咨

询等多方面的专业人员，同时外聘外联了产业知识丰富的专家和专业投资机构，组成A集团不良资产包处置业务项目综合服务组。确立了对资产包“彻查家底，精心梳理，准确核评，保值增值”的服务宗旨。内部分成现场工作小组（主要由注册会计师负责）、外调核查小组（主要由法务部负责）、资产处置服务小组（主要由管理咨询部负责）。

2. 资产剥离和收购尽职调查。该业务主要任务是梳理情况，摸清家底，发现问题。本资产包的债权共计1600笔，总金额为60亿元。先后安排12人，其中注册会计师2人、评估师3人、律师2人、助理人员4人，历时一个月完成了对接收的资产包情况尽职调查报告。发现问题主要有：债权效力不足、银行追偿依据不足、债务人（含担保方）资产状况不明、关联资产不清、抵押资产流失等方面的问题。同时发现诉讼案件众多，涉及法院较多，为日后资产通过法律途径处置，带来时间、程序等方面困难。

3. 审计、评估。针对不同情况和不同标的对象，进行分类处理。其中对涉及公司债权较大、标的金额较大的公司或者资产，进行审计和评估程序。主要对资产负债情况进行专项审计，对标的资产目前的市场价值情况进行评估。累计完成评估报告300份，专项审计报告80份。

4. 实地考察。资产包有相当部分为仓储等实物资产。为掌握情况，为日后处置做好准备，对涉及的所有房屋、土地类资产全部进行了实地考察，对周边生产要素情况进行了调查摸底，对尚在经营的标的经营情况进行了经营情况调查。

5. 处置方案咨询。综合服务组在审计、评估、调查的基础上，对大量资料数据进行分析，提出处置方案建议书。主要有债权效力、债务人担保人关联资产追偿、诉讼案件执行案件处理、资产处置等方面建议。处置基本思路是：按照集团整体产业发展目标，

通过培育、注入业务内容，将资产价值低的优势转化为业务发展的价格竞争力，将场地位置、面积、设施齐全、环境适合发展的优势转化为业务发展的要素竞争力，将化解社会稳定矛盾、巩固金融安全区的贡献优势转化为业务发展的政策竞争力，壮大业务，实现“培育产业、资产增值”的双重目标。

6. 内控制度管理检查。由于不良资产处置业务涉及面广、多、杂，A集团这方面业务经验也不足。特别是本处置业务政策性很强，自由裁量权很大，容易导致管理失控，存在再次发生不良事件的可能，风险巨大。因此，又对A集团本业务内部控制制度进行了设计、建立、核查服务，发现薄弱之处三类11项，并提出方案建议。

三、成效

1. 资产处置得到极大推进。经过注册会计师的辛勤努力，以及与其他专业人员综合服务，《关于资产包的整体审计分析和处理建议》顺利完成。这份方案建议的采纳率达到80%以上。转让分割的处置已经开始实施，重分转售的也开始进行；生产自用、金融自用部分已经实施；国际不良资产专业经营客户和国内收购处置客户合作协议已经签署。由于方案得当、服务到位，专业效果明显，不良资产处置工作得到明显推进。从已完成部分来看，效果明显，经营效果突出，收益可观。

2. 资产不良率有效降低。由于在债权效力不足、银行追偿依据不足、债务人（含担保方）资产状况不明、关联资产不清、抵押资产流失等方面及早发现问题，及早提供对策方案，追回账册之外资产、权利众多，可变现率相应提高。特别是通过集团建议加强自用能力建设，提高了资产处置比例，同时加强了集团经营能力。变废为宝，有效地降低了资产不良率。

3. 事务所业务得到有效扩大。事务所的经营内容和团队能力得到有效地锻炼，业务量有效地扩大。业务从审计、评估等传统内容，扩大到资产尽调、处置方案、类金融产品方案、受让对象物色、价格模型、风险计算等高端前卫型业务，甚至有部分涉及破产清算、谈判服务等内容。业务收入也得到大幅度提高。

四、启示

1. 业务机会巨大，但竞争激烈。本案例标的虽然达到58亿元，金额已经属于较大，但是与全市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总额相比，占比不高，尚有巨大发展空间。特别是抵押资产、担保债权等单个项目众多，复杂性、难度都较低，完全可以成为进入这个市场的切入口。目前这个市场相比证券市场，尚未完全成型。北京产权交易所、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和一些地方交易场所，市场影响力和规范性都有待进一步提高。正是由于这些情况，目前进入者业务手法相对于习惯规范操作的注册会计师来讲，比较不透明，没有现成规则，从而竞争比较激烈。同时相对于报表审计业务市场而言，资产包处置业务市场毕竟是跨市场作业，是后进入，经验也不足，客观上也影响了竞争力。

2. 具备服务能力，但尚需加强。注册会计师人员凭借强大的财务方面的知识经验以及资质、行业品牌等优势，具备了资产包处置业务的能力。只要思想意识调整统一，完全可以胜任，并在处置方案、缺陷发现、类金融产品设计等方面提供超值服务。但是，由于不良资产形成过程复杂，涉及面广，专业设备行业甚至市场行情瞬息万变，都是目前注册会计师从事该类业务的短腿，尚需通过外联和补充的办法进行补强。资产的变现能力、直接处置能力方面也亟需提高。这个方面甚至可以成为提高注册会计师业务的竞争力手段。

3. 服务架构具备，但人才短缺。经过多年的发展，大部分事务所都建立了财务、工程、税务、评估等多方面的基本业务服务部门，有些还提供了管理咨询、IT、法务、投融资等专业服务业务。同时在中注协的统一领导下，准则指引规定建立众多，行业规范透明，与国际接轨，行业品牌形象高大，受人尊敬。服务架构基本具备，且优势明显，但是由于注册会计师的知识结构、跨市场服务能力、成熟经验等方面和广大的市场需求相比，严重不足，这方面的人才队伍亟需加强培养与建设。

从财务咨询切入帮助企业实现管理升级

■ 江西三清会计师事务所 童善进 何柳青 胡长飞

江西三清会计师事务所立足于为企业 提供财务总监外包、财务顾问、税收筹划及管理咨询等财务咨询服务，因企施策，满足企业需求，把服务手段合理链接，形成工具包，以民事契约锁定双方合作关系，实现价值共享。本案例介绍我所为上饶市XX化工产品有限公司(简称A公司)提供的财务咨询服务，为企业创造了管理价值，刷出了财务咨询的获得感。

一、背景

A公司设立于2002年，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产品销往国内外。公司占地45亩，年产值5800万，销售收入7600万。2014年底，80后的张总从其父辈手中接管了该企业，决心把公司发扬光大，引进现代管理理念，按“新三板”挂牌要求进行管理升级。但接手时企业管理涣散，管理上无从下手，于是请我所为他们提供财务咨询服务，助力实现管理升级。

2015年2月，我们派出业务组，深入企业 尽职调查，列出急待解决的下列管理问题：

1. 业务管理流程混乱，企业内控重形式 轻实质，关键节点监控脱靶，岗位不明，职 责不清。

2. 财务报税岗仅定位为处理涉税业务、 应对税务监管等，大量非税业务由老板“袋 管”，会计信息严重失真。

3. 从不研究税收政策，税收优惠无从谈 起，“袋管”下的非税业务，潜伏着舞弊 风险。

4. 法务监管缺失，长短期合同纠纷经常 发生，未决争议、未决诉讼久拖不决。

5. 产品通过第三方贴牌出口，致使出口 利润大打折扣。国内销售分散在多个关联主 体同质化经营，销售费用重复支出，也易丧 失商务谈判的主动权。

6. 2014年前所拍得建厂土地67亩，因城 市规划调整需要将由当地政府收回，双方须 于2015年6月30日前就政府收购在用土地使用 权、补偿厂内建筑物以及企业整体搬迁损失 等完成协商。对此，公司没有研讨可行的拆 迁补偿方案，对整体搬迁的资金需要量及资 金缺口没有合理预测。

7. 管理层安于现状，经营思想作坊化。

8. 从不实施业绩考核和目标激励，企业 文化建设无从谈起。等等。

二、做法

(一)以民事协议做保障，合理组合服务 方式

我们接受委托，为A公司提供“公司财务 核算与管理外包托管、顾问”服务，签订了 为期3年的《公司财务核算与管理外包托管、 顾问协议书》。协议内容包括：(1)第一年由 受托方派出项目负责人入驻委托方担任财务 总监，以财务总监外包方式进行财务托管， 直接负责委托方日常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 帮助管理层全面实施企业管理升级；(2)第 二、三年由受托方担任委托方财务顾问；(3) 委托方的付费价格和付费方式为第一年付费 40万/年，第二、三年付费20万/年。

(二)以管理升级为目标，统筹考虑，对症 施策

1. 流程再造，节点管控。从严控委托 方供产销环节中的关键节点，全面实施流程 再造和管控指引。我们为委托方制定具体操 作规程，把目标和责任分解到责任人和关键 节点，在流程管控中环环扣紧。针对间歇订 单式、连续订单式、以存货销式等产销方式 经常导致供销存安排偏差的问题，我们采取 统分组合、树叉化管理，对共性流程及其关 键节点实施集中管控，对差异化流程及其关 键节点进行分类管控，做到了以规程盯住流 程，以责任锁住节点。

2. 财务整理，信息还原。真实、完整、 公允的财务信息是公司链接外部，决胜内部 的基本盘。为把委托方杂乱、失真、残缺的 历史财务信息还原至可决策参考状态，我们 对委托方税务账(外账)和管理账(内账)进行了 统一归并，一账制反映。在财务上我们对所 有经济行为施行合规性过滤和合理性归集， 把断了链的财务信息进行完整性修补和逻辑 性追溯，一些涉假事项也得到纠正处理。

3. 风险导向，合同评审。发现委托方之 所以经常出现合同纠纷、争议甚至诉讼， 是缘于事前疏于风险预防、事中疏于风险控 制。为此，我们为委托方制定了《重大合同

财务法务评审制度》，对每单重大合同导入风险评审和管理，以制度方式明确规定委托方在对外签订合同前，必须事先经过法务、财务、对口执行部门等的评审，各部门在《重大合同财务法务评审报告》盖章后放行。评审内容不限于合同预算合理性、合同总金额、交易涉税、结算方式、违约责任等。同时，我们为委托方建立了合同版本库，设计了合同评审规程提供评审时使用；建立了合同信息反馈交流平台，让评审人员、执行人员对执行进度、效力、结果进行线上跟踪。

4. 整合重置，战略发展。我们强调委托方要突破长期以来存在的管理僵化和发展短视，从不同角度向企业管理层灌输资源整合、财务筹划等新型发展观。我们先后谋划、推进了多项可持续发展事项，把企业管理拔高到战略定位、战术筹划的新层次。

(1)对关系到委托方长期发展的企业整体搬迁项目，我们酝酿出多套方案引导政企谈判，最后经过优序排列、合理取舍，实现了政企双赢。

(2)帮助委托方对资源综合利用项目进行科学筹划，帮助其通过了高新企业资格认定，享受了税收优惠，节省了税收成本。

(3)建议委托方以关联并购方式整合了多个关联主体，实现了“一体化销售”，掌握了商务交易主动权。

(4)配合委托方“新三板计划”，制作了上板的商业计划书，拟定了债务融资、股权融资方案，引进了战略投资者。

(5)帮助委托方制定了人才更新、储备计划，推动委托方尝试使用平衡记分卡进行绩效管理，促进了委托方企业文化和战略发展。

三、成效

(一)经济效益方面

通过合理组合服务方式，多措并举，我们帮助委托方解决了阻碍效率、影响效益的管理问题，在服务当年就实现了增收节支，提高财务收益15%以上，达到了管理升级委托的近期目标。

(二)可持续发展贡献方面

在专业策划下实施的管理升级，我们为委托方创造了统筹的、全局的综合贡献，从企业文化和公司长期战略方面为委托方布下了可持续发展大局。

(三)共同成长和价值共享方面

以托管、外包、顾问等多位一体的综合手段全面服务于企业，我们收获了与企业共同成长和价值共享的效果，并在具体咨询实务中提升了执业能力。

四、启示

1. 财务咨询应围绕“价值创造”这个核心，以提升企业价值为最终目的，把对企业的贡献摆在首位，切忌急功近利，始终坚持立规矩、定规则、走程序、纠问题、行规范。

2. 开展财务咨询，无论财务托管还是财务顾问，都必须深入企业第一线，直面公司经营的新老问题和市场上的最新变化，坚持从企业中来到企业中去。

3. 以企业乐于接受的组合方式提供服务。本案第一年，我们派人入驻企业，以财务总监外包形式进行财务托管，在托管中融入企业获得互信；同时，财务托管也为受托方稳定了客户、积累了人脉。后面的两年，由财务托管转为财务顾问，有利于委托方自身管理团队的成长和担当；同时，由于先前的财务托管经历，为财务顾问提供了扎实的基础，也使财务顾问更易于被委托方接受并适合双方的长期合作。

简 讯

“青年文明号开放周”暨“注册会计师行业青年专家服务团”活动6月启动

根据共青团中央的统一部署，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团委决定于2017年6-7月在全行业青年文明号集体和创建集体中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青年文明号开放周”暨“注册会计师行业青年专家服务团”活动。活动将以“青年建功十三五 青春献礼十九大”为主题，展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的新气象，汇聚行业青年的正能量，共建社会文明的新风尚。

届时，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团委将组织北京地区行业青年文明号集体和青年专家走进北京交通大学，结合注册会计师行业“青年文明号开放周”活动举办“注册会计师行业青年专家服务团”活动，为会计相关专业师生提供专业讲座和咨询服务。

会计师事务所治理与管理

中小事务所服务“双创”企业探讨

■ 万燕敏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下简称“双创”），是当今我国经济工作的主旋律之一。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及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简政放权的新形势下，中小会计师事务所面临着传统产业萎缩、传统企业生存艰难、传统会计服务需求减少的严峻现实。如何从传统会计服务向创新型会计服务转型、从服务于传统企业向服务于“双创”企业转型的过程中，寻找会计服务发展的动力、新的机遇、新的增长点，已成为中小会计师事务所面临的迫切和现实的机遇和挑战。

一、中小会计师事务所应从“双创”中寻找新的市场

中小会计师事务所作为专业会计服务机构，在为“双创”企业服务中有着巨大的发展机遇和空间。

1. 中小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充分认识在“双创”中的作用，明确战略，找准定位，并积极寻求理念创新、专业创新、服务创新。从为“双创企业”的基础性服务、专业化服务中寻找发展空间和发展机遇。做到“做专做精、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国内外中小型事务所中不乏区域特色明显、专业特色突出，在市场细分中“剑走偏锋”而“出奇制胜”的事务所。

2. 中小会计师事务所，特别是区域性较强的小型事务所，可以根据市场需求，从服务于“双创”企业基础工作着手，如设立商务秘书公司为“双创”企业提供公司设立过程中的各项代理，包括工商登记、开户许可、前置审批报备、代理记账、代办纳税申报等，甚至可以代理统计数据的申报，提供工商注册地及商务洽谈场所、参与商务洽谈等服务。

3. 中小事务所除了利用传统平台、传统手段为“双创”企业提供传统服务外，可以

与“互联网+”对接，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为“双创”企业提供多元化服务，一是利用网络为“双创”企业提供财务会计培训，利用“手机报”、“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为“双创”企业提供财税、法律相关知识的咨询服务。同时，对具有创新性、成长性的高科技“双创”企业，可以全程参与“高新企业”、“新三板”企业的“孵化”过程，包括目标的选择与设定，“孵化”过程中的财税、法律政策咨询以及专业鉴证服务，真正成为“双创”企业成长的合作伙伴。

4. 具有一定规模的事务所可以为“双创”企业成长周期中不同阶段提供专业服务。在企业处于成长阶段，可以在财务报告审计、涉税鉴证、战略规划、价值管理到内部控制、管理咨询、流程再造、并购重组、资信调查、业绩评价等为“双创”企业提供专业性较强的各项鉴证、咨询服务，甚至在“双创”企业涉诉时提供司法鉴定等服务。

二、浙江印相会计师事务所服务“双创”的“产品系列”

浙江印相会计师事务所（原杭州富春会计师事务所）在为“双创”企业服务中，适应新形势、树立新观念、探索新思路，从改革和创新中寻找发展良机，切实推进业务转型升级。在传统业务向创新型业务转型、服务于传统企业向服务于“双创”企业的转型中走出了一条创新之路。自2015年以来，“浙江印相”组织专门力量，成立了“‘双创’企业服务中心”，组建了近40人的专业服务团队，为“双创”企业提供了全周期、全过程、全天候并各具特色的专业服务。

1. “普惠式”的培训服务。针对“双创”企业规模小、财税知识基础薄弱状况，组织师资对“双创”企业进行了财务会计知识、“营改增”、高新技术企业相关政策、创业板、新三板政策的培训、辅导。

2. “助产式”的前期服务。为“双创”企业从办公场所的落实、五证合一的代办等提供企业成立初期的各项基础性代办工作，为“双创”企业主要经营者在较短时间内进入角色、开展正常经营、研发节省了大量时间和精力。

3. “保姆式”的全成长周期服务。针对“双创”企业会计基础薄弱状况，为500余家企业提供了免费代理记账服务，并无偿提供代办纳税申报工作（服务费用以争取政府财政性补助形式解决），既减轻了企业的负担，又有利于企业主要经营者专注于创业创新。

4. “精准式”的差异化服务。根据省市相关部门关于小微企业服务的相关政策，本所联合当地律师所设立了“双创”企业财会法律服务中心，为“双创”企业提供个性化的“精准服务”，采取集中培训、上门服务、手机报、微信群等“互联网+”思维模式为“双创”企业提供“全天候式”的个性化服务。

5. “孵化式”的“一对一”服务。有针对性的从“双创”企业中发现、挖掘、培育具成长性、高科技型的创新型企业，从公司成立至公司日常经营、内部管理、市场细分、品牌定位、发展战略、财税政策扶持、资产市场通道的相关政策等以“保姆式”、“孵化式”等方面的全过程培育、引导，重点从科技型、创新型、智能型、“互联网+”等新兴产业中筛选，力争在较短的周期内促进企业稳定发展并进入资本市场，助推“双创”企业成长。

通过以上举措，浙江印相与“双创”企业建立了长期会计服务合作关系的同时，还建立了相互依赖、抱团成长的双赢模式。

6. “靶向式”的以问题为导向的服务。在为“双创”企业提供“保姆式”、“全天候式”服务，助推其健康成长的同时，“浙江印相”，结合当地政府推行的供给侧改革，为供给侧改革提供了“靶向式”的以问题为导向的各项专业服务。如参与政府牵头的困境企业前期资产清查、参与政府相关帮扶政策和诊断政策的制订、参与产能过剩企业并购重组的方案设计、受托为金融机构提供专业培训、担任破产管理人、协助大中型房地产企业去库存中的尽职调查等等。为当地经济从高能耗、高排放的造纸、通讯、建

材等传统产业向装备制造、机械、电子、新材料、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等高产、低污染的新产业转型提供了专业化服务。

经过多年的努力，“浙江印相”在规模扩大的同时，收入结构更趋合理，一是服务于改革、服务于“双创”企业的业务收入比例大幅提升；二是服务于企业内生性需求的业务收入比例大幅提升；三是服务于富阳区域以外的业务收入大幅提升；四是服务于政府购买服务的业务收入大幅提升；而传统的会计服务如年报审计、注册资本验证的业务收入占比大幅下降。而且事务所的“体质”明显改善，抗风险能力大大增强，彻底改变了原来为因应政府监管为目的的企业被动式服务需求为企业自发的、内生性的真实需求。

三、注册会计师行业服务“双创”需有创新思维

近两年来，“浙江印相”服务于“双创”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业务成长的同时，培育了一大批稳定的、具有较好成长性的客户群体，为后续发展积累了稳定的力量源泉。为“双创”企业服务有收获、有成长、有艰辛，但更有体会。

1. 服务“双创”离不开理念创新

在“双创”热潮涌动的当今时代，如何为“双创”企业提供增值服务，是中小型事务所面临的挑战，更是时代赋予的良好发展机遇。在做好传统的代理记账、财务咨询等服务工作的同时，要创新服务产品，规划合理的服务组合，特别是用“互联网+”为“双创”企业提供在线财务咨询服务。同时，积极为“双创”企业提供全周期的咨询服务。

国家大力推进“双创”企业发展，为会计师事务所发展提供了重大的政策机遇。随着“双创”正成为我国经济的一个新亮点，“双创”企业对会计师事务所的服务需求将更加广泛，注册会计师专业服务的领域空间巨大。会计师事务所应主动寻找、拓展、挖掘新业务，在政府职能转变中找业务，在政策调整中找业务，在企业转型中找业务，在市场创新中找业务，全力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注册会计师的专业胜任能力、业务开拓能力，努力打造一支业务水平精、思想观念新、职业道德优的注册会计师队伍。

2. 服务“双创”离不开供给侧的创新

注册会计师行业同样需要进行供给侧改革。从行业管理角度，应当以需求为导向，对会计师事务所的数量进行了合理规划、布局，提倡有序竞争、质量竞争；从会计师事务所的角度，应当及时掌握会计服务市场的脉动，实行服务转型、业务升级，从传统的会计报表审计向并购重组、税务筹划、尽职调查、财务顾问、政府购买服务等企业、政府内生性需求服务转变。这就需要事务所建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人才战略和专业知识储备，为市场提供有效的会计服务供给。

3. 服务“双创”离不开专业创新

大数据、云计算已经深度融入经济中，注册会计师必须认识、适应、拥抱大数据。大数据时代先进技术正以更快的速度重整着会计审计行业，传统的会计核算职能将被信息技术所替代，甚至会计监督职能将通过信息技术与管理系统的高度统一协调而被信息技术所替代，传统的财务人员面临着理念的更新和技能的更新，需要从传统的核算向一专多能，甚至多专多能的管理型人才转型，这就需要会计师事务所未雨绸缪，从管理咨询、内控制度的设计、评价入手，积极参与企业的日常监控中，同时，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对传统的审计方法、审计程序带来了挑

战，需要注册会计师适应新形势、迎接新挑战。

4. 服务“双创”离不开服务创新

“双创”企业的需求是广泛且多层次的，因此，在为科技创新企业搭建“创新平台”，提供如高新企业申报中的一系列专业服务以及为创新企业提供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科研经费补助专项审计等专业服务的同时，还必须加强管理会计培训。在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边界相互渗透、职能已相互交叉的时代，会计师事务所的专业人才应当是财务会计专家，更是管理会计专家。同时，加强对前沿性业务的研究，如针对政府大力推行的PPP项目，注册会计师如何参与全过程的控制，特别是在可行性研究、物有所值评估等方面大有作为，从政府购买服务中挖掘业务增长点。

■ 作者单位：浙江印相会计师事务所

简 讯

财政部等六部委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 建立包括注协的跨部门联合监测和防控机制

2017年4月26日，财政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通知》（财预〔2017〕50号）。

针对地方政府融资担保行为的关键环节和参与主体，《通知》明确，将开展跨部门联合监管，建立财政、发展改革、司法行政机关、人民银行、银监、证监等部门以及注册会计师协会、资产评估协会、律师协会等行业自律组织参加的监管机制，对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融资平台公司、金融机构、中介机构、法律服务机构等的违法违规行为加强跨部门联合惩戒，形成监管合力。

《通知》强调，针对涉嫌违法违规的地方政府融资担保行为的责任主体将严格依法追究责任。其中，对中介机构、法律服务机构违法违规为融资平台公司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信用评级报告、法律意见书等的，依法依规追究中介机构、法律服务机构及相关从业人员的责任。

《通知》在以下六个方面提出了要求：全面组织开展地方政府融资担保行为清理整改工作、切实加强融资平台公司融资管理、规范政府与社会资本方的合作行为、进一步健全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建立跨部门联合监测和防控机制、大力推进信息公开。

中注协工作 CICPA NEWS

行业注册管理

4月，编发《全国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及非执业会员2017年第一季度报备情况通报》。

4月，针对会员发展情况发表新闻消息《2017年第一季度中注协新增非执业会员2832人》。

4月，确定2017年非执业会员国内版及海外港澳台版证书印制单位并签订合同，目前已完成海外港澳台版证书印制200本。

行业监管

4月7日，参加财政部、证监会联合检查组，完成对瑞华所整改情况的核查工作。

4月上旬，中注协约谈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就临近年报披露日期更换审计机构的上市公司审计风险作出提示。

4月上旬，中注协书面约谈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就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重大变化的上市公司审计风险作出提示。

4月13日，中注协相关负责人电话约谈上会会计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就其临近年报披露日期新承接的上市公司审计业务风险进行提示。

4月中旬，中注协书面约谈中准、德勤华永2家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分别就业绩连续多年处于盈亏平衡点以及海外业务较多的上市公司年报审计风险防范做出提示。

4月10日，中注协发布上市公司2016年年报审计情况快报（第八期），发布截至4月7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上市公司2016年年报审计报告总体情况、按新审计报告准则出具审计报告情况和上市公司审计机构变更总体情况。

4月14日，中注协发布上市公司2016年年报审计情况快报（第九期），发布截至4月14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上市公司2016年年报审计报告总体情况、按新审计报告准则出具审计报告情况和上市公司审计机构变更总体情况。

4月21日，中注协发布上市公司2016年年报审计情况快报（第十期），发布截至4月21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上市公司2016年年报审计报告总体情况、按新审计报告准则出具审计报告情况和上市公司审计机构变更总体情况。

4月21日，中注协发布《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检查通告（第十五号）》，通报2016年各地方注协检查总体情况、检查结果以及惩戒情况。

4月26-28日，中注协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举办2017年全国注协监管干部培训班，讲解会计、审计准则最新变化及国际动向，通报全国会计师事务所2016年执业质量检查情况，布置2017年检查工作。

行业研究与发展

4月，编发2017年第1期《行业发展研究资料》：《经合组织成员国权责发生制会计实务与改革经验要点摘编》。由经济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研究资料（2016）》。编辑完成《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行业制度全编2017/增补本》。

行业党建

近日，财政部党组书记肖捷同志主持召开党组会议。财政部党组成员莫建成、朱光耀、史耀斌、戴柏华、许宏才、赵鸣骥等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党委陈毓圭同志关于行业党建工作的汇报。会议充分肯定了2016年行业党建工作，强调了加强行业党建的重要意义，对在新的起点上进一步深化行业党建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4月24日，中央党校中央国家机关分校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行业党员骨干进修班（第八期）（简称行业

中注协工作 CICPA NEWS

党校班)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举行开班典礼。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党委常务副书记、中注协副会长兼秘书长陈毓圭,北京国家会计学院纪委书记、院长助理杨卫东出席开班典礼并讲话,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党委副书记梁立群主持开班典礼。

国际及港澳台交往

4月6日,陈毓圭秘书长会见BDO国际会计公司首席执行官马丁·万·洛克先生(Mr. Martin Van Roekel)一行。

4月20日,杨志国副秘书长会见国际注册专业会计师协会学术执行总裁一行。

4月26日,冯淑萍会长会见美国管理会计师协会(IMA)会长马克·帕克先生(Mr. Marc Palker)一行。

地方注协工作 UPDATES OF LOCAL CPA INSTITUTES

北京

4月7日，北京注协党委以党委扩大会议的形式，听取17家基层党组织书记述职，总结交流党建工作经验。北京市委社会工委书记陈建领，北京市委组织部组织处干部严哲，北京注协党委副书记郭文杰，北京市委社会工委非公有制企业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处处长李明洪、副调研员邓龙政，北京注协秘书长汪宁出席会议。会议特别邀请了行业各基层党组织书记，部分市区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部分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代表和党员群众代表以及中央和市属新闻媒体记者共计200余人参加会议。

4月11日，北京市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李颖津一行调研北京注册会计师行业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并主持召开工作座谈会。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机关党委书记李玉国，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徐衡，北京注协党委副书记、会长郭文杰，副会长窦铮出席会议。局办公室、机关党办、人教处、纪检监察处等单位领导，以及北京注协秘书处领导班子成员参加座谈会。

天津

4月6-7日，2017年度天津市注协理事会扩大会议在天津市财经学校蓟州校区举行，来自全市会计师事务所的主任会计师、评估机构负责人、协会理事及各党支部书记约150人参加了会议。方文森会长主持了会议。天津市注协秘书长、行业党委副书记陈晓泓作了2016年度天津市注协理事会工作报告，部署了2017年行业主要工作，并通报了2016年度行业党建工作及2017年度工作要点。

山西

4月24-26日，山西省主任会计师暨行业领军人才培训班在太原召开，省财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武志远出席开班仪式并讲话。省财政厅会计处长邢绪生、副处长张云廷、省注协秘书长张志祥、副秘书长杜建中、会计处和协会相关人员及全省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行业领军人才共计380余人参加了培训。

辽宁

近日，辽宁省注协组织行业会员单位招聘团参加了东北财经大学、辽宁大学2017届毕业生春季供需洽谈会。两校对行业协会组织会员单位招聘非常重视，特为我们行业举办专场招聘。辽宁电视台也在招聘会当天的“辽宁新闻”中报道了行业走进校园招聘的消息，业内共有33家会计师事务所参加，提供审计助理、会计咨询等186个工作岗位。于延琦秘书长率团走进校园招聘。

上海

4月24日，2017年第5次行业党委（扩大）会议在市注协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行业党委书记袁白薇主持，新一届行业党委、行业纪委班子成员出席本次会议。会议重点审议了行业党委办公室起草的《2017年度行业党建工作方案》、《2017年度行业纪检工作要点》和《上海市注册会计师行业“质量提升年”主题活动实施方案》的征求意见稿。

浙江

4月20日，浙江省注册会计师行业党委在金华召开扩大会议。会上，2017年浙江省注册会计师行业“红色引擎促发展”专题活动正式启动。省行业党委书记、省财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沈磊到会，就开启“红色引擎促发展”专题活动作出全面部署。沈磊书记指出，省注会行业应紧扣行业实际，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创新发展、坚持制度机制驱动，以“红色引擎促发展”专题活动为载体，念好“聚人才、抓规范、提提升”的九字诀。

4月23-24日，浙江省注协破产管理人业务专家委员会在绍兴组织开展了业务研讨活动。马超主任委

地方注协工作 UPDATES OF LOCAL CPA INSTITUTES

员主持会议，部分专家委员参加会议，重点对破产管理人业务中的财产状况报告编制规范指引进行了专题研讨。

安徽

近日，安徽省行业党委、省注协印发《安徽省注册会计师行业“质量提升年”主题活动实施方案》，指导推进注册会计师行业“质量提升年”主题活动。《方案》要求，全省各级行业党组织和会计师事务所要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创新驱动，坚持制度保障，全力组织行业党员和从业人员积极投身行业质量提升年行动。

4月25日，安徽省注册会计师行业团工委召开行业“五四”总结表彰会，总结2016年行业团建工作。省行业党委、团工委以及合肥市行业党委有关人员，受表彰的先进集体代表、先进个人参加了会议。会议表彰了华普天健等4家先进团委（团支部）、鲍光荣等4名优秀共青团干部、姚捷等6名优秀共青团员、洪峰等23名青年岗位能手。

江西

4月18日，江西省注协五届五次理事会在南昌召开。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紧密联系行业实际，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总结2016年工作，分析行业的新形势，安排部署2017年工作。省财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行业协会会长潘昌坤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注协第五届理事会理事，各设区市财政局长、注协秘书长，各会计师事务所主任会计师参加会议。

湖北

4月10日，湖北省委统战部组织召开学习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会议精神会议。省注协、省知联会分会等二十余个社会组织参加会议，省委统战部副部长蔡藻鲜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统战部知工处处长郝俊严主持会议。

湖南

4月6日，共青团湖南省直属机关工委下发《关于2016年度省直“五型”团组织标准化创建结果的通报》，湖南省注协团委获评2016年度省直五星级“五型”团组织称号。

4月15-16日，湖南省注协党委在长沙举办了湖南省注册会计师行业2017年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来自省直会计师事务所的50余名入党积极分子参加了培训班。开班仪式上，省注协党委常务副书记王顺虎从“坚定信念，充分认识培训的重要意义；明确目标，努力提高培训学习效果；严格要求，踏实学习，争取学有所成”三个方面讲解了此次培训班的意义、性质和目的。

广东

4月11-12日，广东省注协袁庆副会长兼秘书长与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副主任蔡祥教授带领有关人员到东莞、中山、珠海三地召开座谈会开展行业收入分析课题调研。东莞市财政局党组成员、翟才善副局长、珠海市注册会计师协会潘荣卿会长、相关市财政局有关科室、注协负责人以及省注协综合部、会员部、监管部等负责同志和课题组成员参加了调研座谈。

4月21日，广东省财政厅党组成员、钟炜总会计师主持召开省注协党委会会议，回顾总结2016年行业党建工作、审定2017年党委“书记项目”、审议《关于加强广东省注册会计师行业党建工作指导员队伍建设的意见(试行)》、确定党委委员指导地区和挂靠联系点事宜，研究2017年行业党建工作重点。省注协党委副书记、副会长兼秘书长袁庆同志及其他6位行业党委委员出席了会议。

地方注协工作 UPDATES OF LOCAL CPA INSTITUTES

深圳

4月10日，深圳市行业党委第一书记任职宣布大会在市财政委召开，会议由行业党委书记麦炳志同志主持。会上，市财政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文政同志宣读了《中共深圳市财政委员会党组关于任命万美娜同志担任深圳市注册会计师行业党委第一书记的通知》，对第一书记的工作方式和职责做了简要介绍。市财政委党组书记、主任汤暑葵同志发表重要讲话。

四川

4月8日，2017年度“注协杯”四川省高职院校会计技能大赛在四川财经职业学院举行。此次大赛由四川省教育厅主办，四川财经职业学院承办，四川财经职业教育联盟、四川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协办。省注协秘书长易德鹤、副秘书长郭正苏应邀出席大赛和颁奖典礼。

4月24日，四川省注协四届十六次常务理事会在成都召开，会议由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易德鹤主持，副会长黄友、罗孝银、刘胜良及各常务理事参加了会议。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了协会2017年度工作计划和2016年度财务收支情况报告。会议还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全省注册会计师购买“人身意外保险”的议案》、《关于同意赵德武同志辞去协会副会长、常务理事、理事等职务的议案》等。

重庆

近日，重庆市注协抽调专业技术委员会委员前赴涪陵送教上门，对渝东南片区七家会计师事务所开展专业技术培训。本次培训，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授课老师结合大量案例，讲授了修订后的会计准则；介绍了风险导向审计理念及在实践中的应用；系统分析了审计底稿体系；对部分关键审计科目和程序进行了重点讲解。

云南

4月12日，云南省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苏红军带队调研注册会计师行业新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省财政厅党组成员、厅长助理、省注册会计师行业党委书记蒋寒迪，省注协副会长兼秘书长金德华等陪同调研。

宁夏

4月7日，宁夏注册会计师行业党委、团委、工会在盐池县举办了“以人为本，创新发展”主题健步行活动，促进行业内沟通交流，推广体育健身观念。行业党委副书记、秘书长盖忠主持仪式，宁夏自治区社会组织管理局尤建清局长、行业协会部分老领导出席活动。行业从业人员共30支队伍380余人参与了本次活动。

宁夏注册会计师协会按照自治区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要求，经会长会议决议，将201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社会责任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布。4月25日、26日分别在《宁夏日报》和《新消息报》上进行专版刊登，同时对宁夏注册会计师发展和排名前五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重点宣传。

ACADEMIC RESEARCH

学术研究

- 46 半强制分红政策对上市公司价值的影响研究 | 佟锦霞
- 53 管理者特质、负债融资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研究 | 郭桂华 赵倩倩
- 60 我国审计费用影响因素研究现状及未来趋势 | 樊瑞炜 傅宏宇
- 67 媒体关注、资产误定价与非效率投资 | 刘文琪 杜闪
- 73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陷与审计师变更相关性研究 | 葛新旗
- 79 分析师盈利预测偏差对审计意见购买的影响 | 尤克清 张昊晨
- 85 文化价值观、企业并购与长期账面绩效 | 车伟娜
- 90 “基底”行为视角下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演进模式 | 梁红俊



半强制分红政策对上市公司价值的影响研究

■ 佟锦霞

摘要

本文以2011-2015沪深股市非金融类公司作为样本,以实证研究为主要的分析方法,从政策维度、时间维度和综合维度对半强制分红政策给有直接再融资需求的上市公司、高成长性且每股自由现金流低的上市公司、高行业竞争性且每股自由现金流低的上市公司的价值带来的影响深入研究。本文建立了双重差分模型对研究结果进行估计,通过模型的测度发现,在以净资产收益率作为公司价值衡量指标时,半强制分红政策在短期内降低了有直接再融资需求的上市公司价值,长期来看该政策对受其影响的上市公司价值和股利支付水平的影响有限,并没有达到提高现金分红,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初衷。

关键词

半强制分红政策 公司价值 股权再融资 双重差分模型

一、引言

由于国外发达的资本市场拥有高效的市場约束机制、健全的現代公司治理机制和完善的的外部投资者法律法规保护体系,从而降低了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可能性,即使现金股利的分配比率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市場仍尚未对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进行直接干预。而我国市場自发调节的功能尚不健全,中国证监会从2001年开始陆续颁布相关政策,强化上市公司的现金分红意识、提高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中国证监会对上市公司的股利分红政策做出了越来越严格的规定,逐步提高了现金分红的比例,而这些规定向市場传递的信息是否受到投资者的认可政策的效果如何,半强制性的现金分红政策是否可以提高上市公司的价值,从而真正起到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这些应该成为学界和实务界关注和研究的重点内容。西方股利理论对发放现金股利是否可以提高公司的价值给出了不同的解释。由于中国資本市場的特殊性,对中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研究也应该结合自身的市場特征、股权性质、股权结构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本文以2008年证监会颁

布的《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为背景,重点关注在证监会颁布此项决议实施后几年中,受其政策影响的上市公司的价值是否得到提升。该决议是否达到了提高公司价值,保护外部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初衷。

二、研究假设

Bhattacharya (1979) 研究认为,上市公司派发股利可以充当向外部投资者传递关于公司经营状况、发展前景的信号。西格尔(2007)认为在现实中,投资者取得投资回报的一种重要的方式便是获取股利收益,同时股利再投资不仅可以扮演缓和投资者股票价值下降的“熊市保护伞”,而且可以成为提高预期收益率的“收益加速器”。然而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我国上市公司分红意思薄弱,不分红或少分红的公司大有所在,发放现金股利来带的公司治理效应在我国并不起效。同时,股东无法获得现金股利,只能通过股票市場的交易来获取投资回报,促使了我国資本市場上的投机行为,降低了有效市場对外部投资者的保护性。因此,2008年证監

会颁布半强制分红政策的初衷旨在强化上市公司分红意识,提高上市公司市场价值,进一步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半强制分红政策实施五年来,其对我国股票市场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然而,该政策在设计、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不合理的方面,应该受到监管当局的重视。

根据《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要求,上市公司如果要公开发行业务券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即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能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由此可见,《决定》将对有直接再融资需求的上市公司产生重要影响,上市公司如果想要达到股权再融资的市场准入条件,必须提高现金股利支付比例。然而,根据“融资优序理论”,内源性融资所受限制最少,可以有效地降低使用费用或契约费用,是成本最低的融资方式,应该作为融资首选;其次是债务性融资,债务融资成本较低并可以适当利用公司的财务杠杆来扩大利润;最后才是选择以发行股票的方式进行股权再融资。那些希望公开发行业务券的上市公司一般具有较好的投资机会,并且缺乏足够的内源性融资资金,才选择通过股票市场进行股权融资。因此,在股权再融资的前几年,上市公司应该尽量减少现金股利的分配以扩充内部留存收益,降低融资成本。根据半强制分红政策的要求,上市公司反而要将大比例的利润通过现金股利的方式发放给股东,使得本不充裕的留存收益更加得不到增加。这种有悖于传统“优序融资理论”的融资方式,可能会给上市公司带来不小的财务压力,从而降低公司的盈利能力和价值。由此本文提出假设1:

H1: 半强制分红政策会降低有直接再融资需求(增发或配股)上市公司的价值。

半强制分红政策“一刀切”地要求所有上市公司进行现金分红,而不考虑上市公司实际的资金需求情况,从理论上讲并不利于高成长性的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因为高成长性的上市公司通常有巨大的资金需求量,而内部留存收益并不能满足其高速发展的需要,此时要求其增加现金股利支付比例,可能会增加财务负担,不利于价值增长。实证文献也证明上市公司的成长性与现金分红政策间存在较为紧密的联系。Fama & French (2001); Denis & Osobov (2008) 认为

为规模较小、盈利能力较差并且成长性水平较高的公司不具有派发现金股利的倾向。Fama 和 French (2002) 研究表明公司的成长机会和股利支付率呈负相关,成长性水平较高的上市公司股利支付率普遍偏低。Ibboyson 和 Chen (2003) 也支持上述研究结论。由此可见,我国大部分上市公司具有较强的成长性也可能是我国现金股利支付率较低的一个原因。如果高成长性的上市公司同时又缺乏充沛的现金流量,那其内部留存收益更难为自身的快速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因而其具有潜在的再融资需求,通过在二级市场上进行增发或配股以扩充资本,满足公司的资金需求。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

H2: 半强制分红政策会对成长性较高且现金流相对紧张的上市公司价值产生不利影响。

高竞争行业的上市公司和高成长性的上市公司面临相似的融资困境,半强制性分红政策可能同样不利于高竞争行业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如果上市公司处于高竞争性的行业之中,其可能更倾向于持有更多的现金,而减少现金股利的支付,以避免投资不足引发的丧失投资机会、流失市场份额等风险。假如要求高竞争行业中的公司与低竞争行业公司发放同样多的现金股利,将增大前者所面临财务压力,这一点在行业竞争性高且每股自由现金流低的上市公司中更为明显。行业竞争性高且自由现金流低的公司为了保持内部留存收益的份额,同时又不丧失投资机会,可能通过二级市场进行股权再融资满足资金需求,具有潜在再融资需求。因此,本文提出假设3:

H3: 半强制分红政策可能会对行业竞争性高且每股自由现金流较低的上市公司价值产生不利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 模型设定

因为半强制分红政策只对有再融资或潜在再融资需求的公司产生直接影响,而不会对其他公司造成直接影响,所以研究该政策有效性的过程近似于一个科学实验的过程。通过对比两个受不同程度影响的经济体之间的差异,便可以反映出政策执行的效果。若假设 y 是代表上市公司价值的随机变量,而 $x=1$ 为实验组、 $x=0$ 为参照组,则在半强制分红政

表1 价值模型主要变量定义表

序号	变量名称	符号	变量定义
1	净资产收益率	ROE	净利润/净资产
2	总资产收益率	ROA	净利润/总资产
3	托宾Q值	Tobinq	托宾Q=(流通股数*股价+非流通股数*每股净资产+负债账面价值)/总资产
4	政策变量	Dummy_group	虚拟变量:受政策影响时值为1,否则为0
5	时间变量	T	虚拟变量
6	政策净效应变量	Dummy_group*t	虚拟变量
7	股利支付率	Div	每股股利/每股净收益
8	每股股利	Dps	现金股利总额/流通股股数
9	流通股比例	Rt	流通股股数/总股本
10	公司规模	Size	Ln(期末总资产)
11	资产负债率	Lev	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表2净资产收益率与政策效果变量回归结果

假设	(1)	(2)	(3)
Var	Roe	Roe	Roe
Dummy_group	0.0200*** (3.35)	0.0255*** (3.30)	-0.0137 (-0.82)
t1	0.00310 (0.48)	0.0182* (2.50)	0.000810 (0.04)
t2	-0.0240*** (-3.69)	-0.0266*** (-3.59)	-0.0286 (-1.26)
t3	0.00214 (0.31)	-0.0116 (-1.47)	0.00466 (0.20)
t4	0.0163* (2.32)	0.000113 (0.01)	0.0151 (0.66)
dt1	-0.00628 (-0.74)	-0.0304** (-2.91)	-0.0164 (-0.69)
dt2	-0.00743 (-0.88)	-0.00413 (-0.40)	-0.00684 (-0.29)
dt3	-0.0166* (-1.97)	-0.00402 (-0.38)	-0.00970 (-0.41)
dt4	-0.0132 (-1.56)	0.00459 (0.44)	0.000447 (0.02)
rt	-0.000629*** (-8.91)	-0.000422*** (-4.74)	-0.000982*** (-8.19)
lev	-0.0604*** (-7.63)	-0.0202 (-1.94)	-0.0660*** (-5.05)
size	0.0260*** (18.06)	0.0257*** (12.81)	0.0344*** (12.94)
_cons	-0.167*** (-9.26)	-0.206*** (-7.69)	-0.224*** (-6.15)
N	5465	3290	2655
F	46.32	24.18	26.83
R ²	0.0905	0.0780	0.1046

注:表中所示变量回归结果中上行为回归系数,下行为t统计值。***、**、*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策执行期间,实验组的上市公司受到该政策的影响为 $E(y|x=1)$ 、而非实验组受到的影响为 $E(y|x=0)$,那么可以获得一个政策对不同经济体产生影响的因果关系,即半强制分红政策给上市公司价值带来的净影响效果为:

$$E(y|x=1) - E(y|x=0)$$

同时为了研究该政策实施的动态效果,本文引入时间虚拟变量。由于该政策的执行效果在各年度内也存在差异,而实验组和参照组都可能会受到这种差异的影响,故可以对比每个经济体在该政策实施前后的变化。受该政策影响前的公司价值记为 $E(y|t=0)$ 、而受该政策影响后的公司价值记为 $E(y|t=1)$,则政策的执行在时间水平产生影响为:

$$E(y|t=1) - E(y|t=0)$$

为了进一步了解在各个年度内,该政策的实施对实验组与参照组产生的不同影响,本文将时间维度和政策维度共同影响下两组变量间的政策净效应记为:

$$[E(y|x=1) - E(y|x=0)] - [E(y|t=1) - E(y|t=0)]$$

这一政策的净效应不仅衡量了政策实施前后的效果,还度量了实验组和参照组所受不同影响的程度。

基于上面的观点,同时为了验证假设,本文设定的基本模型(1)为:

$$Y_{i,t} = \beta_0 + \beta_1 \text{dummy}_{\text{group}} + \beta_2 \sum_{2006}^{2010} \text{time}_t + V \sum_{2006}^{2010} \text{dummy}_{\text{group}} \times \text{time}_t + \beta_4 \text{Size}_{i,t} + \beta_5 \text{Lev}_{i,t} + \beta_6 \text{RT}_{i,t} + \varepsilon_t \quad (1)$$

其中, $Y_{i,t}$ 为上市公司*i*在时间*t*的价值,本文用净资产收益率ROE来衡量公司价值,同时使用总资产收益率ROA和托宾Q值来进行稳健性检验。 $\text{dummy}_{\text{group}}$ 则为组间虚拟变量, $\text{dummy}_{\text{group}}=1$ 为实验组, $\text{dummy}_{\text{group}}=0$ 为参照组。 time 为时间虚拟变量。 V 为双重差分统计量,用以衡量该政策在不同时间内对实验组与参照组产生的净影响;同时本文控制了企业规模SIZE、流通股比例RT和资产负债率LEV这三个变量对上市公司价值的影响。

最后 ε_t 为随机干扰项。双重差分统计量所含信息为上述模型考察的主要内容,若该统计量在一定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则表示半强制分红政策的执行提升了上市公司价值。

从基本模型中可以看出政策实施前后对上市公司价值的整体影响效果,但是这种影

表3模型2的回归结果

假设	(1)	(2)	(3)	(1)	(2)	(3)
Var	div	div	div	Dps	Dps	Dps
dummy_group	0.00345	-0.0743***	-0.0530	0.00692	-0.0177**	-0.0408***
	(0.25)	(-4.31)	(-1.87)	(1.41)	(-3.09)	(-4.40)
t1	-0.0589***	-0.0620***	-0.0617	-0.00278	-0.00367	-0.0141
	(-4.03)	(-3.81)	(-1.62)	(-0.53)	(-0.68)	(-1.13)
t2	-0.0495***	-0.0505**	-0.0523	-0.0108*	-0.00785	-0.0187
	(-3.34)	(-3.05)	(-1.36)	(-2.01)	(-1.43)	(-1.49)
t3	-0.0401*	-0.0476**	-0.103**	-0.0109	-0.0270***	-0.0228
	(-2.57)	(-2.71)	(-2.66)	(-1.93)	(-4.64)	(-1.80)
t4	-0.0555***	-0.0833***	-0.0607	-0.00862	-0.0287***	-0.0271*
	(-3.47)	(-4.60)	(-1.57)	(-1.49)	(-4.77)	(-2.14)
dt1	0.00675	0.0183	0.0191	-0.00110	0.00584	0.0147
	(0.35)	(0.78)	(0.48)	(-0.16)	(0.75)	(1.12)
dt2	-0.00406	-0.00788	-0.00494	0.00486	0.00132	0.0130
	(-0.21)	(-0.34)	(-0.12)	(0.70)	(0.17)	(0.99)
dt3	-0.0187	0.00856	0.0473	-0.0105	0.0180*	0.0106
	(-0.97)	(0.36)	(1.18)	(-1.51)	(2.30)	(0.81)
dt4	-0.0357	0.0341	-0.000291	-0.0128	0.0254**	0.0223
	(-1.86)	(1.44)	(-0.01)	(-1.84)	(3.24)	(1.70)
rt	-0.000420**	-0.000613**	-0.0000422	-0.0000947	-0.0000557	-0.0000794
	(-2.61)	(-3.08)	(-0.21)	(-1.63)	(-0.84)	(-1.20)
lev	-0.332***	-0.321***	-0.284***	-0.127***	-0.0923***	-0.0903***
	(-18.44)	(-13.77)	(-12.91)	(-19.46)	(-11.95)	(-12.55)
size	0.0745***	0.0576***	0.0713***	0.0369***	0.0315***	0.0275***
	(22.75)	(12.86)	(15.93)	(31.23)	(21.18)	(18.78)
_cons	-0.493***	-0.252***	-0.480***	-0.319***	-0.266***	-0.197***
	(-12.01)	(-4.20)	(-7.83)	(-21.54)	(-13.38)	(-9.82)
N	5465	3290	2655	5465	3290	2655
F	61.93	44.80	32.52	93.67	66.19	44.19
R ²	0.1180	0.1378	0.1248	0.1691	0.1921	0.1634

注：表中所示变量回归结果中上行为回归系数，下行为t统计值。***、**、*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响效果是如何实现的？现金股利支付率与每股股利的变化是否是提高公司价值的影响因素？因此需要对政策效果做进一步分析，本文将原被解释变量分别替换为现金股利支付率和每股股利变量，衡量现金股利支付率和每股股利这两个变量在政策实施前后是否发生显著变化。建立如下回归方程（2）为：

$$\begin{aligned} \text{Div}_{i,t} = & \beta_0 + \beta_1 \text{dummy_group} + \beta_2 \sum_{2006}^{2010} \text{time}_t \\ & + V \sum_{2006}^{2010} \text{dumm_group} \times \text{time}_t + \beta_3 \text{Size}_{i,t} \\ & + \beta_4 \text{Lev}_{i,t} + \beta_5 \text{Rt}_{i,t} + \varepsilon_t \quad (2) \end{aligned}$$

$$\begin{aligned} (\text{Dps}_{i,t} = & \beta_0 + \beta_1 \text{dummy_group} + \beta_2 \sum_{2006}^{2010} \text{time}_t \\ & + V \sum_{2006}^{2010} \text{dummy_group} \times \text{time}_t + \beta_3 \text{Size}_{i,t} \\ & + \beta_4 \text{Lev}_{i,t} + \beta_5 \text{Rt}_{i,t} + \varepsilon_t) \end{aligned}$$

DIV_{i,t}为上市公司i在t年的股利支付率。DPS_{i,t}为上市公司i在t年的每股股利。V为双重差分统计量，用来衡量半强制分红政策对实验组和参照组在不同时期内股利政策的整体影响，如果该统计量在某年显著为正，则表明实验组的股利支付率（或每股股利）在该年较之参照组有显著提高，半强制分红政策对实验组的股利支付率（或每股股利）有显著的正效应。同时控制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和流通股比例RT这三个变量对公司股利支付率的影响。

最后，本文将衡量半强制分红政策是如何通过现金股利支付率的变化，来进一步影响上市公司价值的，估计模型3的退化形式为：

$$\begin{aligned} Y_{i,t} = & \beta_0 + \beta_1 \text{dummy_group} + \beta_2 \sum_{2006}^{2010} \text{time}_t \\ & + V \sum_{2006}^{2010} \text{dummy_group} \times \text{time}_t \times \text{Div}_{i,t} \\ & + \beta_3 \text{Div}_{i,t} + \beta_4 \text{Size}_{i,t} + \beta_5 \text{Lev}_{i,t} \\ & + \beta_6 \text{Rt}_{i,t} + \varepsilon_t \quad (3) \end{aligned}$$

$$\begin{aligned} (Y_{i,t} = & \beta_0 + \beta_1 \text{dummy_group} + \beta_2 \sum_{2006}^{2010} \text{time}_t \\ & + V \sum_{2006}^{2010} \text{dummy_group} \times \text{time}_t \times \text{Dps}_{i,t} \\ & + \beta_3 \text{Dps}_{i,t} + \beta_4 \text{Size}_{i,t} + \beta_5 \text{Lev}_{i,t} \\ & + \beta_6 \text{Rt}_{i,t} + \varepsilon_t) \end{aligned}$$

通过对上面三个方程的回归分析，可以进一步研究上市公司是否受到半强制分红政策的直接影响，并且通过提高现金股利支付率（或每股股利）的方式来满足股权再融资的条件，进而提升公司价值。

（二）变量定义

本文的变量主要包括被解释变量（净资产收益率ROE、托宾Q值、总资产收益率ROA），解释变量（根据政策影响范围进行组间划分的虚拟变量dummy_group、时间变量t、政策效果变量dummy_group*t、现金股利支付率DIV、每股股利DPS）和控制变量（流通股比例RT、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

表4 模型3的回归结果 (以股利支付率为控制变量)

假设	(1)	(2)	(3)
Var	roe	roe	roe
dummy_group	0.0118***	0.0126**	-0.0222**
	(3.76)	(2.64)	(-2.68)
t1	0.00181	0.00472	-0.0149
	(0.39)	(0.86)	(-1.79)
t2	-0.0298***	-0.0321***	-0.0413***
	(-6.41)	(-5.73)	(-4.92)
t3	-0.00419	-0.0161**	-0.00408
	(-0.84)	(-2.65)	(-0.46)
t4	0.0129*	0.00150	0.0199*
	(2.48)	(0.23)	(2.17)
dtd1	-0.00436	0.00623	0.0257
	(-0.25)	(0.24)	(0.81)
Dtd2	0.0334	0.104***	0.0840*
	(1.95)	(3.75)	(2.57)
dtd3	-0.0164	0.0775	0.0252
	(-0.95)	(1.30)	(0.79)
dtd4	-0.0194	0.0612	-0.00942
	(-1.03)	(1.35)	(-0.30)
div	0.0360***	0.0172	0.0392*
	(4.89)	(1.89)	(2.09)
rt	-0.000608***	-0.000437***	-0.000981***
	(-8.67)	(-4.92)	(-8.23)
lev	-0.0488***	-0.00802	-0.0494***
	(-6.00)	(-0.76)	(-3.70)
size	0.0233***	0.0229***	0.0300***
	(15.50)	(11.15)	(10.83)
_cons	-0.144***	-0.175***	-0.179***
	(-7.96)	(-6.50)	(-5.12)
N	5465	3290	2655
F	46.06	24.84	27.70
R ²	0.0968	0.0861	0.1157

注：表中所示变量回归结果中上行为回归系数，下行为t统计值。***、**、*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主要的变量定义见表1。

(三) 样本选择

本文选择2011—2015年作为研究时间区间。为了得到更为稳定性和平滑性的研究结论，本文在处理数据的过程中进行了如下处理：(1)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数据。(2)剔除研究时间区间内被中国证监会ST处理的公司。(3)剔除同时发行B股和H股的上市公司。(4)剔除相关财务数据不可获得或不完整的上市公司。

为了控制极端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

文在5%的分位数水平上对数据进行缩尾处理(winsorize)。在做回归分析时需要严密关切各个控制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如果回归模型存在多重共线性将难以区分每个解释变量的单独影响能力、降低T检验的可靠性并可能导致回归模型缺乏稳定性。因此本文将采用相关系数检验来测量各个控制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所有模型中各个控制变量间的相关系数最高位0.2057，所有数值均没有超过0.5，可以认为各控制变量间基本上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公司流通股数量和资产负债率之间的相关系数为负值，表明流通股数越多，资产负债率越低。

四、实证分析

(一) 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的模型1主要验证的是半强制分红政策对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ROE的影响，政策变量用dummy_group表示，政策效果变量用dt表示。分别对假设一、假设二和假设三中的模型1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在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对样本进行估计时，所要考察的核心内容主要是通过双重差分统计量来表达的。在模型1中，政策效果变量dt即为双重差分统计量。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假设一中，综合效果变量dt仅在2014年对净资产收益率产生了显著的负效应，表明半强制分红政策实施后在短期内降低了有直接再融资需求的上市公司价值，政策的实施并没有达到投资者预期的效果。在短期内降低了公司价值，支持了假设一。同时，有直接再融资需求的上市公司在研究期间存在增发或配股行为，通过此类股权再融资本身也可能影响公司的盈利能力和价值。在假设二中，政策效果变量dt基本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政策效果不明显。由于缺乏研究半强制分红政策对公司长期价值影响的文献，但是李常青等(2010)对半强制分红政策的短期市场反应也可以佐证上述结论。李常青(2010)认为成长性高且缺乏自由现金流的上市公司在政策实施后的市场反应显著较差，显示政策对其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假设三认为半强制分红政策会降低行业集中度高且每股自由现金流低的上市公司价值，假设三中的政策效果变量dt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且政策实施前后一年均为负值，表明该政策的实施未对行业竞争性强且缺乏自由现金流的公司产生显著影响。因此，从整体上看，该政策的实施对有直接再融资需求或潜在再融资需求的上市公司价值没能产生显

表5模型3的回归结果（以每股股利为控制变量）

假设	(1)	(2)	(1)
Var	roe	roe	roe
dummy_group	0.00929**	-0.112	-0.0176*
	(3.14)	(-1.60)	(-2.11)
t1	0.0000185	-0.0229	-0.0197*
	(0.00)	(-0.27)	(-2.53)
t2	-0.0261***	0.00218	-0.0388***
	(-5.91)	(0.03)	(-4.93)
t3	-0.00327	-0.132	-0.00344
	(-0.69)	(-1.42)	(-0.41)
t4	0.0130**	0.0597	0.0131
	(2.63)	(0.61)	(1.51)
dtd1	0.0152	0.468	0.179*
	(0.36)	(0.48)	(1.98)
dtd2	0.00958	0.652	0.218*
	(0.23)	(0.64)	(2.26)
dtd3	0.0419	0.959	0.170
	(0.88)	(0.95)	(1.70)
dtd4	0.0252	0.233	0.163
	(0.56)	(0.25)	(1.81)
Dps	0.326***	0.0904	0.331***
	(16.00)	(0.33)	(5.99)
rt	-0.000590***	-0.00233	-0.000954***
lev	-0.0183*	-0.537***	-0.0255*
	(-2.32)	(-3.62)	(-1.96)
size	0.0135***	0.0265	0.0218***
	(8.99)	(0.92)	(7.94)
_cons	-0.0531**	0.212	-0.107**
	(-2.98)	(0.56)	(-3.12)
N	5465	3290	2655
F	80.53	22.6	40.43
R ²	0.1591	0.049	0.1619

注：表中所示变量回归结果中上行为回归系数，下行为t统计值。***、**、*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著影响。政策的实施并未取得良好的预期效果，并且其存在一定的理论缺陷反而可能会降低受其影响的上市公司的价值。

本文模型二需要验证的是半强制分红政策是否显著提高了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率或者每股股利。半强制分红政策要求上市公司在进行股权再融资前发放现金股利，但其要求有悖于传统的融资理论，其对现金股利支付率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结果如表3所示：

表3列示了半强制分红政策的实施对上市公司股利支付水平的影响，包括股利支付率和每股股利两部分。首先，半强制分红政策

的实施对上市公司股利支付率的影响并不显著，双重差分变量dt在假设一、假设二和假设三中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尽管该政策要求上市公司在进行增发或配股要提高股利支付水平，以达到在二级市场上进行股权再融资的准入标准。但是，根据优序融资理论，该类上市公司应该增加内源性资金的数量，减少不必要的现金流出。股利政策属于上市公司内部治理问题，上市公司更可能根据自身经营状况和盈利水平制定股利分配政策，而不是为了满足监管要求或再融资要求来提高现金股利支付率。李慧（2013）对上市公司股利支付率的研究中也得出一致结论，该政策对成长性高的公司股利支付率的影响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影响后，半强制分红政策的颁布对成长性高公司的分红策略未产生影响。其次考察强制分红政策对上市公司每股股利的影响。每股股利也是公司股利支付水平的另一种体现方式。在假设一中，政策效果变量d t均不显著，表明该政策未能显著改变该类上市公司的每股股利水平。在假设二中，政策效果变量d t在政策实施后的两年中对公司每股股利有较为显著的正效应，可能是高成长性的企业为了满足未来的再融资的准入条件，在财务能力允许的范围内，适当增加了每股股利水平。表明进行了现金分红的上市公司，提高了每股股利，尽量达到再融资资格。

根据本文的研究设计，模型1来检验半强制分红政策对上市公司价值的影响，模型2来检验半强制分红政策对上市公司股利支付率的影响，最后通过模型3进行综合判断，以确定半强制分红政策对上市公司价值的影响是否是通过改变股利支付率（或每股股利）来达到的。但是从模型1模型2的回归结果看，该政策对公司价值、现金股利支付率及每股股利的影响均不显著，从而会降低半强制分红政策、股利支付率和公司价值之间的联系，降低模型3意义。本文仍然对模型3进行了回归，其中以股利支付率为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以每股股利为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在采用股利支付率作为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时，政策效果变量dtd基本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在假设二和假设三中，政策效果变量dtd在政策实施当年具有显著性，表明政策的实施可能会对有潜在再融资需求的上市公司价值产生了短期的正效应，而长远来看，政策作用性不强。

从表5可以看出，政策效果变量DTD在假设

一、假设二和假设三中基本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大体可以认为该政策对上市公司价值没有显著影响，从而上文假设未能得到很好的验证。

（二）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采用总资产收益率ROA和托宾Q值对上述研究做稳健性检验。由上文回归结论可知，半强制分红政策对上市公司价值影响有限，政策效果不显著。因此，下文主要选择对本文的基础模型——模型1进行稳健性检验。运用总资产负债率和托宾Q值对假设一、假设二和假设三中模型1的稳健性检验。通过稳健性检验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从整体上看，采用托宾Q值衡量公司价值比采用总资产收益率ROA衡量公司价值更能反映总体的情况。在假设一、假设二和假设三中，采用托宾Q反映公司价值的模型的F值和调整R²值均高于采用ROA反映公司价值模型中的数值。（2）在假设一中，采用ROA和托宾Q值衡量公司价值，政策效果变量dt基本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半强制分红政策未能显著改变有直接再融资需求的上市公司价值，同上文检验结果一致。（3）在假设二中，用ROA和托宾Q值衡量公司价值时，政策效果变量d t表现出较强的显著性，意在说明该政策显著提高了成长性高且自由现金流低的上市公司的价值，且政策的影响效果具有一定的持续性。由上文可知，该类型的上市公司可能在政策颁布实施之后适当提高了每股股利，向市场传递了未来经营业绩良好的信号，促进了公司价值的提升。该部分的研究结论与采用ROE衡量公司价值时略有出入，也可能是由于托宾Q值与传统财务会计指标有不一样的计量口径造成的，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4）在假设三中，采用ROA和托宾Q值衡量公司价值时，政策效果

变量DT均不显著，和上文研究结论一致，该政策的影响效果有限，未达到理论的预期。

五、研究结论

本文研究的重点是半强制分红政策的实施对上市公司价值的影响，更倾向于研究政策的市场反应。从长远上看，市场可以准确发现并反映公司的价值，从而对股利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政策不能对公司价值产生影响，则对投资者回报的影响也很有限。故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1. 半强制分红政策和有直接再融资需求的上市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在政策实施的次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明该政策在短期内降低了该类上市公司的价值。但是这种影响具有短期性，长期来看该政策对有直接再融资需求的上市公司价值和股利支付水平没有显著影响。

2. 半强制分红政策大体上没有对成长性高且每股自由现金流低的上市公司价值产生显著影响。该类上市公司的每股股利在2014年和2015年间显著增加，表明需要进行股权融资的该类公司在短期内提升了每股股利，从而满足未来在二级市场上进行股权再融资的条件。但是未计划进行股权融资的该类公司更可能采用内源性融资或债务融资等方式，降低融资成本，同时避免受到该政策的影响，甚至降低了总体的股利支付率。

3. 半强制分红政策对行业竞争性高且每股自由现金流低的上市公司价值、股利支付率和每股股利均没有显著影响。该类上市公司可能更倾向于根据自身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等确定股利支付水平，而较少受到监管政策的影响。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 李常青, 魏志华, 吴世农. 《半强制分红政策的市场反应研究》. 《经济研究》. 2010 (3)
2. 李慧. 《半强制分红政策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策略的影响》. 《上海经济研究》. 2013 (3)
3. 刘银国. 《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有效性实证研究》. 《经济管理》. 2008 (14)
4. 刘星, 刘伟. 《监督, 抑或共谋?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价值的关系研究》. 《会计研究》. 2007 (6)
5. 陆瑶. 《激活公司控制权市场对中国上市公司价值的影响研究》. 《金融研究》. 2010年 (7)
6. 吕长江、许静静. 《基于股利变更公告的股利信号效应研究》. 《南开管理评论》. 2010年 (2)
7. Denis, D, and I., Osobov. Why Do Firms Pay Dividends? International Evidence on the Determinants of Dividend Policy,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8.
8. Fatemi, Ali, and Recep Bildik. Yes, dividends are disappearing: Worldwide evidence,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12.
9. Fuller, Kathleen P., Michael A. Goldstein. Do dividends matter more in declining markets?,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011.

管理者特质、负债融资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研究

■ 郭桂华 赵倩倩

摘要

本文以高层梯队理论为基础,以2009—2014年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区分产权性质,实证检验了管理者特质对负债融资及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管理者的性别、受教育水平和财务经历更能增强负债融资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抑制作用。和国有公司相比,在非国有公司中,管理者教育水平、工作经历更能显著提高负债融资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企业如何选拔高层管理人员等人力资源问题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关键词

管理者特质 高层梯队理论 负债融资 过度投资

一、引言

上市公司的融资和投资行为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热点问题。现代企业的典型特征是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由于信息不对称、代理冲突等,管理者可能从自身利益出发,出现非效率投资。长期以来,学者们对该领域的研究一直保持着较强的研究兴趣,也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然而,现有的文献大多基于权衡理论、优序融资理论和代理理论等传统理论进行研究,这些理论都是建立在管理者是“经济人”的假设基础之上,忽略了管理者的异质性特点。行为金融理论认为,管理者总是非理性的,他们的融资和投资决策可能会随着自身周围环境和情绪等因素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管理者由于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工作经历、是否有海外背景等各方面的不同,他们做出的行为和决策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因此,一些学者开始从管理者自身特征出发构筑新的行为理论。近些年来,随着社会学的发展,学者们逐渐将人口学运用到在管理学中,这为研究管理者特质和投融资之间的关系开辟了新的思路,并逐渐成为公司治理领域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鉴于此,本文将从管理者特质角度

出发,区分企业产权性质,实证研究我国上市公司不同特质的管理者对负债融资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

二、文献回顾

(一) 管理者特质与负债融资

管理者特质对负债融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管理者的内在特质对企业融资行为的影响。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过度自信会导致人们对自身认识和能力评价过高,夸大其对事件的控制力(Nofsinger, 2005)。这些特征很可能对企业财务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企业高级管理人员。Itzhak等(2007)的研究结果表明管理者的自信程度越高,其对长期负债融资的偏好程度越强。Harrey(2012)的研究也表明,管理者的过度自信会使其对企业未来项目前景的估计更乐观,相信企业未来的现金流量是持续稳定的,因此在进行融资选择时更偏好长期债务融资。余明桂、夏新平等(2006)研究显示,过度自信的管理者由于对未来的乐观估计,更倾向于采取负债的方式进行融资。李豫湘和刘旭飞(2013)的相关研究也支持的这一观点。廖蕾(2009)研究发现管理者的过度自信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显著。

(二) 管理者特质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

目前,学术界对管理者特质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之间的研究尚不完善,只有少数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并得到了有价值的结论。企业并购的“狂妄假说(Hubris Hypothesis)”最早是由Roll(1986)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提出的,他认为,在企业并购过程中,对未来估计乐观的管理者会倾向于通过大规模收购其他企业来实现自己商业帝国的设想,但是由于其对目标企业的实际情况等的不合理估计可能导致兼并行为的失败。Zahra等(2005)的研究发现,随着任职时限变长,CEO倾向于安逸且稳定的公司现状,不愿意为企业的战略模式花费精力,因而他们不愿意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胡国柳、周遂(2012)研究发现具有政府部门工作背景的人员更易产生过度自信的心理,这种心理会导致管理者盲目扩张企业经营范围,降低企业的投资效率。在进一步区分企业性质后发现,在国有和非国有控股中管理者背景特征的影响程度存在显著的差异,有待于进一步去探讨为何会出现这种差距(姜付秀等,2009)。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随着委托代理理论、自由现金流理论等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负债融资对企业的决策和收益均会产生影响。当企业出现充足的闲置资金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管理者更愿意通过扩大公司规模来满足自己的控制权,或通过扩大规模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在职消费、更高的社会地位等,因此将资金投资于NPV<0的项目,产生过度投资行为。这种行为损害了股东的利益,背离了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也浪费了企业的优质资源。而负债融资使管理者面临的还本付息的压力和破产风险,约束管理者对自由现金流的支配,减少管理者的自利行为,从而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基于此,提出假设1:

H1: 上市公司负债融资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即负债融资与企业的过度投资负相关。

上述研究都以管理者“理性人”为基础进行研究,然而随着行为金融理论的发展,学者们发现管理者并非总是理性的,他们的决策会因个人信念而出现各种认知偏差(姜付秀等,2009)。管理者既有的价值观和认知结构决定了公司如何选择战略决策,因此,不同的管理者会做出不同的战略选择并进而影响企业财务战略及决策的制定。本文使用管

理者的性别、年龄、教育水平、任期、工作经历五个要素衡量管理者特质,并进而研究管理者特质与负债融资及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关系。

1. 管理者性别

管理学家和心理学家在长期的研究后就指出,不同性别管理者的行为方式是存在差异的,女性比男性更为谨慎和保守。一方面是天性和生理原因,基因学研究认为随着人类的进化和发展,女性由于生殖和抚育孩子的责任需要,对风险容忍程度变低;另一方面来源于社会文化的塑造。在进行财务决策时,郭敏华等(2005)研究显示男性和女性风险偏好存在明显偏差,在进行战略选择或面临突发情况时,女性管理者更容易保持冷静,并做出正确的决策。以上差异通常导致男性的行为更激进,更愿意做出高风险的行为。基于此,提出假设2:

H2: 与女性高管相比,男性高管更倾向于使用负债融资,从而显著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

2. 管理者的年龄

不同年龄的管理者在阅历、风险承受能力和社会关系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这影响了他们对企业的财务决策(何威风,2012)。和年长的管理者相比,年轻化的管理者有更强的学习能力和整合信息的能力,在现代信息技术知识方面也存在优势,同时,他们的职业生涯才刚起步,更期待展现自己的能力,因而他们在进行财务决策时更愿意创新,且显得更为自信。而年长的管理者,从业经验丰富,生活状态稳定,在进行财务决策时更保守,同时,以往工作中积累的良好声誉和社会地位,使得他们在进行财务决策时更谨慎小心,避免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留下败笔,因此会极力避免潜在风险大的财务决策(Carlsson and Karlsson, 1970)。因而年轻的管理者会更倾向于过高估计自身能力,在进行财务决策时更容易出现过度自信的行为。基于此,提出假设3:

H3: 与年长的管理者相比,年轻的管理者更倾向于使用负债融资,从而显著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

3. 管理者的教育水平

教育水平反映了一个管理者的知识储备、认知能力和学习能力的高低,是衡量管理者专业程度的重要标准之一。一般来说,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会使管理者有更好的搜集和分析信息的能力、对内外部环境变化的反应能力、更强的适应能力和信息整合能力,

表1 变量定义

变量	符号	变量定义
过度投资	Over-Inv	由3.3.3分析可得
负债融资	Lev	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
管理者性别	Dgend	董事长性别, 男性取值为1, 女性取值为0
管理者年龄	Dage	董事长年龄
管理者教育水平	Ddegr	董事长学历, 高于本科时取值为1, 否则取值为0
管理者任期	Dtime	董事长的任职时间
管理者工作经历	Djob	董事长是否有财务相关工作经历, 有取值为1, 没有取值为0
公司规模	Size	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成长性	Growth	总资产增长率=(年末资产总额-年初资产总额)/年初资产总额
盈利能力	Profit	净利润/主营业务收入
股权集中度	Top1	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行业虚拟变量	Ind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划分上市公司所属行业, 本文样本公司分属11个行业
年度虚拟变量	Year	以2009年为基准, 设立六个虚拟变量

表2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样本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Over-Inv	5574	0.004	0.5573	0.0638	0.0573	0.0775
Lev	5574	0.016	0.955	0.463	0.459	0.312
Dgend	5574	0	1	0.935	1	0.351
Dage	5574	29	71	48.58	52	7.203
Ddegr	5574	0	1	0.56	1	0.507
Dtime	5574	1	27	4.78	4	1.172
Djob	5574	0	1	0.21	0	0.354
Size	5574	18.584	28.359	21.846	20.431	1.298
Growth	5574	-0.528	2.493	0.162	0.175	0.209
Profit	5574	-0.986	0.745	0.207	0.352	0.198
Top1	5574	0.034	0.819	0.384	0.302	0.146

从而影响管理者的认知能力、学习能力和价值观, 进一步影响其进行财务决策时的思维模式, 促使管理者相信自身的能力和判断的准确性, 从而表现出过度自信。大量实证研究也表明, 管理者的受教育水平会正面影响企业战略改变 (Kimberly and Evanisko, 1981)、创新决策 (Bantel and Jackson, 1989)、投资决策、多元化决策等 (陈传明和孙俊华, 2008; Dyreng et al., 2010)。基于此, 提出假设4:

H4: 与低教育水平的管理者相比, 较高教育水平的管理者更倾向于使用负债融资, 从而显著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

4. 管理者的任期

已有研究表明, 既有任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管理者的经营水平、认知能

力、风险偏好和工作态度等 (Allen, 1981; Hambrick and Fukutomi, 1991; Miller and Shamis, 2001)。显然, 这些心理想法和素质都会影响管理者的战略观点和行为选择。和任期较短的管理者相比, 任期长的管理者已经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较好的声誉, 他们无需在短期内证明自己的能力, 他们对公司的经营和管理情况更为了解, 遇到问题时会更多依赖经验和惯例, 缺乏创新精神, 而过去的经历或者错误决策也会让他们认识到自身的决策偏差, 从而不断地对行为进行修正。因而他们表现出过度自信的倾向更低。在进行融资决策时, 他们会更多地考察负债融资所带来的财务风险和可能的破产压力, 因而更倾向于选择稳健的财务融资决策。基于此, 提出假设5:

H5: 与任期长的管理者相比, 任期较短的管理者更倾向于使用负债融资, 从而显著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

5. 管理者的工作经历

管理者的工作经历对企业融资决策的作出具有着很大的影响。姜付秀和黄继承 (2013) 认为, 企业资本结构决策具有专业性, 它对于管理者的专业知识和经历有着基本的要求。和没有财务相关工作经历的管理者相比, 有财务相关工作经历的管理者对公司的财务状况有更强的认知能力, 能更敏感关注到市场环境的变化对企业财务决策的影响, 进而结合企业情况做出最优决策。没有财务相关工作经历的管理者会将更多精力用于公司其他战略上, 如产品创新等, 因而不太可能在财务决策上表现出过度自信。基于此, 提出假设6:

H6: 和没有财务相关工作经历的管理者相比, 有财务相关工作经历的管理者更倾向于负债融资, 从而显著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

在我国特有的制度背景下, 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公司治理方面有很大差异, 姜付秀等 (2009) 认为国有企业存在更大程度管理层私利的风险, 因而无论是负债融资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 还是管理者特质对负债融资及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 在国有和非国有企业之间都会有差异。谢德仁、陈运森 (2009) 认为, 企业只有具有有效的债务管理机制, 才能使负债融资通过改善公司治理来改善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对国有上市公司来说, 政府为了满足政绩目标, 可能要求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在进行负债融资决策时考虑政府因素的影响, 而非国有企业

表3 负债融资与过度投资的关系

变量	全样本	国有样本	非国有样本
	Over-Inv	Over-Inv	Over-Inv
constant	0.271*** (6.275)	0.276*** (4.752)	0.299*** (5.213)
Lev	0.132*** (10.621)	0.154*** (5.738)	0.129*** (8.946)
Size	-0.005 (-1.275)	-0.004 (-1.274)	-0.032 (-0.985)
Growth	0.018** (2.267)	0.011 (0.256)	0.024* (1.877)
Profit	0.001 (0.036)	-0.013* (1.704)	0.005 (0.032)
Top1	-0.067 (-1.016)	-0.078** (-2.106)	-0.138 (-0.921)
Ind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Adj-R2	0.235	0.22	0.179
样本量	5574	3508	2066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

表4 管理者特质与负债融资的全样本回归

Constant	Lev				
	-1.472*** (-20.468)	-1.459*** (-19.375)	-1.528*** (-20.162)	-1.494*** (-20.376)	-1.483*** (-19.694)
Dgend	0.032* (1.534)				
Dage		-0.021 (-0.415)			
Ddegr			0.032*** (2.719)		
Dtime				-0.008* (-1.783)	
Djob					0.064*** (5.375)
Size	0.080*** (24.875)	0.089*** (24.657)	0.088*** (25.005)	0.090*** (24.738)	0.084*** (24.174)
Growth	0.174*** (8.875)	0.173*** (8.397)	0.176*** (8.822)	0.171*** (8.479)	0.173*** (8.647)
Profit	-0.127*** (-18.886)	-0.128*** (-19.382)	-0.126*** (-19.154)	-0.126*** (-18.942)	-0.128*** (-19.007)
Top1	0.028 (0.869)	0.006 (0.847)	0.017 (0.749)	0.025 (0.687)	0.022 (0.737)
Ind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Adj-R2	0.547	0.546	0.549	0.532	0.558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

的管理者在考虑负债融资决策时，不需考虑政府影响，只考虑企业自身绩效即可。另一方面，由于国有企业要帮助政府实现政治目标，政府也对国有企业的负债融资有着隐性的担保，而对于非国有企业来说，负债融资的审查和监管更为严格，过度负债带来的破产风险更大，他们会更加追求负债融资效率。因而，对于国有企业来说负债融资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抑制作用大大降低。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7：

66

随着委托代理理论、自由现金流理论等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负债融资对企业的决策和收益均会产生影响。当企业出现充足的闲置资金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管理者更愿意通过扩大公司规模来满足自己的控制权，或通过扩大规模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在职消费、更高的社会地位等，因此将资金投资于NPV<0的项目，产生过度投资行为。

99

H7：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相比，国有上市公司的管理者特质与负债融资之间的相关性更弱，且负债融资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抑制效应也更弱。

四、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9—2014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进行分析，为保证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可信度和严谨性，剔除极端异常数据可能带来的影响，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初始数据进行筛选：（1）剔除同时发行B股以及中小板、创业板的上市公司；（2）因为行业财务信息的特殊性，剔除金融行业上市公司；（3）剔除管理者个人信息不完善和其他财务信息缺失的上市公司；（4）剔除因财务状况异常会对本文结论产生影响的已经退市、ST类或*ST类的上市公司。通过筛选，本

表5管理者特质、负债融资与过度投资的全样本回归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Over-Inv	Over-Inv	Over-Inv	Over-Inv	Over-Inv
Constant	4.355*** (9.563)	4.013*** (8.265)	4.460*** (9.996)	4.473*** (10.535)	4.364*** (10.368)
Lev	0.476 (1.195)	0.842 (1.217)	0.326* (1.117)	0.258 (0.946)	0.231* (1.884)
Dgend	-0.076 (-0.431)				
Dage		0.015 (1.254)			
Ddegr			-0.154* (-1.957)		
Dtime				0.006 (0.199)	
Djob					1.966* (0.658)
Lev*Dgend	0.074** (2.864)				
Lev*Dage		0.011 (0.732)			
Lev*Ddegr			-0.215*** (-5.193)		
Lev*Dtime				0.017 (0.054)	
Lev*Djob					0.178** (2.964)
Size	-0.147*** (-7.415)	-0.136*** (-7.327)	-0.141*** (-7.571)	-0.143*** (-7.039)	-0.140*** (-7.546)
Growth	0.571*** (4.857)	0.548*** (4.632)	0.492*** (4.776)	0.483*** (4.813)	0.516*** (5.078)
Profit	0.407*** (13.989)	0.403*** (14.001)	0.398*** (13.698)	0.386*** (13.771)	0.395*** (14.176)
Top1	-0.238 (-1.544)	-0.227 (-1.573)	-0.256 (-1.521)	-0.245 (-1.497)	-0.198 (-1.655)
Ind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Adj-R2	0.247	0.268	0.294	0.231	0.256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

文得到6年共5574个公司年度数据，其中国有上市公司3508个，非国有上市公司2066个。为了消除极端值对样本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还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Winsorize处理。

(二) 变量设定与说明

1. 被解释变量的设定与说明

被解释变量为过度投资，本文借鉴Richardson (2006)的研究思路，把企业总的投资支出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企业为了保持正常生产运营的维持性投资，另一部分为企业新增的投资项目支出。企业新增的项目投资中又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满足企业正常发展的最优投资规模，另一部分是企业非效率投资。通过新增投资和最优规模投资之间的残差来计算出企业非效率投资，残差大于零的部分称为企业的过度投资。这一量化方式被大多数学者所认可。

2. 解释变量的设定与度量

本文选取负债融资和管理者的个人特质为解释变量。根据我国的特殊国情和制度背景，本文将管理者界定为董事长，从性别、年龄、教育水平、任期和工作经历五个方面来度量管理者特质。借鉴大多学者的做法，选取资产负债率来衡量企业的负债融资水平。

3. 控制变量的选取与度量。

参照李焰等(2011)、张兆国等(2013)等研究成果和相关理论，本文选取公司规模、成长性、盈利能力、股权集中度以及行业和年度作为控制变量。变量的衡量指标见表1。

(三) 回归模型建立

借鉴Richardson和辛清泉的做法，根据对过度投资衡量方法的分析和比较，本文使用模型(1)检验负债融资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以验证假设1。

$$Over_Inv_t = \alpha + \beta_1 Lev_t + ControlVariables + \varepsilon \quad (1)$$

为了考察管理者特质如何影响负债融资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其中模型(3)的交叉性是用来考察不同管理者特质对负债融资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相关性产生的影响：

$$Lev = \alpha + \beta_1 Dgend + \beta_2 Dage + \beta_3 Ddegr + \beta_4 Dtime + \beta_5 Djob + ControlVariables + \varepsilon \quad (2)$$

$$Over_Int_t = \alpha + \beta_1 Lev + \beta_2 Dgend + \beta_3 Lev * Dgend + ControlVariables + \varepsilon \quad (3)$$

$$Over_Int_t = \alpha + \beta_1 Lev + \beta_2 Dage + \beta_3 Lev * Dage + ControlVariables + \varepsilon \quad (4)$$

$$Over_Int_t = \alpha + \beta_1 Lev + \beta_2 Ddegr + \beta_3 Lev * Ddegr + ControlVariables + \varepsilon \quad (5)$$

$$\begin{aligned}
 Over_Int_t &= \alpha + \beta_1 Lev \\
 &+ \beta_2 Dtime + \beta_3 Lev * Dtime \\
 &+ ControlVariables + \varepsilon (6) \\
 Over_Int_t &= \alpha + \beta_1 Lev \\
 &+ \beta_6 Djob + \beta_{11} Lev * Djob \\
 &+ ControlVariables + \varepsilon (7)
 \end{aligned}$$

五、回归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对模型(1)进行回归分析之前,本文先对所涉及的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包括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描述性统计。

从全样本来看,我国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最大值为0.557,最小值为0.004,差距较大,说明我国上市公司之间的过度投资行为有显著不同;我国上市公司负债融资的平均值为0.463,但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有很大的差距,跨度较大;管理者的性别均值为0.935,我国管理者中男性占比为93%,说明我国上市公司中存在严重的男女失调问题;管理者的年龄均值为48.58岁,最大值为71岁,最小值为29岁,说明我国管理者的平均年龄在48岁至49岁之间,大多数管理者相对比较年轻;管理者教育水平的均值为0.56,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管理者的教育水平在本科以上的占大多数;管理者的任职期限的均值为4.78年,最大值为27年,最小值为1年,说明我国管理者的任职年限介于4年到5年之间,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的差距较大,任期时间跨度大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管理者的任职时间变化幅度很大;管理者的工作经历的均值为0.21,即约有21%的管理者有从事财务相关工作的经历,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管理者有财务相关工作经历的管理者不多。

(二) 相关性分析

为了避免各自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同时为研究假设提供更可靠的结论,本文同时采用了Pearson系数相关分析法对各主要便利进行相关性分析,限于篇幅,表略。

结果表明,企业的负债融资与企业过度投资有显著正相关关系,管理者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工作经历都与负债融资有显著正相关关系,管理者任期时间与负债融资有显著负相关关系。这些结果表明,管理者特质、负债融资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但仍需要进一步探讨。此外,各变量的相关系数绝对值基本都小于0.5,说明所选的变量多重共线性较低。

(三) 回归结果分析

1. 负债融资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
 负债融资与企业过度投资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模型(1)的回归结果显示,负债融资与企业过度投资有显著负相关关系,即负债融资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故假设1得到支持。

从国有和非国有公司比较分析来看,在非国有公司中,负债融资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更显著,即与非国有公司相比,在国有公司中,负债融资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抑制效应更弱。

2. 管理者特质对负债融资及过度投资的影响

根据表4和5,本文可以得出以下回归结果:管理者性别与负债融资显著正相关,说明在进行财务决策时,与女性管理者相比,男性管理者风险偏好程度更高,验证了Peng and Wei (2007)、Olsen and Cox (2001)等的研究结论。同时,管理者性别与负债融资的交叉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管理者性别可以显著加强负债融资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抑制作用。假设2得到支持。管理者年龄与负债融资的相关性不显著,两者交叉项的系数也不显著,说明管理者年龄对负债融资及企业过度投资行为都不存在影响。假设3未得到支持。管理者教育水平与负债融资显著正相关,说明管理者教育水平越高,越偏好负债融资,验证了Bantel and Jackson (1989)研究认为的教育水平越高的管理者学习、认知能力更强,获取和处理新资源的能力更强,因而风险承受度更高、更容易创新的结论。此外,教育水平与负债融资的交叉项显著为正,说明管理者教育水平越高,负债融资决策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抑制作用越强。假设4得到支持。管理者的任期与负债融资显著负相关,说明管理者任期越短,管理者越容易过度自信,负债融资水平越高。但是,管理者任期与负债融资的交叉项系数不显著,说明管理者任期不能显著影响负债融资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相关性,其原因可能是张兆国等(2013)所指出的我国上市公司的管理者平均任期较短,管理者的财务决策在任期内难以凸现。假设5得到部分支持。管理者工作经历与负债融资显著正相关,二者的交叉项也显著为正,说明有财务相关工作经历的管理者偏好负债融资,且可以显著提高负债融资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抑制作用。假设6得到支持。这一结论验证了管理者学习效应的存在,也验证了Graham et al. (2013)研究认为的财务工作经历会使企业管理者对公

司财务更加了解，对资本市场的运行也会有着深刻的理解，且更能领会负债融资方式能够增加企业价值这一结论。

本文进一步区分我国上市公司的产权性质，检验了国有与非国有上市公司中管理者特质对负债融资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的不同，实证结果显示：和国有公司相比，在非国有公司中，管理者教育水平、工作经历更能显著提高负债融资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而管理者的性别、年龄、任职期限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

(四) 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本文实证结果的可靠性，对以上研究结论进行了稳健性测试。

首先重新界定管理者。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中，通常CEO是企业中负责日常事务的最高管理者，对企业的财务活动负责；在我国，一些上市公司也将CEO、总裁作为公司的最高决策者，或者总经理是企业的实际决策者。对于这一问题，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认识。因此，本文在稳健性测试环节将CEO、总裁和作为实际决策人的总经理界定为管理者，对我国上市公司重新进行了分析。检验结果显示，实证结果与前文基本一致。

在样本选取上，考虑到董事长当年变更或离任通常意味着企业可能存在非正常的经营环境；并且即将离任的董事长其经营行为与正常经营时可能存在差异，当年刚上任的董事长对公司经营管理和文化理念的影响也需要在一段时间之后才会显现出来。因此，在进行稳健性检验时，本文剔除董事长在当年新上任或任职期限不满2年的公司样本，重点考察董事长的任职期限超过5年的上市公司样本。经检验，前文基本一致。

六、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发现：负债融资能够通过改善公司治理环境，抑制管理者的过度投资行为，且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更加明显。在我

国上市公司中，管理者的性别、教育水平、工作经历与负债融资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即男性、教育水平越高、有财务相关工作经历的管理者更倾向于负债融资，且管理者特质更能增强负债融资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抑制作用。管理者的年龄和任期长短与负债融资的相关性不明显。和国有公司相比，在非国有公司中，管理者教育水平、工作经历与负债融资的正相关更强，也更能显著提高负债融资对企业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而管理者的性别、年龄、任职期限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我国上市公司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企业选择管理者时应尽量选择受教育水平较高，具有财务经历的人才；应采取增强管理者与中层领导之间的沟通，相互之间的有效信息交流有助于提高管理者对企业风险的认知和判断，减少管理者的过度自信行为；加强管理者的监督机制，减少管理者的自利行为；加强对投资者资历的评估，发展机构投资者等。

■ 本文为自治区人文社科基地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项目名称：新疆（兵团）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审计，项目编号：020213C06。

■ 作者单位：石河子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 Hambrick D.C., Mason P.A.. Upper echelons. 1984. Organiz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its managers. *Academy Management Review*, (2):193-206.
2. Pason R., Dempster L.. 2002. Managing change from a Gender Perspective. *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 (5):539-549.
3. Landier A, Thesmar D. 2009. Financial Contracting with Optimistic Entrepreneurs: Theory and Evidence. *The Reviews of Financial Study*, (22):117-150.
4. 张兆国, 刘亚伟等. 2013. 管理者背景特征、晋升激励与过度投资研究. *南开管理评论*. 2013 (4)
5. 姜付秀, 黄继承. CEO财务经历与资本结构决策. *会计研究*. 2013 (5)
6. 何瑛, 张大伟. 管理者特质、负债融资与企业价值. *会计研究*. 2015 (8)

我国审计费用影响因素研究现状及未来趋势

■ 樊瑞炜 傅宏宇

一、引言

审计费用是审计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收费的合理性关系到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性以及审计质量，进而影响会计信息质量。在公共审计的发展过程中就存在被审计单位为了上市或者吸引更多的投资而花费大额费用购买审计意见，或者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非正常竞争而导致低价揽客，从而导致审计质量下降。1980年Simunic最早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研究美国审计市场中审计费用的影响因素，我国的相关研究始于2003年。从国内外研究来看，事务所收取审计费用或者企业支付审计费用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相关研究主要分为会计师事务所和企业两个研究角度。其中从会计师事务所角度开展的研究主要分析源于审计本身的因素，比如事务所变更、审计意见等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这类影响因素与审计费用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关系。总体来看，这类研究重点的重复率较高，且研究结果趋于成熟。而从企业角度开展的研究结果显示，源于企业层面的影响因素与审计费用之间的相关性比较明确，而且基于不同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对于复杂多样影响因素的研究不断推陈出新。所以本文选择以企业角度的研究为对象，旨在梳理我国审计费用影响因素研究的相关文献，从主要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影响因素类型三个维度分析对审计费用影响因素的研究趋势，以利于未来新研究方向的构建。

二、文献整理与编码框架

（一）文献检索与筛选

根据上述研究内容，本文采用以下方法进行文献检索和筛选：（1）文献检索的数据库为中国知网网站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CSSCI数据库；（2）因为审计费用和审计收费的概念是一致的，所以采用以“审计费用”或含“审计收费”为主题进行搜索。

初步筛选得到的文献为396篇。

基于检索结果，按照以下步骤对文献进行筛选。第一，删除不是研究A（变量因素）和B（审计费用）之间关系的文献；第二，删除与审计本身相关的因素，比如审计质量、审计意见等因素。第三，通过阅读文献的摘要，删除以国外为研究对象的文献，选择以我国企业为研究对象的文献。通过筛选，最终得到总样本文献75篇。

（二）企业角度审计费用影响因素研究的发展脉络

图1表明了论文发表时间的分布图，对企业角度审计收费影响因素的研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萌芽期（2003-2007），在这一阶段刘斌等（2003）开始对我国审计收费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在本阶段发表论文数量为17篇，每年发表的文献数量比较平均，表明在2003年到2007年间审计费用影响因素研究处于探索阶段，基本上形成了相关研究群体，并且发表的期刊质量也比较高。

第二阶段为变革期（2008-2012），在这一时间段内，论文发表数量为23篇，说明在该领域的研究一直在继续，并且在研究成果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由于审计的发展阶段从账项导向审计向风险导向审计过渡，学者们开始关注风险、治理等外在因素对审计费用产生的影响，并且大多都建立数据模型进行实证研究。

第三阶段为稳定期（2013年至今），发表的论文数量呈上升趋势，四年的论文发表总数为35篇。在该阶段学者更加注重探究企业层面的因素，比如，会计处理上的某些科目对审计收费的影响，还考虑高管特征和会计稳健性的影响。这些研究成果大都发表在质量较好的期刊上，例如审计研究、会计研究、审计与经济研究等等。

从上述的发展阶段来看，审计费用逐渐成为研究的重点。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我国对审计费用

的影响因素研究比国际上晚了20多年，但是发展比较迅速，已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合理规划企业角度展开的我国审计费用影响因素的不同研究阶段，正确认识该研究的发展脉络对于后续研究的发展十分重要。

（三）编码框架

内容分析法是定性分析文献的一种方法。这一方法的首要步骤是建立一个编码框架，本文的编码维度是根据梳理文献的研究角度来划分的。选取企业视角来对样本文献进行编码，根据文献的主要内容，从主要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和影响因素类型三个维度搭建框架。编码框架如表1所示。

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对已有文献进行总结，由此编码过程的信度需要进行检验。为了避免较强的主观意愿，对于影响因素类型、研究方法及理论基础的编码均采用重测法（2011，周沛）来保证信度：在已筛选文献中随机选择20篇，分析结果与原样本文献基本相同，说明该种分类方法是可取的。因此该编码框架可以用来进行内容分析。

三、审计费用影响因素的主要理论基础

（一）主要理论基础的相关分析

在审计学领域，审计产生动因的相关理论主要包括代理理论、受托责任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保险理论以及冲突理论。鉴于样本文献中大部分学者是依据上述某一个或者多个理论来分析导致审计费用的增加或减少的影响因素（只选取文献中的核心理论作为主要的理论基础），因此，本文影响因素的主要理论基础分为六种：代理（契约）理论、保险理论、受托责任理论、冲突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以及其他理论。

表2表明以保险理论作为理论基础的比重最高，达到52%，而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冲突理论的占比较小，仅为4%，说明保险理论得到学者们的一致认可，与之相对应的就是风险因素对审计费用的影响。

从表2可见，在萌芽期，学者们依据的理论基础多种多样，各执己见，没有达成一致。代理（契约）理论、保险理论、受托责任理论和其他均占总样本的10%以下，其中其他理论的数量最多，是指没有提及理论基础的相关文献（周春生等，2003；徐筱凤等，2004；张继勋等，2006）。具体来看，代理理论为基础的研究认为，较高的代理成

本会使得风险增加，从而增加审计费用（刘明辉等，2006）。而肖作平（2006）认为公司代理成本若较高，则需要会计师事务所提供较高质量的审计，从而增加了审计费用。保险理论为基础的研究认为，盈余管理会增加审计风险，注册会计师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等成本，从而使得审计费用升高（伍利娜，2003；刘运国等，2006）。而张继勋等（2005）则将风险因素分为对外担保额、存货、应收账款，直接研究风险因素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受托责任理论为基础的研究认为，会计师事务所受被审计单位的委托，执行审计程序，则需要收取相关的费用来弥补损失，增加利润。而极少学者利用冲突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进行该研究。

在变革期，保险理论为基础的研究快速发展，逐渐得到理论界的认可，占总样本的16%。在该阶段，我国相关会计、审计准则的出台，约束了企业的各种行为，并处于经济转型时期，风险的关注点也在增加。冯延超等（2010）发现企业面临的法律风险与审计费用呈正相关。此外，冲突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应用也值得关注。蓝文永（2009）提出事务所和企业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事务所如何选择企业或者企业如何选择事务所，这是一个双方权衡的结果。马建威等（2012）、钱春杰等（2007）认为企业和相关利益者之间获得的信息是不完全一样的，导致企业利用独有信息进行会计操纵，从而增加审计风险，企业需支付较高的审计费用。

在稳定期，由表2可以完全看出，保险理论为基础的研究已经独树一帜，属于最主要的理论基础，接近总样本的1/3，说明该理论已经被广大研究者所接受。保险理论是许多论文中研究假设部分的核心。例如，对外担保的公司、处在金融危机下的公司、媒体着重关注的公司或者被媒体报道过负面新闻的公司，它们的存在必然伴随着风险的产生，影响着审计费用的高低。在此基础上，分析由企业的会计处理、外部因素等方面产生的各类风险对审计费用的影响。

（二）主要理论基础的研究趋势

从表2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保险理论为基础的研究的发展趋势几乎是成倍增加，这不仅说明更多的学者以该理论为基础，也说明该理论能更好地解释目前的现状。2006年，我国确立实行现代风险导向审计，制度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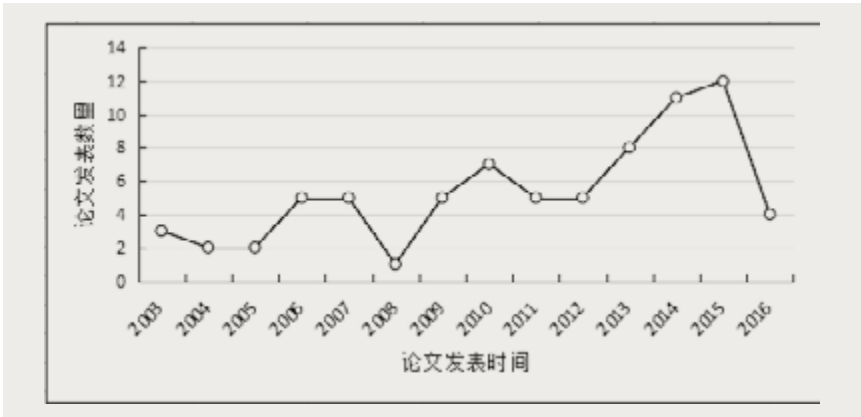


图1 论文发表时间趋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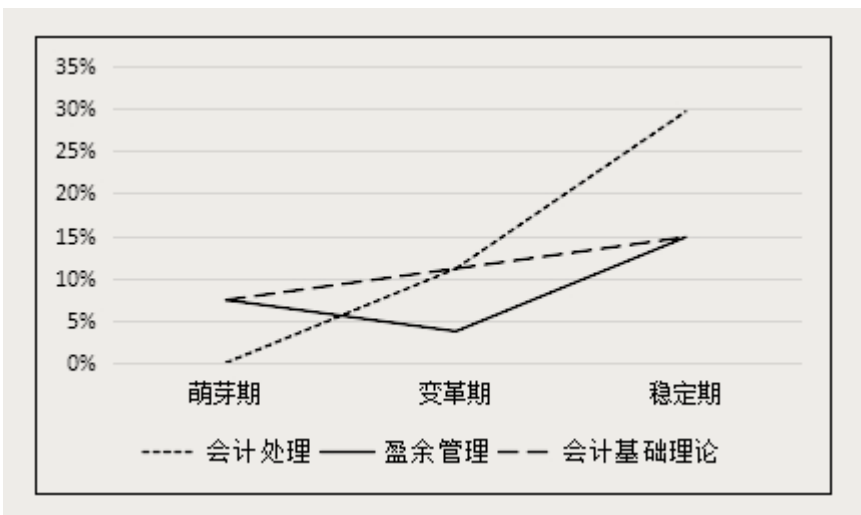


图2 会计因素分布及研究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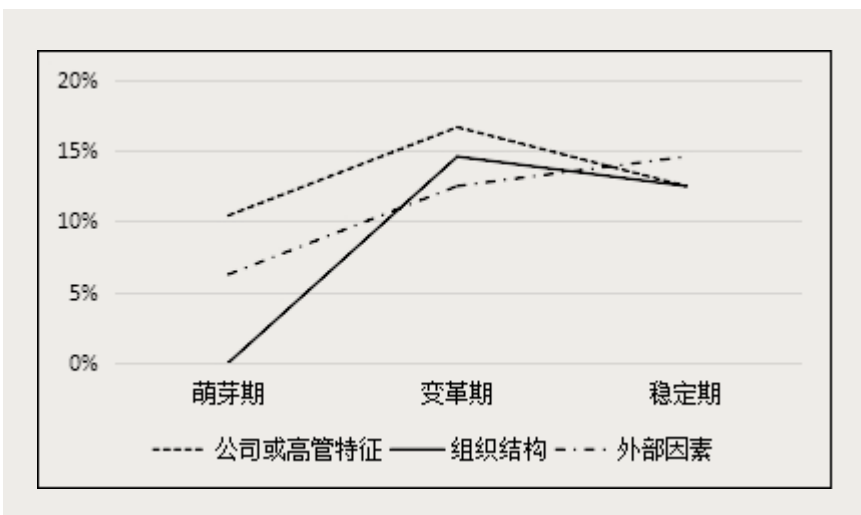


图3 非会计因素分布及研究趋势

良好的基础。而基于代理理论、受托责任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其他理论研究的比例均在变革期之后下降，由于基于这些理论的研究往往都聚焦于审计风险，进而与保险理论密切相关。另外，审计费用本身就体现着审计方与被审计方的利益冲突。基于这一现实，样本文献中虽然冲突理论在理论基础中占据较小的地位，但也呈上升趋势。综上所述，由于市场的多变，潜在的风险，保险理论也许会作为未来的主要研究基础。

四、审计费用影响因素的研究方法

样本文献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包括问卷调查方法、案例研究方法、实验研究方法以及模型法等，其中大多是实证研究（占比高达97%），极少数采用规范性研究。实证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包括单变量影响因素、多变量影响因素和加入调节变量的方法。规范性研究则主要是研究综述或政策建议。

（一）实证研究方法 与 审计费用的研究

在研究审计费用影响因素的领域中，大部分采用的是Logit回归模型，对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进行解释，并得出相应的结论。对于审计模型的选择有两种，一种是审计定价模型，比如Simunic审计收费模型（1980年Simunic提出的）等；另一种是其他模型，例如双重差分模型（张淑惠，2016），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何威风，2015）。下面根据研究的不同阶段，分析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

萌芽期阶段，所有研究都处于探索阶段，学者选用的研究方法也许比较简单。表4说明，单变量和多变量的研究占主要地位（占本阶段文献数量的83.33%）。伍利娜（2003）控制公司规模、出具的审计意见等变量，以净资产收益率作为衡量指标，分析盈余管理与审计费用的关系。而有的学者在Simunic审计收费模型的基础上，将盈余管理分解为调增收益和调减收益两种类型，控制公司规模、业务的复杂程度以及事务所声誉等变量，运用回归分析的方法，得出审计费用与盈余管理呈正相关的结果（刘运国等，2006）。从这一阶段的12篇文献中可以看出，实证数据选择基本上都是横截面数据，没有进行连续几年的分析或者比较分析，为以后的发展提供了空间。

变革期阶段，单变量和加入调节变量的

企业环境的多变使得事务所按照不同的标准收取审计费用，保险理论为未来的研究奠定

表1 编码框架

类别	编码维度	研究主题
主要理论基础	代理（契约）理论	1. 代理问题与审计费用
	保险理论	2. 风险问题与审计费用
	受托责任理论	3. 公司与事务所的关系、审计成本
	冲突理论	4. 利益冲突与审计费用
	信息不对称理论	5. 盈余管理、会计差异与审计费用
	其他	6. 没有提及理论基础或其他理论的研究
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	1. 单变量影响因素
		2. 多变量影响因素
		3. 加入调节变量的影响因素
	理论研究	4. 研究综述或政策建议
影响因素类型	财务因素	1. 会计处理与审计费用
		2. 盈余管理与审计费用
		3. 会计原则、会计假设与审计费用
	非财务因素	4. 公司、高管特征与审计费用
		5. 组织结构与审计费用
		6. 外部因素与审计费用

表2主要理论基础分布和趋势（占总样本）

主要理论基础	研究主题		萌芽期	变革期	稳定期	合计
代理（契约）理论	代理问题	篇数	3	5	4	12
		占比	4.00%	6.67%	5.33%	16%
保险理论	风险问题	篇数	3	12	24	39
		占比	4.00%	16.00%	32.00%	52%
受托责任理论	公司与事务所的关系、审计成本	篇数	1	2	1	4
		占比	1.33%	2.67%	1.33%	5.33%
冲突理论	利益冲突	篇数	0	1	2	3
		占比	0.00%	1.33%	2.67%	4%
信息不对称理论	盈余管理等	篇数	0	2	1	3
		占比	0.00%	2.67%	1.33%	4%
其他	其他理论或没有提及的理论	篇数	5	6	3	14
		占比	6.67%	8.00%	4.00%	18.67%

表3各研究方法的文献统计及所占比例

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			规范性研究
	单变量影响因素	多变量影响因素	加入调节变量	研究综述或政策建议
篇数	31	27	15	2
所占比例	41.33%	36.00%	20.00%	2.67%

研究呈增加趋势，多变量的研究文献数量发展迅速，达到最高点（占变革期样本数的53.57%）。其中风险是多变量研究的主要问题，并且在研究中更加关注公司或高层管理者的特征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其中两篇文章均从风险角度研究了公司治理与审计费用之

间的关系，蔡吉甫（2007）从董事会规模和不同股东持股比例等角度认为公司治理结构与审计费用是正相关的，而余敏（2012）则站在被审计单位的立场上，以公司及其利益相关者面临的风险为主，公司治理为辅，得出与蔡吉甫相同的结论。由此可以看出，即使学者们研究同一个问题，研究角度不一样，也会得出相同的结论。

稳定期阶段，多变量影响因素的研究数量占阶段样本比例下降，从53.57%到22.86%，而单变量（从32.14%到45.71%）特别是加入调节变量（从14.29%到28.57%）的研究数量占比在上升。朱敏等（2015）分析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与审计费用的负向关系受到股权性质的影响，即在国有企业中，两者之间的负向作用会加强。而较高的诉讼风险作为调节变量，加强了媒体对公司进行负面报道与审计收费之间的正向关系（刘启亮等，2014）。加入调节变量的研究中，将可能影响解释变量的因素考虑进去，会加强或减弱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增加了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可以更好地应用在实务和理论中。

（二）规范性研究与审计费用

本文中的规范性研究主要是指文献综述类的文章，对国内外审计收费影响因素及模型进行总结和评述。张继勋等（2006）认为应建立适合我国的审计收费模型，并考虑加入公司治理等变量因素进行研究。王彤彤等（2015）针对某一地区，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分析审计收费中的个中缘由，最后为制定审计定价制度提出相关建议。在仅有的两篇文献中，发现学者均认为应及时发现我国的审计收费中的问题，并加以解决和约束。

（三）研究方法的研究趋势

分析表4中的数据可知，各个研究方法的趋势有所差异，但是均在变革期开始发生变化，上升或者下降。比如单变量、加入调节变量的影响因素研究和综述类文章是转折后持续增加的，而多变量影响因素则在变革期之后开始下降。因为多变量的研究与加入调节变量的研究有一定的重复部分，意味着在变革期，多变量影响因素的研究向加入调节变量的影响因素的研究过渡，所以才会出现一个上升一个下降的情形。

这种变化也表明了未来的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总体来说，单变量和加入调节变量的影响因素研究成为研究的焦点，因为调节变量

表4 各研究方法占不同阶段的分布趋势

研究方法	萌芽期	变革期	稳定期
单变量影响因素	50.00%	32.14%	45.71%
多变量影响因素	33.33%	53.57%	22.86%
加入调节变量的影响因素	8.33%	14.29%	28.57%
研究综述或政策建议	8.33%	0.00%	2.86%
合计占比	100.00%	100.00%	100.00%
总篇数	12	28	35

表5会计因素研究主题的文献统计及所占比例

研究主题	会计处理与审计费用	盈余管理与审计费用	会计基础理论与审计费用	总计
篇数	11	7	9	27
所占比例	40.74%	25.93%	33.33%	100%

表6非会计因素研究主题的文献统计及所占比例

研究主题	公司或高管特征与审计费用	组织结构与审计费用	外部因素与审计费用	总计
篇数	19	13	16	48
所占比例	39.58%	27.08%	33.33%	100%

表7影响因素类型文献统计（占总样本）

影响因素类型		萌芽期	变革期	稳定期	
会计因素	会计处理	篇数	0	3	8
		占比	0.00%	4.00%	10.67%
	盈余管理	篇数	2	1	4
		占比	2.67%	1.33%	5.33%
	会计基础理论	篇数	2	3	4
		占比	2.67%	4.00%	5.33%
非会计因素	公司或高管特征	篇数	5	8	6
		占比	6.67%	10.67%	8.00%
	组织结构	篇数	0	7	6
		占比	0.00%	9.33%	8.00%
	外部因素	篇数	3	6	7
		占比	4.00%	8.00%	9.33%

的作用十分重要，会改变因素的影响方向。实际上，实证研究的文章大同小异，控制变量具有极小的差异，创新主要在于新视角，新的调节变量。

五、审计费用的影响因素类型

在筛选文献时，发现学者们或者基于同一视角下研究不同的问题，或者基于不同视角下研究同一问题。但是在差异的基础上存在共同之处，比如研究方法相同、影响因素的所属类型相同或者他们依据相同的理论进

行研究。从企业角度研究审计费用的影响因素大致分为两类，即会计因素和非会计因素（见表1）。

（一）会计因素与审计费用

会计因素是指与会计基础理论以及具体会计处理有关的因素。本文将会计因素类型分为三种：会计处理与审计费用、盈余管理与审计费用和会计基础理论与审计费用。如表5，在会计因素的三种类型中，各类型的分布比较均匀，其中会计处理与审计费用关系的研究最多。

在审计风险导向模式的驱动下，会计人员对相关会计处理的不同会带来不同程度的风险，从而会影响审计费用。钱春杰（2007）、赵国庆（2014）发现会计收益和应税收益之间的差异与审计费用呈正向关系，而部分学者分别从资产减值损失、关联方交易、商誉减值和或有事项等会计处理方面进行研究（朱松等，2012；马建威等，2013；叶建芳等，2016；董小红等，2016）。随着研究的深入，会更多关注会计处理与审计费用之间的关系上。

企业为达到利润最大化进行的盈余管理也是会计因素的一种。盈余管理的相关研究始于2003年，到目前为止，研究已趋于成熟。企业存在盈余管理的现象，在为企业带来利益的同时，需要审计师获得更多审计证据，从而导致审计成本、审计费用的增加。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研究盈余管理现象与审计费用的关系，蔡春等（2015）赞同高管利益驱使产生盈余管理的观点，探析了企业高管与审计费用的关系。张娟等（2014）研究高管报酬对盈余管理与审计费用正向关系的调节作用，并且认为盈余管理产生的风险导致审计费用的增加。

会计基础理论相关研究沿袭会计稳健性和应计制等实证会计研究的主流问题，在总样本中仅占12%，却在会计因素类型中占有1/3。肖作平（2006）、黄银利（2011）等人以代理理论为主要基础理论，研究自由现金流量与审计费用的关系。随着研究领域的发展，有的学者认为会计稳健性与审计费用呈反向关系，李伟（2015）发现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会加强这种关系，而朱松等（2012）发现同时发行A股和其他类型的股票作为调节变量也会加强该关系。这些研究也表明主流文章依托的理论基础由代理理论转向了保险理论，同

时在模型中加入调节变量，以期发现新的研究成果。

从图2看来，在萌芽期，与会计处理相关的文献数量为零，而与盈余管理和会计基础



理论相关的文献均占会计因素样本数的7.4%。在变革期之后，会计处理相关的研究开始出现，三个研究主题以不同的比率正向发展。其中会计基础理论相关的研究一直稳定增长，与会计处理有关的研究增长最快。这说明学者们比较关注相关会计处理对审计费用的影响，注重会计实务对审计费用的影响。而与盈余管理相关的研究则整体是先下降后上升。这反映了通过对一系列的财务舞弊事件处理以及国际趋同的会计审计准则的颁布实施，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有所减少（变革期占会计因素样本的3%以上），但当前在我国企业操纵利润的现象仍比较严重，而且盈余管理的研究与会计处理存在紧密联系（稳定期占非会计因素样本的14%以上）。

（二）非会计因素与审计费用

非会计因素是指与企业环境、市场环境以及风险等影响审计费用的因素。本文将非会计因素类型分为三种：公司状况或高管特征与审计费用、组织结构与审计费用、外部因素与审计费用，其中外部因素包括整个市场环境和企业所处的微观环境，比如金融危机、企业面临的媒体报道等。

样本文献中，非会计因素的研究占总样本的64%，明显多于会计因素的研究（占总样本的36%），说明学者们更注重企业或高管特

征、企业组织结构、企业环境的变化对审计收费的影响。由表6可以看出，公司或高管特征、组织结构、外部因素与审计费用关系的文献数量相差不大，初步可以看出公司或高管特征与审计费用关系的研究占比最高。

通过图3可见，在研究的萌芽阶段，我国学者根据国外的研究成果，研究我国审计市场中收费的影响因素。最初研究的出发点，认为企业本身的某些特征会影响会计师事务所对企业的风险评估，从而收取的审计费用也会有差异。因此，公司或高管特征、公司治理等因素成为萌芽期的主要关注点。一些学者认为企业的规模、业务复杂程度等与审

66

2006年，我国确立实行现代风险导向审计，制度环境、企业环境的多变使得事务所按照不同的标准收取审计费用，保险理论为未来的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础。而基于代理理论、受托责任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其他理论研究的比例均在变革期之后下降，由于基于这些理论的研究往往都聚焦于审计风险，进而与保险理论密切相关。

99

计费用具有显著关系（刘斌等，2003；徐筱凤等，2004；王善平等，2004；张继勋等，2005），刘明辉（2006）发现公司治理的情况也会影响审计收费的高低。

2007年开始的变革阶段，研究方向由公司治理延伸至组织结构，并且在模型验证分析中加入调节变量。在该时期，大部分学者将股权结构作为控制变量，胡莲（2007）借助Panel data模型分析得出总经理兼任情形下，审计费用会提高。朱敏（2015）将股权性质作为调节变量，揭示了企业社会责任与审计费用之间的负向作用更加明显。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开始关注产权性质、董事会领导权结构等的影响，股权结构、性质以及内部

控制的有效性作为解释变量分析对审计费用的影响。

在稳定期,只有与外部因素相关的研究处于上升状态,对公司高管和组织结构的研究呈现下降趋势,说明企业面临的外部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支付的审计费用。在该研究主题中,大多数研究与风险有关,有的学者从审计风险的组成部分出发(戴捷敏等,2010;张天舒等,2013),有的学者研究企业面临的外部风险(张继勋等,2005;冯延超等,2010;刘启亮等,2014),虽然他们研究的变量不同,但大致认为风险与审计收费呈正相关,同时外部因素的研究范围也在不断扩展当中。

(三)影响因素类型的研究趋势

由表7可见,与公司或高管特征有关的研究和与组织结构相关的研究的趋势特点为先增加后减少,与盈余管理有关的研究则是先减少后增加,其他的研究主题接近直线上升趋势。虽然公司的组织结构等因素的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稳定期的下降不能表明对该研究的关注度下降,其实学者们的研究一直在继续,每年在该研究领域都会有新的研究成果。而会计基础理论相关的研究处于平稳状态。表中更明显的是,与会计处理和外部因素有关的研究的增长较快,并且在后期发展中处于领先位置。在这两个研究主题下,单变量和加入调节变量的研究方法占主要地位,由此可以推测未来的研究趋势和

方向。

六、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运用内容分析法,将样本文献分为主要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影响因素类型三大编码类别和多种编码维度,总结审计费用影响因素研究在萌芽期、变革期和稳定期的发展状况。分析发现在主要理论基础方面,保险理论占比高且正向增长,逐渐成为核心理论基础;在研究方法方面,单变量和加入调节变量的研究文献数量较多,且逐渐占主导地位;在影响因素类型方面,近三年的研究状况显示,各影响因素类型的研究均保持了较高的被关注度,其中特别是与会计处理和外部因素有关的研究发展迅速,文献数量也越来越多。将上述三个维度结合分析,以保险理论为基础,在考虑调节变量的情况下,会计处理和外部因素相关变量与审计费用的关系应该是未来的研究方向和趋势。

作者单位:北京联合大学管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 蔡春,谢柳芳,马可哪呐. 高管审计背景盈余管理与、异常审计收费. 会计研究. 2015(3)
2. 蔡吉甫. 公司治理、审计风险与审计费用关系研究. 审计研究. 2007(03)
3. 冯延超,梁莱歆. 上市公司法律风险、审计收费及非标准审计意见——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审计研究. 2010(03)
4. 蓝文永. 上市公司审计费用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华东经济管理. 2009(6)
5. 马建威,杨亚军,黄文.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分类与审计收费的相关性研究——来自2007—2010年沪市A股的经验证据. 中央财经大学报. 2012(1)
6. 马建威,李伟. 关联方交易对审计收费的影响研究——基于一年沪市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审计研究. 2013(1)
7. 钱春杰,周中胜. 会计-税收差异,审计收费和“不清洁”审计意见. 审计研究. 2007(01)
8. 王彤彤,彭晖,郑盼盼. 审计收费现状分析及政策建议. 财务与会计. 2015(24)
9. 伍利娜. 盈余管理对审计费用影响分析——来自中国上市公司首次审计费用披露的证据. 会计研究. 2003(12)
10. 肖作平. 自由现金流量和债务控制假说检验——来自中国上市公司审计费用的经验证据. 经济管理. 2006(6)
11. 余敏. 论风险、风险管理和公司治理对审计收费的影响——从审计需求的角度.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02)
12. 张继勋,陈颖,吴璇. 风险因素对我国上市公司审计收费影响的分析——沪市2003年报的数据. 审计研究. 2005(4)
13. 张娟,黄志忠. 高管报酬、机会主义盈余管理和审计费用——基于盈余管理异质性的视角. 南开管理评论. 2014(03)
14. 张天舒,黄俊. 金融危机下审计收费风险溢价的研究. 会计研究. 2013(5)
15. 朱敏,刘拯,施先旺. 股权性质、企业社会责任与审计收费——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江淮论坛. 2015(02)
16. 朱松,陈关亭. 会计稳健性与审计收费:基于审计风险控制策略的分析. 审计研究. 2012(1)

媒体关注、资产误定价与非效率投资

■ 刘文琪 杜闪

摘要

本文以2004-2015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媒体关注的视角探讨了资产误定价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资产误定价与企业非效率投资显著正相关,媒体关注能有效缓解资产误定价,继而缓解企业非效率投资。进一步研究发现,媒体关注的治理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结论表明,媒体关注具有公司治理效应,可以通过抑制资产误定价,提高市场有效性,促进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

关键词

资产误定价 投资效率 媒体关注 公司治理

一、引言

投资活动是企业财务活动的核心,投资效率的高低不仅决定能否提升企业价值,还影响着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然而,由于内外影响因素繁多,比如代理问题、融资约束、市场化进程等,导致企业投资往往偏离最优投资水平。因此如何有效改善企业投资效率是学术界与实务界一直关注的焦点话题。企业价值在市场中所反映出来的不完全信息,或多或少会造成投资者理解上的偏差,继而做出有限理性的决策,加之“羊群效应”的存在和市场不完善,最终形成企业价值偏离其内在价值的资产误定价。市场错误定价现象常年存在(卿小权等,2012),那么当企业资产未被有效定价时,是否会影响企业投资效率呢?现有研究对资产误定价所导致的经济后果仍处于起步阶段,对其影响机理也尚处初步探索时期。当资产被高估时,企业可能倾向于股权融资(李君平、徐龙炳,2015),由于融资成本低,融资额高,企业有资本进行过度投资(张静、王生年,2016),亦或缓解投资不足;当资产被低估时,企业也可能会回购股票(林祺,2016),现金流减少,易于投资不足,亦或抑制过度投资。而对于股价泡沫而言,企业的投资

支出率与之呈正相关关系(屈文洲等,2016)。可见,资产误定价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尚无定论,有待深入探索和进一步完善。

投资者作为资本市场主体之一,其投资决策对企业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互联网与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媒体报道可更好发挥信息中介角色,为投资者提供更为直观及时的信息,降低信息不对称,并进一步提高投资者定价能力。此外,大量研究证实媒体关注还具有监督治理的作用,故而媒体关注可能会成为影响资产误定价对企业非效率投资关系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国外研究从影响审计师行为、降低控制权私人收益、减少企业对外部投资者的侵害等方面证实了媒体监督的公司治理作用(Dyck and Zingales, 2004; Miller, 2006; Dyck et al., 2008; Joe et al., 2009)。纵观国内研究,媒体关注可通过声誉机制和市场压力有效抑制管理层盈余操纵及其他自利行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并最终提升了市场对盈余构成信息的定价效率,减少了应计误定价情况的出现(于忠泊等,2011;宋常、揭晓小,2012),可有效提高股价中公司层面信息含量,降低股价同步性(黄俊、郭照蕊,2014),说明媒体关注可纠正市场对资产的定价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variable	N	mean	sd	p50	min	max
INV	8881	-0.0047	0.1561	-0.0266	-0.3227	5.5458
Misp	8881	0.4582	0.4655	0.3891	-4.7979	8.0094
Newlog	8881	4.0159	0.8903	4.3041	0.0000	6.7056
Growth	8881	0.2228	0.5813	0.1278	-0.6428	4.0798
Lev	8881	0.5131	0.1902	0.5230	0.0745	0.9182
Cash	8881	0.1834	0.1497	0.1438	0.0066	0.8590
Age	8881	10.5673	3.8928	10.0000	4.0000	22.0000
Lnsiz	8881	21.6879	1.1573	21.6061	19.2094	25.4860
Ret	8881	0.3825	0.9444	0.0496	-0.7347	3.7718
Dividend	8881	0.0768	0.1255	0.0200	0.0000	0.7000

表2 Pearson和Spearman相关系数表

	INV	Misp	Newlog	Growth	Lev	Cash	Age	Size	Ret	Dividend
INV		0.1999***	0.0837***	0.1559***	-0.0691***	0.1384***	0.0075	0.2818***	0.0839***	0.2389***
Misp	0.0824***		-0.0393***	0.0302***	-0.0780***	0.0800***	-0.1368***	0.3611***	-0.1777***	0.4055***
Newlog	0.0456***	-0.0108***		0.0550***	0.0458***	0.1272***	0.2091***	0.3742***	0.1380***	0.1756***
Growth	0.2373***	-0.0087	0.0133		0.0760***	0.1433***	-0.0767***	0.1578***	0.0796***	0.1679***
Lev	-0.0150	-0.0995***	0.0311***	0.0753***		-0.1684***	0.0954***	0.2474***	-0.0109	-0.1994***
Cash	0.1822***	0.0550***	0.1246***	0.2298***	-0.1772***		0.0172	0.1088***	0.0842***	0.2374***
Age	0.0027	-0.1052***	0.2695***	-0.0132	0.0681***	0.0312***		0.1357***	-0.0178	-0.0812***
Size	0.1342***	0.3594***	0.3765***	0.0791***	0.2428***	0.0757***	0.1217***		0.0268**	0.4208***
Ret	0.0460***	-0.1564***	0.2076***	0.0948***	0.0196*	0.0815***	-0.0451***	-0.0045		0.0676***
Dividend	0.0893***	0.3554***	0.1595***	0.0492***	-0.1780***	0.2076***	-0.0682***	0.3485***	0.0243**	

注：左下角是Pearson 检验结果，右上角是Spearman 检验结果；其中***，**，* 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

偏差。李焰、王琳（2013）也验证了媒体监督在约束公司行为、改善公司治理、保护投资者利益方面的作用；媒体关注越高，投资者得到有价值的信息越多，越能够做出准确判断，媒体越能够发挥公司治理作用。

据以上分析发现，资产误定价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结论，而从媒体关注视角，探究三者之间关系的研

究也不多见。本文以具有更强解释力度的剩余收益模型衡量资产误定价更具有说服力。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一）资产误定价与企业非效率投资

资产误定价作为非有效市场的普遍现象，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熟知并研究。对于资产误定价与投资效率之间关系的研究，国外学者提出三种对两者关系的可能解释：经理人市场的时机选择，管理者迎合行为和管理者对行业未来性质的不确定性（Morck、Shleifer&Vishny, 1990；Stein, 1996）。当资产被高估时，对企业来说是利好消息，说明企业向市场传递发展良好的信号，此时，企业倾向减少固定资产，在资本支出、R&D和企业合并方面会进行过度投资；当低估时，企业则更倾向减少流动资产，并仅在资本支出和R&D方面投资不足（Mohammed, 2006）。可见，资产误定价会影响到公司的投资决策。

从管理者行为角度来说，公司投资与股票误定价之间的联系是通过市场时机选择和迎合行为导致的。由信息不对称，结合投资者情绪和行为金融学理论分析可得，当股价高估时，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企业可能在此时通过股权融资渠道发行股票，继而导致企业过度投资（刘松，2010）。在这一点上，也得到了张静和王生年（2016）的支持，且他们的研究更符合我国股权集中的特点，且公司股票错误定价会显著增加公司投资过度的投资行为。反之，若企业资产被低估，投资者持悲观态度，筹资困难，企业发展受阻，极易导致投资不足。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1：资产误定价与非效率投资正相关，误定价程度越高，企业非效率投资越严重。

（二）媒体关注对资产误定价与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

在传统的资产定价模型中，市场价格机制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被视为导致资产定价偏差的唯一途径，而忽略了媒体关注的作用。就目前研究而言，媒体关注对股市波动的解释，存在两种观点：一是加剧；二是缓解。但大量研究更倾向于后者，认为新闻媒体中披露的高质量信息有利于提高股价的有效性（Klibanoff et al., 1998），对股票市场运行效率的提升发挥了积极作用（罗进辉等，2013），并且能够通过降低市场摩擦和信息不对称（Bushee et al., 2010）使资产定价更为有效。通过行政介入和声誉机制两个途径，媒体关注降低了股价同步性（黄俊、

表3 资产误定价对非效率投资检验

	INV	INV (过度)	INV (不足)
Misp	0.0141*** (6.72)	0.0084*** (2.65)	0.0067*** (6.02)
Growth	0.0156*** (7.64)	0.0409*** (10.90)	0.0041*** (5.51)
Lev	-0.0425*** (-10.46)	-0.0572*** (-6.62)	-0.0506*** (-24.74)
Lnsiz	0.0157*** (19.87)	0.0139*** (8.82)	0.0120*** (29.60)
Ret	0.0061*** (4.10)	0.0032 (1.13)	0.0007 (1.03)
Age	0.0001 (0.52)	-0.0008* (-1.92)	0.0007*** (6.87)
Cash	0.0266*** (3.80)	0.0242* (1.81)	-0.0058** (-2.17)
Dividend	0.0081 (1.08)	-0.0065 (-0.51)	0.0036 (0.99)
行业	控制		
年份	控制		
N	8881	2986	5895
F-value	33.23	20.32	98.75
Adj-R2	0.1303	0.2036	0.3606

注：括号内数字为t值；***、**、*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1%、5%、10%，下同。

表4 媒体关注的公司治理检验

	Misp	INV	INV (过度)	INV (不足)
M_N		-0.0039* (-1.87)	-0.0092** (-2.46)	0.0001 (0.06)
Misp		0.0300*** (3.45)	0.0459*** (2.92)	0.0064 (1.40)
Newlog	-0.03902*** (-4.21)	0.0069*** (3.86)	0.0109*** (2.54)	0.0005 (0.65)
Growth	-0.0191653*** (-2.88)	0.0157*** (7.67)	0.0409*** (10.88)	0.0040*** (5.5)
Lev	-0.2680671*** (-12.27)	-0.042*** (-10.33)	-0.0557*** (-6.47)	-0.0506*** (-24.67)
Lnsiz	.1258809 *** (29.30)	0.0149*** (18.04)	0.0130*** (7.55)	0.0120*** (28.81)
Ret	-0.0625455*** (-11.06)	0.0056*** (3.70)	0.0021 (0.73)	0.0007 (1.08)
Age	-0.0127744*** (-12.14)	0.0001 (0.49)	-0.0008* (-1.95)	0.0007*** (6.88)
Cash	.0120669 (0.45)	0.0262*** (3.74)	0.0229* (1.70)	-0.0057** (-2.16)
Dividend	.7137811*** (17.03)	0.0075 (1.00)	-0.0070 (-0.55)	0.0037 (1.01)
行业	控制			
年份	控制			
N	8881	8881	2986	5895
F-value	97.94	31.68	19.28	94.61
Adj-R2	0.1303	0.1316	0.2058	0.3607

郭照蕊，2014）。Chen等（2009）、Fang和Peress（2009）也发现媒体的大量关注能够有效降低市场摩擦，提高了会计信息质量，使市场正确评估会计盈余构成信息，提升资产定价效率。

媒体关注能够加强对管理者的监督，增强公司内部治理功能，缓解信息不对称（Tetlock，2010）和代理问题（叶勇等，2013），提高企业违规行为改正率（李培功、沈艺峰，2010），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众多中小投资者，有益于正确识别公司价值，阻止了企业价值与其内在价值的偏离（李伟、李丽娇，2014）。当资产定价更有效，股价信息含量越高时，就越能缓和融资约束和代理冲突，缩小了企业进行非效率投资的空间（杨继伟，2011）。说明媒体关注对公司的资源配置产生正面效应，提高了投资效率（程新生、刘建梅、王子璇，2015）。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2：媒体关注能够发挥治理作用，弱化资产误定价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正向影响。

（三）产权性质、媒体关注与资产误定价

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特殊性，国企与非国企在诸多方面差异较大。国企有非国企不可比拟的优势资源，比如政策扶持等，但也承担着更大的社会责任。由于非国有企业中管理人员由经理人市场选拔而来，为了得到雇主青睐，会格外注重自己的声誉，这就为媒体关注发挥外部监督治理作用提供了良好契机。

非国有企业在资源配置和政策保障上劣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具有融资难、风险高的特质，使得中小投资者们更加谨慎，极易导致非国有上市公司股价被低估。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关注可以发挥信息中介角色，帮助市场投资者和债权人了解企业的真实经营状况（仲秋燕、石晓峰，2016），有利于市场对企业内在价值进行合理评估与定价，并降低融资约束。融资成功后，管理层会倍加珍惜，并进行合理投资提升效率，继而增加企业价值。国企并不担心资金来源，故媒体关注的作用应在非国企中更为显著。尤其是媒体报道可作为股东考核经理人业绩时的信息来源。非国企高管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会尽其所能提高企业业绩；而国企所有者缺位的特质，使得高管并不受此限制。有研究发现，随着媒体关注程度的提高，能够有效改善企业高管与绩效之间的关系（伍中信、严思思，2016）。在现代经济中，企业越来越注重自身的声誉，良好的声誉能带来意想不到

表5 产权性质分组检验结果

	INV (国有)	INV (非国有)	Misp (国有)	Misp (非国有)	INV (国有)	INV (非国有)
M_N					-0.0022 (-0.94)	-0.0087* (-1.87)
Misp	0.0193*** (7.47)	0.0039* (1.76)			0.0282*** (2.90)	0.0393** (2.05)
Newlog			-0.0335*** (-3.05)	-0.0594*** (-3.28)	0.0054** (2.49)	0.0102*** (3.17)
Growth	0.0202*** (6.78)	0.0109*** (4.08)	-0.0297*** (-3.53)	-0.0115 (-1.09)	0.0202*** (6.78)	0.0109*** (4.08)
Lev	-0.0348*** (-6.79)	-0.0573*** (-8.18)	-0.2831*** (-10.29)	-0.2401*** (-6.68)	-0.0348*** (-6.79)	-0.0573*** (-8.18)
Lnsize	0.0146*** (15.06)	0.0177*** (11.43)	0.1358*** (25.15)	0.1162*** (16.07)	0.0146*** (15.06)	0.0177*** (11.43)
Ret	0.0063*** (3.28)	0.0068*** (2.88)	-0.0662*** (-9.86)	-0.0525*** (-5.13)	0.0063*** (3.28)	0.0068*** (2.88)
Age	0.0005* (1.79)	-0.0001 (-0.27)	-0.0125 *** (-9.04)	-0.0113*** (-6.60)	0.0005* (1.79)	-0.0001 (-0.27)
Cash	0.0057 (0.70)	0.0582*** (4.58)	0.0305 (0.89)	0.0138 (0.33)	0.0057 (0.70)	0.0582*** (4.58)
Dividend	0.0145 (1.55)	-0.0039 (-0.32)	0.6581*** (13.16)	0.7999*** (10.72)	0.0145 (1.55)	-0.0039 (-0.32)
行业	控制					
年份	控制					
N	5959	2922	5959	2922	5959	2022
F-value	23.91	13.72	76.75	32.79	22.88	13.07
Adj-R2	0.1335	0.1461	0.3891	0.3129	0.1343	0.1489

的溢价，非国企高管尤然，声誉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能否被重用，媒体报道通过声誉机制提高市场压力的作用会被加强。据以上分析，提出假设3：

H3：相对于国有企业，媒体关注的治理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

三、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以我国股票市场所有A股非金融类公司为初始样本，期间选择为2004-2015年，由于在计算资产误定价模型中使用滞后两期数据，因此实际样本区间为2002-2013年。根据研究目标，对初始样本进行以下处理：（1）剔除ST、PT和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2）剔除相关数据缺失的公司。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在1%和99%水平上对极端值进行了Winsorize处理，最终获得有效样本8881个。本文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采用stata12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二) 研究模型与变量定义

1. 投资效率测度(INV)。本文基于Richardson (2006) 预期投资理论模型，计算出非效率投资。建立模型：

$$\begin{aligned}
 Investment_{i,t} = & \beta_0 + \beta_1 Growth_{i,t-1} \\
 & + \beta_2 Cash_{i,t-1} + \beta_3 Age_{i,t-1} + \beta_4 Ret_{i,t-1} \\
 & + \beta_5 Size_{i,t-1} + \beta_6 Lev_{i,t-1} + \beta_7 Investment_{i,t-1} \\
 & + \sum year + \sum industry + \varepsilon_{i,t} \quad (1)
 \end{aligned}$$

其中，Investment_{i,t}为预期的资本投资量，为消除公司上期整体运营情况对本期投资支出的影响，该模型的解释变量均为滞后一期的变量。Growth_{i,t-1}、Lev_{i,t-1}、Cash_{i,t-1}、Age_{i,t-1}、Size_{i,t-1}、Ret_{i,t-1}分别为成长性、资产负债率、现金持有率、上市年限、公司规模、股票回报率。同时控制投资活动的持续性影响，采用滞后期的投资水平Investment_{i,t-1}。并控制行业和年度。对模型进行分年度分行业回归，回归残差表示真实投资和预期投资的差值，若残差大于0，则为过度投资。

2. 资产误定价测度(Misp)。本文采用较为全面、客观且解释力度更强的剩余收益模型来测度资产误定价。在未来第三年的盈余能够持续的假设下，运用未来三期的分析师预测数据估计股票内在价值，将剩余收益模型改写成：

$$\begin{aligned}
 V_t = & b_t + \frac{f(1)_t - r \cdot b_t}{(1+r)} + \frac{f(2)_t - r \cdot b(1)_t}{(1+r)^2} \\
 & + \frac{f(3)_t - r \cdot b(2)_t}{(1+r)^2 \cdot r} \quad (2)
 \end{aligned}$$

上式中V_t为每股内在价值，f()_t为分析师预测的公司盈余，b_t为每股权益账面价值，r为资本成本。同时，借鉴饶品贵和岳衡(2012)的思路，采用Hou et al. (2012)的预测方法预测公司未来一至三年的盈余，并将其带入V_t模型估计公司内在价值。具体预测模型如下：

$$\begin{aligned}
 Earnings_{i,t+j} = & \alpha_0 + \alpha_1 Asset_{i,t} \\
 & + \alpha_2 Dividend_{i,t} + \alpha_3 DD_{i,t} \\
 & + \alpha_4 Earnings_{i,t} + \alpha_5 NegEn_{i,t} \\
 & + \alpha_6 Accrual_{i,t} + \varepsilon_{i,t} \quad (3)
 \end{aligned}$$

式中Earnings_{i,t+j}是公司i未来一至三年的每股盈余预测值；Asset和Dividend分别是每股总资产和每股现金股利；DD是否发放股利哑变量，发放取1，否则取0；Earnings_{i,t}是公司i当年的每股盈余；NegEn为公司是否亏损的虚拟变量，若亏损则取值1，否则取值0；Accrual是每股应计项目。以此估计出公司未来一至三年的盈余预测值将其带入V_t式中，继而得出个股在各

年份上的内在价值(V)，本文将市场错误定价定义为内在价值与次年4月末股票收盘价P之比，即V/P简记为Misp。

3. 媒体关注测度(Newlog)。有关媒体关注的来自CSMAR国泰安财经新闻数据库，根据关键词、标题、摘要、分类编码、来源、股票市场咨询及A股等字样进行检索，将收集来的数据按股票代码和年份匹配，并进行计数+1取对数的处理，构造媒体关注变量。

4. 产权性质(Soe)。虚拟变量，若为国有企业，则取值为0，若为非国有企业，则取值为1。

5. 控制变量。考虑到企业成长性和规模不同将导致企业媒体关注度不同，本文使用公司规模(Lnsize)、每股收益(Eps)、公司成长性(Growth)、资产负债率(Lev)、股票回报率(Ret)和公司上市年限(Age)作为控制变量，同时还加入了行业和年度虚拟变量。

6. 研究模型。本文采用模型(4)作为基本检验模型。当验证H1时，用非效率投资(INV)作为因变量，与资产误定价(Misp)及控制变量进行回归，按照假设1，此时资产误定价的系数应为正；验证H2时，先进行资产误定价与媒体关注(Newlog)的回归，媒体关注作为解释变量，其系数应为负，再构造资产误定价与媒体关注的交乘项(Misp*Newlog，下文简记为M_N)与非效率投资进行回归，若假设2成立，则交乘项系数应为负；验证H3时，以产权性质变量(Soe)进行分组，若成立，则交乘项在非国有企业中的t值更大，显著性更高。

$$\begin{aligned} INV = & \beta_0 + \beta_1 Misp_{i,t} \bullet Newlog_{i,t} \\ & + \beta_2 Misp_{i,t} + \beta_3 Newlog_{i,t} + \beta_4 Growth_{i,t} \\ & + \beta_5 Lev_{i,t} + \beta_6 Lnsize_{i,t} + \beta_7 Ret_{i,t} \\ & + \beta_8 Dividend_{i,t} + \beta_9 Age_{i,t} \\ & + \sum Control + \varepsilon_{i,t} \end{aligned} \quad (4)$$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结果与相关性分析

首先，对模型中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从表1看，企业投资效率普遍不高，其中过度投资现象更为严重(|5.5358|>|-0.3227|)，但投资不足更为普遍，p50为-0.0266。资产定价偏离程度较大，高估低估程度不分上下，从均值和中位数(均小于1)可以看出，企业多被高估。对于媒体关注来说，均值为4.0159，说明媒体关注较为普遍。

为了检测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计算了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表2左

下部分是Pearson的相关系数，右上部分是Spearman的相关系数，从表中可以看出，变量之间相关性较低，绝大多数系数都在0.5以下，因此，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即不存在内生性问题。

(二) 资产误定价与企业非效率投资间检验结果

表3报告了资产误定价与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回归结果。资产误定价与企业非效率投资间是正相关关系，误定价程度越高，非效率投资程度越高，验证了假设1。随后，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进行分组回归检验。资产误定价与企业过度投资组和投资不足组的回归结果均显著为正，表明当企业资产不能正确定价时，会加剧企业的非效率投资。当资产被高估时，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会加剧过度投资，反之，低估时，企业投资不足现象更严重。

(三) 媒体关注的公司治理检验

表4报告了基于媒体关注的公司治理视角，检验媒体关注对资产误定价的影响。结果表明，媒体关注与资产误定价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说明媒体关注可以有效抑制资产定价偏离其内在价值；接着，检验媒体关注与资产误定价交乘项(M_N)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到，交乘项M_N与企业非效率投资显著负相关，说明在加入媒体关注之后，能有效改善资产误定价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正向作用。进一步，非效率投资分为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两组检验交乘项作用，回归结果表明，交乘项M_N可有效遏制企业过度投资，而对投资不足作用不显著。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媒体关注可以有效提高资产定价效率，继而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其内在机理为，当媒体广泛关注时，必然会向市场传达更多有关企业的信息，降低了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使得投资者能理性评估企业价值，降低资产错误定价，企业根据自身价值融得合理资金，若进行过度投资时，必然会引起投资者的不满，企业出于自身形象和声誉的考虑，会谨慎投资，提高企业投资效率。这就支持假设H2，即媒体关注的确实能够从外部缓解资产误定价，并间接对企业的投资决策起到约束作用，促使企业不断提高投资效率。

(四) 产权性质分组检验结果

表5分别报告在进行产权性质分组后，资产误定价对企业非效率投资、媒体关注对资产误定价以及交乘项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与非国有企业

相比,资产误定价在国有企业中会显著加剧企业的非效率投资。媒体关注,不管是国企还是非国企,对资产误定价都能起到显著的缓解作用,且在非国有企业中显著性更高(3.28>3.05),而从交乘项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加入媒体关注变量后,对国有企业的治理作用虽不显著,但能起到抑制作用,对非国有企业在10%水平上显著,说明媒体关注发挥了其外部监督治理的作用,并验证假设3。

(五) 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本文实证结论的可靠性,本文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1)更换企业投资效率衡量方法。在模型设定上,本文用反映综合能力的ROE代替原始模型中股票回报指标,更适应我国国情。ROE为加权净资产收益率:以当年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与加权净资产净值进行计算。(2)为了考察媒体关注对资产误定价影响的持续时间,本文将媒体关注指标滞后两期。总体上,稳健性检验结果与之前结论一致,媒体关注可以缓解资产误定价,继而间接弱化资产误定价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正向影响,起到外部公司治理的作用,表明本文结论较为稳健。

五、结论与建议

由于资产误定价作为资本非有效市场特征,在其所带来的经济后果这一领域研究尚浅,所以探究其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从媒体关注的公司治理视角出发,对两者关系进行检验,实证结

果表明:(1)资产误定价与企业非效率投资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2)媒体关注可以有效发挥外部公司治理作用,通过缓解资产定价偏离程度,进而提高企业投资效率;(3)媒体关注的治理作用在非国企中更显著,但高媒体关注对国企的治理作用更强。根据研究结论提出建议:对企业层面而言,需尽量保持资产定价准确,可以通过提高企业会计信息透明度,缓解信息不对称程度,发布真实有效的企业信息,对企业形象进行客观展示等途径实现,同时,要进行合理投资,达到资金效用最大化;对市场层面而言,需促进我国财经新闻媒体的完善,推动金融市场持续稳定、健康有序得发展,可以通过对媒体信息市场建立相关法规制度,完善制度环境,提高媒体对企业进行公平公正报道的市场环境;对国企而言,需加快改革进度,进行结构调整,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对非国有企业来说,应尽快解决其融资难问题,建立健全的信贷市场;对投资者而言,虽然随着我国媒体市场越来越完善,媒体报道能发挥部分外部治理监督作用,投资者仍需加强自身对信息有效性的甄别能力,提高专业知识水平,不要被市场所主导。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于行为金融和信息不对称的资产误定价研究”(项目编号:71562029);新疆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项目编号:XJEDU020116B01)资助。

■ 作者单位:石河子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 Justin Y. Jin. Investor Attention and Stock Mispricing [J]. Account Perspect, 2014, 13(2).
2. Dyck, A., N. Volchkova and L. Zingales.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Role of the Media: Evidence from Russia [J]. Journal of Finance, 2008(63): 1093-1135.
3. Joe, J.R., H. Louis and D. Robinson. Managers' and Investors' Responses to Media Exposure [J].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2009, 44(03): 579-605.
4. Hou K., M. van Dijk, Y. Zhang. The Implied Cost of Capital: A New Approach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12, 53 (3): 504-526.
5. Mohammed Alzahrani, Ramesh P. Rao. Managerial Behavior and the Link between Stock Mispricing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s: Evidence from Market-to-Book Ratio Decomposition [J]. Financial Review, 2014, 49 (1)
6. Carl R. Chen, Peter P. Lung, F. Albert Wang. Mispricing and the cross-section of stock returns [J]. Review of Quantitative Finance and Accounting, 2009, 32(4): 317-349
7. 李君平, 徐龙炳. 资本市场错误定价、融资约束与公司投资. 财贸经济. 2015(03)
8. 张静, 王生年. 资产误定价对过度投资的影响路径. 财经科学. 2016(03)
9. 林祺. 资本市场效率与资产增长异象——最优投资效应假说vs. 错误定价假说. 经济学(季刊). 2016(02)
10. 宋常, 揭晓小. 增发配股、媒体关注度与资产误定价. 中国会计评论, 2015(03)
11. 黄俊, 郭照蕊. 新闻媒体报道与资本市场定价效率——基于股价同步性的分析. 管理世界. 2014(05)
12. 饶品贵, 岳衡. 剩余收益模型与股票未来回报. 会计研究. 2012 (9)
13. 杨继伟. 股价信息含量与资本投资效率——基于投资现金流敏感度的视角. 南开管理评论. 2011(05)
14. 程新生, 刘建梅, 王子璇. 媒体关注能提高公司投资效率吗?. 财经论丛. 2015(04)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陷与审计师变更相关性研究

■ 葛新旗

摘要

审计和内部控制是影响公司组织效率的重要因素,内部控制缺陷会影响内部控制的效率进而对审计风险产生影响。本文以2012-2015年的沪深A股主板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内部控制缺陷与审计师变更之间的相关性及法律环境好坏对审计师变更与内部控制缺陷的影响。研究发现,内部控制缺陷与审计师变更显著正相关,缺陷程度与审计师变更正相关,法律环境与审计师变更显著负相关。

关键词

内部控制 缺陷 审计师变更

一、引言

事务所作为调解管理层与利益相关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纽带,可以降低公司代理成本,为会计信息的真实性与可靠性提供保障。作为提高审计独立性的一种重要方法,审计师变更的有效运用可以避免由于审计任期过长而引起的管理层与审计师相互串通的问题,保证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利。反之则可能成为管理层寻找利益合作伙伴,掩盖公司内部控制缺陷的手段。近年来,审计师变更问题成为学者和监管部门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2015年的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226家上市公司变更了审计师,占上市公司总数的7.95%,相比2014年的164家(占总数的6.15%)有较大幅度的上升。审计与内部控制是影响企业组织效率的重要因素,审计师变更与内部控制缺陷是否存在相关性?内部控制的缺陷程度对审计师变更的影响怎样?法律环境好坏对内部控制缺陷与审计师变更的影响又是什么?本文以2012-2015年的沪深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内部控制缺陷与审计师变更之间的相关性,进而分析内部控制缺陷程度及法律环境好坏对审计师变更的影响,提出针对性的建议和对策。

二、理论综述

(一) 内部控制缺陷研究综述

对内部控制缺陷的研究,目前国内学者主要从内部控制缺陷产生的原因及后果进行分析。在公司规模与内部控制缺陷相关性研究上,Kinney and McDaniel(1989)发现公司规模越大内控越完善,Jeffrey Doyle、Ashbaugh等(2007)、李育红(2010)研究发现公司规模小出现内控缺陷的概率较大。在公司经营复杂性与内部控制缺陷的关系上,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即认为:公司经营的复杂性和增长速度与内部控制缺陷正相关。如国外的学者(Jeffrey Doyle等,2007,Kinney and McDaniel,1989)和国内学者齐保垒、田高良(2012)、李瑛玫等(2015)。在上市时间与内控缺陷的关系上,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论有很大出入。国外学者如Ashbaugh(2007)、Jeffrey Doyle等(2007)研究发现公司上市时间越长,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出现内控缺陷的概率越低。而国内学者如孙慧慧(2012)、林斌等(2012)的研究则恰恰相反。在内控缺陷产生的其他原因上,国内外学者研究还存在以下发现:(1)重组并购与内控缺陷正相关(韩丽荣、盛金,2013),(2)公司治理与内控缺陷存在联系,如Krishnan(2005)发现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和行业专长与内部控制缺陷负相关。

对内控缺陷的经济后果,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盈余管理的选择、对投资、融资和股价的影响等几个方面。对盈余

表1 变量简介

被解释变量	变量简称	变量定义及计算方法
审计师变更	Switch	审计师变更, 变更为1, 未变更为0
解释变量	变量简称	变量定义及计算方法
内部控制缺陷	ICD	披露缺陷为1, 否则为0
内部控制缺陷严重程度	ICDTYPE	一般缺陷=0, 重要缺陷=1, 重大缺陷=2
法律环境	LAW	公司所在省级行政区的法律环境指数
控制变量	变量简称	变量定义及计算方法
高管变更	CEOCHANGE	本期发生董事长变更为1, 否则为0
四大	BIG4	为公司提供财务报表审计的公司为四大之一取1, 否则取0
上一期审计意见	OPIN_1	上一年的审计意见非标准审计意见为1, 标准审计意见为0
公司规模	SIZE	年末账面总资产的对数
企业性质	STATE	年末实际控制人为国有性质取1, 否则取0
总资产收益率	ROA	息税前利润 / 平均资产总额
资产负债率	LEV	总负债 / 总资产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	CFPS	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总股本
年度	YEAR	年度哑变量
行业	IND	参照证监会行业分类标准 (除金融保险外)

表2 样本描述性分析

	样本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SWITCH	7246	0	1	.093	.290
ICD	7246	0	1	.260	.439
LAW	7246	0	1	.667	.472
CEOCHANGE	7246	0	1	.120	.325
BIG4	7246	0	1	.055	.228
OPIN_1	7246	0	1	.013	.114
STATE	7246	0	1	.413	.492
SIZE	7246	18.468	28.509	22.127	1.286
ROA	7246	-.699	.790	.043	.059
LEV	7246	.008	1.345	.426	.211
CFPS	7246	-16.34	16.29	.396	1.017

管理的选择方面, 刘行健、刘昭(2014)的研究认为存在内控缺陷的公司会选择营业外收入来进行盈余管理, 而不存在内控缺陷的公司会选择投资和资产减值来进行盈余管理。在投资方面, Cheng等(2013)发现内部控制缺陷的充分披露对公司的过度投资具有抑制作用。张超、刘星(2015)研究认为如果审计能够充分地披露企业内部控制存在的缺陷, 可以有效减缓企业的过度投资。在对融资的影响研究中, 学者们发现内部控制缺陷的披露对于权益融资和债务融资都有影响。刘中华、梁红玉(2015)研究发现, 上市公司存在内部控制缺陷会加剧公司的信贷约束, 即便缺陷修补后, 也不能完全消除对信

贷的影响。但也有学者认为内部控制缺陷修正后, 债务融资成本会下降(Kim等, 2009)。而在内部控制缺陷对股价的影响上, 学者们发现内部控制缺陷的披露会引起股价的下滑(Hammersley等, 2008; Kim等, 2009), Beneish等(2008)的研究结论则相反。

(二) 审计师变更研究综述

对审计师变更的研究, 目前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审计师变更原因及目的两个方面。在变更原因方面, 张文杰等(2006)、王艳艳等(2009)研究发现高管持股比例越高和规模对审计师变更类型有显著影响。刘笑霞和李明辉(2013)、王兵(2013)研究发现当审计师或事务所声誉受到质疑, 管理当局会选择变更审计师。从审计师自身辞职变更的原因上, 王李(2010)研究发现审计师的辞职与事务所面临的诉讼风险、成本结构和客户特征有关。戴亦一、潘越、陈芬(2013)认为审计师的地域特征也是审计师变更的原因。在变更审计师目的方面, Lennox(2000), 陆正飞、童盼(2003), 吴联生(2005), Chan等(2006)的研究都认为认审计师变更的目的是为了改善审计意见。伍利娜、王春飞、陆正飞(2013), 刘伟、刘星(2007)研究认为通过变更审计师可以实现审计意见购买, 公司容易获得好的审计意见。也有研究认为公司变更审计师是为了提升盈余管理(李爽、吴溪, 2004)。

(三) 内部控制与审计师变更方面的研究

在内部控制与审计师变更关系方面, 方红星, 刘丹(2013)发现内控质量越高审计师变更的概率越低, 而且内控质量高低会影响审计师变更的方向。李奇峡(2014)研究认为内部控制的效率对内部控制信息的披露与审计师变更之间的关系具有抑制作用。Ettredge等(2007)、叶陈刚、刘桂春、姜亚凝(2013)研究发现审计师变更与企业财务报告层面的内部控制缺陷高度相关, 财务重述与内部控制缺陷正相关。田高良、齐保垒、李留闯(2010)研究发现审计师变更的公司更愿意披露企业内控中存在的缺陷。

通过对以往文献的梳理, 可以看出国外关于内控缺陷与审计师变更的研究比我国早, 而且部分研究也发现两者具有一定的联系, 但通过研究, 可发现在内控缺陷对审计师变更的影响方面相关研究还是很少, 随着我国内部控制审计的实施, 审计师了解公司

表3 皮尔逊相关性结果

	SWITCH	ICD	LAW	CEOCHANGE	BIG4	OPIN_1	STATE	SIZE	ROA	LEV	CFPS
SWITCH	1										
ICD	.046**	1									
LAW	-.070**	-.136*	1								
CEOCHANGE	.034**	.081**	-.034*	1							
BIG4	.027*	.053**	.061**	.041**	1						
OPIN_1	.047**	.053**	-.050*	.062**	-.023	1					
STATE	.044**	.234**	-.181*	.198**	.163**	-.003	1				
SIZE	-.004	.205**	-.063*	.112**	.371**	-.033**	.425**	1			
ROA	-.010	-.109*	.106**	-.080**	.021	-.063**	-.118**	-.047*	1		
LEV	.041**	.182**	-.109*	.122**	.108**	.065**	.338**	.570**	-.358*	1	
CFPS	.008	.033**	-.028*	.006	.133**	-.027*	.099**	.166**	.246**	-.015	1

注：（1）**、* 分别表示（双尾）1%、5% 水平上显著不同 （2）样本量为 7246。

表4 模型一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标准系数	Z值	P值	VIF值
ICD	0.225	2.41	0.016	1.04
CEOCHANGE	0.262	2.22	0.027	1.03
BIG4	0.543	3.07	0.002	1.09
OPIN_1	0.543	3.18	0.001	1.01
STATE	0.220	2.25	0.024	1.15
SIZE	-0.181	-3.94	0.000	1.42
ROA	0.891	1.21	0.225	1.13
LEV	0.930	3.45	0.001	1.35
CFPS	0.015	0.34	0.733	1.05
_cons	1.048	1.09	0.275	
YEAR	控制			
IND	控制			
LR chi2	150.52***			
Pseudo R2	0.0336			
N	7246			

内部控制的机会增多，发表内控意见的权利扩大，研究二者之间相关性具有更大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另外，研究不同法律环境下内控缺陷与审计师变更的情况，从法律制度层面提升公司内部控制质量也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三、公司内部控制缺陷与审计师变更相关性实证研究

（一）研究假设

内部控制对于保证财务报表的可靠性以及经营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作用。公司内部控制在存在缺陷可能会导致财务报表存在重

大错报和目标偏离。因此作为审计师需要充分了解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选择合适的审计程序和重点领域。通过对以往学者研究成果的梳理发现，当审计师发现公司存在内部控制缺陷并披露时，被辞退的概率较高，审计师为了规避风险也会选择主动辞职。所以，当内部控制存在缺陷时，可能会引起审计师变更。

因此提出假设一：内部控制缺陷与审计师变更正相关。

内部控制缺陷程度不同，审计师面临审计失败的风险也不相同。Ettredge等（2007）研究发现审计师辞职与内部控制一般缺陷更相关，而我国的学者研究却发现重大缺陷与审计师变更正相关。刘中华、梁红玉（2015）研究发现内控缺陷程度越严重，公司潜在的风险越大，审计师未来面临的赔偿越多。张红英、高晟星（2013）从审计师的角度发现，根据“深口袋”理论，当公司内部控制的严重程度增加，审计师为了减少因审计失败而赔偿，可能会增加审计费用。如果缺陷程度上升到一定程度，审计师增加审计程序和审计费用依然难以弥补因为缺陷带来的风险和损失时，审计师会选择从公司主动辞职。

因此提出假设二：内部控制缺陷程度与审计师变更正相关。

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情况不同，法律制度环境也不尽相同。在法律环境好的地区，公司内部控制存在缺陷，市场监管会越严格，公司变更审计师会引起监管部门的更多关注，新任审计师面临的法律风险也较为严格，审计失败被发现的概率更高，公司会选择通过改善内部控制质量而获得较好的审计意见，反之在法律环境差的地方，审计失败风险较低，公司更容易通过购买方式获得较好的审计意见。

因此提出假设三：法律环境与审计师变更负相关。

（二）研究设计

1. 样本选择

样本数据选择是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年报为起点，不重复地选择2012-2015年为公司提供年报审计的事务所。剔除在此期间因更名、合并、重组等带来变更的事务所得到的7246个样本。剔除金融业、当年新上市及被ST的及没有披露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和不存在内控缺陷的公司。最终得到1830个样本。法

表5 模型二的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标准系数	Z值	P值	VIF值
ICDTYPE	0.553	3.46	0.001	1.09
CEOCHANGE	0.124	0.62	0.534	1.04
BIG4	0.387	1.27	0.203	1.20
OPIN_1	-0.161	-0.35	0.729	1.10
STATE	0.503	2.78	0.005	1.15
SIZE	-0.267	-3.42	0.001	1.76
ROA	0.018	0.01	0.989	1.22
LEV	1.211	2.51	0.012	1.64
CFPS	-0.033	-0.42	0.678	1.02
_cons	2.414	1.43	0.154	
YEAR	控制			
IND	控制			
LR chi2	70.79***			
Pseudo R2	0.0551			
N	1830			

表6 模型三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标准系数	Z值	P值	VIF值
LAW	-0.471	-5.37	0.000	1.04
CEOCHANGE	0.273	2.30	0.021	1.03
BIG4	0.636	3.58	0.000	1.09
OPIN_1	0.820	3.07	0.000	1.01
STATE	0.175	1.80	0.072	1.15
SIZE	-0.168	-3.64	0.000	1.41
ROA	1.023	1.37	0.170	1.13
LEV	0.871	3.21	0.001	1.35
CFPS	0.013	0.30	0.766	1.06
_cons	1.184	1.23	0.219	
YEAR	控制			
IND	控制			
LR chi2	173.14***			
Pseudo R2	0.0386			
N	7246			

律环境的数据来自樊纲等(2011)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一书中,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作为衡量各地法律环境的指标。运用state12.0对数据进行合并、逻辑分析以及检查数据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和SPSS17.0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以及相关性检验。

2. 模型及变量设定

(1) 模型设计

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是研究内部控制缺陷、内部控制缺陷程度以及法律环境是否与审计师变更之间存在相关性。模型主要借鉴

张鸣(2012)、方红星(2013)的研究,并考虑其他影响审计师变更的因素,适当加入变量引入到模型中。

模型一

$$\begin{aligned} \text{Switch} = & \beta + \beta_1 * ICD \\ & + \beta_2 * CEOCHANGE + \beta_3 * BIG4 \\ & + \beta_4 * OPIN - 1 + \beta_5 * STATE \\ & + \beta_6 * SIZE + \beta_7 * ROA + \beta_8 * LEV \\ & + \beta_9 * CFPS + \text{YearDummy} \\ & + \text{IndDummy} + \varepsilon_{i,t} \end{aligned}$$

模型二

$$\begin{aligned} \text{Switch} = & \beta + \beta_1 * ICDTYPE \\ & + \beta_2 * CEOCHANGE + \beta_3 * BIG4 \\ & + \beta_4 * OPIN - 1 + \beta_5 * STATE \\ & + \beta_6 * SIZE + \beta_7 * ROA + \beta_8 * LEV \\ & + \beta_9 * CFPS + \text{YearDummy} \\ & + \text{IndDummy} + \varepsilon_{i,t} \end{aligned}$$

模型三

$$\begin{aligned} \text{Switch} = & \beta + \beta_1 * LAW \\ & + \beta_2 * CEOCHANGE + \beta_3 * BIG4 \\ & + \beta_4 * OPIN - 1 + \beta_5 * STATE \\ & + \beta_6 * SIZE + \beta_7 * ROA + \beta_8 * LEV \\ & + \beta_9 * CFPS + \text{YearDummy} \\ & + \text{IndDummy} + \varepsilon_{i,t} \end{aligned}$$

(2) 变量选择

本文用到的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及变量简介如表1。

(三) 描述性统计

为了研究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对全样本进行描述性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在7246个样本中审计师变更(SWITCH)的均值约为0.093,表明在我国大部分公司并不会经常进行审计师变更,审计师和公司之间更倾向于维持一种稳定的关系。内部控制缺陷(ICD)均值为0.26,说明披露内部控制的公司中大多数公司并不存在内部控制缺陷,只有1886个样本存在缺陷,这一数字虽然与总样本相比并不大,但是内部控制缺陷的存在可能导致企业目标的偏离,因此企业仍需加强对内部控制的重视。法律环境(LAW)的均值是0.667说明样本大多是来自法律环境较好的地区。在与审计师变更有关的控制变量的描述性分析结果可以看出,12%的样本

发生了高管变更, 5.5%的样本聘请四大进行审计, 1.3%的公司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分析与审计师变更有关的控制变量中, 41.3%的样本为国有企业, 资产(SIZE)最小值为18.468, 最大值为28.509, 标准差为1.286, 样本公司资产规模差异变化范围较大, 样本有大有小, 符合样本研究需要。总资产收益率(ROA)最小值为-0.699, 最大值为0.790, 均值为0.043, 说明样本中公司总体盈利水平并不高。资产负债率(LEV)最小值为0.008, 最大值为1.345, 均值为0.426, 说明有的企业资产负债率高, 有的低, 但是负债总体水平合理。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CFPS)最小值为-16.34, 最大值为16.29, 说明企业的经营状况好坏差距较大。

(四) 实证检验

1. 主要变量相关性分析

表3是对研究变量之间的皮尔逊相关性,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 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不大。其中, 相关性系数最大的为资产负债率(LEV)与资产(SIZE), 系数为0.570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 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资产负债率(LEV)的计算公式中分母为资产, 但是为了使研究更加严谨, 本文回归分析对模型中的变量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从表中可以看出被解释变量审计师变更(SWITCH)与解释变量内部控制缺陷之间的系数为0.046, 与法律环境(LAW)之间的系数是-0.070, 并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 表明审计师变更与内部控制缺陷之间显著正相关, 与法律环境之间显著负相关, 即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可能更容易发生审计师变更, 公司在法律环境差的地方更容易变更审计师。这与假设的初衷相符合, 另外他们之间的相关系数均不大, 说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但是并没有控制其他变量, 因此他们与审计师变更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检验。

研究还发现: 与审计师变更相关的控制变量: 高管变更(CEOCHANGE)、四大(BIG4)、上一期审计意见(OPIN_1)与审计师变更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 即变更高管、聘请四大所及上一期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公司更倾向变更审计师。常规控制变量中企业性质、资产负债率与审计师变更之间显著正相关, 其他控制变量资产规模(SIZE)、总资产收益率(ROA)、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CFPS)与审计师变更的相关性并不显著。

2. 回归分析

从表4可以看出在控制其他可能影响审计师变更的变量之后, 内部控制缺陷(ICD)与审计师变更(SWITCH)之间的系数为0.225, 在5%的水平上显著, 这说明在控制其他变量之后, 公司内部存在缺陷与审计师变更之间正相关。假设一得到证实。因为, 审计师与公司之间的关系是长期博弈的结果, 如果一方情况发生变动可能会影响双方合作关系的稳定性, 造成双方关系破裂。研究结果也显示, 控制变量中高管变更(CEOCHANGE)、四大(BIG4)、审计意见(OPIN_1)与审计师变更之间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与回归前结论一致。常规控制变量中企业性质(STATE)、资产负债率(LEV)与审计师变更显著正相关, 资产规模(SIZE)与审计师变更在1%的水平上, 显著负相关。总资产收益率(ROA)、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CFPS)与审计师变更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从VIF的值均小于10说明变量之间并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5是内部控制缺陷程度与审计师变更之间的回归结果。从表5可以看出在控制其他可能影响审计师变更的变量之后, 内部控制缺陷程度(ICDTYPE)与审计师变更之间系数为0.553, 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 说明缺陷程度越严重审计师变更的概率越大, 与假设2一致。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缺陷程度增加, 意味着风险上升, 审计师在审计时会更加谨慎, 采取更加稳健的会计政策, 难以与管理层达成一致意见, 影响两者之间关系。从控制变量的结果可以看出, 国有企业更容易变更审计师, 资产负债率与审计师变更之间显著正相关, 资产规模与审计师变更之间显著负相关。其他控制变量在模型二中与审计师变更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

表6是法律环境与审计师变更之间的回归结果, 从表中可以看出, 在控制其他可能影响审计师变更的因素后, 法律环境(LAW)与审计师变更之间显著负相关。说明在法律环境好的地方审计师变更的可能性低于法律环境差的地方, 与假设3一致。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 可能是因为在法律环境好的地方, 监管部门对于企业变更审计师的行为更加关注, 企业想要通过更换审计师来改善审计意见或者掩盖内部控制缺陷比较困难。一方面, 虽然新任审计师对企业缺乏了解可能影响审计工作的进程, 但是因为监管环境严格

审计师处于风险考虑也会坚持职业谨慎性。另一方面,在法律环境好的地方,不论是大小所还是小所面临的诉讼风险较法律环境弱的地方都要大,因此其在出具审计意见时都会更加谨慎,所以企业想要通过变更审计师来掩饰问题是行不通的。另外,模型三的控制变量的结果与模型一基本一致,而且通过VIF值可以看出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四、研究结论及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2-2015年披露内部控制的公司为样本,研究内部控制缺陷对审计师变更的影响。通过理论与实证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 研究发现内部控制缺陷与审计师变更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表明内部控制缺陷的存在可能会促使公司审计师的变更。

2. 以存在缺陷且披露缺陷程度的公司为样本,研究缺陷程度对于审计师变更的影响,研究发现缺陷程度与审计师变更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说明缺陷程度越严重审计师变更的可能性越大。

3. 研究发现法律环境与审计师变更负相关,说明法律环境越好审计师变更的可能性越小。这可能是因为法律环境好的地方,监管机构对公司和审计师变更行为监管更为严格,因此,公司与审计师之间的合作关系更为稳定。

(二)研究启示

根据研究结论以及研究中发现的问题,

提出以下建议:

1. 完善审计师变更披露制度。建议:监管部门应将审计师变更原因的披露要求,由必要时说明原因转为必须披露审计师变更的原因。按照审计师变更的发起人不同,监管部门应要求企业披露审计师变更的类型,使利益相关者更好地了解审计师变更的原因和实际情况。

2. 加强对法律环境薄弱地区审计师变更行为的监督。目前,我国由于历史原因和地理原因等造成相同的制度,在不同地区执行过程中监管存在差异。而从实证研究的结果,不难发现法律环境可以削弱内部控制缺陷对审计师变更的影响。因此,在不断完善法律对审计师变更行为监督的过程中,应加强对法律薄弱地区制度执行过程中的监督。

3. 企业树立正确的内部控制观。内部控制是企业活动的监督者,可以帮助企业发现问题,为企业资产的安全和目标的实现提供保障。当内部控制出现缺陷时,企业应当不断完善内部控制建设,并将缺陷如实和详细地告知审计师,需求外部治理者的帮助,而不至于因为采取不当的处理方法隐瞒和忽视内部缺陷,导致企业目标不能实现甚至出现更严重的问题。因此,建议企业如实对内部控制缺陷进行披露,尽量细化,使外界了解缺陷所在,减少外界因内部控制缺陷披露产生的恐慌。

作者单位: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 Ashbaugh H, Collins D W, Kinney W. The discovery and reporting of internal control deficiencies prior to SOX-mandated audit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7(1-2):166-192.
2. Chan, K. C., B. R. Farrell, P. Lee. Earnings Management of Firms Reporting Material Internal Control Weaknesses under Section 404 of the Sarbanes-Oxley[J].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Forthcoming, 2008, 27(2):161-179.
3. Ettredge, M.L., Li, C. and Scholz, S. Audit fees and auditor realignments in the Sarbanes-Oxley era[J]. Accounting Horizons, 2007, 21(4): 371-386.
4. 陈丽蓉, 周曙光. 内部控制质量对审计师变更影响的实证检验. 财会月刊. 2010(12)
5. 戴亦一, 潘越, 陈芬. 媒体监督、政府质量与审计师变更. 会计研究. 2013(10)
6. 方红星, 刘丹. 内部控制质量与审计师变更——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3(2)
7. 伍利娜, 王春飞, 陆正飞. 企业集团审计师变更与审计意见购买. 审计研究. 2013(1)
8. 樊纲, 王小鲁, 朱恒鹏. 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9年报告.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0.
9. 李奇峡. 内部控制效率、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与审计师变更. 商业会计, 2014(8)
10. 刘行健, 刘昭. 内部控制对公允价值与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 审计研究. 2014(2)
11. 刘中华, 梁红玉. 内部控制缺陷的信贷约束效应.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5(2)
12. 刘伟, 刘星. 审计师变更、盈余操纵与审计师独立性——来自中国 A 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管理世界. 2007(9)

分析师盈利预测偏差对审计意见购买的影响

■ 尤克清 张昊晨

摘要

本文以2012-2014年沪深两市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分析师盈利预测偏差对审计意见购买行为的影响及其在不同产权性质上市公司中的影响差异。实证结果显示,分析师盈利预测偏差越大,对上市公司施加的业绩导向压力越大,企业有更强的动机进行审计意见购买从而获得更清洁的审计意见。进一步研究发现,相比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具有更强的政治晋升动机,承担的经营业绩压力相对较小,分析师盈利预测偏差对审计意见购买行为的影响更弱。

关键词

分析师盈利预测偏差 审计意见购买 产权性质

一、引言

注册会计师是我国社会经济监督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近年来国内外证券市场发生的一系列财务欺诈丑闻使独立审计的社会公信力受到破坏,从国内证券市场上发生的深圳原野不实验资、长城公司非法集资、银广夏虚构利润、麦科特欺诈上市等造假丑闻,到国际上安然、世通、施乐、帕玛拉特等巨型公司相继深陷财务丑闻,这些都使得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质量成为目前学术界和实务界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审计意见购买是上市公司进行审计合谋的重要实现途径,事务所出具虚假审计意见,不仅降低审计质量,而且损害投资者利益,扰乱资本市场正常秩序(Simunic, 1980;杨鹤和徐鹏, 2004)。目前学术界关于审计意见购买行为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审计意见购买行为的经济后果、产生原因及实现方式上,少有学者探讨审计意见购买的影响因素。

本文以分析师的盈利预测为研究视角,研究分析师盈利预测偏差对审计意见购买行为的影响。证券分析师作为资本市场上的中介机构,因其较高的独立性和专业分析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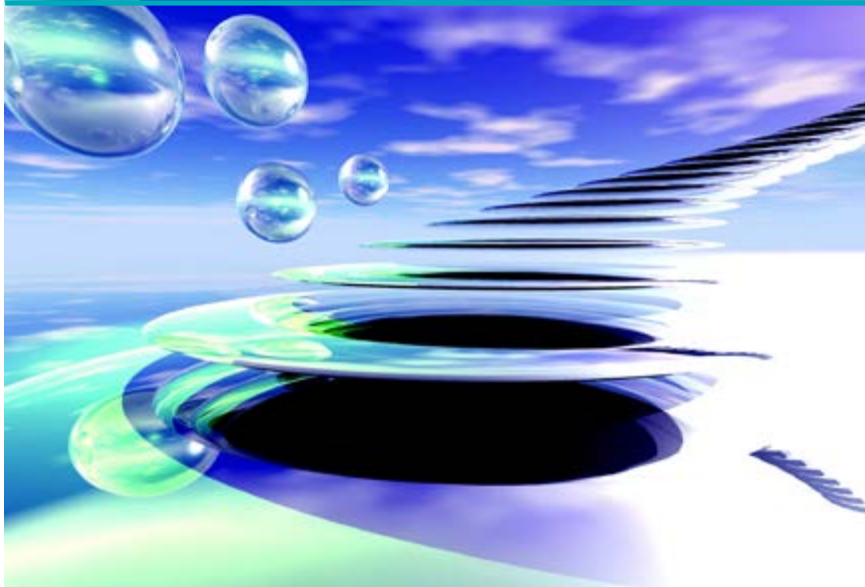
力,使其发布的盈利预测报告具有较高的信息含量和投资价值(朱红军、何贤杰和陶林, 2017),不仅成为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也被很多公司纳入企业业绩的衡量标准,成为公司业绩的风向标,一旦公司出现正向“盈余意外”(企业实际盈余超过分析师的盈利预测),会向资本市场传递经营良好的信号,从而吸引更多投资,提升自身股价。基于正向“盈余意外”的信号传递功能,在分析师盈利预测偏差引致的市场压力作用下,管理层更加关注自身的经营业绩及审计意见类型,对清洁的审计意见有更强的需求,因此有更强的动机购买审计意见。另一方面,基于产权理论视角,不同产权性质的公司高管表现出不同的晋升动机,国有控股公司高管具有更强的政治晋升动机,承受经营业绩的压力较小(杨瑞龙、王元和聂辉华, 2013),而非国有控股公司更符合“经济人”假设,追求企业利益最大化,对分析师盈利预测偏差所引致的公司业绩导向压力可能更为敏感。因此,分析师盈利预测偏差对审计意见购买行为的影响及其在不同产权性质上市公司中的影响差异,需要进一步的

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 分析师盈利预测偏差对审计意见购买的影响

近年来国内外的研究表明,分析师盈利预测被许多上市公司视为经营业绩的标杆,管理层具有规避负向“盈余意外”的倾向,所以其决策往往会受制于分析师的盈利预测(刘



春力, 2014)。Degeorge, Patel和Zeckhauser (1999)首次发现企业在达到避免亏损的首要目标后,保持增长率达到预期成为紧要任务,管理层会迎合分析师预测进行盈余管理。此后,大量学者(Brown, 2001; Bailk and Jiang, 2006; 晁楠, 2009; 文静, 2012)的研究证明,分析师的盈利预测可以更好地代表资本市场对公司的盈余预期,管理层有规避负向“盈余意外”的动机,进而迎合分析师盈利预测来调增实际盈余。近期的研究中,有学者(Knyazeva, 2007; Yu, 2008; 曹胜, 2010)研究发现,分析师关注不仅具有改善公司治理的积极作用,在发挥“监督效应”的同时,还存在着“压力效应”,尤其是随着分析师关注程度的增加,其发布的盈利预测报告对市场的影响力越大,管理层面临的压力也越大,会更加关注企业的经营业绩及市场反应。

翟胜宝、张雯和曹源等(2016)的研究发现,分析师跟踪会强化公司的审计意见

购买行为,完善了分析师跟踪“压力效应”假说的相关研究,但是缺乏分析师盈利预测对审计意见购买行为影响的内在机制探讨。由于我国目前处于弱式或半强式有效市场,资本市场普遍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现象,一方面,不清洁的审计意见向资本市场传递经营不善的信号,其会计信息可信度受到质疑,容易引起股价的波动(杨坤和李晓慧, 2016);另一方面,分析师盈利预测偏差引致的公司业绩导向压力会放大不清洁的审计意见对公司的不利影响,引发消极的市场反应(李琰和温菊英, 2015)。根据行为金融学理论,公司管理层基于有限理性选择,很可能为了减少因达不到分析师盈利预测而产生的不利影响,从而调增实际盈余进行盈余管理。因此,分析师盈利预测偏差越大,对企业造成的公司业绩压力越强,管理层对清洁审计意见的需求越强,更有动机购买审计意见来隐藏盈余管理的行为。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 分析师盈利预测偏差强化审计意见购买行为。

(二) 基于不同产权性质下分析师盈利预测偏差对审计意见购买的影响

分析师盈利预测偏差对审计意见购买的影响作用,在不同产权性质上市公司中的表现也有所不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所有权是国家,其与产权结构相关的决策和执行往往通过政府进行,实际上是政府控制着公司。金宇超、靳庆鲁和宣扬(2016)认为国企高管身兼“经济人”和“政治人”两类身份,相比于非国企高管纯粹由经济动机驱动的代理行为,国有控股公司存在更为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分析师盈利预测偏差引致的公司业绩压力,主要表现在经济动机驱动下的行为选择,国有企业高管受政治晋升激励机制的影响较强,除了正常的经济利益考虑外,还多出一层政治因素的考量(程博、宣扬和潘飞, 2017),可能会对分析师盈利预测偏差的“压力效应”不敏感。而非国有企业高管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以追求自身利益和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因此受分析师盈利预测偏差的约束作用更强。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2:

H2: 相比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分析师盈利预测偏差强化审计意见购买的行为更明显。

表1 变量定义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解释说明
审计师变更	$S_{i,t}$	两名审计师均更换, 取值为1, 否则为0
分析师预测偏差	$CUR_{i,t}$	计算方法如公式(6)所示
审计意见类型	$Q_{i,t}$	获得非标审计意见, 取值为1, 否则为0
资产负债率	LEV	负债/总资产
净资产收益率	ROE	净利润/股东权益
经营现金流	CFO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总资产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SDS	CSMAR数据库获得

表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S_{i,t}$	0.4395	0.4964	0	0	1
$CUR_{i,t}$	0.0505	0.4002	-2.7143	.0032	8.0909
$Q_{i,t}$	0.0245	0.1547	0	0	1
LEV	0.4397	0.2199	0.0079	0.4358	1.2261
ROE	0.0535	0.2865	-2.5338	0.0629	4.9728
CFO	0.0394	0.0777	-0.8877	0.0394	0.6837
SDS	0.3593	0.1553	0.0135	0.3405	0.8941

表3 相关系数矩阵表

	$S_{i,t}$	OP	$CUR_{i,t-1}$	ROE	LEV	CFO	SDS
$S_{i,t}$	1						
OP	-0.020*	1					
$CUR_{i,t-1}$	-0.0180	0.031***	1				
ROE	-0.00800	-0.188***	-0.029**	1			
LEV	-0.035***	-0.020*	0.060***	-0.087***	1		
CFO	0.0130	-0.074***	-0.0200	0.149***	-0.137***	1	
SDS	0.00800	-0.050***	-0.0100	0.046***	0.071***	0.066***	1

注: ***, **, * 分别表示在 1%, 5% 和 10% 水平以下显著。

三、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的研究样本为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 因审计意见数据库暂更新到2014年, 故时间研究范围定为2012-2014年。根据Lennox (2000) 提出的审计意见购买模型, 选取了最容易被出具不清洁审计意见的前50%的样本, 并对研究样本进行了如下筛选: 剔除ST、PT类上市公司; 剔除金融类、保险类行业数据; 剔除IPO企业的数据; 剔除财务数据缺失、未披露审计意见、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 采用1%的比例对样本进行缩尾处理。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 数据处

理采用Stata12.0软件。

(二) 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

借鉴Lennox (2000) 构造的审计意见估计模型进行研究, 公司*i*在*t*期获得的审计意见类型 $Q_{i,t}$ 与*t*-1期获得的审计意见类型 $Q_{i,t-1}$ 、本期审计师变更情况 $S_{i,t}$ 和本期的公司财务状况 $X_{i,t}$ 存在相关关系, 因此可以根据上市公司在*t*-1期的财务状况及其对审计市场的估计构建如下Logistic模型

$$Q_{i,t-1} = \beta_0 + \beta_1 Q_{i,t-2} + \beta_2 S_{i,t-1} + \beta_3 X_{i,t-1} + \beta_4 S_{i,t-1} X_{i,t-1} + \beta_5 Q_{i,t-2} X_{i,t-1} + \varepsilon \quad (1)$$

其中, 公司*i*在*t*期获取非标准审计意见时, $Q_{i,t}=1$, 获取标准无保留的审计意见时, $Q_{i,t}=0$; 公司*i*在*t*期的审计师与*t*-1期相比进行了变更, 并且将两名审计师均进行了变更定义为 $S_{i,t}=1$, 否则 $S_{i,t}=0$; 公司*i*在*t*期的财务状况 $X_{i,t}$ 从四个方面进行度量: 盈利状况ROE、财务杠杆LEV、经营现金流CFO、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SDS。根据模型(1)拟合出的各变量系数 β_x 和公司*i*在*t*期审计市场和财务状况的实际值, 构建如下Logistic模型, 可以得到公司*i*在*t*期估计的审计意见 $\hat{Q}_{i,t}$:

$$\hat{Q}_{i,t} = \beta_0 + \beta_1 Q_{i,t-1} + \beta_2 S_{i,t} + \beta_3 X_{i,t} + \beta_4 S_{i,t} X_{i,t} + \beta_5 Q_{i,t-1} X_{i,t} \quad (2)$$

Lennox (2000) 认为, 公司只有在变更审计师的情况下获得非标审计意见的概率小于继续聘用现任审计师的情况下获得审计意见的概率, 才具备变更审计师以改善审计意见的动机。因此, 本文采用公司在变更与不变更审计师两种情况下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概率之差OP来衡量公司是否具备变更审计师的动机, 即 $OP = Pr(\hat{Q}_{i,t} | S_{i,t} = 1) - Pr(\hat{Q}_{i,t} | S_{i,t} = 0)$, 然后运用(3)式和(4)式可以分别得到公司在变更与不变更审计师两种情况下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概率。

$$Pr(\hat{Q}_{i,t} | S_{i,t} = 1) = \frac{\exp(\hat{Q}_{i,t} | S_{i,t} = 1)}{1 + \exp(\hat{Q}_{i,t} | S_{i,t} = 1)} \quad (3)$$

$$Pr(\hat{Q}_{i,t} | S_{i,t} = 0) = \frac{\exp(\hat{Q}_{i,t} | S_{i,t} = 0)}{1 + \exp(\hat{Q}_{i,t} | S_{i,t} = 0)} \quad (4)$$

只有当 $OP < 0$ 时, 公司变更审计师可以获得更为清洁的审计意见, 因此构建Logistic模型(5), 研究当年审计师变更 $S_{i,t}$ 与变更审计师

表4 分析师预测偏差对审计意见购买行为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5)		模型 (7)	
	回归系数	Z值	回归系数	Z值
OP	-0.761**	-1.97	-0.572	-1.44
CURi, t-1			-0.0465	-0.73
OP×CURi, t-1			-4.146**	-2.21
ROEi, t	-0.150	-1.33	-0.146	-1.30
LEVi, t	-0.318***	-2.77	-0.311***	-2.70
CFOi, t	0.191	0.59	0.188	0.58
SDSi, t	0.0849	0.53	0.0870	0.54
截距项	0.0513	0.59	0.0502	0.58
Year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Adj-R2	0.0209		0.0274	
F	171.82		204.10	
N	6771		6771	

注：***、**、*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水平以下显著。

表5 不同产权性质下分析师盈利预测偏差对审计意见购买行为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	国有		非国有	
	回归系数	Z值	回归系数	Z值
OP	-1.139**	-2.14	0.201	0.30
CURi, t-1	-0.0349	-0.36	-0.0543	-0.63
OP×CURi, t-1	-5.384	-1.14	-4.222**	-2.15
ROEi, t	-0.201	-1.57	-0.0738	-0.47
LEVi, t	-0.0928	-0.51	-0.297*	-1.89
CFOi, t	0.134	0.29	0.224	0.50
SDSi, t	-0.0089	-0.04	0.254	1.17
截距项	-0.149	-1.01	0.0771	0.70
Year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Adj-R2	0.1359		0.1555	
F	102.71		131.73	
N	2938		3833	

注：***、**、*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水平以下显著。

获得非标审计意见概率OP之间的关系，如果 $\alpha_1 < 0$ ，说明上市公司变更审计师后成功进行了审计意见购买。

$$S_{i,t} = \alpha_0 + \alpha_1 OP + \alpha_2 ROE_{i,t} + \alpha_3 LEV_{i,t} + \alpha_4 CFO_{i,t} + \alpha_5 SDS_{i,t} + \varepsilon \quad (5)$$

为了验证假设H1，即分析师盈利预测偏差会强化审计意见购买行为，在模型(5)的基础上加入分析师盈利预测偏差CUR、分析师盈利预测偏差CUR与变更审计师获得非标审计

意见概率OP的交乘项OP×CUR，其中分析师盈利预测偏差CUR通常用分析师盈利预测值FEPS减去企业实际盈余值EPS的差值与每股盈余实际值EPS绝对值的比值表示，计算方法如公式(6)所示，然后构建了Logistic模型(7)，如果 $\alpha_3 < 0$ ，说明分析师盈利预测偏差引致的公司业绩导向压力强化了上市公司审计意见购买的行为。同时，为了缓解模型的内生性和自选择性问题，采用t-1期的分析师盈利预测偏差 $CUR_{i,t-1}$ 检验其对t期审计师变更行为的影响。

$$CUR_{i,t} = (FEPS_{i,t} - EPS_{i,t}) / |EPS_{i,t}| \quad (6)$$

$$S_{i,t} = \alpha_0 + \alpha_1 OP + \alpha_2 CUR_{i,t-1} + \alpha_3 OP \times CUR_{i,t-1} + \alpha_4 ROE_{i,t} + \alpha_5 LEV_{i,t} + \alpha_6 CFO_{i,t} + \alpha_7 SDS_{i,t} + \varepsilon \quad (7)$$

为了验证假设H2，即不同产权性质下分析师盈利预测偏差对审计意见购买行为的影响差异，在模型(6)的基础上，按照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类型将样本分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两个样本组，分别检验重视政治晋升的国有企业高管和追求经济业绩的非国有企业高管，在面临分析师盈利预测引致的业绩导向压力时，是否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上述内容所涉及的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四、实证结果

(一) 描述性统计

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的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 $S_{i,t}$ 的平均值为0.4395，说明在我国审计市场中有43.95%比例的上市公司变更了审计师，说明研究上市公司审计意见购买行为是有必要的，论文试图检验上市公司变更审计师行为的经济后果以及是否存在改善审计意见的动机。 $CUR_{i,t}$ 平均值为0.0505，中位数为0.0032，说明目前资本市场上分析师盈利预测的准确度较高，分析师发布的盈利预测报告具有较高的信息含量和预测价值，同时可以看出分析师盈利预测普遍存在乐观偏差(Beckers et al., 2004; 伍燕然, 2007)，证券分析师面临来自供职证券公司的利益冲突和对好消息过度反应坏消息反应不足的认知偏差，会倾向于做出高于实际盈利的预期。 $Q_{i,t}$ 平均值仅为0.0245，说明目前的审计市场中仅有2.45%比例的上市公司获得非标

审计意见,不清洁审计意见的占比较小,因此本文重点研究被出具不清洁审计意见可能性在前50%的公司。我国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平均为43.97%,相对于发达资本市场的国家仍然偏低;ROE标准差为0.2865,平均值为0.0535,说明各公司的盈利水平有较大差异;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方差为0.1553,最高持股比例高达89.41%,说明上市公司股权制衡度的差异较大。



(二) 相关性检验

表3对整体样本的各变量做了Person的相关性检验,可以看出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低于0.5,表明多重共线性问题并不严重,可以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由表3相关性检验可以初步看出,审计师变更 $S_{i,t}$ 与获得不清洁审计意见概率 OP 一定程度上显著负相关,需要通过多元回归分析进一步检验。后续还需要加入交乘项 $OP \times CUR$ 检验分析师盈利预测偏差对审计意见购买行为的影响。

(三) 多元回归分析

模型(5)和模型(7)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模型(5)中 OP 的估计系数为-0.761 ($P < 0.05$),说明样本范围内的上市公司的确存在着购买审计意见的行为,随着获得非标审计意见概率的减小,公司会倾向于选择变更审计师以改善审计意见;随着获得非标审计意见概率的增大,公司会继续聘任现任审计师,这一回归结果为后文的研究奠定了基

础。从模型(7)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分析师预测偏差与获得非标审计意见概率的交乘项 $OP \times CUR_{i,t-1}$ 估计系数为-4.416 ($P < 0.05$),说明加入分析师盈利预测偏差后,强化了审计意见购买行为。当上市公司上年分析师作出的盈利预测值大于当年实际盈余时,呈现负向“盈余意外”,会向市场传递公司经营不善的消息,会被投资者认为公司经营成果未击败或达到分析师预期,容易造成股价波动,引发不良的市场反应,从而影响管理层的声誉和职业发展,因此对于上年分析师盈利预测偏差越大的公司来说,管理层承受的市场压力越大,向上调增盈余活动增多,对清洁审计意见的需求越大,具有更强的动机进行审计意见购买。该回归结果进一步证明,分析师盈利预测偏差会强化上市公司审计意见购买的行为,支持假设H1。

进一步分析不同产权性质下分析师盈利预测偏差对审计意见购买影响的差异,其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可以看出在国有企业样本组中,获得非标审计意见概率 OP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而加入分析师预测偏差的交乘项 $OP \times CUR_{i,t-1}$ 估计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说明样本研究范围中的国有企业上市公司存在审计意见购买的现象,但是分析师盈利预测偏差并没有强化审计意见购买行为,证明国有企业高管更看重政治晋升动机,对分析师盈利预测偏差引致的业绩导向压力并不敏感。在样本研究范围中的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实证回归结果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组恰恰相反,交乘项 $OP \times CUR_{i,t-1}$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与总体样本的回归结果一致,进一步完善了不同产权性质下公司管理层激励机制异质性的相关研究,说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受到较少的政府干预,其业绩导向性较为明显,分析师盈利预测偏差下的盈余意外表现会给非国有企业带来更大的市场压力,因此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分析师盈利预测偏差强化审计意见购买行为的表现更明显,支持假设H2。

(四) 稳健性检验

从表2的描述性统计分析中可以看出,审计师变更 $S_{i,t}$ 的平均值为0.4395,审计意见 $Q_{i,t}$ 的均值平均值仅为0.0245,说明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概率只有2%左右,频率非常小,在统计学上被称为“稀有事件”,回归过程中出现大量的0.只有少量1,在有限样本下存

在“稀有事件偏差”。因此对模型(5)和模型(7)采用“稀有事件偏差”检验,对于稀有事件造成的小样本偏差进行估计,然后对原回归模型的估计系数进行修正,以得到“偏差修正估计”,估计量的标准误差也得到改善,从而验证结论是否发生改变。同时使用资产收益率ROA来代替ROE进行检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除个别变量显著性水平发生变化外,获得非标审计意见概率OP的估计系数、分析师盈利预测偏差与变更审计师获得非标审计意见概率的交乘项OP×CUR的估计系数仍然显著为负,主要研究结论不变,说明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五、研究结论

本文借鉴Lennox(2000)构建的审计意见购买模型,以2012—201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Logistic回归、稀有事件偏差检验等方法,结合不同产权性质上市公司高管的晋升动机,研究分析师盈利预测偏差对审计意见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分析师盈利预测具有业绩导向作用,当分析师发布的盈利预测值与企业实际盈余水平产生较大偏差时,会被投资者认为企业经营不善,从而造成股价波动,引发不良的市场反应,因此管理层向上调增盈余活动增多,更加关注审计意见类型,有更强的动机进行审计意见购买从而改善审计意见。而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管理层承受的政治晋升压力强于分析师盈利预测偏差引致的市场压力,因此分析师盈利预测偏差对审计意见购买行为的影响在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更为明显。

本文研究一方面拓展了审计意见购买行为为影响因素的研究范畴,另一方面丰富了分析师盈利预测偏差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有关分析师盈利预测偏差强化审计意见购买行为的研究结论,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分析师跟踪的“压力效应”假说,而基于不同产权性质的影响检验也为研究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的晋升动机提供一种研究思路,不仅有助于投资者充分认识分析师在资本市场中发挥的作用,而且对监管部门控制审计风险和制定审计计划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作者单位: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 Simunic, D. The Pricing of Audit Services: Theory and Evidence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1980(18):161-190.
2. 杨鹤, 徐鹏. 审计师更换对审计独立性影响的实证研究. 审计研究, 2004(1)
3. 朱红军、何贤杰和陶林. 中国的证券分析师能够提高资本市场的效率吗?——基于股价同步性和股价信息含量的经验证据. 金融研究, 2007(2)
4. 杨瑞龙, 王元, 聂辉华. “准官员”的晋升机制:来自中国央企的证据. 管理世界, 2013(3)
5. 刘春力. 中国证券分析师预测与盈余管理研究. 西南财经大学, 2014.
6. 曹胜. 国内分析师预测能否反映市场预期?——基于MBE的市场反映分析. 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 2010(2)
7. 翟胜宝, 张雯, 曹源, 朴仁玉. 分析师跟踪与审计意见购买. 会计研究, 2016(6)
8. 杨坤, 李晓慧. 审计师变更与分析师关注的实证研究.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16(11)
9. 李琰, 温菊英. 证券分析师预测偏差与审计质量. 天津商业大学学报, 2015(03)
10. 金宇超, 靳庆鲁, 宣扬. “不作为”或“急于表现”:企业投资中的政治动机. 经济研究, 2016(10)
11. 程博, 宣扬, 潘飞. 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的信号传递效应——基于审计师选择的分析. 财经研究, 2017(03)

文化价值观、企业并购与长期账面绩效

■ 车伟娜

摘要

文化价值观是一个企业的核心要素之一，是企业的整体信念与行为规范。本文从文化价值观的维度解析企业的并购案件，并深入探究了收购者在获得目标方控制权之后的持股比重、并购双方文化价值观差异性与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通过对2011-2015年我国A股并购案的实证研究发现：并购企业双方的文化价值观一致性较强，就会提升企业并购的长期账面绩效。分析结果说明，在当前国内经济结构发展不合理的背景中，企业构建积极、向上的文化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有益于新合并体长期绩效的提升，进而实现快速增长的发展战略。

关键词

文化价值观 企业并购 长期账面绩效

一、引言

在市场竞争中，企业实现发展目标的一大路径就是兼并收购，不但拓宽了企业的业务领域，开发了新的目标市场，同时也为合理配置企业资源提供可操作性途径。在已有的学术研究中，兼并收购所涉及到的内容比较繁多，既包含企业之间的合并，又包含企业资产的剥离与换置，同时还存在资产重组的问题。至今关于并购案件的研究仍是众说纷纭：一是并购绩效的问题，企业之间的并购是否会带来一定的绩效，带来的绩效属于哪一类，是长期的、短期的，还是市场的、账面的；二是，绩效影响要素的问题，在并购交易进程中的支付方式，有研究证实现金支付方式可以增加并购绩效，但有的研究得出与此正好相反的结论。还有研究指出组织匹配程度会影响企业之间的并购绩效。尽管研究结果不具统一性，究其原因可能在于不同学者所选的样本变量不同，因而在界定相应的分析要素、核算与计量等方面上存在一定的差异。然而，在目前经济发展结构不合理的宏观环境下，亟需一种适用性较强的指导理论，来阐明并购过程中的各类现状，并

解释企业之间兼并收购的内在动机，指导企业之间的兼并收购行为朝着持续发展的方向前进。

现有的并购研究主要集中于探索国与国之间的文化差异性与跨国并购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化差异性在并购案件中的间接作用。此类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是，尽管国与国之间的文化在一定范围内与国家企业的文化有共同之处，但一国之中不同企业间也有不同的文化价值观，所以单单是研究国与国宏观层面的文化价值观不具有概括性；二是，关于文化差异的分析具体是从并购双方之间在管理模式与组织上的文化差别，来研究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并没有注重文化价值观本身在企业并购案件中的直接影响作用。

鉴于此，本文研究文化价值观在企业并购案件中所发挥的作用，并深入探究了收购者在获得目标方控制权之后的持股比重、并购双方文化价值观差异性与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选取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1-2015年并购案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文化价值观对企业并购案件的影响，检验了并购企业之间的文化价值观差异程度对企业并购长期账面

绩效的影响。结果证实：并购企业双方的文化价值观一致性较强，就会提升并购的长期账面绩效；在文化价值观助推下，收购者在获得目标方控制权之后的持股比重、并购双方文化价值观差异性交互影响到新合并体的长期账面绩效，收购一方凭借实质性权力强势加入到并购双方的文化价值观对弈之中，经由深化及扩大收购方的文化价值观念，将收购方的文化价值观快速渗入到目标企业之中，降低并购双方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度，减少企业文化价值观的整合成本，进而提升并购的长期账面绩效。



二、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一) 文献回顾

有关企业并购案件的研究，当下主要是从并购主体双方的经济特性以及战略思想的角度去找寻影响并购绩效的因素。有学者基于并购双方的经济特性研究了企业文化差异性对并购绩效的影响效用。战略分析者Stahl and Voigt (2008) 指出，企业的战略资本包含有形资本与无形资本两种形式，核心竞争力是一个企业长久发展的最重要战略资本之一，而企业之间的并购可以实现企业之间的资源优化，实现互补，据此可知并购可以提升企业整体的核心竞争力。King et al (2008) 发现企业通过协同管理彼此之间的财务、运营模式可以带来更好的并购绩效。比如并购方挑选与自己相关的行业，有利于其在并购事件发生之前精准估计目标公司的价

值，进而降低了并购风险。国内学者潘红波 (2008) 在《政府干预、政治关联与地方国有企业并购》一文中指出，相同区域中的并购事件，能够有效降低并购信息的不对称性，进而减少并购过程中的信息成本，且区域相同的并购事件很可能会得到地方政府部门的支持，从而使得其并购绩效远远高于跨地域并购。

从组织行为学来讲，企业并购过程需要依照与组织文化的匹配程度来推进，在这之中文化价值观的匹配性是并购的关键元素，并购双方文化价值观的差异性是导致企业并购绩效降低的主导因子。Weber与Drori (2011) 通过研究指明并购企业双方的文化价值观的认同程度是组织文化差异的主要要素，良好的组织文化价值认同可以抑制企业并购整合过程中的文化冲突，故而可以提升长期的并购绩效，文化价值观的差异性是并购不能顺利进行的首要因素。有研究指出，大约有60%的企业并购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原因就在于文化价值观的匹配性相对较差。张建红与周朝鸿 (2010) 以海外并购企业为样本，分析了文化制度在国际并购事件中的主要作用，结果证实制度要素不但影响到企业国际化战略目标的顺利开展，同时还会影响到企业国际并购的成效。颜士梅 (2012) 指出在企业并购之后，组织结构的重组、文化价值观的重选，使得企业员工在一段时间内难以顺应新合并体的发展模式，出现较大范围的离职现象，进而会影响到企业的并购绩效。

上述理论归纳可以看出，文化价值观是企业的核心价值，且具有一定的层次性，核心文化价值观的匹配程度关乎着企业的并购绩效。文化价值观差异性较大，并购之后新合并体的整合难度较大，进而会降低并购绩效，甚至造成并购失败。现今，理论界已从并购主体双方的经济特性以及战略思想的角度对并购问题进行了阐述，据研究文献可知文化价值观对并购绩效具有一定的影响效用，所以从文化价值观的维度去解释并购问题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据此，本文以2011-2015年我国A股并购案件为研究样本，探索收购方文化价值观对企业并购的长期账面绩效的可能影响，为文化价值观与企业并购绩效的关系研究做了必要补充。

(二) 假设提出

新旧股东对目标公司控制权即为股权，

表1 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变量名	N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ENP	1359	-3.786	0.756	0.102	0.246
SR	1359	0	1	0.504	0.363
CV	1359	-4	5	1.875	1.690
HC	1359	-0.424	0.762	0.008	0.052
IC	1359	0	6	1.705	1.502
AT	1359	15.381	30.103	21.882	1.420
LEV	1359	0	6.244	0.550	0.331
FT	1359	0.044	0.889	0.347	0.148

表2 回归结果

变量名	因变量: ENP					
	模型1-1	T值	模型1-2	T值	模型2	T值
常数项	-0.221	-1.525	-0.288*	-1.827	-0.146	-1.342
HC	-0.006*	-1.787	—	—	-0.013*	-1.864
HC-2	—	—	-0.009***	-3.086	—	—
CV	-0.001	-0.023	0.001	0.205	0.003	1.437
IC	-0.038	-0.327	0.112	0.577	0.004	0.016
SR	—	—	—	—	-0.038	-1.231
SR*CV	—	—	—	—	0.023*	1.647
AT	0.009*	1.840	0.022**	2.495	0.008*	1.677
LEV	0.030	1.177	0.047	1.639	0.019	1.138
FT	0.071	1.532	-0.006	-0.121	0.057	1.468
Ind	control					
Year	control					
F	1.325*		1.685**		1.365*	
D-W	0.871		1.922		0.874	
N	1359		654		1354	

注: *** 是指在 0.01 的水平上显著, ** 是指在 0.05 的水平上显著, * 是指在 0.1 的水平上显著

与控制权相对应的持股比例的大小,是当今学术界所争论的热点话题。诸多研究者认为收购方在取得目标企业控制权之后的持股比例与并购绩效正向相关,但是也有一部分学者与之意见相左。从股权控制力上来讲,笔者认为在控股型企业并购案件中,新合并体控股股东的意见表决权越多,其控制力就相对越强,当此类控制权被施加到并购双方的文化价值观之中,将会转变并购双方的文化博弈能力。但股权控制力比重不能够直接作用到企业上,而是需要一个中介桥梁,此中介便是文化价值观。

简单来讲,文化价值观也就是一个权利的载体,经过承载与测度企业核心文化可以核定一个企业的文化发展状况。与控制权相

对应的股权比重经由文化价值观的输送,增强和扩大了收购方文化价值观强度,使得收购方的文化价值快速渗透到目标企业之中,进而降低了并购双方二者的文化差异性,减少文化整合费用,提升并购的长期账面绩效。换句话说讲,假若收购方愿意支付对价去换取新合并体的控制权,且其对价要高于并购收益时,上述命题是不成立的。故而,获取控制权之后的持股比例与文化价值观的差异性交互影响到新合并体的并购长期账面绩效,其是建立在并购各方一致性的文化价值观前提之下,是并购绩效影响要素的重要补充。故而,本文提出理论研究的三个基本假设:

并购企业双方的文化价值观等同性较高,在并购过程中的交易成本比如文化整合成本、谈判成本等费用就会大大降低,并购之后预期的长期账面绩效也将得以提升。由此,提出本文的假设1:

H1: 并购企业双方的文化价值观一致性越强,企业并购的长期账面绩效就会越高。

结合企业文化层次理论,一个企业的创新技能及创新技能的连续性,是彰显企业文化价值观的主要元素之一,而科研投资力度及产能转换能力是企业创新的重要测量指标。由此,提出本文的假设2:

H2: 收购方科研投资力度及产能转换能力越高,并购的长期账面绩效就会越高。

收购方在取得目标企业控制权之后,经由文化价值观这一核心理念的载体,对并购之后文化差异性与并购的长期账面绩效的关系具有一定的交互作用。收购方拥有较高的实质性股权将会降低整合文化的费用,提高并购的长期账面绩效。由此,提出本文的假设3:

H3: 收购方在取得目标企业控制权之后的持股比例越高,企业并购成本越低,并购的长期账面绩效就会偏高。

(三) 研究模型

本文选用Barth et al. (2001) 提出的水平模型,并借鉴Baron and Kenny (1986) 的回归方法,来分析文化价值观对企业并购案件的影响。模型设定如下:

$$\begin{aligned}
 ENP = & \alpha + \lambda_1 HC + \lambda_2 CV + \lambda_3 IC \\
 & + \lambda_4 AT_{2(i-1)} + \lambda_5 LEV_{2(i-1)} \\
 & + \lambda_6 FT_{2(i-1)} + \lambda_7 ARE_i \\
 & + \lambda_8 Ind_i + \lambda_9 Year_i + \varepsilon \quad (1)
 \end{aligned}$$

$$\begin{aligned}
 ENP = & \alpha + \lambda_1 HC + \lambda_2 CV + \lambda_3 IC \\
 & + \lambda_4 SR + \lambda_5 SR * CV + \lambda_6 AT_{2(i-1)} \\
 & + \lambda_7 LEV_{2(i-1)} + \lambda_8 FT_{2(i-1)} + \lambda_9 ARE_i \\
 & + \lambda_{10} Ind_i + \lambda_{11} Year_i + \varepsilon \quad (2)
 \end{aligned}$$

式中ENP为企业并购后一年新合并体的长期账面绩效，i代表着企业并购的年份，i-1表示并购上一年，HC表示文化价值观中的诚信度差异性，CV表示文化价值观强度差异性，IC表示文化价值观中创新度差异性，SR表示取得目标企业控制权之后的持股比重，SR*CV表示取得目标企业控制权之后的持股比重与文化价值观强度差异性的交互项。



通过模型1可以检验假设H1与H2，模型2可以用来检验假设H3。在这之中模型2是对假设H1与H2的补充性验证。其中因变量是新合并体的长期账面绩效，并购绩效达成的前提条件是完成并购之后，新合并体的长期账面绩效高于并购前并购双方的企业单体绩效。自变量为诚信文化价值观，可以用古家军（2004）年提出的五要素模型来测量，其中五要素为：诚信意愿要素、诚信能力要素、诚信环境要素、契约组合要素以及诚信表现要素；创新文化价值观，可以用创新文化投入/主营业务收入来测量；文化价值观强度可以用并购企业双方文化累计效用之差，值越大，差异性越大。取得目标企业控制权之后的持股比重即为转移控制权之后相应的股权比例。此外，本文还对收购方并购上一年的资产AT、负债率LEV、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FT、并购事件行业类别Ind、并购年份Year进

行控制。

三、实证分析

（一）研究样本

本文对实证分析样本进行如下筛选：（1）剔除金融、保险类行业样本；（2）剔除那些并购之后控制权没有改变的样本变量；（3）样本区间界定在2011-2015年我国A股并购案，如果某家企业一年之中发生多起并购，选取第一次并购为样本变量；（4）剔除非股权并购企业。通过筛选最终得到1359家样本企业，样本数据均从国泰安数据库中选取，文化价值观变量要素没有现成数据，以手工录入方式为准。其余数据主要通过查看企业年报、搜索企业网站以及相关网站检索来获取。

（二）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1对文化价值观及并购绩效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从结果不难发现，各变量要素之间的标准差值比较小，且变量要素之间的分布比较合理，可以进一步作回归分析。

（三）回归检验

为了更好地检验本文提出的原假设，本文对样本变量进行多元性回归检验，回归结果如表2。

通过分析可知，在0.05水平上，文化价值观中的诚信度差异性HC与并购事件发生后一年的ENP显著负向相关，且路径系数值越小，企业文化价值观中的诚信度越高；在0.1水平上，文化价值观中创新度差异性IC与并购事件发生后一年的ENP显著正向相关，且路径系数值越大，企业文化价值观中的创新度越高。表2回归检验结果表明，在所属行业、所归地区、并购年份等影响要素被控制的前提下，新合并体的长期账面绩效ENP与文化价值观中的诚信度HC在0.1水平下呈显著负向相关，证据显示，倘若企业比较注重信用方面价值观的提升，就会得到市场与客户的信任与认可，使得企业供应链发展良好，进而就会提升企业绩效。此类企业进行战略并购之后，就会主动将自有的文化价值观整合到目标企业中去，进而实现协同发展效用，提升并购绩效。鉴于当下企业文化价值观的诚信度影响因子偏多，本文在原有要素基础上增添了企业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得到新的诚信度影响因子HC-2，并将其代入模型，得到模型1-2，结果显示，文化价值观中的诚信度差异性HC-2与并购事件发生后一年的ENP在0.01水

平下显著负向相关，且模型HC-2的F值是1.685，且在0.01的水平下具有显著性。进而验证了假设H1。

从结果中还可以看出，ENP与SR*CV在0.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相关，这说明收购方在取得目标企业控制权之后的持股比例通过文化价值观差异性来影响并购长期账面绩效。收购方在取得目标企业控制权之后的持股比例越大，凭借着强势的控制权其文化价值观更具渗透性，也更容易同化目标企业的文化价值观，达成文化价值观的统一。经由文化价值观的统一，降低文化价值观差异性，缩减文化价值观的整合费用，提升并购后新合并体的长期账面绩效，进而验证了假设H3。而文化价值观中创新度差异性IC与ENP之间不具有显著关系效用，究其原因可能是科研创新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并购案件中，出于保护商业机密的目的，并购双方为了防止竞争者的追随与进攻，而不愿将创新方面的信息披露出去，这就说明假设H1并没有通过验证，但也不能据此说明文化价值观中创新变量与并购绩效毫无瓜葛，需作进一步检验。

购方在取得目标企业控制权之后的持股比例越高，企业并购成本越低，并购的长期账面绩效就会偏高的结论，尽管收购方科研投资力度及产能转换能力越高，并购的长期账面绩效就会越高的假设没有得到验证，但不能说明两者之间没有关联性，其原因可能是企业信息披露不全造成的。

四、结论

本文选用2011-2015年中国A股并购案数据，分析了文化价值观对企业并购案件的影响效用。研究证实，文化价值观显著影响到并购之后新合并体的整合效用。并购案件之后，控股企业可以通过整合文化价值观，来影响新合并体的长期账面绩效。另外，收购方在并购过程中获取的控制权，能够经由核心文化价值观中的文化价值观载体强度，去修正文化价值观差异性对新合并体长期账面绩效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检验，本文得出：并购企业双方的文化价值观一致性较强，企业并购的长期账面绩效就会较高、收

作者单位：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 King, D. R., Slotegraaf, R. J., Kesner, I., 2008, "Performance Implications of Firm Resource Interactions in the Acquisition of R&D-intensive Firms", *Organization Science*, 19 (2), pp. 327~340.
2. Stahl, G. K. and A. Voigt, 2008, "Do Cultural Differences Matter i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 Tentative Model and Examination", *Organization Science*, 19 (1), pp. 160~176.
3. 潘红波、夏新平、余明桂，政府干预、政治关联与地方国有企业并购. *经济研究*. 2008 (4)
4. Weber, Y. and Drori, I., 2011, "Integrating Organizational and Human Behavior Perspectives o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41 (3), pp. 76~95.
5. 张建红, 周朝鸿.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制度障碍研究——以海外收购为例. *经济研究*. 2010 (06)
6. 颜士梅. 创业型并购不同阶段的知识员工整合风险及其成因——基于ASA模型的多案例分析. *管理世界*. 2012 (07)

“基底”行为视角下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演进模式

■ 梁红俊

摘要

“互联网+”是新一轮技术革命的主导元素，其在诸多方面影响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状况。在“互联网+”背景下，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将出现新的演进。此外，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在生产、传递以及贮存等维度也均会显现出新的特征。信息本身会更为契合社会责任实际行径，“言”与“行”之间的空间差距将会极大缩减，“言”体现“行”的线路也将日趋多元化。本文从形式、基底以及方法的维度描绘了“互联网+”下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演进情况，旨在帮助上市公司更好地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应对新兴市场环境的挑战。

关键词

“互联网+” 社会责任 信息披露 演进路径

一、引言

在资本积累发展时期，上市公司鲜有提及社会责任的问题，在这方面的研究也比较少，可见社会责任问题并未得到上市公司的重视。随着资本的快速积累，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上市公司对货币资本的需求；另一方面，上市公司的发展愈加注重除货币资本之外的诸多资源之间的耦合关系，社会责任理论在过往的竞争理论模式之外建构出新的企业运作范式。迄今为止，大多数上市公司均在扮演着一个努力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角色。上市公司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同时还需要借助于一定的方式将这种信息传递给投资者以及社会公众，这样才可以更好地帮助企业树立社会形象，从而就有了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话题。

近些年来，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也带动着“互联网+”迅猛崛起。鉴于“互联网+”市场界限的跨越性，同时还深入社会的各个方面，所以有望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演进问题做出一个全新的阐述。

二、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基底”演进

（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基底

从本质上来讲，上市公司的运营活动是在市场中发生的，这些运营活动在信息的传递过程中能够被顺利收敛于价格中去，所以，上市公司全部的运营活动均可以在其财务报表中完整表现出来。但是，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行为并不能全部导向市场，其社会责任还有别的“场”上的行为，进而难以形成一个统一性处理方法，所以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维度的信息质量很难得到鉴定，换句话说来讲就是其“言论”不一定能够真实地表明其“行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要完成“坐言起行”，就需将社会责任相关行为信息真实披露出来。在传统的市场环境中，鉴于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存在有诸多“场”地，凭借传统信息提取模式具有极高的处理费用，而“互联网+”具备“场”的跨性，其可以凭借较低处理费用来解决此难题，使得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可以最大范围地契合企业行为。基于此，本文便将上市公司社会责任行为作为出发点，并基于此来探究行为“基底”下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在“互联网+”背景下的演进模式。

（二）“互联网+”背景下行为导向的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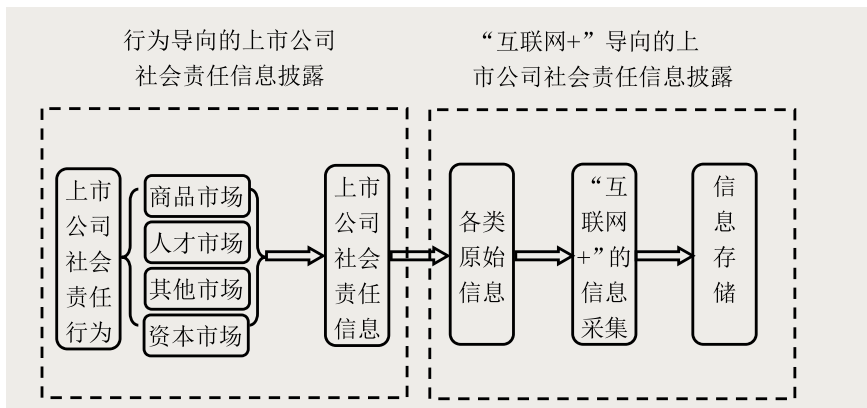


图1 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处理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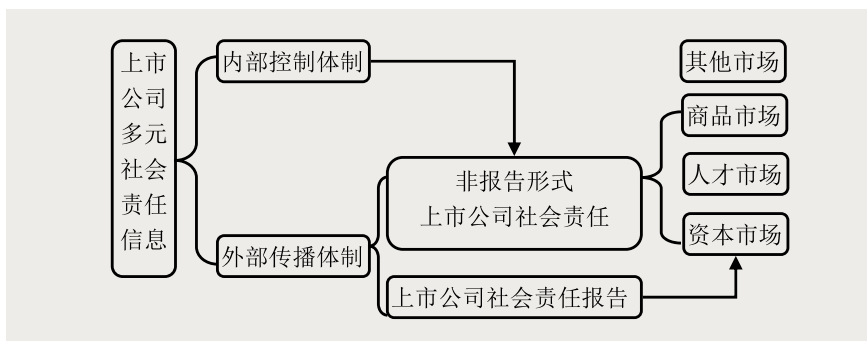


图2 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路径结构

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1. 商品市场行为中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在“互联网+”背景下，较之于以往的传统市场环境，上市公司在商品市场中的社会责任信息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尽管上市公司需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但其运营行为依旧是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在传统的环境中，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行为则被认定为一种“非主营业务”。从本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从行为视角上来看，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活动是一种彼此契合的关系。在“互联网+”背景下，因为信息采集点分布十分广泛，再加上信息提取技术费用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以较低的成本来获取嵌入在上市公司运营活动中的社会责任信息。

2. 人才市场行为中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在传统的市场环境中，企业在人才市场中的行为与其薪酬机制等内部机密信息相挂钩，所以难以获取真实的社会责任信息。另外，上市公司在员工的福利待遇方面不单单是薪酬，还包含了职业培训、权益保护、工

作氛围等诸多要素，这类信息的外在形式并不是“价格要素”，另有员工的信息反馈也无法用“价格要素”显现，使得此类社会责任行为在现有条件下，难以得到完整的披露。在传统市场背景下，上市公司不能有效披露职工方面的社会责任信息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上市公司信息屏蔽的主动性，不管是何种企业中，此类信息在传统社会中虽然也能够得以识别，但披露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但是，在“互联网+”背景下，由于信息技术环境的完善，信息披露模式日趋多样性，信息的传播路径也日臻多元化，信息技术的改变会慢慢攻破上市公司与社会公众之间的信息壁垒，公司与职工在社会视角上的关系逐步转化为企业与供应商的关系，诸多传统市场环境中难以获取的信息将会变得唾手可得。

3. 其他与资本市场行为中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从共生性以及利益相关者的视角上来看，上市公司在其他市场中的社会责任行为具体包含有公益捐赠、资本运作等等。做社会公益所带来的社会责任信息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其信息与企业自身的经营活动不相关，公益捐赠行为通常会独立于公司日常经营行为之外；此外，这些行为的社会责任比较容易受到社会媒体的普遍关注，因此，获得这类信息就比较容易。也正是基于此，理论界对公益事件与公司其他运营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就更加容易。此外，在“互联网+”背景下，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中社会责任信息的报告模式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其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运用下，企业便可以凭借较低的花费来报告社会责任信息，进而可以顺利提升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质量。

三、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方式的演进

“互联网+”对上市公司来讲是一个全新的发展环境，其将从诸多维度影响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方式。在研究行为导向下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问题的前提下，本文将进一步深入探讨分析“互联网+”背景下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方式以及其特点。在“互联网+”背景下，企业信息的披露更为契合信息来源的“行径”，再加上信息披露路径日趋多元化，依赖于上市公司自身决策中的被动性“披露”出来的信息，

将逐步导向为上市公司与社会公众体关联互动基础上的主动性“报道”。这种区别进而会从信息披露的方式上显现其处理模式与处理特征方面的差异。在“互联网+”背景下，上市公司信息的披露是一个持续不间断的过程性聚集，信息的形成、搜集以及存储三维度结成了“互联网+”背景下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预处理问题，此外在信息“报道”维度上，也会显现与以往不同的演进模式。

（一）“互联网+”下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处理结构

上文研究表明，从逻辑结构上来讲，“互联网+”背景下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更契合企业行为，同时还具有多样性与丰富性，此种特性也显现出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的处理结构，具体详见图1所示。由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影响，信息数据的搜集点愈加丰富，进而使得在现实中可以搜集到比过去更加丰富的信息数据。“互联网+”背景不单单丰富了人们发送信息的内容，同时，也使得一些行为得到数据化处理。有学者研究指出，“互联网+”囊括了各个传统行业，但这并不意味着是两者之和，而是凭借信息通信设备以及互联网信息技术，使得互联网与传统行业相互融合，建构新型化商业发展态势，“互联网+”无时无刻都在影响着现代公司的日常化管理工作。上述这些“互联网+”的信息采集工作会出现在各大市场，进而形成一个信息化社会形态。

在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的存储方面，“互联网+”也有与传统的市场环境相异的地方。在传统市场环境中，信息数据提取技术受到相应的限制，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信息便会在时空的间隔中消失掉，或者是在大量的企业数据信息中，只能提取到为数不多的社会责任信息。但是在“互联网+”背景下，各个行业与互联网技术相结合，具有强大的信息存储功效，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提醒了企业，“互联网+”背景下，上市公司难以掩盖违背社会责任的行为。

（二）“互联网+”下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方式与特性

上文论述提到在“互联网+”背景下，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在诸多面异于传统市场环境，因此，在信息披露模式上也有一定的区别。一是，信息披露的载体多样性；二

是，信息受众多样性。详见图2所示。这两个维度的多样性将会带来诸多方面的影响。

首先，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从一个基于“资本市场”的社会责任逐步转换成基于“社会维度”的责任。在传统市场环境中，尽管上市公司社会责任行为受众在社会关系之中也属于一定的利益相关者，但是鉴于其具体上是以“社会责任报告”的模式来发布报告，因而上市公司社会责任行为的“受众”具体上是指资本市场。在“互联网+”背景下，“受众”逐步拓宽到社会中的每一个利益相关者，随着“受众”的快速增多，在一定时期内这将会逐步提升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目的。

66

在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的存储方面，“互联网+”也有与传统的市场环境相异的地方。在传统市场环境中，信息数据提取技术受到相应的限制，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信息便会在时空的间隔中消失掉，或者是在大量的企业数据信息中，只能提取到为数不多的社会责任信息。但是在“互联网+”背景下，各个行业与互联网技术相结合，具有强大的信息存储功效，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提醒了企业，“互联网+”背景下，上市公司难以掩盖违背社会责任的行为。

99

其次，在快速增多的多元信息维度与“受众”群体，将致使交互复核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的可靠性变成可能。在传统市场环境中，就非“价格”维度计量的社会责任行为的真实性确认通常比较困难。但在“互联网+”背景下，企业某种行为可能会通过多元维度与形式存储下来，并实现传播，交互复核过程中的一致性能够推测上市公司信

息的科学性。例如，上市公司的内部培训工作，在传统市场环境中，第三方鉴证部门需要借助访谈法或者查看一些书面资料，比如员工培训签到记录等等资料，来验证此行为模式的可靠性，但是鉴于这是上市公司内部行为，因而数据资料的独立性和可靠性比较低。但在“互联网+”背景下，能够借助电脑系统查看受训职工当时的工作情形，如果职工培训信息确切，在这期间培训职工的电脑为非工作情形，便可以借助部分监控录像数据来交互认定培训工作的真实性。

第三，多样化的信息交互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企业整合有用的零碎信息数据，但是局部化企业信息又能够积累成一定的知识。通过上述职工培训的例子可以看出，从电脑状态自身来讲，其仅仅是一个“开关”性数据，意义并不大，然而，在交互考核之后便可以得到一个可靠性较高的信息资料，但是相同的培训信息还需要考虑到时间要素、地域要素等其他视角的“信息”资料，同时还能够给受众体披露出有关企业培训的知识信息。在这个过程中，“互联网+”不单单提供一个“量”的信息，其可在结构优化的前提下，催生信息出现“质”的提升。

第四，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方式的多元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企业优化其社会责任行为。在传统市场背景中，抛出单纯道德维度的因子，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依旧是期望可以得到相应的经济利益报酬；当下，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变量与经济报酬维度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探究的热点话题之一。但

是，从上市公司的视角上来讲，考虑到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方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便会青睐于便于“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因此不难发现，在传统市场环境中，较之于其他行为，上市公司更青睐那些公益事件中能够被“价格化”处理或者“广告化”的社会责任行为。但是，在“互联网+”背景下，上市公司信息传播方式多元化，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便得到公平的披露契机，这在一定程度上有益于上市公司重新测度各类社会责任行为对企业有哪些影响，利于上市公司选用那些均衡性较强的社会责任策略。

四、结论

“互联网+”作为新一轮革新整个社会商业形态的发展走势，势必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披露的各个维度均产生深刻的影响。在本文的理论分析中，建构出以基底、方式、结构为主导的理论研究架构，同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究了在“互联网+”背景下，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所受到的各种影响和改变，希望借此能够帮助学术界与企业界提前做好准备工作，使其能够更好迎接新技术的变革。此外，通过本文的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在“互联网+”发展走势中与其说是新的挑战，还不如说是获取新的商机，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在过去传统的市场环境中所受到的种种困难和问题，在“互联网+”环境中都可以得到解决，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也会由此出现新的演进趋向。

■ 作者单位：山西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 张正勇. 产品市场竞争、公司治理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经验证据.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2 (04)
2. 权小锋, 吴世农, 尹洪英. 企业社会责任与股价崩盘风险: “价值利器”或“自利工具”? 经济研究. 2015 (11)
3. 段志鑫, 黄璐.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商业信用正相关吗. 财会月刊. 2015 (36)
4. 冯丽艳, 肖翔, 程小可. 披露制度、社会绩效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 2016 (02)
5. 陶文杰, 金占明. 媒体关注下的CSR信息披露与企业财务绩效关系研究及启示——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CSR报告的实证研究. 中国管理科学. 2013 (04)
6. 坚瑞. 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现状与对策研究. 中国物价. 2014(10)
7. 谢建, 邵芬芬, 孙素侠. 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现状与对策研究.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12(09)
8. 孙玉军. 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公司价值相关性研究. 财会通讯. 2015(12)
9. 王月, 陈兴述, 蒋水全. 媒体报道的公司治理作用: 基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视角.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15(10)
10. 吉利, 张丽, 田静. 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可读性研究——基于管理层权力与约束机制的视角. 会计与经济研究. 2016(01)
11. 蒋尧明, 郑莹. “羊群效应”影响下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同形性研究. 当代财经. 2015(12)

AUDITING & ASSURANCE

审计与鉴证

95 事务所审计质量改进研究——FRC
审计质量调查报告的启示与借鉴|
袁敏 徐菁霞

99 新形势下会计师事务所如何做好科
研经费审计工作|许诺 徐凯 成伟



事务所审计质量改进研究

——FRC审计质量调查报告的启示与借鉴

■ 袁敏 徐菁霞

金融危机以来，伴随着问题公司的出现，市场参与者对中介机构的执业质量关注日益增多，包括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内的诸多海内外审计机构受到诉讼、监管处罚。本文拟在相关文献梳理的基础上，结合英国财务报告委员会（FRC）2016年发布的调查报告，对事务所审计质量的改进提出相关建议，以期为同行提供借鉴。

一、文献回顾

自20世纪70年代科恩报告发布以来，对审计质量的研究日益增多。Wallace（1980）认为审计质量是审计工作减少财务报表信息中的“噪声”和“偏差”的能力。“噪声”即财务报表中不相关的、具有干扰作用的信息，而“偏差”则指财务报表中的错报，审计工作越是能够“降噪”、“纠偏”，审计质量越高。DeAngelo（1981）则将审计质量定义为审计人员发现并报告违约行为（breach of contract）的联合概率，审计人员发现违约现象的可能性取决于审计人员的技术能力，而审计人员报告违约现象的可能性则取决于审计人员的独立性。

由于我国审计的发展晚于西方，所以国内学者对于审计质量的定义大都建立在国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之上。谢志华（1990）认为审计质量体现在审计结论上，考虑到审计结论是在审计报告中得出的，因此，审计报告的结果公允性决定了审计质量的好坏。李攀（2012）与谢志华观点相似，他认为审计报告与财务报表的真实程度的相关关系决定了审计质量的高低。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审计质量的定义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既有从审计结果出发，也有从审计过程出发，还有综合审计过程与结果来对审计质量进行定义的，但是这些定义都比较抽象，对于实务中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的定义与衡量不够细化。IAASB（2014）在综合学术界观点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从投入、过程、产出、财务报告供应链的关键交互、背景性因素等

五个方面对审计质量进行了全面描述，相信会成为行业遵循和对话的共识。考虑到审计业务的特征，这种将审计活动的投入、过程和产出结合起来，并考虑复杂的制度环境因素，显然能帮助利益相关者更加全面、准确地理解审计质量（王涛，2016）。

由于审计质量的难以定义，在学术研究中往往采用替代性指标对审计质量加以度量，如事务所规模（DeAngelo, 1981；宋衍衡等，2012）、法律处罚的力度（Raymond, 1994；王兵等，2011）、事务所的品牌声誉（Charter, 1998）、审计收费（Higgs and Skantz, 2006）、监管部门的调查报告（Philip, 2016）等。还有学者关注审计人员的专业胜任能力和独立性（刘文军等，2010）、审计任期（陈信元等，2006）等因素与审计质量的关系，这些研究为理解审计质量提供了很好的视角，对监管部门及事务所切实提高执业水平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二、对审计质量的批评——以FRC的审计质量调查报告为例

根据IAASB（2014）的观点，影响审计质量的要素来自投入、过程、产出、财务报告供应链、审计环境五个方面，其中诉讼环境、审计监管等作为外部环境对审计质量有着深远的影响。实务中，各国监管部门对事务所的注册、质量检查、惩戒措施等都有着详细的规定，市场参与者往往得到的信息是因为事务所因某家客户财务舞弊而陷入诉讼或处罚的境地，但显然，如果监管部门能够定期、实时地对事务所执业质量进行检查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意见，特别是加强监管部门和事务所之间的互动，能够更好地预防、及时地发现并纠正审计质量问题，有利于市场参与者了解事务所的质量控制实践。FRC给业界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FRC的职责之一是监控并采取措施以提升公司报告和审计质量，并监督和检查审计质量。该机构在2006年就针对审计质量框架进行了深入的咨询和讨论，并于2008年建立了审

表1 FRC报告的普华永道审计质量关键发现一览 (2015/16)

内容	关键发现	建议
事务所层面	1. 方法、指导和培训方面：更新事务所的审计手册和指南，并在一系列领域开展培训，包括测试IT控制和集团审计领域等； 2. 独立性程序：事务所已经强化了特定的独立性的监控程序； 3. 质量监控程序：易经开展了改进事务所质量监控的方法	1. 改进挑战管理层在职业判断方面相关的一贯性程度，尤其是减值复核和税务准备金领域等； 2. 确保数据分析更好地整合进收入的审计； 3. 持续改进复杂供应商协议的审计； 4. 确保在测试日记账时有恰当的舞弊风险特征考虑 5. 确保所提议的审计方法的任何重要变更与审计委员会进行沟通； 6. 改进在审计报告中描述的、所执行的审计程序的准确性或清晰性； 7. 持续强化事务所监控遵循其独立性的政策和程序，努力减少违反独立性的事件数量
单个业务层面	1. 某项审计业务中，与短期增长假设以支持近期投资相关的审计程序主要来自管理层自身提供的讨论计划； 审计组告知审计委员会，管理层已同意扩展披露财务报表中的关键假设，但扩展的披露并没有包括短期增长率及相关的敏感性； 2. 税务准备金方面，两笔审计业务中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撑大量的长期挂账的税务准备金以及提取这些准备金的原始基础	1. 更好地改进对管理层职业判断方面的挑战： 2. 原因分析； 3. 对问题更清晰地认识和改进

时，披露了事务所在审计质量方面做出的努力，这些报告为市场参与者了解监管部门、事务所两个层面对审计质量的关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其特征如下。

(一) 内容丰富翔实

根据所发布的六份报告，FRC公开了检查中发现的所有事项，内容涵盖来自单个审计业务以及事务所在执行并改进审计质量的政策和程序两个方面的发现，单个审计业务如针对某个减值项目或高风险领域的审计程序和方法、审计证据等方面存在的瑕疵；事务所层面的检查要点则包括高层基调、独立性和道德、审计方法、员工培训和指导、事务所自身的审计质量控制等。表1以普华永道为例列示了FRC质量检查中的关键发现。

(二) 通过连续年度的分类描述审计质量的评价结果

FRC将审计质量的检查结果分成四个类别，即审计质量好；审计质量良好，仅需有限改进（2A）；需要加以改进（2B）；需要显著改进（3），同时将过去几年的检查结果中存在问题的事项放在一张图表中，以利于读者进行比较分析。图1列示了普华永道过去5年的审计质量评价结果，从图中可以看出，FRC虽然在检查中发现了诸多的问题，但需要显著改进的事项很少，表明普华永道的审计质量优良；但与此同时，审计质量需要改进的项目并不少见，虽然程度不同，但仍应引起事务所的关注。

(三) 事务所积极回应

尽管对某些审计质量调查结果存在认识上的分歧，但事务所仍然对FRC提出的问题一一作了解答，并有针对性地进行了原因分析，提出下一阶段的工作计划。表2以普华永道为例列示了事务所的回应。

从表中可以看出，FRC所提问题涵盖了审计方法（数据分析）、审计理念（职业怀疑）、高风险领域（复杂供应商协议）、舞弊风险及应对、与治理层的沟通、审计报告、独立性等多个方面，着重于投入、过程、产出等审计质量要素，对事务所有针对性地提升审计质量有很大帮助。需要说明的是，FRC所提出的问题是依据所抽查项目的调查结果，虽是针对某个具体事务所的具体实践展开的，但对同行而言同样具有借鉴意义。而事务所的回应则涵盖了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已有审计程序或方法乃至审计指南、事务所对相关问题的关注和重视情况、以前已经采取的措施、所提问题的原因分析、下一步拟采取的措施等，这些良性互动能够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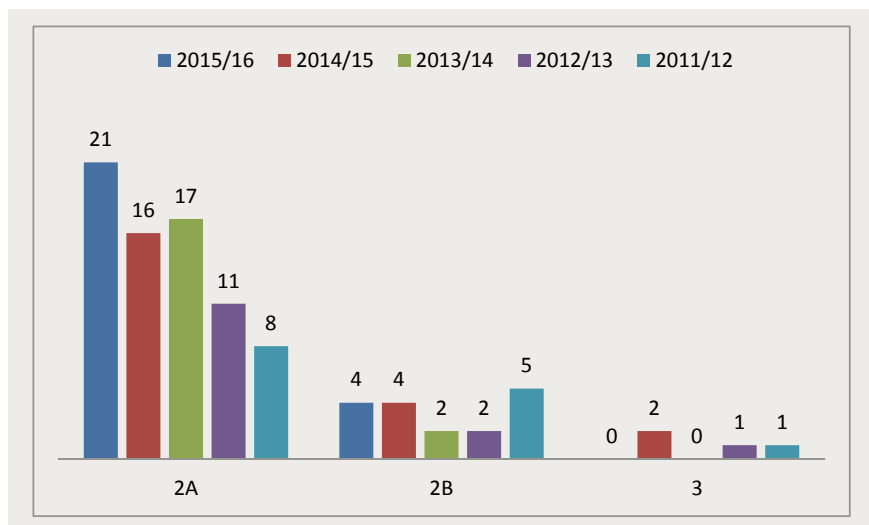


图1 普华永道审计质量评价一览表

计质量的五个关键驱动因素，内容涵盖事务所内部的文化、审计合伙人和员工的技能和个人资质、审计过程的有效性、审计报告的可靠性和有用性，以及审计师无法控制的其他因素，同时针对上述要素提出相应的审计质量指标。此外，FRC会每年对事务所的审计质量进行检查并发布报告，2016年，FRC公布了六大会计师事务所（BDO、德勤、安永、致同、毕马威、普华永道）的审计质量检查报告，在陈述2015/2016年检查的主要发现的同

表2 普华永道事务所针对FRC所提问题的回应 (2015/16)

序号	FRC的问题	普华的回应
1	挑战管理层的职业判断	挑战管理层是拥有怀疑态度的核心； 过去几年的培训项目要求在审计档案中反映这种挑战； 制定文本引导审计小组关注特定领域的审计问题，并要求业务组聚焦这些问题，将开展的相应审计工作在审计档案中予以反映； 针对减值问题，事务所开发一个实务指南来辅助业务组从哪些来源收集证据，2016年的培训项目将对此进行特定培训
2	确保数据分析更好地整合进收入的审计	增加使用数据分析，以提供收入的实质性审计证据，相关方法称为“收入CAATs”； 2015年9月发布了新的指南，以帮助业务组更好地使用CAATs来解决收入的正常风险，并修订了相应的电子工作底稿； 夏季培训项目将针对收入审计开展实务研讨，聚焦于审计组如何建立并证实其收入的审计策略，并将FRC的调查所发现的问题纳入其中；
3	持续改进针对复杂供应商协议的审计，如供应商协议中包含数量及其他类型的折扣等	对复杂供应商进行定义，并针对复杂供应商协议发布了特别指南； 考虑到不同的客户特征以及集团组织架构，指南并不能很容易地得以运用，因此需要在审计档案中增加额外的审计步骤，来帮助业务组将指南中的程序恰当地运用于特定的业务； 在2016年6-8月的内部质量监控项目中对指南的运用情况进行检查
4	确保在对日记账进行测试时恰当地考虑舞弊风险	事务所有专门的工具“Halo for Journals”来帮助分析100%的样本，以提高正常的审计抽样覆盖面； 针对具有异常特征的日记账，业务组使用该新增功能来检查样本总体； 已发布修订的指南，向业务组强调对舞弊风险的关注； 2015年末的风险和质量专题研讨会讨论了业务组在舞弊风险识别实务上面临的挑战，2016年开发一个新的实务工具来展示如何针对舞弊风险进行测试
5	确保审计方法的任何重要变更都与审计委员会进行了沟通	审计计划建立在对客户的了解及其关系的基础上，首次审计客户、续聘客户的前期审计档案审阅、管理层详细信息的获取等都会对审计计划产生影响，因此不可避免在审计过程中对审计方法进行修正； 事务所已经提醒业务负责人，对审计方法的任何重要变更，都应在审计过程中向审计委员会提供恰当的解释； 事务所将更新相应的审计委员会报告模板
6	改进在审计报告中描述的所执行审计程序的准确性或清晰性	事务所在相关指南中持续关注审计报告中所描述的已执行审计程序； 2015年1月更新了相关领域的政策和指南，再次强调业务组需要将所描述的审计程序与相应的审计工作彼此映射； 事务所通过专家对审计组的电话指导和解释来强化新的修订； 新增的工作底稿导入了审计档案，以确保业务组了解所需的详尽程度和恰当记录要求
7	持续强化事务所对独立性政策和程序的监督，减少违反独立性的数量	过去两年中，每年对大约25%的合伙人进行了独立性测试，以后将继续保持恰当比例的合伙人得到经常性的测试； 建立了核心客户系统（CES），并发布相应的用户指南，对相关人员进行特别培训，要求CES数据得以维护和更新，并在过去12个月进行沟通； 2015年11月，进行了一次集中性的季度检查控制，记录所有的新增公众利益实体审计的CES得到准确性复核； 在2016年的年度风险和质量管理培训项目中，对业务负责人及时批准非审计服务进行了重要性提醒，在咨询、交易确认和税务等业务服务条线的培训项目中进行了类似的提醒，并将其作为内部质量检查程序的一部分加以监控； 在独立性日志中持续记录所有被发现的违反独立性要求的行为

助市场参与者了解监管机构的审查重点、事务所的实践做法等，尤其是接受检查的事务所，能够将FRC的检查对象所涉及到的审计档案、审计问题等作为培训资料，帮助事务所的合伙人和员工更好地理解审计质量的要素和重点，客观上起到“闻者足戒”的效果。

三、启示与借鉴

如前文所述，审计质量是一个定性指标，很难量化与排序，受到事务所层面、审

计业务层面、监管层面乃至法治环境因素等多方面的影响。近年来，伴随着资本市场监管的日益完善，市场上对事务所执业质量的质疑声音时有发生，事务所强化审计质量的努力持续进行，除了事务所自身出于品牌声誉和竞争优势的角度，在质量控制方面投入大量的资源之外，监管部门也加大了监督检查甚至处罚的力度，财政部、中注协、证监会等分别从会计信息质量检查、执业质量检查、中介机构处罚的角度对事务所审计质量提出了批评，表3列示了近年来中国证监会发布的相关处罚情况。

作为影响审计质量的重要维度，国家层面的监管非常重要，其内容涵盖对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的业务准入与许可；制定职业道德准则、审计准则及配套指南等，对事务所及从业人员进行外部质量检查、后续教育、持续监管、惩戒等多个方面。其中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是业界了解审计质量的重要信息渠道之一。从表3中可以看出，有些事务所并非第一次发生问题，而证监会的立案、调查乃至处罚往往与被审计客户的违法违规行为相联系，这种事后性的惩戒虽有必要，但防患于未然的努力对事务所而言也许更有价值，如果能够将这种事后处罚的方式进一步提前到事先的提醒、事中的检查督促，相信能够对事务所审计质量的改进提供更好的帮助。FRC针对所监管的事务所开展的审计质量调查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

首先，这种检查建立在良好互动的基础上。监管部门和事务所的关系往往被看作猫鼠游戏的双方，事实上并不平等。但从FRC的调查报告看，大部分提出的问题都是结合具体的检查项目，相关建议得到了事务所的认同。因此FRC提出的问题可以看作是对提高事务所执业水准和审计质量的建议，在此过程中FRC的角色就从监管者转向了咨询、顾问的角度，从而与事务所的利益和目标形成了一致。我国的注册会计师协会、财政部门、证监会等监管部门在这方面也做了类似的努力，例如年报审计工作通知中对关键风险领域的警示、对事务所开展的同业复核等，如果将这些警示和问题做到与事务所的审计质量检查结合起来，真正做到有的放矢并让事务所心悦诚服，共同致力于事务所审计质量的提升，有利于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其次，检查报告的公开透明，有利于利益相关者更好地认识和了解审计行业。在FRC的调查报告中，采用了问题——回应的阐述方式，即FRC针对所调查的审计业务，对事务

表3 中国证监会对部分事务所处罚情况概览

年度	涉事事务所	存在的主要问题
2012	利安达	对财务报表审计未执行必要的分析程序； 对没有回函的函证未实施替代程序
2013	大华、中磊、大信、深圳鹏城	IPO审计阶段函证程序缺失； IPO审计阶段未对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实施恰当的审计程序； 虚构访谈笔录； 未真实完整编制工作底稿； 未对被审计单位毛利率的异常波动进行分析
2014	利安达	IPO审计中计划类工作底稿缺失； IPO审计中银行账户询证程序缺失或无效执行； IPO审计中未对异常回函实施替代性程序； IPO审计中未有效执行关联方识别和披露的审计程序； 客户走访流于形式，部分结论无底稿支持
2015	利安达、深圳鹏城、河北华安、亚太	未取得函证回函，且未执行替代性程序； 审计程序不够充分、完整； 识别、评估舞弊风险因素存在缺陷； 了解、评价销售与收款循环内部控制设计和有效性测试存在缺陷； 审计底稿中未见关联方交易及占款的审计痕迹
2016	利安达、立信、北京华兴	风险评估程序执行不到位，未能识别和评估财务保重大错报风险； 未对银行存款实施函证程序； 未对销售与收款业务中已关注到的异常事项执行必要的审计程序； 出具的审计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审计程序不够充分完整，审计证据不充分

所执业程序、方法、档案等提出质疑，而事务所则针对这些质疑进行了原因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例如虚心接受FRC的建议，将FRC所发现的问题、涉及到的业务资料纳入到随后的事务所培训项目、开发新的工具和指南以更好地应对舞弊风险或特别风险等。通过这种互动，利益相关方进行了充分的沟通，能够了解监管者和被监管者的视角，尤其是事务所针对相关问题或风险领域的实践。质量控制准则、事务所的职业道德手册、质量控制程序这些条文，经过这个问答程序，变成了实务操作手册，对

同行、从业人员、学生等起到很好的教育和借鉴意义。目前我国证监会的处罚公告中也有类似的申述，例如在大智慧审计中针对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处罚就披露了被监管方事务所的申诉意见，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处罚公告的信息含量。如果注册会计师协会等监管部门的检查报告也能够公开，相信会更好地促进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沟通。

最后，检查结果的评级，更清晰地向报告阅读者提供信息。在FRC公布的报告中，采用了1、2A、2B、3四个级别的评价方式，将涉及到的问题进行了分类，这同样值得我国监管部门的借鉴。目前，中注协采用了百强事务所的排名方式，更多从收入、人员、业务量等方面进行信息披露，但对这些事务所的审计质量并没有明确的区分，对事务所自身的审计质量提升帮助意义不明显。监管部门如果能够借鉴这种评级的方式，一方面能够帮助事务所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例如即使像国际“四大”这样的事务所，仍然存在着质量瑕疵，从而客观揭示事务所的审计质量现状并予以警示；另一方面，向报告阅读者披露，接受检查的事务所整体上审计质量情况，包括不同年度之间检查的审计业务数量、审计质量评级结果等，有助于横向、纵向比较，丰富了审计质量变化趋势这一信息。

■ 作者单位：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 DeAngelo, L. 1981. Auditor size and audit quality.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 3:183-199.
- Financial Reporting Council. 2008. The Audit Quality Framework. [R]Feb:1-14.
- Financial Reporting Council. 2016. PwC LLP Audit Quality Inspection[R]Feb:1-22.
- International Auditing and Assurance Standards Board. 2014. A Framework for Audit Quality: key elements that create an environment for audit quality. [R]February: 1-63.
- Knechel, W. R., G. V. Krishnan., M. Pevzner., L. Shefchik and U. Velury. 2012. Audit quality: insights from the Academic Literature. Working paper. Oct. 1-68.
- Phillip T. Lamoreaux. Does PCAOB inspection access improve audit quality? An examination of foreign firms listed in the United State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16. 02
- 陈信元，夏立军. 审计任期与审计质量：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会计研究. 2006（1）
- 李攀. 我国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化与审计质量研究. 南华大学. 2012
- 刘文军，米莉，傅惊轩. 审计师行业专长与审计质量——来自财务舞弊公司的经验证据. 审计研究. 2010（1）
- 宋衍衡，肖星. 监管风险、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 审计研究. 2012(3)
- 王兵，李晶，苏文兵，唐逸凡. 行政处罚能改进审计质量吗？——基于中国证监会处罚的证据. 会计研究. 2011（12）
- 王涛. 审计质量影响因素的国际框架及启示. 会计之友. 2016（9）
- 谢志华. 审计管理. 中国商业出版社. 1990

新形势下会计师事务所如何做好科研经费审计工作

■ 许诺 徐凯 成伟

摘要

会计师事务所作为独立的第三方鉴证机构,具有专业性、客观性、独立性的独特优势,在科技经费监管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针对会计师事务所在科技经费审计中的职能发挥与业务现状,本文分析了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其成因,同时结合当前中央关于加快科技领域放管服改革的新形势要求,提出了会计师事务所进一步规范科技经费审计,提高审计质量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科研经费审计 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质量

一、问题的提出

2016年7月,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特别强调“要着力改革和创新科研经费使用和管理方式,让经费为人的创造性活动服务,而不能让人的创造性活动为经费服务。”李克强总理指出“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的相关制度规章不合理,条条框框太多,致使办事难、耗时长、成本高。要精简程序、简化手续,把科研人员从繁琐的表格中解放出来。”结合当前中央和国务院对改革和创新科技资金管理的新形势,作为服务在科研经费审计一线的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应如何应对?本文通过回顾科研经费审计相关理论及实践,剖析事务所在审计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其成因,最后结合当前新形势,对事务所提出进一步规范科研经费审计、提高审计质量的对策。不同于以往文献,本文紧密结合当前改革和创新科技资金管理的新形势,站在会计师事务所的角度,思考如何提高科研经费审计质量和降低审计风险等重要问题,并提出相关具体建议。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是首次全面回顾了科研经费审计相关重要文献并且进行评析;二是系统地介绍了会计师事务所参与国家科研经费审计工作发展历程;三是站在事务所角度,阐述了

新形势下如何做好科研经费审计实务工作。

二、科研经费审计工作相关理论回顾及简评

国内关于科研经费审计的研究最早源于1991年,目前关于科研经费审计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主题:一是科研经费审计存在的问题和对策;二是科研经费审计模式和方法;三是国外科研经费审计先进经验借鉴。

(一) 科研经费审计存在的问题和对策研究

早在1992年韩彪和徐艳丽就针对高校科研经费横纵向来来源的不同,结合北方交通大学的管理经验,提出了科研经费分类管理与审计的具体做法。王琪(2006)认为高校科研经费管理存在未形成有效的科研经费管理制度、未实行全成本核算、综合使用效益不高、科研经费过程缺乏监督与控制等四类主要问题。汤靖(2009)分析了高校科研经费审计质量不高背后的原因在于三方面:一是“课题制”管理模式的错误导向;二是经费开支合理与否界定不清晰;三是缺乏效益型评价指标。戴榕(2014)总结了我国科研院所存在乱支滥用问题严重、预算编制不科学、科研经费资产流失严重、科研项目结题不及时和管理监督机制不完善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强制度建设、加



图1 科研经费审计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框架图

强财务审核、设立内审部门的相应建议。李洪敏（2016）、吴小玲（2016）、陈晨（2016）均结合中办发2016年50号文件，联系高校科研经费管理实际情况，分析当前科研经费违规使用的主要方式，归纳科研经费审计中应关注的重点问题，并提出对新形势下高校科研经费审计的思考。除此以外，欧阳卓平（2011）、宋华未和尚珂全（2015）、董再英（2016）、陆兴凤和翟志华（2016）等均在科研经费审计存在的问题和对策方面提出见解。

（二）科研经费审计模式和方法选择研究

刘洋和冯义秀（2012）结合我国科研经费划拨、管理和使用现状，提出了构建全过程、全体系、全内容的科研经费审计模式。姚王信等（2013）从科学性、艺术性、特殊性、实践性四个方面对科技经费审计基本方法、审计沟通技巧、应对特别风险以及三种主流审计模式进行了全面总结。缪雄平和郑允贵（2014）认为运用数据分析对高校科研经费支出进行实质性审计，能够快速查找并缩小审计疑点范围，定位问题凭证并判断业务发生的真实性、合法性和相关性，从而提高审计效率。李燕（2014）以抽样方法的理论为基础，联系科研经费审计的特点，阐述抽样方法在科研经费审计中的具体应用；杨柳菁和叶少霞（2015）从审计创新的视角，借鉴经济责任审计制度，以人文社科类课题为例，探讨一种既使课题组有自由学术氛围和环境来进行研究。又能接受公众监督，珍惜财政资助，负责地履行研究义务的科研课题审计制度。王雷和赵亚楠（2015）从科研经费审计的背景出发，引出并分析了当前科研经费审计的难点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同时提出了科研经费审计业务模式。甘海忠和王玉玲（2017）指出科研经费审计是高校各职能部门多重责任并行的一项工作，从内部控制、合理、合法及使用效益四方面加强高校科研经费内部审计机制

的新模式建设。

（三）国外科研经费审计先进经验借鉴

刘福祥和黄小红（1996）介绍了美国科技经费的审计监督经验，包括科技经费审计制度和标准、科技经费审计方法、科技经费审计内容和具体做法以及当时美国科技经费审计发展的新特点。雷雯等（2015）借鉴英国政府科研经费管理的先进经验，提供军队科研经费审计工作中应发挥审计监督利剑作用，加大科研领域违法违规问题查处力度、发挥审计监督导向作用，促使提高军队科研经费使用效益，同时发挥审计监督服务作用，并推进军队科研管理制度健全完善。刘西友（2015）总结美国审计署的做法，对深化我国科研经费审计工作具有一定启示。

从前人研究的情况来看，科研经费审计主题研究有“三多三少”的显著特点：一是实务问题多、理论贡献少。大多数文章是围绕科研单位科研经费管理或审计中遇到的现实问题提出解决方案，鲜有谈及文章本身对相关领域的理论贡献。二是微观研究多、宏观研究少。大部分文章是站在高校、科研院所或医院等层面去讨论科研经费管理或审计实务中遇到的微观问题，鲜有文献站在政府管理部门角度展开宏观政策分析研究。三是规范研究多、实证研究少。大部分文章采用文字阐述、案例分析、经验介绍等规范研究法，鲜有论文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去寻找一些经验证据检验相关假设。

三、会计师事务所开展国家科研经费审计现状及问题分析

自2006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财政部科技部关于改进和加强中央财政科技经费管理若干意见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提出要对科研项目建立财务审计与财务验收制度后，科技部率先在国家科技计划和专项经费审计中引入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结题财务审计报告服务，之后财政部、教育部、工信部、环保部等部委及大部分地方科技行政主管部门也聘用会计师事务所作为支撑力量开展科研经费审计工作。2010年至今，国内参与科研经费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数量一直保持稳定增长趋势，相关审计业务范围也在不断拓宽。以科技部为例，从2008年开始，首批遴选了160家事务所在“十一五”期间从事国家科技经费审计工作，资质周期3年，主要从事863

、973和支撑计划三大类国家科技计划经费审计，为科技经费监管提供重要支撑；2011年，第二次遴选确定了208家事务所在“十二五”期间具备国家科技经费审计资格，资质周期增长至5年，事务所能够参与的国家科技经费审计范围也扩大至多个计划以及科技专项经费的审计、检查；2016年，第三次遴选确定了259家事务所在“十三五”期间具备国家科技经费审计资格，主要工作包括：一是完成国家主体科技计划项目（课题）的结题审计；二是承担中央、地方科技行政部门委托的监督检查任务，特别是重大专项审计、特定事项监督检查任务等。

然而，事务所从事科研经费审计业务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共性问题，近两年甚至有个别事务所还因科研经费审计质量问题被公开通报处理，引起业界高度关注。结合当前中央对科技计划管理改革的新要求，本文在总结多年来对入围国家科技经费审计的事务所监督检查实践以及各类国家科技计划专项经费管理办法、《中国注册会计师相关服务准则第4101号——对财务信息执行商定程序》、独立审计准则、职业道德规范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基础上，归纳整理了事务所在从事科研经费审计中的问题，同时分析了问题发生的关键原因，以供从事科研经费审计的事务所参考借鉴。图1为科研经费审计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框架图。

（一）审计程序内部缺乏统一的规范

审计程序执行得当与否，则直接决定了审计报告质量。检查发现，部分会计师事务所在承担项目（课题）结题审计业务时的审计程序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部分对于审计现场执行哪些审计程序、如何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随意性较大。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未建立结题审计操作规程或审计手册、审计程序等规范性文件，履行审计业务时没有制定审计计划和具体程序；二是建立了有关规程，但对具体程序的要求比较粗略。审计程序的不得当，造成大部分事务所存在审计证据不充分的问题。以获取课题支出明细账这一审计程序为例，部分事务所并未取得财务系统导出的课题经费收支明细账，而是直接将课题组提供的台账或电子表格作为原始课题收支明细账，以此为依据执行后续的审计程序。这种做法使这一审计程序的作用大为“缩水”，不仅为单独核算

的认定带来隐患，也难以保证课题经费收支的真实性。再如有些情况下必须查看原件的没有查看原件，而以复印件代替；应该复印有关证据的没有复印有关证据，而以现场审计人员的口头沟通代替；应该核实有关支出真实性的没有核实，而以课题组的解释说明代替；审计底稿资料收集不够充分甚至有取证等。

（二）内部业务质量控制缺失或不严

2010年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了《关于加强会计师事务所业务质量控制制度建设的意见》，要求事务所建立健全业务质量控制制度和严格的质量复核制度，加强对所有业务项目的指导、监督和复核，更好地发挥经济鉴证作用。内部业务质量控制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结题审计报告质量。然而实践中，有的事务所仍未建立健全质量监控制度、三级复核制度；有的事务所未单独设立质量控制部门或专职的质量监控人员；有的事务所虽然建立了相关制度并设立了相关专职质量监控人员，但存在执行不严格、随机性大的问题，很多诸如审计报告文字、数据相互矛盾、勾稽关系错误等明显疏漏等应该在复核环节予以发现、纠正的问题，未得到发现、纠正。还有的事务所存在底稿及相关材料中反映的问题未能全部在审计报告中披露的问题，如工作底稿中显示，被审计课题存在材料费中列支经费用于预算外购置设备的问题，但该问题未在审计报告中披露。更有甚者，出具的审计报告出现重大的认定错误或出现重要遗漏。如对被审计课题预算外新增合作单位的问题未在审计报告中披露、对被审计课题的合作单位层层转拨经费的问题未在审计报告中披露。

（三）科研经费政策内部学习培训不足

科研经费审计与一般的企业财务年报审计不同，其审计的对象是课题支出的会计资料及其所反映的课题经费收支活动，目的在于证实课题经费收支的真实、合法、有效。它属于与国家财经制度相关政策联系非常强的业务，政策一变，问题认定的标准就需要随之变动，同时在工作中还要充分考虑科研活动规律的特点，因此事务所必须注重内部对科研经费管理与使用相关政策进行学习培训。然而，检查发现，部分事务所安排没有参加过培训、没有科技经费审计经验的审计人员从事结题审计，导致参与结题审计

人员对经费管理的相关政策把握和理解不到位,甚至按照对政策的错误理解执行有关审计,不仅降低了审计报告的质量,也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部分审计人员不了解科研活动规律,审计过程中不结合科研工作的实际情况,处理不好科研活动不确定性与科研经费管理政策要求之间的关系,生搬硬套,死扣预算,不认可合理的调整和变化的情况时有发生。另外,部分审计人员对结题审计的认识较为片面,认为结题审计就是看看课题支出汇总表上的数字是否准确、各科目支出的划分是否准确、各科目支出是否与预算相符,单纯地套用报表审计、工程预算审计的基本原则,因而,所执行的审计程序也较为简单、刻板,难以实现结题审计的目的。

(四) 结题审计档案管理不规范

2016年1月,财政部和国家档案局联合印发了《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档案管理办法》,指出审计档案为会计师事务所按照法律法规和执业准则要求形成的审计工作底稿和具有保存价值、应当归档管理的各种形式和载体的其他历史记录。现实中,尽管事务所基本都建立了档案管理制度,但在执行和日常管理中仍然存在保管、归放、借阅、销毁过程中不符合有关要求的情况,特别是归档资料不完整的问题较为突出,存在课题任务书、课题预算书,外拨经费合同或协议、外拨经费预算书、会计核算明细账及相关会计凭证、采购大额设备、大宗材料的合同、量大价高的测试化验加工服务合同及测试报告、课题专项经费购置的设备清单及设备盘点表、课题组全体成员名单及其在该课题组任务分工情况必备底稿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此外,还有部分事务所存在档案未建立档案索引的问题,个别事务所甚至出现了无法找到有关课题的工作底稿,工作底稿“张冠李戴”的问题。

(五) 原因分析

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科研经费审计业务违规成本低。科研经费审计属于小众化专业业务,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仅在科研项目(课题)财务验收时或者监督检查中使用,其使用对象仅限于科研项目(课题)组、验收专家及相关政府管理部门。审计报告的公开范围、使用频次、被监督的频次均非常有限,审计报告质量存在的缺陷不易被发现,科研经费

审计违规成本低;第二,大型事务所对科研经费审计重视程度不够。由于科研经费审计业务收费普遍较低,在事务所总业务中所占的比重不高,一些大型的事务所对此类业务重视程度不高,难以将优质专业技术资源配置到科技经费审计业务,导致审计人员配置存在较大差异;第三,中小事务所各项能力有待提高。从入围科技部十三五的259家事务所情况来看,中小事务所占到绝大多数,注册会计师人数50人以下事务所195家,占66.1%。中小事务所普遍存在低价竞争引发的短视行为、专业人才队伍匮乏、从业人员职业素质低、内部管理薄弱等一系列问题,从而导致科研经费审计业务质量偏低。

四、新形势下事务所做好科研经费审计的建议

通过上文对事务所从事科研经费审计业务现状及问题分析,结合当前科技领域放管服改革的形势要求,出于事务所业务发展的长远考虑,同时经过对多家事务所调研访谈后,笔者认为,事务所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 适应形势,积极融入国家创新发展大局

当前中央和国务院正在科技管理领域加快实施“放、管、服”改革,政府部门角色也开始由科技管理转向服务创新。中办和国办2016年7月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中办发【2016】50号文),其中提出了“简化预算编制,下放预算调剂权限”、“提高间接费用比重,加大绩效激励力度”、“明确劳务费开支范围,不设比例限制”、“改进结转结余资金留用处理方式”、“差旅费、会议费管理由科研单位内部制定”等一系列与科研经费审计业务相关的新要求。结合当前形势,事务所的理念必须围绕“服务创新发展”进行转变,即提高为科研人员的服务意识。

(二) 强化培训,提高科技经费政策理解水平

当前科技经费管理正处于不断的改革完善中,科研经费审计既面临改革交替期间的新旧制度运用问题,同时还有新旧制度衔接在审计实践中的一些新问题。比如:课题经费中的国际合作与交流科目能否超出预算金额进行支出?科研人员在野外实验时未取得住宿费发票能否报销差旅费?间接经费中多

大比例用于发放科研人员绩效合适？横向经费是否需要严格按照国家财政科技经费管理办法或规定执行？等等，这些问题的解答对于事务所审计人员尤其是“新人”来说，存在一定挑战。现场审计人员如果对政策没有全面理解和把握，客户提问时表现出“一知半解”或“自以为是”的话，不但不能为科研人员“松绑助力”，反而给客户发送错误信号。因此，事务所应强化内部培训，尤其是与科研经费管理与使用相关的国家政策、法规，提升事务所从业人员的政策敏感度和实际经验，理解每一项政策出台的背景和原则，结合科研活动的特点，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深入思考，这样才能真正做好科研经费审计工作。

（三）健全内控，提升审计业务质量和效果

内部控制是在一定的环境下，单位为了提高经营效率、充分有效地获得和使用各种资源，达到既定管理目标，而在单位内部实施的各种制约和调节的组织、计划、程序和方法（1972年，美国准则委员会（ASB）《审计准则公告》）。对于从事科研经费审计业务的事务所来说，内部控制具体是指实现科研经费审计高质量目标和规避审计风险的一类制度建设行为，涉及所内章程、岗位职责、现场工作程序、质量监控制度、三级复核制度、档案管理等多项内部管理制度。随着国家财政科技投入的逐年提升，公众对科研经费管理使用的关注度会越来越高，相关监管部门及行业协会对从事科研经费审计业务的事务所监督也会越来越严格，因此，事务所必须充分重视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借鉴

COSO内部控制框架，结合自身战略重点、业务规模、人员组成等情况，制定一套包含控制环境、风险评估、内控活动、信息与沟通、监督五方面完整内容，且可操作性强的内部控制制度，为科研项目（课题）结题审计报告质量提供制度保障，同时维护好自身行业声誉。

（四）稳固队伍，逐步提升事务所核心竞争力

人才队伍的松散不仅影响事务所未来科研经费审计业务的长远发展，而且给科研项目（课题）结题审计报告质量埋下风险隐患。事务所可以在以下三方面做文章：一是注重员工业务能力培养。对于新入职员工采取“传帮带”机制，同时加强在职员工业务培训，鼓励员工内部建立业务学习讨论小组，让员工感受到在职期间业务水平能够不断提升。二是建立健全考核、晋升及薪酬体系。结合事务所内部实际，完善管理和技术两条线的岗位设置，明确各级岗位职责范围，根据各自工作目标进行量化考核，相关结果与职务晋升和薪酬奖金直接挂钩。三是加强组织文化建设。事务所文化是其核心竞争力重要组成部分，组织文化既可增强所内员工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激励员工不断进步，还能对员工发挥内在约束作用。所内领导班子在文化建设方面需要发挥带头作用，把构建学习氛围、提升服务意识、增强创新理念等内容贯穿在日常管理实践中。

■ 作者单位：科学技术部科技经费监管服务中心



主要参考文献

1. 韩彪，徐艳丽. 对高校科研经费审计的几点认识. 上海会计. 1992(08)
2. 刘福祥，黄小红. 美国科技经费的审计监督. 中国审计信息与方法. 1996(10)
3. 欧阳卓平. 高校科研经费审计现状及改进措施探讨. 审计月刊. 2011(02)
4. 姚王信.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科研经费审计及对中国的启示. 教育财会研究. 2012(04)
5. 薛凯麟，管小敏. 高校科研经费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审计对策. 长春工业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 2012(02)
6. 刘洋，冯义秀. 全过程全体系全内容科研经费审计制度初探. 商业会计. 2012(21)
7. 姚王信，孙婷婷，何鹏. 科研经费审计方法研究. 财会通讯. 2013(28)
8. 黄伟. 国家科技经费审计有关问题探讨.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14(5)
9. 戴榕. 试论如何加强科研院所科研经费的审计监督. 中国总会计师. 2014(07)
10. 王雷，赵亚楠. 高校科研经费管理审计业务模式研究. 会计之友. 2015(08)
11. 雷雯，宋宜蔚，张云雾. 英国政府科研经费管理对我军科研经费审计工作的启示. 当代经济. 2015(08)
12. 刘西友. 美国审计署科研经费审计的特点和启示. 中国内部审计. 2015(05)
13. 陆兴凤，翟志华. 基于公立高校自身的科研经费规范化管理探析. 会计之友. 2016(13)

ACCOUNTING

会计

105 合并报表中少数股东权益金额变化及填列的思路 | 郭磊

109 完全权益法下逆顺流交易调整抵销的逆向解析 | 张先敏



合并报表中少数股东权益金额变化及填列的思路

■ 郭磊

摘要

在企业合并报表的编制中,需要填列“少数股东权益”及“少数股东损益”这两个项目,但是实务中少数股东权益金额变化的数据很难从工作底稿中获得,因此合并权益变动表中“少数股东权益”的填列成为了一个工作的难点。本文通过实务中常见的引起少数股东权益变动的七种业务因素展开分析,提供了一个分析少数股东权益金额变化及填列的可行思路。

关键词

合并报表 少数股东权益 少数股东损益 合并范围 利润分配

现行《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在合并报表中需要对少数股东有关情况列报,即合并报表中列示“少数股东权益”及“少数股东损益”两个项目。以非同一控制下合并为例,合并方可直接以子公司净资产持续计量的公允价值以及子公司当期实现净利润按照少数股东份额分别确认“少数股东权益”及“少数股东损益”。现行会计准则的规定给实务工作带来高效与简便,但是少数股东权益、损益在会计期间的变化过程并未展现,往往也会导致按照少数股东份额直接确定的权益金额与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间接计算期末少数股东权益金额两者存在差异,而这往往是实务工作着需要重视的。

一、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少数股东权益”列示方法

现行合并方法直接按照少数股东份额确定少数股东权益期末份额,并未考虑会计期间的变化过程,导致在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的“少数股东权益”期末余额需还原计算填列。传统方法下,先需要找出各种引起少数股东权益变动的影响因素,再对这些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确定其影响少数股东权益的内在逻辑,信息还原分析的基础上最终才能

准确计算“少数股东权益”的期末余额。

通过对传统方法核算的少数股东权益信息进行还原计算,得到在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列示的期末余额数,这样可以将少数股东权益在各个合并报表中的勾稽联系明朗化。正常来说,合并资产负债表所列示的各种“所有者权益”项目均是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各项目当期变化后的期末最终金额;同样,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的某些项目又是来自于合并利润表中的有关项目当期变化的期末最终金额。除此之外,还可以将按照少数股东份额直接确认的金额与按照还原各种影响因素信息得到的少数股东权益金额两者进行比对,不同结果有不同结论。若两者计算结果一致,表明合并方充分考虑了所有影响少数股东权益的因素;若两者存在差异,则表明合并方可能未将所有对少数股东权益产生影响的因素考虑周全。为此,笔者认为企业坚持传统的直接确认方法与本文介绍的还原各种影响因素计算方法两条线,工作量虽有一定增加,但可相互验证并提高合并报表的准确性。

二、“少数股东权益”影响因素及列报说明

实务中合并方面临的合并可能有同一控

制下和非同一控制下两种，前者实务中涉及“少数股东权益”有关项目计算与列报较为简单，而后者则较为复杂。因篇幅有限，本文选择后者（非同一控制下的合并）为对象，对以下七个影响“少数股东权益”的项目因素进行详细分析，并简单介绍列报方法。

（一）合并当前新增可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若合并方在合并当期新增加了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等母公司“可控制”的子公司，则需将这些子公司纳入合并方的合并报表范围。如此，新增合并子公司则会对合并报表中的“少数股东权益”产生影响（新增全资子公司不会产生影响，本文不以此为代表）。

合并方在购买日需要针对新增加纳入合并范围的控股子公司进行合并报表编制，此时“少数股东权益”金额以购买日子公司可辨认的净资产公允价值按照少数股东份额进行确认。考虑购买日并不一定在期初或期末，并不需要编制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为此，在合并当期期末编制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时，“少数股东权益”的期初金额则需要以购买日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少数股东权益”项目金额列报。

（二）合并子公司的当期利润实现与分配问题

针对纳入合并方的子公司在当期会计期

间实现的利润，需要按照归属于少数股东的份额进行确定“少数股东损益”及“少数股东权益”的金额。按照会计准则要求，当期增加的归属于少数股东的权益金额需要在期末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的“少数股东权益”项目下的“综合收益总额”一栏列报。当期利润正常情况下指会计期初到会计期末；若是期间新增合并子公司，则当期仅包括自购买日起至当期期末的会计期间。

同样，针对子公司分配利润的情形，会导致子公司净资产减少进而影响归属于少数股东的权益。按照少数股东份额确认应分摊的分配股利的数额，扣除此金额后的余额作为“少数股东权益”的填列金额，少数股东分摊的分配利润金额列报于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的“少数股东权益”项目下的“对股东的分配”。

（三）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逆流交易

母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主要分为顺流和逆流交易。考虑顺流交易，合并抵销后仅仅会对母公司个别利润表产生影响，并不会对子公司少数股东的损益及权益产生影响，故无需分析。不过，针对逆流交易，交易产生的损益会影响子公司的利润表，在合并抵销操作时会对少数股东损益及权益产生影响，需详细分析。

针对逆流交易产生利润时，经合并抵销后的全部损益均计入合并利润表会增加合并净利润，然后，按照少数股东份额将合并新增净利润中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单独计提出来，计入少数股东名下。为此，需要做如下调整分录：借“少数股东损益”、贷“少数股东权益”。该分录的含义是按照少数股东份额确定其应享有的权益将其从合并利润表的利润项目转移至合并资产负债表“少数股东权益”项目。当然，合并资产负债表“少数股东权益”项目的增加，对应需要调整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少数股东权益”下的“综合收益总额”。针对逆流交易减少了子公司净利润的情形，只要做上述的反向分录，并做相应的调整即可。

（四）前期差错更正、会计政策变更

当子公司在出现前期差错或遇到重大会计政策变更，都面临追溯调整需要，追溯调整若影响子公司净资产，必然对少数股东权益产生影响。为此，前期差错和会计政策变更导致的子公司净资产变动，需要按照少数

股东份额对“少数股东权益”的上期期末余额进行调整，相应本期期初余额也需要调整。

按照准则规定，需要将追溯调整对“少数股东权益”期初累积的影响数进行如下处理。若追溯调整导致子公司期初净资产增加，则按照少数股东份额做会计分录：借“留存收益”、贷“少数股东权益”；若追溯调整导致子公司期初净资产减少，则反向



分录调整。根据借记或贷记的“少数股东权益”直接调整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少数股东权益”的期初数，并将调整金额同时记入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少数股东权益”下的对应的“会计政策变更”或“前期差错更正”栏。

本文分析简化处理，仅考虑了两类追溯调整对“少数股东权益”期初金额的影响，实务中则需要对列报最早期初至本期期初的各期累积影响金额均进行调整。

（五）合并子公司还存在控股子公司情形

针对纳入合并的子公司其还有控股子公司的情况，本质上即合并方（母公司）的孙公司，这种持股结构导致“少数股东权益”较为复杂，需要深入分析、剖解。根据会计准则的要求，由于孙公司本质上也是合并方（母公司）的“子公司”，故也需纳入合并范围。针对此情况，实务中分层合并为主，即子公司先纳入其子公司（即母公司的孙公司）编制合并报表，然后合并方（母公

司）再纳入子公司（此时孙公司可以在合并范围内）编制合并报表。现通过如下案例进行说明。

案例1：集团公司甲，其非同一控制下控股乙公司、持股75%，乙公司同样存在非同一控制下的控股丙公司、持股89%，现在会计期末资产负债表日母公司集团甲需要编制合并报表。

分析：现行会计准则要求集团公司甲将乙、丙共同纳入合并报表的编制范围，为此，可以按照分层合并思路进行合并。第一步，乙公司将丙纳入合并范围编制乙公司合并报表，乙公司合并报表中可将丙公司少数股东持有的份额放入其合并报表的“少数股东权益”进行列报。第二步，甲公司将乙公司纳入合并范围编制集团合并报表，但此时不对丙公司少数股东的权益进行合并，只合并属于乙公司持有的丙公司股份，乙公司编制的合并报表中的“少数股东权益”及“少数股东损益”直接挪至集团公司甲的合并报表中对应的科目（这只是集团合并报表“少数股东权益”的一部分）。第三步，甲公司对归属于甲的乙公司股份按照正常程序合并，对归属于乙公司少数股东的权益计入集团公司甲的合并报表的“少数股东权益”项目（这只是集团合并报表“少数股东权益”的另一部分）。

（六）母公司增持或减持子公司股权

母公司对子公司可以选择增加控制权（增持），也可以选择降低对子公司的持股比例（减持）。减持又可以分为减持后继续保持控制权（仍需纳入母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和减持后丧失控制权（不再纳入合并范围）母公司增持或减持子公司股权后的合并报表编制中“少数股东权益”列报过程基本一致，本文以减持为例介绍。

案例2：虹越公司持有80%的福星公司的股权，非同一控制，2016年年初福星公司净资产公允价值为9亿。2016年二季度末，虹越公司减持福星股份至60%，仍保持控制。已知福星公司当年净利润合计1亿元，上半年为0.6亿元、下半年为0.4亿元。

分析：虹越公司2016年上半年减持20%的股份后，直接导致少数股东份额增加至40%。减持前，归属于少数股东的权益及上半年的损益分别为1.8（20%*9）亿元和0.12（20%*0.6）亿元，合计1.92亿元。减持后，

少数股东的权益合计为3.84（40%*（9+0.6））亿元。对比减持前后，发现少数股东权益合计增加了1.92亿元，增加的少数股东权益相当于在减持后少数股东对福星公司的增资。2016年年底，进一步考虑福星公司下半年净利润情况，可发现增加少数股东损益为0.16（0.4*40%）亿元。因此，2016年12月31日，归属于少数股东的权益合计为4（3.84+0.16）亿元。

考虑母公司虹越公司在二季度末减持福星公司股份，故其合并报表中计算少数股东损益及少数股东权益时需分段计算。首先，2016年年末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少数股东权益”期初金额应列报为1.8亿元、当年“少数股东损益”为0.28（0.12+0.16）亿元计入“少数股东权益”下的“综合收益总额”栏。其次，针对减持后少数股东权益增加的1.92亿元需要计入“少数股东权益下”的“所有者投入资本”栏，为少数股东对福星公司的增资。如此，2016年年末，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的“少数股东权益”期末金额合计为4（1.8+0.28+1.92）亿元；与合并资产负债表中按照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归属于少数股东份额确认的“少数股东权益”列报4亿元一致。

（七）母公司处置或减持导致合并子公司减少

合并子公司的减少具体又可能分为两种情形，一是母公司处置合并子公司后不再有合并对象、一是处置后母公司仍需要对其他控股子公司编制合并报表。因此，第一种情形并不会涉及合并报表“少数股东权益”问题，第二种情形则涉及，是本文讨论的范围。

案例3：集团公司达利控股两家子公司A、B，其中持股A子公司股权60%。2016年年初，A公司可辨认的净资产公允价值为6亿元，2016年9月30日达利集团出售全部持有的60%的A公司股份。已知2016年前三季度净利润为0.8亿元，四季度净利润为0.2亿元，全年合计1亿元。

分析：考虑达利集团出售全部A公司股权

后，旗下仍有控股公司B公司，故仍需要编制合并报表。

出售前，由2015年年末达利集团合并报表可知，2016年年初A公司“少数股东权益”为2.4（6*40%）亿元。同时，根据2016年A公司的经营情况可知，前三季度A公司“少数股东损益”为0.32（0.8*40%）亿元。两者相加可知在达利集团出售前，A公司的少数股东权益金额合计为2.72（2.4+0.32）亿元。

出售后，由于达利集团全部出售A公司的股权，故前三季度归属A的少数股东权益合计2.72亿元全部消失，在达利集团合并资产负债表“少数股东权益”将减少2.72亿元。在2016年年末达利集团的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少数股东权益”期初金额仍需涵盖归属A公司少数股东的2.4亿元；针对前三季度实现的归属A公司少数股东损益的0.42亿元需计入“少数股东权益”下的“综合收益总额”栏；退出后减少的2.72亿元以负数计入“少数股东权益”下“所有者投入和减少资本”的“其他”栏。

作者单位：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 彭秀玉. 新会计准则下合并报表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企业改革与管理. 2014(23)
2. 刘璐. 交叉持股中的合并会计报表方法研究. 中国管理信息化. 2014(13)
3. 闫春旭. 新旧合并财务报表准则变化相关问题探讨.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5

完全权益法下逆顺流交易调整抵销的逆向解析

■ 张先敏

摘要

新的长期股权投资准则要求采用完全权益法，要考虑投资双方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的抵销。投资方个别财务报表中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比较容易理解，但当投资方需要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相关的抵销分录无论是对于理论工作者还是实务工作者，都比较难理解，对初学者更是费解。笔者通过实例，立足个别财务报表和合并财务报表两个层面，逆向解析完全权益法下逆顺流交易的调整抵销。

关键词

完全权益法 长期股权投资 逆（顺）流交易 合并财务报表

一、完全权益法下逆顺流交易在个别财务报表中的调整

2014年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要求对合营企业的投资采用完全权益法核算，即按照应享有或应分担的被投资单位实现净利润或发生净亏损的份额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和确认当期投资损益时，不仅要考虑被投资企业的会计政策和会计期间与投资企业不一致对其净利润或净亏损的影响，以及取得投资时被投资企业资产负债项目公允价值与其对应账面价值差异对其净利润或净亏损的影响，而且要考虑投资方和被投资方之间逆流和顺流交易而产生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的影响。由于完全权益法下逆（顺）流交易在合并财务报表中的抵销较难理解，所以本文不考虑会计政策、会计期间的差异和公允价值的影响，仅以逆（顺）流交易为例剖析其在个别财务报表和合并财务报表中的会计处理及差异。

（一）逆流交易在个别财务报表中的调整

逆流交易是联（合）营企业向投资方销售商品，当该商品尚未销售给外部独立的第三方时，所产生的销售利润并未实现，对被投资方而言体现在其净利润当中，完全权益法下需据此调整被投资方的净利润，然后确认投资收益。具体见案例1。

案例1：甲企业于2015年1月1日取得乙企业20%的有表决权股份，能够对乙施加重大影

响。假定甲企业和乙企业的会计政策、会计期间一致，甲企业取得该项投资时，乙企业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的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相同。2015年8月，乙企业将其成本为600万元的某商品以100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甲企业，甲企业将取得的商品作为存货。2015年资产负债表日，甲企业未对第三方出售该存货。乙企业2015年实现净利润3200万元。假定不考虑所得税因素。

乙企业2015年实现净利润3200万元，但其中包括逆流交易（乙企业销售给甲企业）产生的内部交易利润400万元。由于期末甲企业并未对外销售该存货，乙企业的净利润当中有400万元并未实现，需要以此为基础调减乙企业净利润，相应调减甲企业确认的投资收益，所以完全权益法下甲企业2015年在其个别财务报表中应进行如下账务处理：

（1）借：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 $(3200-400) \times 20\%$ ） 560
贷：投资收益 560

假设2016年甲企业将该存货销售给外部独立的第三方，乙企业在2016年实现净利润仍为3200万元。上年内部交易利润400万元的20%在本年实现，其在上年调减了乙企业净利润，本年需调增乙企业的净利润，并按调整后的净利润确认投资收益，完全权益法下甲企业2016年在其个别财务报表中应进行如下账务处理：

（2）借：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

表1 逆(顺)流交易对投资方和联(合)营企业报表的影响

交易方式	投资方	联(合)营企业
逆流	内部交易资产的价值虚计	收入、成本虚计
顺流	收入、成本虚计	内部交易资产的价值虚计

表2 逆(顺)流交易在合并报表的调整过程剖析

项目	完全权益法下个别财务报表的调整	简单权益法下个别财务报表的调整
逆流交易(案例1)	借: 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 640 贷: 投资收益 640 借: 投资收益 80 贷: 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 80	借: 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 640 贷: 投资收益 640 借: 投资收益 80 贷: 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 80
顺流交易(案例2)	借: 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 640 贷: 投资收益 640 借: 投资收益 80 贷: 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 80	借: 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 640 贷: 投资收益 640 借: 投资收益 80 贷: 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 80
项目	完全权益法下合并财务报表的调整	简单权益法下合并财务报表的调整
逆流交易(案例1)	起点: 借: 投资收益 80 贷: 长期股权投资 80 过程: 借: 长期股权投资 80 贷: 存货 80	结果: 借: 投资收益 80 贷: 存货 80
顺流交易(案例2)	起点: 借: 投资收益 80 贷: 长期股权投资 80 过程: 借: 营业收入 200 贷: 营业成本 120 投资收益 80	结果: 借: 营业收入 200 贷: 营业成本 120 长期股权投资 80

(3200+400)*20% 720

贷: 投资收益 720

(二) 顺流交易在个别财务报表中的调整

顺流交易是投资方向其联(合)营企业销售商品, 当该商品尚未销售给外部独立的第三方时, 所产生的销售利润并未实现, 其体现在投资方的个别财务报表中, 完全权益法下需据此调整投资方应确认的投资收益。具体见案例2。

案例2: 甲企业于2015年1月1日取得乙企业20%的有表决权股份, 能够对乙施加重大影响。假定甲企业和乙企业的会计政策、会计期间一致, 甲企业取得该项投资时, 乙企业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的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相同。2015年8月, 甲企业将其成本为600万元的某商品以100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乙企业, 乙企业将取得的商品作为存货。2015年资产负债表日, 乙企业并未对第三方出售该存货。乙企业2015年实现净利润3200万元。假定不考虑所得税因素。

乙企业2015年实现净利润3200万元, 甲企业按权益法应确认投资收益640万元。但甲企业在该顺流交易中的利润为400万元, 其中的

20%是针对本企业持有的对联营企业的权益份额, 且该存货期末并未实现对外部第三方的销售, 80万元(400*20%)属于未实现内部交易利润, 需调减甲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和投资收益, 所以完全权益法下甲企业2015年在其个别财务报表中的账务处理与逆流交易相同, 具体见分录(1)。

假设2016年乙企业将该存货销售给外部独立的第三方, 乙企业在2016年实现净利润仍为3200万元。上年内部交易利润400万元的20%在本年实现, 其在上年调减了甲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和投资收益, 本年需调增甲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和投资收益, 所以完全权益法下甲企业2016年在其个别财务报表中的账务处理与逆流交易相同, 具体见分录(2)。

二、完全权益法下逆顺流交易在合并财务报表中的抵销

(一) 注会辅导教材的讲解

根据《2016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辅导教材》的讲解, 甲企业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 对于逆流交易, 应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对长期股权投资及包含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的资产账面价值进行调整, 抵销有关资产账面价值中包含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并相应调整对联(合)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承例1(逆流交易), 则甲企业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应进行如下处理:

(3) 借: 长期股权投资(400*20%)

80

贷: 存货 80

在顺流交易中, 投资方投出资产或出售资产给其联(合)营企业产生的损益中, 按照持股比例计算确定归属于本企业的部分不予确认。承例2(顺流交易), 则甲企业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应进行如下处理:

(4) 借: 营业收入(1000*20%) 200

贷: 营业成本(600*20%)

120

投资收益(400*20%) 80

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 为什么在逆流交易中需要调整长期股权投资和存货的价值, 而在顺流交易中需要调整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和投资收益? 只因交易方向发生了变化, 抵销涉及的报表项目就全然不同? 如何理解这一抵销处理? 不光对于初学者相当困难, 甚至对理论工作者和经验丰富的实务人员而言, 往往也是一头雾水。笔者拟结合自身的实践及教学工作, 从逆向的角度剖析如此抵销的原因, 以帮助广大考生和财会人员

更好地理解完全权益法下逆（顺）流交易在合并财务报表中的调整和抵销

（二）逆向解析下的过程剖析

1. 逆（顺）流交易对投资方和联（合）营企业各自报表的影响

从合并财务报表的视角来看，在逆流交易的情形下，联（合）营企业将自身的资产销售给投资方，如果投资方未将其销售给外部独立的第三方，则该资产以包含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的金额存在于投资方的资产当中，也就是说，在该种情形下，投资方的资产价值存在虚计，与此相应，联（合）营方的收入和成本存在虚计。在顺流交易的情形下，投资方将自身的资产销售给联（合）营企业，如果联（合）营企业未将其销售给外部独立的第三方，则该资产以包含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的金额存在于联（合）营企业资产当中，也就是说，在该种情形下，联（合）营企业的资产价值存在虚计，而投资方的收入和成本存在虚计。因此，如果将投资方与联（合）营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则逆（顺）流交易对双方报表的具体影响见表1。

2. 逆向解析下合并报表的调整过程

本文所说的逆向解析是指，从投资方与联（合）营企业之间逆（顺）流交易的结果来反推合并财务报表上的调整分录。由于投资方对联（合）营企业不存在控制，所以其不需要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范围。当投资方需要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仅需要分析该逆（顺）流交易对投资方报表的影响即可。

在逆流交易的情形下，根据表1，一方面，投资方因内部交易形成的资产价值存在虚计，故需调整该资产的价值。另一方面，因投资方对联（合）营企业采用权益法核算，假设不是采用完全权益法（即例1当中按640万元确认投资收益），因联（合）营企业收入、成本虚计，相应投资方的投资收益会存在虚计，因此，当没有采用完全权益法时，在案例1中则需要调减投资方的资产价值和投资收益，即需做如下调整分录：

（5）借：投资收益 80
贷：存货 80

在顺流交易的情形下，根据表1，一方面，投资方因内部交易导致收入、成本虚计，故需调整收入和成本。另一方面，因投资方对联（合）营企业采用权益法核算，假设不是采用完全权益法（即例2中按640万元确认投资收益），因联（合）营企业内部交易资产价值虚计，相应投资方的长期股权投资会存在虚计，因此，当没有采用完全权益法

时，在案例2中则需调减投资方的收入、成本和长期股权投资，即需做如下调整分录：

（6）借：营业收入 200
贷：营业成本 120
长期股权投资 80

根据前文的分析，在逆（顺）流内部交易下，完全权益法下个别财务报表的调整相当于在简单权益法的基础上多做了一笔调整分录，即调整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对个别财务报表长期股权投资和投资收益的影响，具体见表2。而不管投资方在个别财务报表中对长期股权投资采用何种核算方法，合并财务报表都需要将未实现利润全额抵销，其最终结果是相同的。因此，可采用逆向思维的方法，从简单权益法下合并财务报表的抵销分录结果倒推完全权益法下合并报表的抵销分录。也就是说，简单权益法下合并财务报表的抵销分录是最终的结果或者目的，由于完全权益法下个别财务报表的调整与简单权益法下并不完全相同，与此相应，完全权益法下合并财务报表的抵销分录就需要在已有的调整分录的基础上（与简单权益法相比），通过补充调整达到最终的目的。其在逆（顺）流交易下调整的起点和过程见表2。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2016年该存货已全部销售给外部独立的第三方，虽然个别财务报表中按完全权益法需要对已实现的内部销售利润进行调整，但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由于已经不存在未实现的内部销售利润，因此无需进行合并抵销或调整。

三、小结

综合前文的分析，当投资方与联（合）营企业之间的逆（顺）流交易存在未实现内部交易利润时，在完全权益法下都需要按比例调整减少应确认的长期股权投资和投资收益，待到该内部交易利润实现的会计期间，再相应调整增加长期股权投资和投资收益，逆（顺）流交易在个别财务报表中调整完全相同。与个别财务报表不同，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如果为逆流交易，需要根据未实现内部交易利润的金额抵销长期股权投资和存货项目；如果为顺流交易，需要根据未实现内部交易利润的金额抵销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和投资收益项目，这主要是因为两者对投资方个别财务报表的影响不同所致。

■ 本文是青岛科技大学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高效复合型财务管理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 作者单位：青岛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企业改革中的管理会计创新分析

■ 张小林

摘要

财务会计工作作为企业改革发展中的关键环节,对于企业管理会计创新的建设工作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现代企业管理会计的新要求,需要管理人员树立财务会计及管理工作的创新意识,更加注重企业统一化与整体化发展,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企业管理会计工作更需要在确保企业资产稳固增长的同时,做到以基本点促进整体的效果。本文通过论述企业改革中管理会计创新的原则,进而分析企业财务治理的结构特点,延伸至对我国企业改革中管理会计工作现状的探讨,以期提供实际经验及相关参考。

关键词

企业改革 管理会计 财务创新

一、引言

企业管理会计工作主要是通过完成企业资金的流动,近而对企业的财务进行全面系统的有效核算,并完成监督管理的工作。企业管理会计工作人员需做到创新管理,不断更新管理会计的理念,才能够对企业外部与企业间的经济利害关系进行科学分析和掌握;此外,管理会计工作人员还需掌握企业的财务状况,对企业的盈利能力做出合理判断,为公司决策提供重要的财务信息。在明确企业经济目标的同时,管理会计工作作为企业一切经济管理活动的基础,最终通过提供财务报表来了解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及财务状况。编制准确的财务报表是最能够准确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的一项工作。同时,作为管理会计工作人员,也有责任为企业提供相应的经济信息,分析企业与投资者和债权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在具体工作过程中完成其监督责任,避免出现财务纠纷等一系列问题,这也就要求管理会计人员在遵循相关标准和规定的同时,在企业改革过程中具备创新意识,不断完善管理会计制度和自身能力,关注管理会计工作的整体创新性,从而

更好地帮助企业完成经济目标。

随着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不断丰富与完善,公司治理已经成为各方关注的重要课题,而管理会计工作作为公司治理的关键部分,对于企业的重组及兼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因此,企业自身如何结合行业结构特点,从原有财务治理模式中实现管理会计系统及机制的创新,是企业和政府必须重点关注的问题。

二、企业改革中的管理会计创新的原则

1. 坚持企业价值最大化

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企业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想要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企业就要坚持自身价值最大化的经营战略目标,例如,对于企业所属的单位类型做出有效分析,从而确定出最适合的财务管理模式,具体的操作过程和标准均应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基础和目标,不仅要综合考量经济效益,还要兼顾社会效益,从而使得公司整体实现其利益的最大化发展。

2. 坚持集约化管理原则

财务管理是企业管理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只有坚持集约化管理的原则，才能够利用好企业内部的各类有效信息，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判断及分类，为企业提供准确有效的财务信息及数据，在高效利用企业内外部资源的同时，实现各类信息的科学配置，充分发挥管理会计工作的决策支持作用。



3. 坚持“四化”管理

企业改革中的“四化”管理主要指的是集团化运作、精益化管理、集约化发展及标准化建设，这不仅是企业的基本管理观念，也是对于管理会计工作的重要评判准则。同时，坚持“四化”管理的原则，也是企业改革过程中进行管理会计创新工作管理模式的重要解决方法和途径。

三、企业管理会计工作现状

国家与社会对于企业改革过程中的管理会计创新重视程度日渐增强，而企业自身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意识到，只有大力发展管理会计，才能够立足于不败之地；加大对管理会计人才的引进力度，才能够为企业财务管理发展提供有力支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随着企业财务法律法规体制的逐渐完善，国家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企业财务通则》的贯彻和落实，2008年我国又在原有基础上实行《企业会计准则》。为了促进企业的全面发展，国家也根据现阶段企业的发展及实际管理情况，对管理会计工作进行了宏

观的把控，这也给企业内部财务管理会计的创新提供了发展动力，促使企业管理会计工作进行调整优化，从而制定出符合企业自身发展的财务管理规划。再者，近年来，管理会计日益得到政府部门和企业的重视，随着诸多以管理会计为核心的相关法律出台，也弥补了之前企业财务管理中被忽略的地带，例如，2014年11月，财政部发布《关于全面推进管理会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2016年6月，财政部又印发《管理会计基本指引》，对于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做出了明确的要求，这也就意味着企业内部必须明确自身责任，履行相应责任。此外，《企业所得税》中则明确提出对于企业固定资产及流动资产等科目进行制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管理会计人员有效降低企业的运行经营成本，帮助企业实现经济目标。

2. 社会各行业的重视提升，随着国家改革进程的深入贯彻落实，社会各行业对于企业管理会计工作又有了全新的认识，而随着国家相关制度及标准的不断完善，诸如企业销售及运输等环节操作流程也得到了细致和优化。当前，企业的经营运行需要国家政策的扶持和相关部门的监督进行有效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够为企业提供一个公开透明的竞争环境，避免不正当经营的现象发生。企业管理人员也只有不断提升创新理念，加强自我素质的提升，与时俱进，紧随国家相关政策及法律法规的潮流，做到与实际工作相结合，才能够为提高自身工作素养提供有力支持，同时也为企业提供准确的会计信息及财务判断创造有利的自身条件。

3.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也作为大企业集团的附属金融机构出现，成为集团企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以煤炭行业来为例，煤炭集团企业财务公司主动投资、外部融资的能力相对较低，业务创新能力不足，从资产业务结构来看，煤炭集团企业财务公司的资产业务主要源于贷款业务及贴现。同时，煤炭集团企业财务公司的债券及股票等油价正确投资业务开展数量较少。

从负债来源方面分析，煤炭集团企业财务公司资金主要通过内部成员单位贷款获得，由于外部融资能力有限，因此对内部企业的金融支持作用较弱，这也是当前诸多企业发展面临的共同问题。

表1 煤炭行业及全行业财务公司资产结构对比

	现金及存放央行	存放同业款项	贷款	投资				其他
				债券	股票	其他	合计	
全行业	9.52	36.93	41.29	1.68	0.43	4.39	6.50	5.02
煤炭行业	11.63	36.57	44.28	0.24	0.05	1.49	1.79	5.53

表2 煤炭企业及全行业财务公司负债结构对比

	利息收入	投资收益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其他
全行业	83.56	13.66	1.97	5.02
煤炭行业	93.41	2.73	2.31	5.53

表3 煤炭行业及全行业财务公司负债结构对比

	存款	同业拆入	应付债券	同行业存放款项	其他
全行业	90.58	3.33	3.45	0.48	2.21
煤炭行业	98.07	0.00	0.00	0.03	1.85

从煤炭行业来看，我国当前企业改革已经进入一个关键的转型期，而既有的财务会计及财务管理工作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当今信息化背景下的需求，只有在现有基础上结合我国企业财务治理的自身特点，不断实现管理会计理论及实践创新，才是实现企业长远发展的根本途径。

四、我国企业财务治理结构特点

当前，我国大多数企业都按照现代化企业管理的相关要求，逐步对公司治理结构进行建立完善，尤其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不断深入发展，与西方国家相比较，我国资本市场还尚未完善，法律法规也较为薄弱仍处在不断完善阶段，而三权分立的模式对于我国企业的内部管理来说并不适应，而正因为这一特点，我国大型国有企业及部分其他企业的财务治理方式也多呈现出集权式模式的管理特点。随着近些年来信息化的发展，在网络环境下的财务集中管理较为普遍。另外，部分企业还具有跨行业、跨地区等特点，因此集团企业往往采用三级管理、两级集中地管理模式，有集团总部统一进行预算和资金的调配，最后进行绩效水平的实际评价的模式。

1. 资金管理权的配置方面

集团公司的资金部主要由集团主要负责人和总会计师进行管理，资金部对资金的使用方式为有偿使用，且通过内部融资的功能进行流转交换，统一进行规划管理，各个核

算单位在集团内部分别设有各自的银行存款账户。

2. 投资决策权的配置方面

企业投资决策权主要采用相对集权的方式，以母公司为主，子公司为辅，子公司享有适度投资决策权。这种配置方式主要能够从整体上对集团投资进行统筹协调，合理安排资金资源。另外，通过跟踪监控等方式，对资金进行动态监控，从而便于对投资的最终效果进行科学评价，确保集团公司对于投资的方向掌控和资金使用的安全性。

3. 资产管理权的配置方面

集团公司对于集团全部资产具有集中管理权，能够从宏观层面对所有资源进行掌控和管理，并下设专门资产管理部门。

4. 成本费用管理权配置方面

集团公司财务部门有权利对成本费用进行分类及管理权、财务部门对成本费用的分类和核算内容进行统一规定，设立专门要求进行严格管理。对于各个独立核算单位的成本费用管理，则具体依据实际情况进行跟踪监督及调查，对预算执行中的偏差进行统计分析，进而完善监督及检查工作。

5. 利润管理权和分配权配置

集团企业进行责任考核制度，针对利润分配和管理权的配置，则主要围绕目标利润为中心进行相关管理。母公司为出资人，按照出资比例进行最终分配数额的确定，而子公司则有权按照《公司法》，在对以前年度亏损的税后利润进行法定公积金和公益金的提取之后，再按照规定进行不可分配利润的提取。

五、企业改革中的管理会计创新探讨

1. 更新企业财务管理目标

利益最大化目标为根本。企业管理的目标不仅囊括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也涵盖了相关利益的最大化，企业的运行生产过程中更应当关注各个方面的影响要素，例如经营者与投资者、相关工作人员之间的利益，这也就需要企业制定并完善确保工作人员利益的标准及政策，以此协调与各个主体的利益分配，鉴于各个团队所承担的风险比率不同，且相互之间依赖密切，因此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更要以利益最大化为根本，合理分配各方面利益。

管理会计必须直接参与投资决策，以实

现最大的投资效益。在市场经济下，企业对于资金的营运和管理是企业经营管理的关键部分，也直接影响着企业各个方面的利益。因此，管理会计工作直接参与投资决策，掌握资金运营的实际状况已经发展成为企业改革过程中的必然要求。所以，在管理会计创新过程中，必须运用充分发挥管理会计工作的作用，对于资金的投入产出情况进行准确掌握，做好事前预测的同时，加强对资金的控制，从而帮助降低企业的整体运营成本及风险，获得最大的投资效益。

2. 转换财务工作思维方式

首先要建立正确的人才考核机制。管理会计不能一味照搬其他国家或企业的经验，企业需要不断更新财务理念，适时引进具有管理会计专业知识的人才，才能够为顺利实施管理会计工作注入新鲜的发展血液。在企业运营过程中，人才作为重要因素不可或缺，企业只有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建立健全相关激励制度及绩效考核体系，才能够增强管理会计工作人员的忧患意识，提高其工作的积极性，发挥管理会计的作用。此外，在考核人才的过程中，不应当单纯考察其知识掌握情况，应当结合管理会计人才实际情况，明确其优缺点，树立正确的人才理念，才能够促进企业的优化升级。

其次要树立知识化的资金管理观。在信息时代发展的大背景下，经济活动的开展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和技术支持，也无形之中推动着企业改革进程的加快。而管理会计创新工作则需要以大量的知识储备作为前提，为企业的运营提供技术及资金的双重支持，才是新阶段下企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方向。另外，企业高管及管理会计人员也需要树立起正确的资金管理观念，强化自身接受信息化的能力，利用网络、“互联网+”及云计算等新兴技术，不断对管理会计工作进行有效的更新，提升整体的财务工作效率，进而为企业的决策规划提供可行性的建议，帮助企业适应改革的需要。

3. 提升风险管控意识及能力

管理会计工作的推进，需要加大财务稽核及专项检查的工作力度，建立健全风险管理与内控机制。在事前、事中及事后的各个环节中，做好不同程度的把控，协调好预防、稽核及检查整改等工作间的关系，通过组织开展抽查，帮助企业建立起健全的财务自我约束机制。此外，财务稽核管理制度也能够很好地为企业管理提供有力保障，不仅能够帮助探索财务稽核向不同领域行业扩展，还能够有效发挥其监督管理作用，从而强化财务评价激励机制的导向作用。

管理会计创新必须确保有效的偿债能力，以确保企业的持续运营。企业作为独立的生产主体，享有法人财产权等一系列合法权益，自行承担盈亏。因此，企业改革过程中的管理会计创新必须在确保有效偿债能力的基础上，增强财务管理的风险防范意识，帮助企业进行有效的决策，这不仅关系到市场经济秩序的合理运转，也与企业的发展命运有着直接的关联。

六、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进入新常态，众多企业正处在改革转型期，需要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及管理会计工作现状，在国家战略目标与企业发展目标相结合的基础上，进行管理会计机制的构建。管理会计工作作为企业改革中的关键环节，在当前的实际工作中，其工作模式及方法需要不断升级以适应外界新的变化和发展，因此，管理会计技能的提升，是实现企业财务工作快速发展的关键。而随着信息时代的快速发展，管理会计工作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会计工作不再是仅仅局限于简单的会计核算等，而需要在原有基础上不断更新其要素，通过协调各相关方之间的关系，实现管理会计决策职能的进一步发展。

作者单位：榆林神华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参考文献

1. 顾洁. 企业财务管理创新分析. 现代商贸工业, 2013 (13)
2. 郭智渊、苏玉娟. 转型创新: 中国煤炭企业发展的理论与策略. 人民出版社2011 (03)
3. 于淑莉. 信息时代如何加强财务会计工作创新管理. 科技创新与应用. 2012 (13)
4. 杨淑娥、金帆. 关于公司财务治理问题的思考. 会计研究. 2002 (12)

程序理性与结果理性在绩效管理中的演进研究

■ 高欣

摘要

我国经济增速由高速换挡到中高速增长,必然引发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增速驱动力也将转变为创新驱动,进而影响我国企业的绩效评价目标和评价方式。本文阐述了企业绩效评价中程序理性与结果理性的定义、表现和成因,分析了经济下行时期对企业绩效管理的影响,进而探讨了企业绩效管理中程序理性与结果理性的有机融合,即突出创新驱动、理性解决业务转型、差异化评价绩效、业绩增长持续性等。

关键词

绩效评价 程序理性 结果理性 经济增速 业绩管理

一、引言

从GDP增速看,我国经济发展在三十年内形成了倒N字形趋势,1993年至1999年期间,经济增速快速降低,1999年至2007年期间快速提升,并且达到14.2%的超高增速,而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我国经济也受到一定影响,增速逐渐走低。但是就经济生产总值规模看,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74万亿,甚至超过了GDP世界排名第三至第五的日、德、英三国的生产总值之和。我国经济增速进入下行通道的经济背景下,对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调整的转变也是必然,参照中央对经济新常态的解读,我国经济结构将逐步优化,经济增长将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这意味着,我国企业的经营环境将面临巨大改变,进而深入影响我国企业的绩效评价目标和评价方式。

二、企业绩效评价中的程序理性与结果理性

在企业绩效评价中,结果理性是指在会计准则和企业财务制度等条件和行为限定范围内,当绩效管理的行为能够满足利益相关者的目标时,绩效管理的行为就是结果理性

的。结果理性的重点在于绩效管理的结果符合目标要求,而不在于绩效结果的形成过程。相对应的,程序理性是指绩效管理的行为要符合会计准则和企业财务制度等秩序规范标准,即绩效管理的行为要合理、合法、合规。程序理性强调的是绩效管理的行为过程要理性,重点在于行为过程是否符合规范标准。

从定义可以看出,程序理性和结果理性的差异在于关注重点不同。结果理性的关注点在于结果的理性,即重点在于结果对既定目标的满足程度,而不会关注结果产生的行为;而程序理性强调的是规范的行为程序,只要保证行为的理性,就会按照因果关系得到可以接受的结果。

在当前我国企业绩效管理中,多数企业注重业绩结果,一切以业绩论成败,而不注重业绩形成过程,更不会注重产生业绩的行为效果,极可能造成绩效结果的不理性。按照有限理性理论假说,企业管理者和员工很难在业绩考核目标下考虑企业长远利益,管理者和员工都容易产生短视行为,为了眼前的绩效考核而损害公司长远利益,最终将

导致经营结果的不理性。再者，企业过于关注短期绩效结果，薪酬奖励、升职加薪等都以短期业绩为标准，极可能会忽略绩效提升的影响因素，业绩的长期持续性就缺少支撑因素，也将引发长期业绩结果的不理性。最后，短期绩效的结果很容易迷惑投资者或者决策者等利益相关者，使投资者和决策者忽略绩效提升的决定因素，一旦业绩降低，也很难发现导致业绩降低的影响因素，而且业绩降低的趋势结果已经难以改变。



从结果理性为主的绩效评价成因看，我国企业结果理性为主的绩效评价主要是由资本市场运行机制、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和企业转制等历史因素造成。虽然从西方管理学理论看，结果是一系列程序的结果，程序的理性会产生结果理性，但是从国内外的管理实践看，程序理性也未必会产生结果的理性。例如，美国建立了非常完善的审计制度，有一套非常完整的会计准则，而且法律和商业环境也比较完善，但是在层层的外内外审核监管下，法尔莫公司仍然利用存货虚增利润、获取巨额资金，结果法尔莫公司破产，提供审计服务的会计事务所也因此损失三亿美金。在绩效评价方面也是如此，阿克斯公司严格控制基金经理的仓位、严格控制止损线、禁止交易员违规操作、严格控制交易权限等，确保程序理性、集中资本投资优质公司，看似公司执行了严格的程序规定、优化了业绩管理，但是阿克斯公司的业绩并未得

到提升，仍然出现下滑趋势。因此，在企业绩效管理实践中，程序理性不能保证结果理性。

整体来看，我国企业绩效管理中多数注重业绩结果、忽略程序规范，但国内外的管理实践也表明，仅仅注重程序理性也无法保证绩效结果理性，因此应当充分考虑利益相关者的诉求，重构企业绩效管理的评价机制。

三、经济下行对企业绩效管理的影响

金融危机爆发前，我国经济维持着高速发展，连续多年经济增速超过两位数，综合国力得到极大提升，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当下我国经济已经平稳切换到中高速发展阶段，近五年经济增速平均在7%左右，虽然经济体量的扩大减弱了经济增速下行的影响，但我国仍面临经济下行压力。随着经济增速变化的还有经济增长方式，我国正经历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升级，经济增长驱动力需要顺势转变。我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是由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在经济下行压力下，我国需要调整经济增长驱动力，转变为以科技创新、金融创新等为主的创新驱动，对我国企业绩效管理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首先，经济下行期的经营目标转变。传统的企业经营目标主要包括扩大企业规模、提高资本投资收益、提高利润率等，从结果理性为主的绩效评价将引导管理者着重提升短期的绩效结果。而经济下行期，国家更加注重资源利用率、环保影响和资源能耗等目标，已经确立了建设节能环保型社会的目标，出台了《环境保护法》《节约能源法》和《清洁生产促进法》等法律法规，在税收优惠和产业扶持方面也限制高能耗产业和高污染企业。因此，企业应当顺应国家政策和市场需求，转变经营目标，着重于降低能耗、节能环保生产等经营目标，理性地淘汰落后技术和老旧设备等，虽然这可能导致企业短期内的业绩结果不理想。此外，经济下行会引起法律和商业环境的变化，企业应稳定扩大符合国家发展规划的业务，着重于挖掘自身优势并固化成为核心竞争力，逐步建立完善的工作流程和相应的内部控制制度，确保内部工作细节的合理有序。

其次，经济下行期对企业会计信息准确性的要求更高。经济环境的变化会放大财务

管理细节的影响力，比如预算管理和资金管理。我国当下货币政策稳健中性，但是银行业的贷款业务却是稳中趋紧，许多公司的资产负债率都屡创新高，甚至部分中小企业不断加杠杆地扩大企业规模、抢占市场份额，如果不提高财务信息的准确性、加强财务管理和资金风险管控，一旦市场出现波动，就极易出现资金链断裂、利润大幅下降、库存积压等问题，而这些都可能导致一个公司由盛转衰、甚至破产。从企业实践来



看，近几年加杠杆扩大生产的李宁、美特斯邦威、威业家具、一丁集团等，都因此出现了业绩大幅下滑的危机。准确的会计信息可以为决策者和管理者提供风险警示，企业就能够适当规避风险或缓解风险，也能提供更准确的经营效果分析。

最后，经济下行期的企业投资机会掌控。我国经济增速下行不仅仅有风险，也会带来机遇，特别是产业结构升级为企业创造了新投资机会。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互联网+教育”、“互联网+金融”、“互联网+医疗”等顺势出现，企业应当凭借现有优势、快速融入社会发展趋势，理性筛选投资机会，注重投资质量的提升和自身经营结构的优化，以此实现长期绩效结果的提升。

四、企业绩效管理中程序理性与结果理性的有机融合

基于企业绩效评价中的程序理性与结果理性的表现和成因，经济下行对企业绩效管理的影响分析，本文提出在面临经济下行压力时，企业绩效管理中结果理性可以与程序理性有机融合的途径，即突出创新驱动、理性解决业务转型、差异化评价绩效、业绩增长持续性等。

1. 突出创新驱动

传统的企业绩效评估体系中普遍包含技术创新指标，部分企业评价体系中还包含模式创新等指标，但是创新指标的权重普遍偏低，是否重视创新、实践创新对绩效结果的影响甚微，因此应当增加创新指标的权重，彰显创新驱动力的重要性。比如，互联网等高科技企业应当增加专利增加量指标的权重，使员工重视创新、积极申报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对于工业机器制造企业、新能源汽车制造企业等高端制造业，还应当增加外观专利增加量指标的权重，使技术部门重视外观创新等。在知识产权能力评价外，还可以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引入合作创新能力评价指标、创新资源投入指标、创新价值实现指标等。合作创新能力评价可以选择产学研合作强度、合作申请专利数量、联合研发项目规模等指标；创新资源投入评价可以选择研发人员比例和研发经费占比等指标；创新价值实现评价可以选择新产品销售额占比、新产品市场占比、本土品牌或商标数量等。从评价指标设定和权重设定角度增加创新类指标及权重，既可以引导企业重视创新管理，也可以将绩效管理引向创新驱动。

2. 理性解决业务转型

即强调落后产能、过剩产能的解决进度。我国钢铁、水泥、煤炭、石化等行业都存在产能过剩或产能落后问题，而且落后的产业普遍具有高污染、高能耗等特征。虽然国家政策支持淘汰落后产能、限制产能过剩的行业，但是在企业生存的前提下，应当逐步解决这些问题，在绩效评估体系中应当强调落后产能、过剩产能的解决进度，比如设定年度减少落后产能规模、限制过剩产能业务规模、减产损失、设备折旧处置损失等。企业应当响应国家号召、尽快转型，避免产业转型过慢或者过快而引发的企业经营难以持续等问题。

3. 注重差异化评价绩效

在经济下行、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

升级背景下,企业需要重视绩效结果生成因素的评价及权重,重视绩效结果形成过程的理性。企业规模及扩张速度、短期利润率、短期资产年收益率等不应再作为绩效评价的重中之重,且不同企业应当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将发展质量等作为重点评价指标,比如,企业可以将主营业务收现率、自有品牌影响力、资产流动性、无形资产增长率或成本费用利润率等纳入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给予不同的权重,以便评价企业的发展质量。此外,要注意考虑到企业现有规模和实际经营情况,如果企业规模较小、发展缓慢,应当化繁为简、建立确保程序理性的评价制度,明确符合企业当下实际情况的差异化绩效评估体系即可。对于大中型企业,需要反其道而行之,不但要建立完善的绩效评价框架结构,还要建立相应的抑制各级管理者短视的监督体系。经济下行对各行各业的影响力也不相同,各个企业还需要注重绩效评价与企业发展阶段的匹配度,以便使绩效评价能真正促进企业发展。

4. 着重于业绩增长持续性

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升级将是长久的国家战略,也就意味着经济下行压力将持续存在于“十三五”期间,而融资环境也限制着我国多数中小企业的发展速度,因此我国多数企业需要面临着长期业绩增长缓慢的压力。然而,企业高管薪酬和会计收益的持续之间存在冲突,高管任期内需要绩效达标才能取得分红、股权等,部分管理层会操纵盈余管理实现会计收益达标,因此企业应当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将长期业绩发展等作为重点评价指标,比如,企业可以将资产可持续性、固定资产结构性、应收账款周转率、新产品销售比率等纳入绩效评价指标体

系,以便评价企业的长期业绩发展能力。着重于企业绩效增长持续性也会帮助投资者和决策层更好地稳定企业发展、规避快速扩张带来的经营风险,对于创建我国百年品牌和规模连锁企业都是非常有益的。只有将程序理性与结果理性有机的融合在绩效评价管理中,才能真正成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

总之,根据国内外发展经验看,我国经济增速面临下行压力是必然的,对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调整的转变也是必然的,参照中央对经济新常态的解读,我国经济结构将逐步优化,经济增长将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对企业经营目标、绩效评价等也会产生影响,因此企业绩效评估管理也要坚持从结果理性转变到程序理性和结果理性有机融合,即增加创新指标权重、理性解决业务转型、差异化评价绩效、重视业绩增长持续性。

■ 基金项目: 山西省社科联项目: 煤炭经济转型期山西煤炭企业全面风险管理研究(项目编号SSKLZDKT2012145)

■ 作者单位: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 刘冰, 李长军. 上市公司企业绩效测度与评价—基于证券市场的经验检验. 商业时代. 2016(21)
2. 林建浩, 王美今. 新常态下经济波动的强度与驱动因素识别研究. 经济研究. 2016(05)
3. 吴锡皓, 吴朝晖, 李广. 相对业绩评价机制与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研究.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16(03)
4. 冯巧根. 论管理会计的工具理性. 会计之友. 2016(04)
5. 崔济麟. 基于模糊神经网络的煤矿安全管理绩效评价. 电子设计工程. 2016(14)
6. 马文超, 张春景. 会计与会计教育: 从整体主义到个人主义. 会计与经济研究. 2015(03)
7. 刘淑华. 会计职业判断有限理性分析及治理. 会计之友. 2015(06)
8. 诸波, 干胜道. 市场竞争程度、经营战略与业绩评价指标选择. 会计研究. 2015(02)
9. 张蕊. 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业绩评价问题研究. 会计研究. 2014(08)
10. 袁广达, 俞雪芳, 袁玮. 企业生态文明建设能力财务评价指标的理论设计.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14(07)
11. 谢志华. 论会计的经济效应. 会计研究. 2014(06)

企业所得税权责发生制的例外情形

■ 翟涛

企业会计核算应遵循权责发生制。所谓权责发生制假设,是指凡是当期已经实现的收入和已经发生或应当负担的费用,不论款项是否收付,都应当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凡是不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即使款项已经当期收付,也不应该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虽然我国税制采取以权责发生制为主,但从纳税必要资金、横向配比等方面的考量,企业所得税对特殊情况下需要实施收付实现制。也就是说,不执行权责发生制原则的税收事项,须有明文规定,否则按权责发生制原则处理。本文对企业所得税法不执行企业会计制度权责发生制的主要情形分析如下。

一、收入类不执行企业会计制度权责发生制的情形

1. 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的确认。会计上,企业权益性投资应在每年末,按有关规定(区分成本法和权益法),计算应享有(或分担)的被投资单位当年实现的净利润(或亏损)的份额,确认投资收益(或损失),并相应调整投资的账面价值。但在税法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企业所得税法若干税收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10〕79号)第四条关于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收入确认问题规定:“企业权益性投资取得股息、红利等收入,应以被投资企业股东会或股东大会作出利润分配或转股决定的日期,确定收入的实现。被投资企业将股权(票)溢价所形成的资本公积转为股本的,不作为投资方企业的股息、红利收入,投资方企业也不得增加该项长期投资的计税基础。”也说是说,税法不承认会计上按权益法核算的投资收益,被投资企业的利润分配日也就是投资方权益性投资收益的确认日。因此,被投资方实现净利润时,按投资方确认的投资收益调减所得,反之调增;被投资方宣告分配利润时,按投资方冲减的投资成本调增投资收益,同时从免税收入角度再调减相同金额的所得。

举例:A公司分别购入甲、乙企业各25%的

股权,采取权益法核算。假设A公司2013年利润总额为100万元,甲企业2013年实现利润100万元,乙企业亏损60万元,甲企业宣布分配2012年度利润共计88万元,A公司可分得22万元。会计上,A公司确认投资甲企业取得投资收益25万元($100 \times 25\%$),确认投资乙企业应分担的投资损失15万元($60 \times 25\%$),并计入当年的利润总额10万元($25 - 15$)。税法规定,A公司持有的甲、乙企业股份期间,被投资企业宣布分配的利润或当年的亏损,税收不予确认。当年被投资企业宣布分配的股息22万元,应确认为投资收益,符合税法规定条件的,可确认为免税收入。

2. 利息收入的确认。对于利息收入的确认,会计上遵循的是权责发生制原则。即属于当期的收入,不论款项是否收到,均作为当期的收入。税法上,利息收入按照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应付利息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例如,某企业将资金贷出,合同约定期限3年,每年利息2万,按照合同约定开始日一次性支付利息6万元。会计上,该企业于贷款期开始日将2万元记入收入。但税法规定,第一年该企业应调增所得4万元,第二、三年各调减所得2万元。

3. 租金收入的确认。会计上,对经营租赁租金收入按照权责发生制确认收入的实现。税法上,租金收入按照合同约定的承租人应付租金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确认租金收入时,款项收取与否不是关键,只要合同约定了收款日期无论约定收款期是否收到款,也不管收入是在什么时候取得的,都要确认为当期收入,不能按租金收入的相应归属期间分期计算收入。例如,某企业于2011年8月出租设备一台,合同约定租期2年,租赁期开始日一次性支付租金36000元。会计上,该企业2011年只确认租金收入5000元,2012年、2013年分别确认租金收入12000元、7000元。税法上,这笔租金36000元应全部记入2011年度,而不按受益年度进行分配。因此,2011年度应调增所得31000元,2012年调减所得12000元,2013年调减所得7000元。另外,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企

业所得税法若干税收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10〕79号)第十九条的规定,企业提供固定资产、包装物或者其他有形资产的使用权取得的租金收入,应按交易合同或协议规定的承租人应付租金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其中,如果交易合同或协议中规定租赁期限跨年度,且租金提前“一次性”支付的,出租人可对上述已确认的收入,在租赁期内,分期均匀计入相关年度收入,与会计收入确认一致。

4. 特许权使用费收入的确认。会计上,对特许权使用费收入按照权责发生制确认收入的实现。税法上,特许权使用费收入按照合同约定的特许权使用人应付特许权使用费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会计上,特许权使用费收入的确认、计量同利息和租金收入基本一致,纳税调增时参照执行。

5. 捐赠收入的确认。企业取得的货币性资产捐赠,应按实际取得的金额,借记“现金”或“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营业外收入——接受捐赠货币性资产价值”科目;企业取得的非货币性资产捐赠,应按会计制度及相关准则规定确定入账价值,借记“库存商品”、“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长期股权投资”等科目,一般纳税人如涉及可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按可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借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按接受捐赠资产和税法规定确定的入账价值,贷记“营业外收入——接受捐赠非货币性资产价值”科目,按企业因接受捐赠资产支付或应付的金额,贷记“银行存款”、“应交税费”等科目。税法上,接受捐赠收入按照实际收到捐赠资产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即捐赠收入按照收付实现制原则确认,以款项的实际收付时间作为标准来确定当期收入和成本费用。会计对捐赠收入的确认基本与税法一致,不需纳税调整,除非收入金额确认违背了公允价值原则。

6. 分期收款方式销售收入的确认。税法上,企业以分期收款方式销售货物的,按照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会计准则规定,对具有融资性质的分期收款销售货物(货款回收期超过3年的),企业应按照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的公允价值确定收入金额。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与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应当在合同或协议期间按实际利率法

进行摊销,并相应冲减财务费用。例如,2011年1月1日,甲公司以分期收款方式向乙公司销售一台设备,合同约定销售价为3000万元,分三次于2011年12月31日、2012年12月31日、2013年12月31日支付货款,即每年年末支付1000万元,增值税的销项税额510万元于2011年1月1日一次付清。该设备现销价款为2624.3万元(即按年利率7%分3年付款,每年支付1000万元为所折算的年金现值),成本为2100万元。甲公司在2011年1月1日商品发出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会计上,2011年1月1日销售实现时确认收入3000万元,计提销项税金510万元。税法上,企业应分别在2011年末、2012年末和2013年末分期确认商品销售收入各1000万元,同时分3期确认产品销售成本各700万元。会计所确认的融资收益,税法不予确认,不计入纳税所得额。

7. 采取产品分成方式取得收入的确认。税法上,采取产品分成方式取得收入的,按照企业分得产品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其收入额按照产品的公允价值确定。会计上,按权责发生制和产品账面价值为收入额确定标准。因此,对产品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调增所得,但企业转让或领用该产品时要以相同金额调减所得。例如,某公司提供一块土地(市场价500万元)与某房地产公司提供资金进行合作建房,该工程于2011年2月开始动工,2013年10月竣工,竣工结算后,该公司于2013年11月分得一栋楼作为办公楼使用,该楼的市场价1000万元。那么,该公司2013年11月应确认收入1000万。

二、成本类不执行企业会计制度权责发生制的情形

1. 工资税前扣除。《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企业发生的合理的工资、薪金支出,准予扣除。工资、薪金是指企业每一纳税年度支付给在本企业任职或者受雇的员工的所有现金形式或者非现金形式的劳动报酬,包括基本工资、奖金、津贴、补贴、年终加薪、加班工资,以及与员工任职或者受雇有关的其他支出。

股权激励也同样属于支付给任职或者受雇的员工的劳动报酬范畴,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我国居民企业实行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18号)的规定,上市公司

依照《管理办法》要求建立职工股权激励计划，并按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在股权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时，按照该股票的公允价格及数量，计算确定作为上市公司相关年度的成本或费用，作为换取激励对象提供服务的对价。上述企业建立的职工股权激励计划，其企业所得税的处理，按以下规定执行：（一）对股权激励计划实行后立即可行权的，上市公司可以根据实际行权时该股票的公允价格与激励对象实际行权支付价格的差额和数量，计算确定作为当年上市公司工资薪金支出，依照税法规定进行税前扣除。（二）对股权激励计划实行后，需待一定服务年限或者达到规定业绩条件（以下简称等待期）方可行权的。上市公司等待期内会计上计算确认的相关成本费用，不得在对应年度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时扣除。在股权激励计划可行权后，上市公司方可根据该股票实际行权时的公允价格与当年激励对象实际行权支付价格的差额及数量，计算确定作为当年上市公司工资薪金支出，依照税法规定进行税前扣除。（三）本条所指股票实际行权时的公允价格，以实际行权日该股票的收盘价格确定。

2. 保险的税前扣除。《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财政部财会〔2014〕8号）的规定：企业为职工缴纳的医疗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等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应当在职工为其提供服务的会计期间，根据规定的计提基础和计提比例计算确定相应的职工薪酬金额，并确认相应负债，计入当期损益或相关资产成本。《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企业依照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规定的范围和标准为职工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等基本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准予扣除。企业为投资者或者职工支付的补充养老保险费、补充医疗保险费，在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内，准予扣除。《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企业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为特种职工支付的人身安全保险费和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可以扣除的其他商业保险费，可以扣除。《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企业参加财产保险，按照规定缴纳的保险费，准予扣除。

3. 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的税前扣除。会计准则规定，企业按规定提取的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应当在职工为其提供服务的会计期间，根据规定的计提基础和计提比例计算确定相应的职工薪酬金额，并确认相应负债，计入当期损益或相关资产成本。《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企业拨缴的工会经费，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2%的部分，准予扣除。《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企业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2.5%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

4. 未按规定取得发票的税前扣除。按照会计核算权责发生制原则，属于当期发生的费用，不论是否取得发票，均确认为当期成本费用，对货到单未到可以采取估价入账。但在企业所得税上，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34号第六条）的规定，企业当年度实际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及时取得该成本、费用的有效凭证，企业在预缴季度所得税时，可暂按账面发生金额进行核算；但在汇算清缴时，应补充提供该成本、费用的有效凭证。

以上未扣除费用，在次年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期间支付或取得合法凭据的，可以税前扣除。

三、预提费用不执行企业会计制度权责发生制的情形

预提费用是指企业预提但尚未实际支付的各项应付未付的费用。其实质是在权责发生制原则下，属于当期的费用，尽管尚未支付，但应计入当期损益。新的《企业会计准则》已经取消“预提费用”科目，将“预提费用”科目原来核算的内容归集到了“预计负债”、“应付利息”、“其他应付款”科目核算。

1. 计提大修理费不能税前扣除。企业固定资产大修理间隔的时间较长，在未进行大修理时，不可能产生大修理费用，但大修理费用应在固定资产两次大修受益期间内进行预提，作为当期费用。按期预提计入费用的金额，同时也形成一笔流动负债。按权责发生制原则扣除的费用并不是预提的费用，而

是实际发生的费用，其发生金额是准确的，可以确定的。而预提的费用是指今后可能发生的但现时尚未发生的费用，其预提费用是不符合税前扣除原则的，要等到实际发生时才能按规定扣除。

2. 计提的弃置费用应区分情况税前扣除。《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固定资产》应用指南对固定资产的弃置费用作出了规定，即所谓的弃置费用是指根据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国际公约等规定，企业承担的环境保护和生态恢复等义务所确定的支出，应当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的规定，按照现值计算确定应计入固定资产成本的金额和相应的预计负债。油气资产的弃置费用，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7号——石油天然气开采》及其应用指南的规定处理。《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企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有关规定提取的用于环境保护、生态恢复等方面的专项资金，准予扣除，上述专项资金提取后改变用途的，不得扣除。例如，甲公司经国家批准2011年12月31日建造完成某项工程并交付使用，建造成本为250亿元，预计使用寿命40年，根据法律规定，该工程将会对当地的生态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公司应当在该设施使用期满后将其拆除，并对造成的污染进行整治，预计产生弃置费用25亿元，适用10%折现率，现值系数0.0221，弃置费用现值即为 $25\text{亿} \times 0.0221 = 5525$ （万元）。根据以上规定，甲公司计提的5525万元弃置费用允许计入固定资产的计税基础，在以后使用过程中通过折旧费用税前扣除。如上述企业计提的固定资产弃置费用无相关的法律法规依据的，则不可税前扣除。

3. 计提的售后服务费不能税前扣除。依据或有事项准则规定，出于谨慎性原则考虑，企业对销售商品提供售后服务预计将要发生的支出满足预计负债确认条件时，应在销售当期确认为费用，同时确认为预计负债。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规定，与销售产品相关的支出应在发生时税前扣除。例如，甲公司2011年销售手机100万台，根据权责发生制及谨慎性原则，年底按每台30元计提售后服务费，计提销售费用3000万元，待下年实际发生维修服务时冲减预计负债。那么甲公司计提的3000万元销售费用在汇算清缴时要作纳税调增，待实际发生时再作纳税

调减。

4. 未经核定的准备金支出不能税前扣除。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十条及实施条例第五十五条规定，企业依据会计准则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损失（包括存货跌价准备、固定资产减值准备、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投资性房地产减值准备、无形资产减值准备、在建工程减值准备等）、坏账准备（金融、保险机构除外）未经国务院财政部、税务主管部门核定不允许税前扣除，汇算清缴时应作纳税调整。

5. 或有事项不允许税前扣除。或有事项是指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其结果须由某些未来事项的发生或不发生才能决定的不确定事项。企业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规定对未决诉讼、亏损合同、重组、因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给予补偿而确认的预计负债年底时若尚未发生，均属于不确定的支出，税法对资产负债表日确认的或有负债和或有资产税收上不予确认，已计入管理费用、营业外支出、营业外收入的或有负债和或有资产作相应的纳税调整。待实际发生时允许税前扣除。

6. 房地产企业预计费用允许税前扣除的例外情形。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办法〉的通知》（国税发〔2009〕31号）的规定，房地产企业以下四项成本费用可以税前扣除：

（1）土地开发同时连结房地产开发的，属于一次性取得土地分期开发房地产的情况，其土地开发成本经税务机关同意后可先按土地整体预算成本进行分配，待土地整体开发完毕再行调整。（2）外包工程未最终办理结算而未取得全额发票的，在证明资料充分的前提下，其发票不足金额可以预提，但最高不得超过合同总金额的10%。（3）公共配套设施尚未建造或尚未完工的，可按预算造价合理预提建造费用。此类公共配套设施必须符合已在售房合同、协议或广告、模型中明确承诺建造且不可撤销，或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必须配套建造的条件。（4）应向政府上交但尚未上交的报批报建费用、物业完善费用可以按规定预提。物业完善费用是指按规定应由企业承担的物业管理基金、公建维修基金或其他专项基金。

作者单位：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营改增”后甲供工程计税方法研究

■ 赵子悦 李晓 李文美

摘要

自2016年5月1日起,建筑业等四大行业被纳入“营改增”试点范围。由于建筑工程中普遍存在甲供材情况,使得建筑企业可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大幅减少,企业税负增加。国家税务总局对此允许甲供工程中的建筑企业综合运用“简易计税”与“差额计税”两种计税方法,从而减免企业税负。由此产生了不同计税方法下的税务差异问题。本文旨在对甲供工程中“一般纳税方法”、“简易计税”的税负平衡点进行研究,从自身测算税负、发包商测算税负和合并测算税负三个方面进行税务筹划。

关键词

甲供材 税务筹划 营改增 简易计税

2016年3月24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文件,以下简称36号文),标志着自2016年5月1日起,建筑业等四大行业被纳入试点范围,营业税正式退出历史舞台。然而,建筑施工企业在“营改增”的具体实施过程中会出现行业特有问題,导致一般计税方法下,税负大幅上升,其中甲供材限制流转抵扣更是一项改革难点。

建筑合同中常常约定由甲方(即发包商)提供大型设备、工程材料,主要是水泥、钢筋、木材和陶瓷等大宗材料,甲方直接与材料、设备的供货方进行结算,不再由乙方(建筑企业)采购,这样的结算方式称为甲供材,使用这种结算方式的工程称为甲供工程。对于发包商而言,甲供材料可以避免施工方赚取材料和合同价格之间的差价。对于建筑企业而言,可以减少材料的资金投入和资金垫付压力,但纳税时缺少了购买材料和设备的进项税额,这就导致增值税大幅上升。

为此,36号文允许这部分建筑企业综合运用“简易计税”与“差额计税”两种计税方法。由此引发纳税差异,建筑企业对于计税方法的选择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由于增值税链条打通,建筑企业的销项

税额构成了发包商的进项税额,因此,建筑企业的计税方法也影响着发包商的税负,两者合并税负的测算有助于双方进行纳税筹划。

一、测算建筑企业自身税负

36号文中规定:一般纳税人为甲供工程提供的建筑服务,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

对于建筑企业的计税方法选择,下文比较简易计税和一般计税,测算其税负平衡点。变量说明如表1所示。

1. 简易计税

$$\begin{aligned} EF &= PC - a \times PC = (1 - a)PC \\ VAT_1 &= OVAT_1 = EF \div (1 + 3\%) \\ &\quad \times 3\% = 2.91\%EF \\ VAT_1 &= OVAT_1 = 2.91\% \times EF \\ &= 2.91\%(1 - a)PC \quad (1) \end{aligned}$$

2. 一般计税

$$\begin{aligned} EF &= PC - a \times PC = (1 - a)PC \\ IVAT_1 &= \Delta a \times PC \div (1 + 17\%) \\ &\quad \times 17\% = 14.53\% \Delta a \times PC \\ OVAT_2 &= EF \div (1 + 11\%) \\ &\quad \times 11\% = 9.91\%EF \\ &= 9.91\%(1 - a)PC \\ VAT_2 &= OVAT_1 - IVAT_1 \\ &= 9.91\%(1 - a)PC \\ &\quad - 14.53\% \Delta a \times PC \quad (2) \end{aligned}$$

3. 税负平衡点

表1主要变量符号说明

编号	名词	变量
1	总工程造价	PC
2	合同工程款	EF
3	收入	NI
4	成本	CT
5	利润	P
6	增值税	VAT
7	增值税税率	T
8	进项税额	IVAT
9	销项税额	OVAT
10	甲供材料占总造价比例	a
11	自买材料占总造价比例	Δa

注：（1）此处默认甲供工程所有材料增值税额为17%；（2）收入项只用于核算扣出增值税的余额，不包括其他税目。

简易计税与一般计税的税负平衡点，即（1）式等于（2）式。

$$VAT_1 = VAT_2$$

$$\Delta a / (1 - a) = 48.21\%$$

所需进项税额比例 = $48.21\% \div (1 + 17\%) \times 17\% = 7\%$

这意味着甲供材料占总造价为a的情况下，想要一般计税税负与简易计税持平，还需有48.21%的费用可供抵扣，也就是说进项税额需要达到总价款的7%。这也就说明在甲供材情况下，如果进项税额未达到总价款的7%时，应该选择简易计税方法进行税务筹划。

虽然，我国对于甲供工程中由发包商提供材料的份额未作明确规定，但是，甲供工程的存在本身就是为了防止乙方赚取实际材料与合同价格之间的差价，对于四大材（钢筋、混凝土、水泥、木材）的把控极其苛刻，而四大材又是可抵扣进项税额的主要组成部分。更何况，劳务成本和沙石等项目进项税额难以抵扣，这就让达到税负平衡点更加困难。所以，对于建筑企业来说应该选择简易计税方法纳税。

二、测算发包商税负

因发包商的销项税额并不受甲供材影响，所以测算发包商税负时，只需要对进项税额进行分析。

甲供材情况下，发包商进项税额主要由两部分构成——建筑企业的销项税额以及自行购买材料和雇佣劳动可抵扣的税额，所以建筑企业计税方法的选择影响着发包商进

税额的多少。

1. 建筑企业选择简易计税

如果建筑企业选择简易计税，那么发包方可抵扣的税额就只有建筑企业简易计税的销项税额和其自身购买的材料进项税额。

$$\begin{aligned} IVAT_2 &= OVAT_1 + a \div (1 + 17\%) \times 17\%PC \\ &= 2.91\% \times EF + 14.53\%aPC \\ &= 2.91\%(1 - a)PC + 14.53\%aPC \\ IVAT_2 &= 2.91\%PC + 11.62\%aPC \quad (3) \end{aligned}$$

2. 建筑企业选择一般计税

如果建筑企业选择一般计税方法，那么发包方可以抵扣的税额是建筑企业一般计税的销项税额和其自身购买的材料进项税额。

$$\begin{aligned} IVAT_3 &= OVAT_2 + a \div (1 + 17\%) \times 17\%PC \\ &= 9.91\%(1 - a)PC + 14.53\%aPC \\ IVAT_3 &= 9.91\%PC + 4.62\%aPC \quad (4) \end{aligned}$$

3. 进项税平衡点

使 $IVAT_3 = IVAT_2$ ，即（3）式与（4）式相等。

$$\begin{aligned} 2.91\%PC + 11.62\%aPC \\ \bar{a} &= 9.91\%PC + 4.62\%aPC \end{aligned}$$

也就是说，要使发包商的进项税额二者相等，则发包商要负责所有的劳务和材料，完全取缔建筑企业的增值环节，但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也就是说 $IVAT_3 > IVAT_2$ 等式恒成立，对于发包商而言，建筑企业选择一般计税方式更优，新政策对于发包商而言，减少了可抵扣的进项税额。同时，如果建筑企业为理性纳税人的话，就会选择简易计税，在这个前提下，发包方可以尽可能增加a，即自己提供的设备和材料占比，取得更多的可抵扣进项税额，从而进行税务筹划。

三、合并测算税负

根据前面从建筑企业和发包方两个角度来分析可以看出，政策在实际落实的情况中，二者倾向于不同的选择，甲供工程的工程比例越高，建筑行业选择简易计税的情况就越高，但是从发包方的角度来看，其更希望建筑企业选择一般计税方法。

由此，就引发出一个新的问题，如果把承包方和发包方看成一个整体，那么整体税负在不同的计税方法下会有怎样的变化。由于涉及到成本发生改变，销项税或者进项税作为绝对数并不能很好反应企业所承担的税负变化，只能用相对数税率进行计算，但是税率的分子和分母都会有变量，不够直观。

所以本部分的核算在同样的工程总造价的情况下，对企业所负担的成本和赚取的收入进行比较。

1. 简易计税

建筑企业的销售收入为：

$$\begin{aligned} NI_2 &= (1-a) \times PC \div (1+3\%) \times (1-3\%) \\ &= 94.19\%(1-a)PC \end{aligned}$$

发包商的进项税额即（3）式：

$$IVAT_2 = 2.91\%PC + 11.62\%aPC$$

发包商的实际成本为：

$$\begin{aligned} CT_1 &= (1-a)PC + a \times PC \\ &\div (1+17\%) \times (1-17\%) \\ &= PC - aPC + 70.94\%aPC \\ CT_1 &= PC - 29.06\%aPC \end{aligned}$$

2. 一般计税

承包方的销售收入为：

$$\begin{aligned} NI_3 &= (1-a) \times PC \div (1+11\%) \\ &= 90.1\%(1-a)PC \end{aligned}$$

发包商的进项税额即（4）式：

$$IVAT_3 = 9.91\%PC + 4.62\%aPC$$

发包商的实际成本为：

$$\begin{aligned} CT_2 &= (1-a)PC + a \times PC \\ &\div (1+17\%) \times (1-17\%) \\ &= (1-a)PC + 70.91\%aPC \\ &= PC - 29.09\%aPC \end{aligned}$$

3. 对比分析

比较 NI_1 和 NI_2 时可以发现，对于建筑企业而言，不同的计税方式，销售收入明显不同，一般计税方法下的销售收入要比简易计税方法下少 $4.09\%(1-a)PC$ 。而对于发包商而言，虽然实际成本变化不大，但是可抵扣的进项税额差距很大，这一点在第三部分里已经测算过了， $4.09\%(1-a)PC$ 恒成立。

这意味着，建筑企业偏向于选择简易计税方法，而发包商在一般计税方法下得到的优惠更多，此时就产生了税务筹划的空间。甲乙双方可以协商工程价格，共享此空间带来的利润收益。如果选择简易计算，承包方可以适当降低价格，让利给发包商。而在一般计税的情况下，为了保质保量，建议发包商选择监督协议签订和货源选择，而不自行

购买取得增值税发票，因为在建筑企业不做手脚的情况下，甲供材的可抵扣税额和一般纳税基础下的乙方提供的可抵扣税额是一致的，但如果乙方选择了简易计税，增值链条不完整，可抵扣的就会更少。总之，工程的质量和税务减免并非只能选择其一，甲供材的思路可以转换为甲督材，这样更容易达到互利共赢。

四、结论

“营改增”给建筑企业带来的税负变化巨大。对于甲供工程，如果“四大材”完全由发包商提供，进项税额大幅锐减，简易计税与一般计税方法下的税负平衡点难以达到，企业作为理性纳税人，自然会选择使用简易计税。然而，建筑企业的销项税额又恰恰是发包商即甲供材料的进项税额。经过测算，其中存在着整体税负的筹划空间。因此，本文建议甲方从“甲供材”转为“甲督材”合理利用税务筹划空间，在工程款上重新议价调整，从而实现发包商和建筑企业共享税负减免。

■ 本文系2016年国家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项目编号：201610290060）阶段性研究成果。

■ 作者单位：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 王甲国. 建筑业应对“营改增”之策略. 税务研究. 2016（01）
2. 张玉辉. “营改增”对建筑企业的影响和应对措施. 现代企业. 2016（03）
3. 徐瑶. “营改增”对我国建筑企业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建筑经济. 2016（05）
4. 王利娜, 张伟. 建筑企业营改增焦点问题分析. 财务与会计. 2016（15）
5. 高桦. 我国建筑业营改增相关问题研究.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5.

合同能源管理业务会计核算典型案例解析

■ 程晓刚

摘要

随着节能环保产业成为我国实现绿色发展的支柱产业,节能服务公司逐步受到资本市场青睐并纷纷登陆资本市场,该类企业大量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在尚无统一、明确的会计准则指引前提下,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受到极大挑战,不利于资本市场稳健发展并保证会计准则的权威性。本文结合一家拟在新三板挂牌公司合同能源管理业务典型案例,在剖析和对比不同会计核算方法后提出较为可行的处理方案,以便为类似合同能源管理业务的会计处理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

合同能源管理 会计处理 可比性

合同能源管理(Energy Performance Contracting),简称EPC)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是一种基于市场的节能新机制。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将合同能源管理定义为:节能服务公司与用能单位以契约形式约定节能项目的节能目标,节能服务公司为实现节能目标向用能单位提供必要的服务,用能单位以节能效益支付节能服务公司的投入及其合理利润的节能服务机制。

近年来,随着国家加快推进节能减排工作,相关政府部门加大对合同能源管理企业的扶持力度,国内节能服务行业市场规模迅速扩大,众多节能服务公司进入资本市场,合同能源管理业务的会计核算问题日益引起社会公众和投资者的广泛关注。

合同能源管理业务较为特殊,具有多种运营模式,包括节能效益分享型、节能量保证型、能源费用托管型、融资租赁型、混合型等不同类型。目前,《企业会计准则》及其指南、讲解、解释等尚未就其会计处理进行明确规范,会计实务中存在多种核算模式,各种会计处理方法差异较大、对会计审计人员的职业判断具有较强的依赖性,给会计信息可比性和资本市场稳健发展带来较大挑战。

本文将拟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即“新三板”)挂牌公司的合同能

源管理业务作为典型案例,针对其会计核算问题进行分析 and 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案例背景

某节能服务公司(乙方)拟在新三板挂牌,其于2014年9月与某钢铁公司(甲方)签订“烧结厂烧结余热利用工程项目合同”,合同约定:

1. 甲方提供项目建设场地、余热资源及各类接入点,乙方负责余热发电项目投资、设计、建设、运行管理等服务。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三台烧结环冷机各设一套余热锅炉装置、一套汽轮发电机组(即“三炉一机”),并设置一个主厂房。

2. 该项目在建造、运行和转让(BOT)的基础上实施,项目建设及投资风险由乙方承担,余热发电收益归乙方所有,甲方以收益分享的方式实现收益。

3. 新建余热电厂建设期1年,运行期8年。合作期内乙方拥有该项目形成的动产、不动产的一切权益(不含土地);合作期满项目相关资产的所有权无偿转让给甲方。

4. 项目运行期内,双方按协议价格就共同确认的当期实际产生的电量计算本期款项,由乙方提供电费增值税发票,甲方支付相应款项。

二、案例解析

1. 观点一：认为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规定的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之混合销售业务进行核算。

节能服务公司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向用能企业提供节能设备、负责安装并提供售后服务，其实质类似于采用分期收款方式销售节能设备并提供后续节能服务的混合销售；由于销售商品部分和提供劳务部分能够区分且能够单独计量，因此销售节能设备应作为销售商品核算，提供节能服务按照提供劳务核算。



2. 观点二：认为应当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2号》规定参照BOT项目处理方式进行处理，按《企业会计准则第15号——建造合同》及《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准则核算。

项目合同明确规定“该项目在建造、运行和转让（BOT）的基础上实施”，节能服务公司需要履行“建造—经营—转移”的完整过程，具有明显的BOT特征，类似于《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2号》规定的企业采用建设经营移交方式（BOT）参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业务。交易合同对节能服务公司的经济影响也与典型的BOT合同一致，二者仅存在法律形式差异。

因此在建造期间，节能服务公司应当就其提供的建造服务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5号——建造合同》确认相关收入和成本；在运营期内，节能服务公司应当按照《企业会

计准则第14号——收入》确认与后续经营服务相关的收入。

3. 观点三：认为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5号——建造合同》进行核算。

从合同能源管理业务模式分析，节能服务公司的主要经营活动包括建造活动和发电运营。由于乙方本身并非一家发电企业，实质为一家专门从事节能环保和合同能源管理的公司，余热发电项目的主要利润来源于公司在节能技术和能源管理领域的专长和经验；公司实际主要为客户建造余热发电装置，并以与余热发电量挂钩的变动对价作为建造合同对价。因此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5号——建造合同》的相关规定进行核算。

本案例中，合同总价款取决于未来8年运营期的实际发电量，由于时间跨度较长，预期经济利益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项目建设阶段建造合同的结果无法可靠估计。因此不能按照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需要根据《建造合同》准则第25条的规定判断成本是否可以收回，分别作出相应会计处理：合同成本能够收回的，合同收入根据能够收回的实际合同成本予以确认，合同成本在其发生的当期确认为合同费用；合同成本不可能收回的，在发生时立即确认为合同费用，不确认合同收入。

4. 认为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中的融资租赁进行核算。

根据合同安排，该合同能源管理业务系节能服务公司按用能企业的要求建造一项特定的固定资产，建设的资产及设施具有专用性，仅供用能企业使用，履行该协议依赖于上述特定资产；该项目合同期为9年，合同期内资产所有权仍归节能服务公司，用能企业拥有使用权，且未来收益不能合理确定。因此可以确定该项协议包含租赁业务。运营期满后项目资产无偿转让给甲方，可以合理推测乙方在运营期内按照合同约定收取的价款实质已经相当于相关资产的公允价值，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中“租赁资产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已经转移给承租人（用能企业）”关于融资租赁的确认标准。

因此，该合同能源管理业务本质上属于融资租赁，与租赁资产相关的风险报酬已经全部转移给承租人（甲方），而乙方通过收取节能经济利益作为租金以回收相关投资价

款，应当按照租赁准则中融资租赁的有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二）讨论与分析

对比上述不同会计处理，均能将合同能源管理业务的商业实质与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相结合进行分析，都具有事实依据和一定的合理性。由于节能服务公司从事合同能源管理业务是提供节能服务解决方案，具有多元化、综合性，与一般混合销售业务、建造合同业务、BOT 业务以及融资租赁业务存在显著区别，需要深入研究、全面分析，从而得出较为合理、公允的会计处理结果。

1. 关于“观点一”，根据项目合同规定，节能工程项目在建设结束、完成安装、试运行成功且验收合格后，项目资产的所有权仍归属节能服务公司（乙方），项目资产的所有权并未实质发生转移。节能服务公司是否能够收回投资并取得合理利润取决于节能项目未来能否创造节能效益，而且节能效益的具体金额取决于项目资产未来实际的发电量，未来实际的发电量具有不确定性，导致收入金额不能可靠计量。因此上述交易不符合混合销售的收入确认条件，不能按“观点一”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准则进行会计处理。

2. 关于“观点二”，《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2 号的通知》（财会[2008]11号）规定，企业采用建设经营移交方式（BOT）参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业务，涉及的BOT业务应当同时满足三项条件：（1）合同授予方为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或政府授权进行招标的企业。（2）合同投资方为按照有关程序取得该特许经营权合同的企业。合同投资方按照规定设立项目公司进行项目建设和运营。项目公司除取得建造有关基础设施的权利以外，在基础设施建造完成以后的一定期间内负责提供后续经营服务。（3）特许经营权合同中对所建造基础设施的质量标准、工期、开始经营后提供服务的对象、收费标准及后续调整作出约定，同时在合同期满，合同投资方负有将有关基础设施移交给合同授予方的义务，并对基础设施在移交时的性能、状态等作出明确规定。

前述项目合同确有规定“该项目在建造、运行和转让（BOT）的基础上实施”，但BOT 业务的合同授予方必须为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或政府授权进行招标的企业，本案例中交

易双方皆非“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或政府授权进行招标的企业”，也未设立单独的项目公司，建造的标的资产也非公共基础设施；BOT 项目建成后项目公司仅取得特许经营权，并不拥有标的资产的所有权，而本合同管理业务中不存在上述特许权。因此，根据经济实质重于法律形式原则，上述合同能源管理业务不能按照“观点二”参照BOT 业务进行会计处理。

66

总之，节能服务企业的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具有多元化特征，尤其进入资本市场融资的企业在会计实务中需要全面分析业务合同，对合同涵盖的业务实质进行合理判断，选用恰当的会计准则；一旦选定会计处理模式，应当将其作为一项会计政策，一贯地运用于企业所有相同或类似交易，不得随意变更，以确保会计信息真实、公允。

99

3. 关于“观点三”，由于合同能源管理业务具有多种运营模式，节能服务企业分享的节能效益可以是变动对价，以运营期内的实际产出为基础进行确定，如本案例所示；也可以是固定对价，比如根据资产建设完成后甲乙双方共同进行一个月测试确定月度节能收益且在运行期内月度节能收益保持不变。因此，合同能源管理核算的争议主要集中于节能服务企业是“自建资产并提供给客户使用”还是“为客户建造资产并提供后续运营服务”，根据前述分析，后者缺乏充足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可行性，因为在建设阶段很难对建造合同的结果做出合理估计，甚至难以确保可以收回成本，而且这种处理模式涉及大量的会计估计和职业判断，将为相关会计核算和审计鉴证带来极大挑战，难以保证会计信息质量。

此外,《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建造合同是指为建造一项或数项在设计、技术、功能、最终用途等方面密切相关的资产而订立的合同。一般来说,判断企业的一项交易是否适用《建造合同》的主要标准为:当买方可以在相关业务开始前指定专业结构元素的设计和/或在建设过程中可以指定重大的结构性变化,则该类业务合同通常情况下应当适用《建造合同》准则,如房地产建造合同。本案例中,用能单位(甲方)只能选择节能服务公司(乙方)所指定的设计选项,仅有有限的能力影响所建造资产的设计,且指定设计相对基本设计仅有轻微变化,因此该类业务合同也不应适用《建造合同》准则。

4.关于“观点四”,该合同能源管理交易依赖于特定资产(即主厂房、三炉一机等节能设备以及依附于该设备的专有技术等),且节能服务公司授予用能企业对建造的节能资产使用的控制权,符合IFRS体系下的IFRIC 4关于《确定一项交易安排中是否包含租赁》所规定的判断一项交易安排中是否包含租赁成份的判断指引,因此该交易可以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

在该交易中,所有的租金都是根据各租赁期的实际发电量计算的或有租金,且租赁结束后资产无偿转让给甲方,因此乙方能否获取报酬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即与租赁资产相关的风险仍由乙方承担,并未实质上转移给承租人(甲方),而且乙方无法对合同期间可获得的节能收益作出合理估计,不能将上述交易认定为融资租赁。因此不能依照“观点四”按《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中的融资租赁进行会计处理。

(三) 会计处理建议

综上,本文建议将案例企业的合同能源管理业务视为节能服务公司自行建造长期资产并为客户提供后续劳务进行会计处理。在合同期内,项目资产的所有权归属于节能服务公司(乙方),且由乙方负责余热发电项

目投资、设计、建设、运行管理等活动,乙方视为自行建设项目资产,确认为自身的固定资产,并提供给甲方使用;项目在运营期内,根据双方事先确定的协议价格就共同确认的当期实际产出电量计算各期节能收益,按照《收入》准则确认电费收入;项目合同期满,节能服务公司向用能企业无偿转让项目资产,视同节能服务公司处置固定资产进行会计处理。具体会计处理如下:

(1) 项目资产的会计处理

建设期内,节能服务公司按照建造成本确认在建工程成本。

在项目资产经验收合格后,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固定资产》在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结转为固定资产并开始计提折旧。

(2) 节能收益的会计处理

运营期内,节能服务公司根据双方事先确定的协议价格就共同确认的当期实际产出电量计算各期节能收益,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确认当期电费收入。

(3) 项目资产处置的会计处理

项目合同期满,节能服务公司向用能企业无偿转让项目资产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固定资产》视同节能服务公司处置固定资产进行会计处理。

三、小结

总之,节能服务企业的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具有多元化特征,尤其进入资本市场融资的企业在会计实务中需要全面分析业务合同,对合同涵盖的业务实质进行合理判断,选用恰当的会计准则;一旦选定会计处理模式,应当将其作为一项会计政策,一贯地运用于企业所有相同或类似交易,不得随意变更,以确保会计信息真实、公允。

作者单位: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企业会计准则2015年版. 立信会计出版社. 2017
2. 财政部会计司编写组. 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 人民出版社. 2010
3.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会计部组织编写. 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案例解析(2016).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6
4. 张连起, 陈奕蔚, 等. 会计学撮要2015——会计审计实务前沿专题研究. 立信会计出版社. 2015
5. 吴迎恺. 关于合同能源管理会计处理的探讨.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12(04)
6. 赵成, 裴志军. 关于对合同能源管理业务收入确认的探析.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14(04)

经合组织成员国权责发生制会计改革情况介绍

■ 翟涛

2017年3月，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联合发布了题为《经合组织成员国权责发生制会计实务与改革经验》的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这次调查2015年11月启动，2016年6月完成，以OECD的全部34个（截至2015年底）成员国为调查对象，采用向各国财政主管机关发放调查问卷的形式，内容涉及OECD国家公共部门会计采用权责发生制的情况、经验与挑战等。摘要如下：

一、OECD国家公共部门财务报告采用权责发生制的情况

（一）总体情况

从调查情况来看，在OECD全部34个成员国中，有25个国家（约占73%）表示其公共部门年度财务报告是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编制的，而在2003年，只有25%的国家这样做。3个国家（约占9%）表示其编制基础正在向权责发生制转变。6个国家（约占18%）表示其仍然采用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编制年度财务报告。

在仍然采用收付实现制的6个国家中，爱尔兰和挪威表示正在考虑是否同时采用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意大利和卢森堡已经计划向权责发生制转变，只有德国和荷兰表示其没有采用权责发生制的计划，但在荷兰，已经有部分机构率先采用了权责发生制。

（二）关于财务报告列报的内容

报告指出，在那些仍然采用收付实现制的国家，以及正在向权责发生制转变的国家中，其公共部门在期末通常只设置一张主要报表，如现金流量表或预算执行差异比较表。这类国家中有一半还披露简化的或不完整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作为主表的补充信息。这类国家提供的财务信息通常不限于现金交易。其中3个国家还提供了现金余额、债务、担保、承诺等信息，这说明这类国家也认识到有必要对资产和负债建立清单并计价。

在那些已经采用权责发生制的国家，尽管权责发生制并没有运用于国际准则所要求的全部主要报表和披露，但是其公共部门财务报告通常能够提供更多的信息。据统计，所有这些国家的财务报告中都包括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编制的资产负债表（或财务状况表）、损益表（或财务业绩表）以及报表附注。除此之外，84%的国家还披露预算执行差异比较

表，76%的国家披露现金流量表，72%的国家披露净资产变动情况表，44%的国家披露管理层评论。这类国家资产负债表中列报的资产和负债范围亦有差别，主要体现在是否列报土地和建筑物、基础设施、应收税款、国防资产、衍生品、养老金负债、社会福利、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相关资产和负债、自然资源和文化遗产。其中，不列报PPP与养老金可能是担心资产负债表中巨额负债不好看。

二、OECD国家公共部门预算编制采用权责发生制的情况

从调查情况来看，在OECD全部34个成员国中，有21个国家（约占62%）在编制预算时采用收付实现制，但其中许多国家在预算中提供债务、承诺和担保的信息；3个国家（约占9%）在编制预算时，部分项目采用权责发生制；10个国家（约占29%）在编制预算时采用权责发生制。

在采用权责发生制的10个国家中，有6个国家编制整套的预测性财务报表；4个国家编制简要财务报表。

从发展趋势看，越来越多的国家在预算编制时采用权责发生制。

三、OECD国家采用权责发生制的经验与挑战

（一）各国权责发生制改革的实施和完成情况

在过去20年中，越来越多的国家从纯粹的收付实现制向权责发生制转换。从调查情况来看，大部分国家已经完成了权责发生制改革，有些国家的改革仍在进行中，只有少部分国家表示从未考虑进行权责发生制改革。

从已经完成权责发生制改革的国家来看，不同国家，其改革的目标和范围存在明显差距。例如，英国的改革包括所有公共部门实体向权责发生制的转变以及权责发生制预算的引入，而法国的改革只强调在中央政府预算层级上实施权责发生制会计。权责发生制也存在很多的变种。

少部分国家未考虑进行权责发生制改革，其主要原因是缺少政治支持。例如，德国担心改革的成本高于收益，荷兰则认为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编制的预算和财务报告已经足以提供所有必要的信息。

（二）权责发生制改革带来的好处

报告指出，权责发生制改革是各国公共管理改革的一部分。信息使用者的需求引导了改革的设计。报告对各国进行权责发生制改革的动机进行了分析，表明权责发生制改革可以带来如下好处：

一是有助于公允反映各国的公共财政状况，评估各国政府运营所耗费的全部成本，并有助于引入或强化绩效文化，推动实现公共管理的现代化。

二是有助于提高透明度和问责制。例如提高财政透明度和促进科学决策，满足对外报告的要求等。

三是有助于战略性资源管理。例如，帮助政府将战略转化为行动，为决策提供更多的信息，提高公共部门对预算、支出、财务进行管理的能力等。

四是有助于增强成本意识，加强成本管理。例如，对资产和负债进行记录，包括对基础设施资产和员工福利等的核算，能够有助于评估公共部门耗用的所有资源，衡量公共部门运营的成果。

这些国家认识到，为满足内外部信息使用者的需求，财务报告应当全面反映政府的收入、费用、资产和负债。财务报告需要同时有较广的覆盖范围，提供整个公共部门的信息，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或至少对某一层级的政府的全面反映。权责发生制会计改革，尤其是在基于国际准则的情况下，被认为是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

（三）权责发生制改革中的挑战与建议

报告指出，进行权责发生制改革的国家，在改革进程中遇到不少共有的挑战：

一是资产和负债的确认与计量。这被认为是改革的预备阶段所遇到的最具挑战性的问题。很多国家对其拥有和确认的资产，尤其是非金融资产等，缺少可靠和完整的记录，更别说对这些资产进行计价了。对公务员和军职人员的养老金负债、PPP的确认和报告，有理论概念上的挑战，也有计价方面的挑战。

二是新信息系统的引入。这是大多数国家在改革的实施阶段遇到的最大挑战。引入一种新的信息系统本身就是一件具有挑战性的事。在改革中，不仅要引入新的系统，还要保证新系统能够支持权责发生制这种新的会计基础，更增加了其挑战性。

三是修改相关的法律。因为这需要与国家的政治领导人沟通以获得其支持。合并报表的编制、在约定的时间内编制完成财务报表也有困难。

针对各种挑战，各国也提出了一些应对挑

战的建议：

一是在改革之初就要认识到工作的复杂性，对改革工作排出步骤，并给予各机构足够的时间来完成改革工作。改革也可以分阶段进行，以有助于管控改革中遇到的挑战，最大程度上降低失败的风险。

二是尽可能在改革的较早阶段确定对信息系统的要求，并采用现成的商业化系统和与该系统配套的业务处理流程。

三是财政主管机关需要进行强有力的领导、高效的项目管理与合作，包括给予充分的培训和指导，成立专项工作小组。

四是要重视人力资源管理和相关人员的能力建设。这些国家强调了拥有懂得权责发生制会计、信息系统和合并报表的员工或咨询人员的重要性。

（四）改革目标的实现程度

约一半国家的财政部认为改革预期的好处已经充分实现，约1/3认为已经部分实现，其余的则反映现在尚不能评估结果。这些国家的财政部门认为透明度的提高和问责制的改善是改革主要的积极成果。一个有趣的对比是，在一些已经采用完全权责发生制的国家，其财政部门认为还应当进一步改革完善：

一是对外部利害关系人利用信息的情况，还不太满意。这是由于：议员们对权责发生制下产生的信息兴趣有限；有关政府运营的全部成本的信息并不总能获得，或者即使能够获得，也缺乏评估分析工具和方法以能够使用这些信息；公共部门的管理者主要对拨款流程负责，对使用权责发生制产生的信息动力不足；采用权责发生制对于管理流程效率的提高作用有限。

二是出于宏观财政目的，对权责发生制产生的信息的利用仍不平衡。许多国家反映，在进行财政预测时，权责发生制会计信息利用有限，现金余额、净债务仍然是关键的财政数字和政治辩论的焦点。但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反映，在将会计核算基础与财政报告的涵盖内容进行协调后，会计信息的有用性提高了。

最近正采取一些新的举措，以增进权责发生制产生信息的用户友好性和对预算决策的有用性。这些举措包括：缩短财务报表的编制时间，使用管理层评论、简化并优化财务报告流程，通过权责发生制会计信息将公共管理的效率告知公民和决策者，利用信息技术提高信息的可获得性，在财务报表附注中加入关键指标等。

（拟稿：唐建华 赵际喆）

国内财经 DOMESTIC FINANCE & ECONOMY

财政部修订三项企业会计准则 旨在防控金融风险

近日，财政部修订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等三项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旨在防控金融风险。新修订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规定，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判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分为三类，即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同时，新修订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将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修改为“预期损失法”，要求考虑金融资产未来预期信用损失情况。（摘自上海证券报）

中国内地IPO市场首季名列全球前茅

毕马威4月11日在港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内地A股IPO市场2017年开局走势凌厉，上海和深圳在今年第一季度集资额名列全球前茅。报告还指出，虽然香港的IPO集资额有所放缓，但上市公司行业及地区分布呈现多元化趋势。毕马威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服务组华北区主管合伙人温梓佑表示，在经济表现渐趋稳定、市场情绪逐步升温的背景下，内地股市也在稳步增长，为企业上市创造了有利环境。报告显示，今年首季，内地共有134家企业上市，共集资700亿元人民币，以集资总额计算，上海和深圳分别位列全球第二和第三。毕马威预期，随着中国经济表现进一步稳定及政府陆续推出优惠政策，今年IPO市场仍将保持强大增长动力。（摘自新华社）

2017年中国海外投资将稳中趋缓

安永4月13日发布的《中国走出去》第五期报告《风控筑基——中企构建全球版图》指出，2016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2015年基础上激增30%，达到1888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其中地方企业已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中坚力量。安永预测，2017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将呈现稳中趋缓的趋势，同时将进一步强化对各类海外投资风险的应对能力以提升海外投资效益。安永中国海外投资业务部全球主管周昭媚表示，2016年中国进一步深化“走出去”进程，成为世界资本市场的主力军。中国不但在“一带一路”沿线铺路搭桥，在欧美等发达地区的投资也不断攀升。她指出，“中国企业不仅已经‘走出去’，还在‘走上去’。2016年中国投资者海外并购的主要目的已从获取生产要素升级为完善产业布局，并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中企海外并购过程中多元化产业同步快速发展趋势更加明显。”（摘自经济参考报）

一季度表外融资增加较多 在社融中占比上升

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新闻发言人阮健弘4月14日指出，一季度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这三项表外融资增加较多，在社会融资中的占比上升。央行刚刚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6.9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2268亿元。其中，一季度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4.5万亿元，同比少增1615亿元；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增加782亿元，同比多增3072亿元；委托贷款增加6347亿元，同比多增862亿元；信托贷款增加7349亿元，同比多增5756亿元；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增加6800亿元，同比多增9005亿元；企业债券融资净减少1472亿元，同比多减1.5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2948亿元，同比多108亿元。3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12万亿元，比上月多1.03万亿元。（摘自中国证券网）

麦肯锡城市可持续发展报告:深圳第一 北京跌出前十

麦肯锡公司“城市中国计划(UCI)”4月14日发布了2016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数报告(USI 2016)。USI 2016显示，大多数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水平都在稳步提高，带来整体发展水平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社会和

国内财经 DOMESTIC FINANCE & ECONOMY

经济方面的改善。2016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综合排名前10位依次为：深圳、杭州、舟山、珠海、宁波、广州、威海、湖州、中山和绍兴。与2011年相比，厦门、大连、福州、北京、长沙和烟台六个城市跌出前十名。大中经济体量城市和小经济体量城市之间的差距在过去的3年里呈现出了扩大的趋势。（摘自第一财经日报）

香港财汇局盯住公司财报“黑五类”

香港财汇局行政总裁卫皓民表示，将重新检视财务报表审阅计划，包括加入“筛漾制”，以更有效地识别可能不遵从会计规定的事宜或审计不当行为。经修订后的“筛漾制”将专注调查五类公司，这相当于财汇局给了这些公司以“红色”警告。这五类公司包括，由于出现意见分歧或未解决事项而更换核数师的公司；聘用小型会计师行处理复杂审计问题的公司；基于媒体报导其财务报表涉嫌有不遵从会计规定事宜、有审计或汇报不当行为以及被香港交易及结算有限公司（港交所）介入的公司；作出重大前期调整的财务报表（投资者或受该前期财务报表误导）的公司；附有非无保留意见核数师报告的财务报表的公司。卫皓民还指出，财汇局过去5年的平均投诉数目为每年25宗，但2016年度接获的投诉数目则上升至118宗，增幅达3.7倍。（摘自投资快报）

五部委发文支持12个转型升级示范区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支持首批老工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建设的通知》，支持12个城市（经济区）建设首批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分别是，辽宁中部（沈阳-鞍山-抚顺）、吉林中部（长春-吉林-松原）、内蒙古西部（包头-鄂尔多斯）、河北唐山、山西长治、山东淄博、安徽铜陵、湖北黄石、湖南中部（株洲-湘潭-娄底）、重庆环都市区、四川自贡、宁夏东北部（石嘴山-宁东）。《通知》明确各示范区下一步要重点探索的示范领域，包括支持传统优势产业改造升级和延伸产业链、通过创新加快培育新技术新产业、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和加强产业合作、加快特色产业园区和产业集群建设、推进军民融合、探索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发展、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等。（摘自一财网）

一季度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放缓

普华永道的统计显示，受2016年底有关部门出台政策限制非主业、非理性大额投资的影响，2017年第一季度中国大陆企业海外投资步伐放缓。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大陆企业海外并购交易142宗，交易金额212亿美元，相比创纪录的2016年同期交易数量下滑39%，交易金额下降77%。不过，尽管今年第一季度海外并购交易数量与金额同比双双下滑，但与2015年第一季度以及之前同期相比，仍然有明显增长。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大陆企业海外投资数量达到920宗，较2015年上升142.1%，交易金额激增至2125亿美元，几乎是2015年的3.5倍，48宗大额海外投资交易金额超过了10亿美元。虽然2017年第一季度海外投资步伐放缓，但仍有7宗大额交易金额超过了10亿美元。（摘自第一财经）

2017年《中国贸促会出口促进路线图》发布

4月19日，中国贸促会发布2017年《中国贸促会出口促进路线图》。《路线图》介绍了中国50个重点出口市场的经贸形势和机遇，详细列出优质出口促进项目306个。其中，从项目主办地看，涉及北美洲项目25个、欧洲项目36个、亚洲（不含中国）项目67个、非洲项目9个、大洋洲项目4个等。值得注意的是，网络版本的该《路线图》包含项目数量更多，目前达349个，额外包括50个重点市场以外的项目，网址为mep.ccpit.org。据介绍，今年《路线图》所提供的出口促进项目含八大类：展览、经贸组团、论坛、研讨会、对接洽谈、商贸平台、服务平台和培训；涵盖领域有农业畜牧、工业制造、智能制造、纺织轻工、互联网、服务贸易、能源环保和商事法律等近22门类的79个行业。（摘自中国证券网）

国内财经 DOMESTIC FINANCE & ECONOMY

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试点扩围 500亿试点额度仍保持不变

在试点重启一年后，不良资产证券化迎来扩围期。上证报记者独家获悉，包括民生银行、光大银行、中信银行、兴业银行、北京银行等多个股份制银行及城商行入围第二批试点，不过在试点机构增加的同时，试点额度仍为500亿元。可预期的是，不良资产证券化试点将成为银行处置不良资产的一大可选手段。据4月18日发布的《中国资产证券化白皮书(2017)》披露，2016年我国信贷ABS市场累计发行14单不良资产支持证券，发行金额156.10亿元，累计处置银行不良资产本息510.22亿元。据央行金融市场司司长纪志宏为白皮书撰写的序言，2016年发行的不良资产支持证券基础资产涵盖公司不良、个人消费不良、个人经营性不良、个人住房不良等类型。（摘自上海证券报）

保监会发文强调风险防控险企要避免激进投资策略

中国保监会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险监管 维护保险业稳定健康发展的通知》。防范保险资金运用风险方面，要求保险公司建立审慎稳健的投资运作机制，加强资产负债管理，不能仅以收益率作为投资目标和考核依据；严禁通过投资多层嵌套金融产品、采用“抽屉协议”“阴阳合同”等形式绕开监管变相向股东或关联方输送利益。防范战略风险方面，要求保险公司加强对公司股权关系和实际控制人的披露。《通知》要求做好群体性事件风险防控。防范资本不实风险方面，《通知》要求保险公司加强资本管理，防范资本被抽逃占用；保险公司股东不得通过关联交易、多层嵌套金融产品、增加股权层级等方式从保险公司非法获取保险资金，用于向保险公司注资或购买保险公司发行的次级债。（摘自新华社）

国际财经 INTERNATIONAL FINANCE & ECONOMY

巴西央行大幅降息100个基点 创八年来最大降幅

巴西央行4月12日调降利率，降幅为将近八年来最大，显示该国央行或将保持大规模宽松政策，来帮助经济走出巴西史上最艰困的衰退。央行九位货币政策委员均一致赞成降息，将指标Selic利率下调100个基点至11.25%，为近两年来最低水平。此次降息幅度也是2009年6月以来最大。巴西总统特梅尔发表推文赞许央行降息，但是他的内阁有三分之一官员被卷入新一波贪腐调查，或将令特梅尔的搏节改革受挫，央行进一步降息的空间可能减小。该央行在决议声明中表示，委员会认为目前宽松的步伐是合适的；不过在当前的经济情况下，有必要密切注意周期前重后轻程度之决定因素的进展态势。不过部分分析师认为，倘若通胀持续放缓，且经济仍旧疲软，巴西央行未来可能不得不选择更大幅度的降息。（摘自汇通网）

东亚未来三年经济前景普遍向好

世界银行4月13日发布《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半年报》称，在内需旺盛、全球经济与大宗商品价格逐步复苏的推动下，东亚发展中国家未来三年经济前景预计仍然普遍向好。在经济持续增长与劳动力收入增加的助推下，该地区贫困率有望继续下落。报告预计中国经济随着向消费和服务业转型而继续逐步放慢步伐。报告预测中国2017年经济增速为6.5%，2018年为6.3%。包括东南亚大型经济体在内的其他国家，预计2017年经济增速将从2016年的4.9%小幅上升至5%，2018年至5.1%。从总体来看，东亚太平洋地区发展中国家2017年增长预测为6.2%，2018年为6.1%。推动东亚地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仍然是强劲的内需，包括公共投资和日益增加的私人投资。随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复苏，这一趋势还将得到进口需求逐渐回升的支撑。（摘自经济参考报）

“缩表”造成恐慌性市场动荡可能不大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副主席费希尔4月17日表示，美联储未来开始收缩资产负债表（“缩表”）时造成恐慌和大范围市场动荡的可能性不大。费希尔当天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发表演讲时说，美联储在3月份货币政策例会前对华尔街主要交易商和其他市场人士进行的调查显示，市场预期美联储要到2018年才开始收缩资产负债表；而3月份的货币政策例会纪要显示，多数美联储官员认为今年晚些时候可能就适合开始收缩资产负债表，不过金融市场对此反应却较为平淡。费希尔认为，截至目前市场对美联储收缩资产负债表相关讨论的平淡反应意味着，当美联储开始收缩约4.5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时，不太可能出现2013年5月份由于担心缩减购债而引起的恐慌和大范围市场动荡。（摘自上海证券报）

加拿大“一跃”成为G7成员国中经济增长最快国家

据加拿大央行数据显示，加拿大这个在过去2年里被低迷油价拖累的石油生产大国今年一季度最新数据录得了接近4%的增长幅度；一跃成为G7国家中增长数据最抢眼的国家。加拿大央行预计全国GDP将在2017年增长2.6%，这也将成为G7成员国中2017年增长幅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上周央行在渥太华的利率会议上调高了对2017年度的经济增长预期，但同时对于2018年展望持保守态度。央行的观望态度也为整体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长期增长预期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政府高官Carolyn Wilkins 4月12日在记者采访时表示，“加拿大央行对近期的经济数据表示非常满意，对于后期增长政府还需要更多数据来建立对加拿大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信心”。（摘自FX168）

特朗普要求美财政部重新审议金融监管规定

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1日签署备忘录，要求美国财政部重新审议2008年金融危机后有关大型金融机构的监管规定。特朗普要求暂时禁止美国监管机构将新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指定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

国际财经 INTERNATIONAL FINANCE & ECONOMY

和使用“有序清算权力”对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进行清算。备忘录还要求美国财政部在180天内重新审议这两项监管权力的决策程序，重点关注是否会让美国纳税人遭受损失或鼓励美国企业更加冒险。特朗普当天在美国财政部举行的签署仪式上表示，这些金融监管规定起到了相反的作用，不仅没有遏制金融机构“太大而不能倒”，而且鼓励它们更加冒险。特朗普当天还签署一项行政令，要求美国财政部识别那些给美国纳税人造成不必要经济负担和使得美国税务法过于复杂的法规，并采取适当的举措来暂停、推迟实施或修改这些法规。（摘自中国金融信息网）

美媒体称特朗普税改方案拟将企业税降至15%

美国媒体4月24日报道，特朗普政府的税改方案计划将企业所得税税率降至15%，以兑现其竞选承诺。《华尔街日报》当天援引一位不具名的美国白宫官员说，特朗普总统要求在税改方案中把企业所得税税率从目前的35%降至15%。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当天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说，企业税改将让美国的企业税更有竞争力，可以让美国企业将数万亿美元的海外资金汇回美国国内。对于个人所得税改革，姆努钦说，方案将针对中产阶级大规模减税，同时还将大幅简化税制，让美国人可以在一张“大一点的明信片”上完成报税。对于减税对政府收入的影响，姆努钦重申税改方案将依赖经济增长来抵消大规模减税对财政收入的影响。他说，特朗普政府可以通过税改和放松监管来推动经济实现3%以上的可持续增长。姆努钦当天并没有就税改方案细节透露更多信息。（摘自新华网）

英国上市公司一季度发布盈利预警数量上升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日前发布的一份报告说，今年第一季度，75家英国上市公司发布了盈利预警，比去年第四季度多了两家。报告指出，英镑疲弱及物价上涨是导致当季上市公司发布盈利预警的主要原因。根据安永公布的数据，这些上市公司中，28%因成本上涨和价格压力上升而发布盈利预警。报告显示，发布盈利预警的主要是旅游休闲、软件和计算机服务及非人寿保险企业。安永分析师艾伦·赫德森认为，全球经济向好以及英镑贬值对出口的积极影响有利于减少近期盈利预警的数量。“但日益增长的管理费用，政治局势的不确定性和监管变化等都对存在长期结构性问题的部门，尤其是消费和服务部门构成压力”。根据安永的这份报告，2017年英国国内生产总值(GDP)预计增长1.8%，2018年增速将下降到1.2%。（摘自新华社）

德国商业信心创六年新高

德国慕尼黑经济研究所(IFO)4月2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衡量商业信心的德国4月企业景气判断指数由112.4上升至112.9，创下2011年7月以来最高水平，表明企业高管对德国经济更为乐观。本次IFO调查在4月上旬进行，数据基于对大约7000家公司的调查整理得出。不过调查同时显示，企业高管对未来6个月德国经济前景的乐观程度轻微下滑。IFO经济学家称，德国经济并未受政治不确定性影响，企业预期指数下降主要受工业拖累，并不表明整体经济景气度出现改变。IFO预计第一季度德国经济表现良好，英国“脱欧”不是德国企业目前关注的问题。该机构预期德国2017年经济增速为1.5%，2018年将提升至1.8%。（摘自中国证券报）

IMF对全球经济增长有信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在刚刚落幕的春季年会上发布了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上调2017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至3.5%，比今年一月的报告上调0.1%。报告指出，由于2016年第四季度世界经济增速强劲且有望保持，2017年和2018年全球经济前景较2016年更为乐观。尤其是2016年下半年，较强的市场需求和市场情绪刺激了商品价格大幅上涨。IMF表示：“由于商品价格的上涨，发达经济

国际财经 INTERNATIONAL FINANCE & ECONOMY

体的总体通货膨胀率将持续上涨，但核心通货膨胀率仍处于较低迷状态。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总体通货膨胀率有所回升。只有少数国家由于2015年和2016年初的货币极速贬值，通货膨胀率仍将继续下滑。”（摘自国际商报）

世界银行与亚投行签署备忘录加深合作

世界银行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4月23日在华盛顿签署了一项备忘录以加深双方未来合作。世行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份备忘录将为双方在开发融资、人员交流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领域提供合作框架，为双方在地区以及国家层面的协调合作打下基础。世行行长金墉在声明中说，自亚投行启动以来，世行就与亚投行开展了紧密合作。他说，多边开发机构的合作对于调动稀缺资源、吸引私营部门参与以及满足发展需求来说至关重要。亚投行行长金立群在同一声明中也表示，签署这份备忘录符合亚投行奉行的新型国际化理念，进一步深化了亚投行与世行的合作关系。他说，双方通过合作有望在亚洲地区取得更多积极成果。声明还说，世行与亚投行正在商讨今明两年可以合作的联合融资项目。（摘自新华社）

国际会计行业动态

近日，来自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理事会、国际会计师联合会的代表在美国华盛顿共同举办了以“透明度之上——公共财政管理的权责发生制”为主题的国际论坛。会议就权责发生制会计准则如何在改善公共部门财政透明度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展开了讨论。

国际会计师联合会近日发布名为《税收中的G20公众信任》的调查问卷。该文件由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特许会计师协会，以及国际会计师联合会共同研究发布，面向G20成员国家的7600余名受访者，就当前国际税收面临的公众信任问题进行了调查。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28日批准了三个总计2.85亿美元的贷款项目。至此，该机构批准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贷款已超过20亿美元。这三个项目分别为1.25亿美元的印尼大坝运行改善与安全工程项目二期，1亿美元的印尼区域基础设施发展基金项目，6000万美元的孟加拉天然气基础设施和效率升级改造项目。

日本金融服务局（PSA）近日发布《审计事务所有效管理原则》（又称为“审计事务所治理准则”），包含五条审计事务所内部管理的原则，以及有效落实这些原则的相关指南。

新加坡特许会计师协会（ISCA）近日与英格兰及威尔士会计师协会（ICAEW）签订两会会员互认协议（RMA），该协议有效的增强了“新加坡特许会计师”这一资质的国际流动性。根据协议，符合条件的双方协会会员无需经过任何考试，即可获得对方协会的会员资格。同时，新加坡特许会计师协会还与苏格兰特许会计师协会（ICAS）签订了类似协议。

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ACCA）发布了题为《综合报告见解》的报告，汇集了对来自全球的41份公司报告的回顾以及对部分报告编写者的采访。报告发现，参与“‘综合报告’企业网络”的企业报告质量普遍较高，且通过采用综合报告，企业在以下方面获益，包括：更综合的思考与管理；更清晰的企业问题与业绩；改善了企业声誉及股东关系；更有效的报告；员工参与度及毛利润的提高。当然也有需要进一步改进的方面，包括：价值创造、关联性、界定绩效指标、重要性、简洁性、可靠性及完整性。

国际注册专业会计师协会（the Association）和企业司库协会（ACT）日前联合发布了《财富与现金管理概要》。作为一份实用指南，《概要》帮助管理会计师深化对企业主要资金业务的了解，从而为企业增值。此份指南指出了现代财务的主要职能，并为帮助管理会计师提高有关方面的能力提供了工具与资源。

澳大利亚公共会计师协会（IPA）赞扬IFAC近期针对全球经济体减少腐败所进行的最新研究，IPA首席执行官安德鲁·康威先生（Mr. Andrew Conway）表示会计师在打击腐败方面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该报告

国际财经 INTERNATIONAL FINANCE & ECONOMY

强调了良好治理的重要性，肯定了会计职业技能在会计师在持续打击腐败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其中主要的研究显示，在企业中会计师占的比例越高，透明度国际清廉指数则越好。同时，该研究还表明了跨部门治理结构的重要性。

欧盟网络安全监管法令《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将于2018年5月生效，以便加强欧盟内部个人信息保护工作，违者除缴纳高达2000万欧元或全球年度营业额4%罚款外，必须接受强制性审计和暂停数据转移业务的惩罚。该法令要求公司，特别是服务于中层市场的公司遵循相关要求。

国际独立审计监管机构论坛（IFIAR）已在日本东京开设总部并召开首次理事会会议。该论坛已与全球六大事务所（四大+BDO和致同）首席执行官讨论强化审计质量和执行力度、事务所轮换和招标及技术等问题，计划在全球范围内强化审计质量，加强其成员及相关方之间的合作。

普华永道发表《2050年的世界》报告。报告认为，得益于技术，生产率将大幅提升，世界经济将于2050年至少翻一番，远高于世界人口增速；新兴市场国家平均增速明显高于发达经济体；届时，世界最大经济体分别为：中国、印度、美国、印度尼西亚，英国将位居第10位。但新兴市场国家需首先大幅强化制度建设并改善基础设施。

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公布了2017年阿特拉斯可持续发展目标，通过超过150个地图和可视化数据，对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和169个目标进行了阐述。阿特拉斯是世界发展指标的一部分，对世界各地人类生活和发展提供了高质量的跨国比较统计。（中注协国际部供稿）